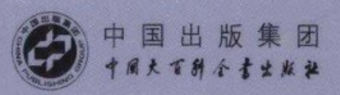


德国史

史蒂文·奥茨门特 著 邢来顺 肖先明
常县宾 徐继承 刘馗 译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ISBN 978-7-5000-8237-8

9 787500 082378 >

定价：48.00元



德国史

The German People



图字:01 -2009 -5513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by Steven Ozmen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史/奥茨门特著;邢来顺等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 -7 -5000 -8237 -8

(世界历史文库)

Ⅰ.德… Ⅱ.①奥…②邢… Ⅲ.德国-历史 Ⅳ.K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946 号

责任编辑 陈 光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960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引言
寻找优秀的德国人

近期德裔美国人举行了一次社区聚会，一位首次造访美国的德国人与我同席。我问这位同桌对美国印象如何，得到的答复是："与别的国家相比，美国人民更有教养且不善言辞。"令人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做出让人满意的回应，数分钟后我才想起来：当今的美国人中，有 5 800 万人有全部或部分的德国血统。①

1

几个世纪以来，不管是外国人还是德国人自己都认为，德国人致力于自我约束和良好的秩序，拥有完美的技术技巧，并且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引以为自豪，不过，他们的这种执著、技巧和自豪却近乎固执、苛求和令人吃惊的傲慢。当然，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其他的国家和人民。对德国人而言，这样的说法只是一个复杂而令人困惑的民族各种奇闻轶事的某种表现而已。这个国家的事业一直在发展着，但她从一开始就在欧洲历史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尽管很少有人认为德国人挽救了西方文明，然而，无论是这个文明受到不同寻常的危害，抑或获得非凡的成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德国人这样持久地居于

2

① 大约 1 830 万人宣称具有德意志血统。"You Told Us: Ancestry": 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ancestry/German.txt。

这一文明的中心位置上。德国人是欧洲各民族中最难理解的群体，没有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就无法清晰地讲述欧洲的文明历史。尽管现代史学常常对德国的描述只有寥寥数笔，但作为具有特殊和普遍意义的历史，有关德国的故事却充斥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布莱希特和格拉斯的作品中。

在战后的多数时间里，在涉及到德国问题的讨论时，通常以 1933 年希特勒和纳粹的掌权为开始，也以之为结束。新生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其论著中利用更大的结构力量（工业化、经济和国内政治）来代替伟大人物的作用，讲述时间更长和更为复杂的德国历史。与这种史学的转变相对应，新生代的德国政治领袖们决心将他们的国家带入与欧洲及世界诸强合作的国家行列。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后果是，出现了一个为人期望的行为正常的德国。

尽管德国的发展方向令人颇为乐观，但是事实证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遗产是无法动摇的，人们仍然囿于对这笔遗产的迷茫、痛苦和困惑之中，不能前行。因此，德国历史的内容大体上仍是以纳粹和犹太人为主。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在考察德国的历史时，仍然围绕着纳粹这样一个吸引人的话题，这种状况不仅让普通大众沉迷不悟，也让期待前行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感到迷惘。这种持续的景象已经将 20 世纪以前的德国历史变成了寻找纳粹主义先驱，探寻民主未能替代绝对领土国家原因的猎场。

因此，甚至在德国国内都存在着一种流行看法，人们似乎相信：如果深刻地挖掘，揭开历史的表象，那么德国人一直是隐藏的法西斯主义者。[①] 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媒体之所以塑造这样虚假的印象，首要的原因是继续将普鲁士成为强权帝国和第三帝国失败之间两个世纪的 3 历史视为整个德国的历史，其次是人们从 1933 年纳粹掌权这一事件倒过来解读德国历史。在美国，“历史频道”就以“希特勒频道”而著称，其节目主题通常是元首和第三帝国，许多美国人不假思索地就把

---

① See below, chap. II.

纳粹等同于德国人。在历史人物的传记中，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记在最畅销的出版物中仍有很大的比重。

今天的德国研究已经处于两种相互矛盾的方法交叉的十字路口，两者都是寻找那些能将德国带回到20世纪以前的先导和先例。[①] 第一个办法较为古老，其使用也正在减弱，它是从德国历史中寻找延伸到第三帝国时期的阴暗面，发现德国历史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是异常的。另一个办法是从德国历史中寻找1949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兆，指出过去和现在的德国都有众多这样的前辈和迹象。在老一辈中，不论是学者还是学界之外的人，都曾经更坚定地从过去的久远历史中求助相关的线索。然而，上述两种方法都对现代社会之前的德国久远历史缺乏深厚的兴趣。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讽刺从遥远古代的背景来考察德国历史的努力，将之称为“塔西佗假设”。[②] 所谓的“塔西佗假设”，意为一种被引入歧途的信念，即一个了解德国部分历史的人就认为了解了整个德国历史。这可追溯到第一位日耳曼历史的研究者古罗马的科纳里乌斯·塔西佗（55—120）。

一、历史学家

在试图解读德国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积聚之地时，历史学家们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它们相互碰撞而又相互补充。他们都是实证主义者，相信事实，认为事实意味着不言而喻。他们的这种做法却伤害了那些移民派历史学家，这类历史学家只能用我们可以理解的少得可怜的笔墨来描述德国的过去。最近，两代自由主义左派社会历史学家被归并到史学阵营内，他们分别是老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所谓的批判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的英裔美国历史学家，他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老一代的历史学家将自己的角色理解为医生和文物工作者，不仅致力于重建过去而且致力于揭露和切除目前坏死的肌体。他们在

4

① Cf.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 pp. 11—40, esp. 114—15.

② The phrase is Rolf Dahrendorf's. See chap. I.

书写近现代德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道德要求，而作为对这种要求的反应，历史学家的目标就是要解放和借鉴。

在寻找罪魁祸首时，通常的最大嫌疑犯就是19世纪普鲁士主宰下的德意志帝国，它带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敌视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①] 用戈登· A. 克雷格的话说，在追溯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看来，政治上碎片化的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逐步演变为“服从的乐土”。[②] 这种看法认为，德国的中心地区很久以前就分裂为多个征战不休的领地国家，其民众相继受到天主教、新教和虔诚派等教派的神职人员所宣扬的尊崇统治者的教育，因此直到18世纪末期也未接受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的启蒙思想。这样一来，面临危机时滑向强人统治就是德国的第二个特征了。在分裂与驯服中，德意志国家统一和政治民主的机会就不是或早或晚的事儿了。

在与美法两国的革命政治作比较时，想象中的德国政治和社会的落后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20世纪后半期批判历史学家的著作认为，在19世纪，德国工业、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取得进步的高大形象无法与其保守的政治社会组织相容。1830—1880年的德国到处都是铁路、汽灯城市、报纸和大学；无论在历史、哲学领域还是在语言学和法律的研究领域，最新的世界领军人物都在德国。德国人甚至在医学、生理学、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860—1879年间，德国科学家有70项新的医学发现，而世界其他国家总共也只有

① 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Conn., 1975), pp. 93—94, 96—98; Jan-Werner Müller, *Another Country* (New Haven, 2000), chap. I; Isabel V. Hull,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1888—1918* (Cambridge, 1982), pp. 1—3. Leonard Krieger, “German History in the Grand Manner” (review of Gordon A. Craig, James J. Sheehan, Fritz Stern, and Hans-Ulrich Wehl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4 (1979): pp. 1007—1017. Wehler’s three-volume, 2300-page narrative: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Reformära 1700—1815; 2: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1849* (Munich, 1987);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unich, 1995). Subsequent volumes carry the story forward to 1949.

② Gordon A. Craig, *The Germans* (New York, 1982), p. 22.

55 项而已。[1]

然而，与此同时，德国向美国、南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来的移民却日益增多。1850—1870 年间，即德意志政治反动和国内民主运动失败后的半个世纪，出于对政府的社会歧视和宗教迫害的不断增长的恐惧，有 170 万德意志人移居到了美国。[2] 一份在德国流行的美国指南曾描绘说，在新移民所到达的这一国度里，个人天赋和能力比与生俱来的特权更为重要，这里既没有诸侯，也没有他们所谓“王权神授”的腐败宫廷。[3]

批判历史学家们谴责德国政治的退化，并将之归因于中等阶级的软弱无能。这些前途光明的市民们不但未能用新的民主制度来消除顽固的容克、官僚和军官，反而日益屈从于他们的统治，新的德国未能打破旧制度的桎梏。有看法认为，在从 19 世纪进入 20 世纪的进程中，中产阶级将对民主的热情转移到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上。于是乎，他们也加入了传统精英之中，破坏了德国按照美国、英国或法国的模式发展的民主道路。根据这种诠释，德国过去很长时期内迈向政治现代化的最初步伐，是由更具有启蒙性的法国从外部施加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非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拿破仑和法国人占领德国的莱茵兰，德国仍将处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等级森严的中世纪社会。[4]

---

① David Blackbour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Oxford, 1998), p. 275.

② Edward R. Brandt et al, Germanic Genealogy: *A Guide to Worldwide Sources and Migration Patterns* (St. Paul, 1995), pp. 137—171; John A. Hawgood, *The Tragedy of German-America: The Germans in the U. S. 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New York, 1940), pp. 57—58. See also Mack Walker, *Germany and the Emigration, 1816—1885* (Cambridge, Mass., 1964), and Anne Galicich, *The German Americans* (New York, 1996), pp. 13—17.

③ F. W. Bogen, *The German in America* (Boston. 1851), pp. 39—41, 57.

④ Richard J. Evans "Whatever Became Of the Sonderweg?" in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From Unification to Reunification, 1800—1996* (London, 1997), pp. 12—14; Krieger, "*German History in the Grand Manner*"; James Van Horn Melton, review of Wehler's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1990): 189—190.

1. 优秀的公民

6 近来，历史学家们日渐摒弃了对德国历史所进行的这种乏味和笼统性的判断。他们指出，19 世纪德国公民社会的启蒙和进步是持续不断发展的。对德国中产阶级的轻率批评尤其受到质疑。在一系列严谨和翔实的研究中，一个更加复杂和进步的德国社会浮出水面，德国中产阶级比老一代历史学家所宣称的更为成功，这反映了德国与欧洲其他进步国家的相互呼应。虽然中等阶级的革命并不突出，影响力也不大，但它毕竟在德国发生过，并详尽阐述了各种个人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工作权、结社权、言论权、保护权和博爱权，还有法制。① 在公务员、企业家和政治领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与旧德国并立的新德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尽管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革命具有局限性，并遭到镇压，但它与当代的欧洲民主很相似。它的成功表明，通向民族社会主义之路并非直接和不可避免的，同样也表明，倘若遇到德国受到的聚集起来的诸种危机的打击，其他欧洲国家取得的更大进步也未必能使它们避免后来在德国所发生的事。② 最起码讲，这种对 19 世纪的德国更有同情心的解读表明，它并非如其他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确定无疑的“纳粹的前室”，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③

还有一种类似的看法也成了这种修正传统看法的牺牲品。这种类似的看法根据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样一种地理位置来推论德国走上特

---

① Eley defends, “a less abject bourgeois rol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Blackbourn cites advances in “property rights and ideas of competition, the rule of law, the Emergence of philanthropy” as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amounting to a programme…which created … a new king of public man” .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84), pp. 13, 164

② Harold James, *A Germany Identity, 1770—1990* (New York, 1989), p. 212, See below, chap. II.

③ 参见“持续的辩论 ”, in James F. Harris, ed., *German-American Interrelations: Heritage an Challenge* (Tübingen, 1985), pp. 55—94; James J. Sheehan, ed.,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76); Richard J.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London, 1978)。

殊的极权主义道路。德国地处中欧的位置使其至少在两条战线上无法防卫（奥地利被从组成德意志帝国的诸邦中排挤出去后，德国就有3条战线无法防卫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地理位置对德国而言既是良好的栖息之地，也是个陷阱；既易侵略他国，也易被别人侵略。由于这种地理位置对猎捕者和牺牲者都有利，因此，从德国历史的复杂性而言，无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辩解史学，还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扩张主义的批判史学，都是不公正的。①

7

2. 变色的历史

将更为复杂的德国从二战后阴郁的道德化史学中挽救出来，也是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的任务，这是一位批判历史学家的伟大批判家。他作为改革派历史学家开始了职业生涯，既具有前瞻性优势，又具备了前辈的长处。他也相信可靠的历史必须如撰写编年史那样从过去写到现在，而非如战后历史学所喜欢的那样从现在写到过去。知道一个故事的结尾，然后在这一故事结局的驱使下去了解整个故事是一回事，而从一开始来讲这个故事就是另一回事了。尼佩代

---

① 比较 Charles S . Maier, "German War, German Peace", in Mary Fulbrook, ed. , *Germany Since 1800* (London, 1997), pp. 539—555; 比较 Evans, *In Hitler ' s Shadow* , pp. 104—107. 在铺平通向1933年的道路过程中，并非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历史学家所相信的那样，19世纪的大公司和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彼此串通一气。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参见：Henry A. Turner, Jr. ,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Jeffrey Diefendorf, *Businessmen and Politics in the Rhineland* (Princeton, 1980); Ro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London, 1968)。事实证明，处于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统治之下的帝国政府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是早期的盲目排外的纳粹主义者。对现实外交政策和殖民扩张竞争的担忧，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以及对叛乱充满恐惧，这些因素在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决策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有关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国内政治局势（"权力的结构"，"社会阶层的畸形"）以及帝国政府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连贯性的研究，请参阅 Fritz Fischer 的两本著作：*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üsseldorf, 1961; English ed. , 1967) 以及*Krieg der Illusionen* (Düsseldorf, 1969; English ed. , 1975)。参见 Hull, *Kaiser Wilhelm II* , p. 1。

在多卷本德国史的首行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写道：“拿破仑是开启者。”① 德国近现代史以 1805—1806 年法国大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占领德意志的莱茵兰为开端，而不是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开始，因为它几乎无法给德国历史提供线索。如果将 1933 年作为德国近现代史的首页，那么很可能最后一句话也在这一页上了。

然而，没有人怀疑过去给现在投下的浓烈的阴影，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这种阴影尤其强烈。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精英们到陆军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这条线是直接明了的，从威廉二世时期的沙文主义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派主义这条线也是如此。然而，自中世纪以来，德国人之中就存在着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和归化的德意志人的恐惧，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和归化的德意志人宁愿与王权联盟而置祖国于不顾。19 世纪和 20 世纪，忠于罗马的天主教徒、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都成功地超越了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成了近现代的象征。

8

尽管尼佩代欣赏 19 世纪的革新，但他并不认为在德国近现代史存在连续性综合症，也即德国现代史不是一种渐进性的基因疾病。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有些“新的东西”，它们既不能完全复原，也无法从中完整地找到它们之前的那些源体。从宗教改革时代的反专制运动到 19 世纪昙花一现的民主运动，德国的历史已经懂得不断改变政治组织形式。1919 年欧洲存在 25 个民主国家，到 1938 年已经倒下了 14 个。显而易见的是，德国不是唯一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蹒跚犹豫

① Evans, “Nipperdey’s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pp. 23—43. Nipperdey’s volumes: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Munich, 1983 [English, 1996]);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unich, 1990);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I: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的国家。[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界的这些批判的巨大教训具有两面性。从现在追溯过去来解读历史，这是理解历史而非借鉴历史。同样，人们对历史的信念也变形了，那就是，历史可以被解读成黑的，也可能被说成白的。正如尼佩代所描绘的那样：历史“具有相似性，模棱两可，并且充满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现实并不是一切事情都已经统筹安排好了的体系，除了那些‘连续性前景’的选择对象外，每向前一步都充满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并非整齐划一地归入进步与反进步或者民主与反民主的范畴之中”。[②]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十年中，德国处于正常状态。尽管如此，正如对德国人所有事物的争论一样，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出现了两极化。就尼佩代的批评来说，他不是消除黑色传说的白色骑士，而是位辩护士。他致力于粉饰美化近一个世纪的德国法西斯主义，以便说明统一的德国期望消除德国历史的痛苦因素。对于尼佩代，评论家理查德·J. 埃文斯认为，紧迫的问题在于，德国历史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否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责任“开脱”掉。[③] 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尼佩代承认德意志帝国和民族社会主义的连续性，然而却拒绝承认它们是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④] 尼佩代相信历史的色彩是一种灰色、混杂和矛盾的阴影，当他去消除阴影时，

---

① Nipperdey, “1933 und die Kontiuitä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n*Nachdenk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Essays* (Munich, 1987), pp. 186—205, esp. 168; 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ridge, 1985), chap. 7; Peter Blickle, *Gemeindereformation: Die Menschen des 16. Jahrhunderts auf dem Weg zum Heil* (Munich, 1985).

② Nipperdey, “1933”, p. 200.

③ Evans, “Nipperdey's Nineteenth Century”, pp. 28—31. 埃文斯认为尼佩代在德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中还不算声名狼藉之人。在埃文斯的史学回顾中，他对尼佩代的探讨篇幅远多于对自由主义者 Ernst Nolte 的关注（两者篇幅大致是20页对2页）。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试图将纳粹主义的罪行一般化，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激烈争吵。埃文斯给予尼佩代这般的关注，证明其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Beyond the Historikerstreit”, in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pp. 221—222; see below, chap. 12, n. 84. On the so-called*Historikerstreit*, cf. Charles 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Cambridge, Mass., 1989)。

④ Evans, “Nipperdey's Nineteenth Century”, pp. 35, 41.

9 他却不愿意将阴影等同于实质。最终，在这种逻辑之下，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民族社会主义、第三帝国和当今的联邦共和国都必须为自己辩护，任何一个都无法证明另一个有罪或为另一个开脱罪责。

埃文斯是英国人，他站在了批判历史学家们的一边。相较于那些试图洗刷掉德国历史污点的人，他更宽恕那些用纳粹的画笔抹黑了很大部分德国历史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真实的但不成比例的善恶。但是这种信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遇到极端的挑战。按照尼佩代的逻辑，好像这数十年与其他年代一样，也处于道德混乱的状态，严格地讲，相关研究也表明就是如此。然而，许多人无法忘怀和宽恕那个年代的各种恐怖，认为这样的信念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一种亵渎。

目前，许多人相信，从20世纪30年代的状况来解读德国历史的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而且也是过时的。人们正以一种更客观、更富有同情心的立场来重构德国历史。[①] 诚然，随着新的一代又一代德国人的出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悲剧距德国人越来越远了。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是德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因此，在那段黑暗岁月后出生的德国人不会再允许他们的生活为那种黑暗岁月所控制。指责尼佩代粉饰纳粹主义，会推动尼佩代进一步努力进行探讨。这是一种提醒：任何染指这一领域的人都会面对道德的挑战。[②]

二、政治家

1949年成立的东德和西德都有理由将1933年作为德国历史的中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都尽可
10 能紧密地与反纳粹的抵抗运动站在一起，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在民主德国，共产党就声称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天生敌人”，有权利

① Thus Evans on Wehler, “After Reunification”, in ibid., p. 238.

② 有关这一棘手的问题，其他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也有论述。比较：Tim Mason, “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Mason,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pp. 212—230。

继承“最优秀德国人的遗产”。联邦德国也有殉道者的鲜血要展示，这种鲜血既证明了其合法性，也提醒了那些很少将纳粹与德国人加以区分的征服者，那就是，在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一直存在一个另外的德国。[①]

由于盟国自己的政治经历以及对德国人期望值很低，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认为德国人集体犯罪的这种最初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也并非完全不对。联邦德国为自己的道德依据申诉说，最醒目的德国抵抗运动是施陶芬贝格在 1944 年谋刺希特勒。[②] 谋杀的幕后者并不是自由民主派人士。他们不信仰自由民主，也不信民族社会主义。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即使在魏玛共和国这样一个民主时代，他们也幸存了下来。他们是一些沉湎于保罗·冯·兴登堡传统之中的人。兴登堡是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如果没有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他的政府也能形成多数联合的话，他在 1932 年就会让希特勒黯然消失。[③] 施陶芬贝格等密谋者与兴登堡一样憎恨希特勒，也憎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使希特勒掌权和保持权力的民粹主义民主。如果他们的密谋获得成功的话，他们的新政府也不会出现丘吉尔或罗斯福式的人物，如果不使德国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边界和盟国承认德国在欧洲的绝对主权，他们的新政府也不会同意和平。[④]

然而，在德国过去两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方面，德国政府的官方看法并不强调这一点。与忙于追溯过去的历史学家一样，在向前看的投票民众的委托下，德国政府必须讲述自己的德国历史。它有责任将德国民众带向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是将他们丢弃于徘徊不前、无法掌握的历史之中。德国政府要讲述的是光明而非阴影。

德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馆都有德国政府每年出版的《德国概况》 11

---

① 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London, 2000), pp. 185—187

② 施陶芬贝格将炸弹安放在希特勒的脚下。

③ 参见第十章。

④ Kershaw, *Nazi Dictatorship*, pp. 188—189.

(以下简称《概况》)。这本书对政治挑战进行了简洁表达。《概况》除通过对各邦(在德文中,"邦"一词的复数叫做 Länder,单数为为 Land)进行逐个介绍来说明今天德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外,也概括了官方对 2000 年德意志历史的看法。[①] 在最近版本的《概况》中,德国历史从公元1世纪谢鲁斯克人的首领阿尔米纽斯即德国人众所周知的赫尔曼讲起,他率日耳曼军团于公元9年单独打败了3个罗马军团。《概况》以严肃讨论德国统一的代价为结束。

1999 年纪念版的《概况》认为,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对于重新统一的德国而言,回顾德国的历史,有9个特殊的年代,而《概况》在涉及历史时的主旨,是审慎地从中摘选了3个特殊年代。第一个年代是 1848—1849 年法兰克福议会,尽管它宣布德国公民享有民主自由,人人平等,但却没有落到实处。第二个年代是建立魏玛共和国的 1919 年,它继承了法兰克福议会未竟的事业,首次给妇女以选举权,并在德国国会中保留了仍然不甚相配的 41 个席位。[②] 然而,希特勒通过魏玛共和国颁布的非常法而攫取了权力,魏玛共和国随之寿终正寝。最后一个年代是 1949 年,标志是自由的国会批准了新的宪法——基本法,其中包含了防范极权统治再度发生的安全机制。[③]

为了进一步认识姗姗来迟的民主胜利,《概况》在这些德国民主的里程碑中又加上了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和 1990 年两德的重新统一。它对德国历史采取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指出民主的迹象最早可追溯到 17 世纪。那时,全欧洲性的会议在德国城市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召开,以讨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国际和约。[④]

在政治家看来,9个历史年代证明了优秀德国的顽强历史。德国

---

① *Facts About Germany: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50 Years On* (Frankfurt-am Main, 1999), pp. 90—137.

② Hagen Schulze, *Germany: A New History*, trans . D. L. Schneider (Cambridge, Mass, 1998), p. 202.

③ 一方面禁止总统剥夺个人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确保政府权力的有序交接,确保德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Facts*, pp. iv - xxiii。

④ Ibide, pp. v, xxiv-viii.

在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后生存了下来，最终变成了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12
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政治家也相信，他们的国家曾经行进于一条特殊的历史道路之上——一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艰苦战役。打败并抛弃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德国真正的政治命运是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而非1933年的纳粹德国。丑陋的德国人不再陷入以期望为开始、以危害为结束的历史循环之中，至少从19世纪中叶以来，优秀的德国人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使德国的统一和民主之火薪火相传。

1. 塔西佗的质疑

当今的德国是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也是自由福利国家的典范。自古以来，德国就一直是国际商业和贸易的先锋（这是地理位置给予的恩赐之一），近来，它又掌握了不友善的并购的艺术。[①] 德国显示了承担大国责任的意愿，参加了西方大国在波斯尼亚和阿富汗的维和行动。与此同时，它作为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正常的国家，却在英美两国在伊拉克的行动问题上畏缩不前。

然而，过去的历史仍纠缠着德国。在德国历史的最初岁月里，罗马人曾长期将“蛮族”的标签贴在日耳曼部落的身上。这些日耳曼人是可与罗马人相媲美的武士，甚至更为优秀。他们也是未来的后罗马时代欧洲文明的新领导者。时至今日，德国人仍必须应付那些名声很臭的标签，它们会使得全世界不断回想起近代德国不同的野蛮行径。在这种野蛮主义的行为之下，不论是最具有同情心的盟国还是其他外国，都无法提供安全保障。与早前的历史相比，有不少外国人对德国人批评更加善意。德国人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作为一个民族受到了抑制，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与所有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民族一样，统一后的德国也必须面对本国的历史。由于德国曾经在西欧历史上交替扮演过最成功与最具威胁的角色，因此当德国人自我思量时，整个世界都屏住呼吸予以关 13

① 参见第十二章。

注也就可以理解了。当德国总理表示，要像欧洲其他大国那样不带感情地指导国家事务的意向时，许多人都感到战栗。这可能是古老的德国文化准备回归铁血斗士岁月所发出的隆隆声响吗？在这样的时刻，可以让人宽慰地记住的一点是：德国历史是在交替变化中前行的，并非只是稳定地在一个方向上流淌；而且德国历史上的文明和创造的纪录要比非人道和破坏的纪录更长。

新的社会历史学家协会至少更易接受德国近现代历史的部分内容，它给长期倾向于揭发丑恶和指责的战后史学带来了些许平衡。从这个方面讲，这些历史学家与当代的德国政府有共同之处。德国政府也决心推动德国这样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现代国家继续前进，德国也有权利保持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如果有理由为更充分和更公正地讲述德国历史而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也有理由为继续将德国的未来置于恐惧和想象力之中的那种战后幻觉感到悲哀。一方面，德国仍然是那个近现代史上充满着侵略和极权主义的记录的永久顺从的国度；另一方面，诚如贡特·格拉斯所描述的那样，德国是一个屈从的、有悔意的国家，是一个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民主国家，它敞开大门吸纳一切。[1] 所有这些抉择都摆布着可怜的德国人民，在失败的状态下，他们要么摆脱对统治者的温驯和恐惧，要么陷入乌托邦式的舍己为人之中。这简直不大可能就是这些20世纪的现代幸存者的前景。

在德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德国人拥护的理想是没有极权主义的秩序和权威，他们的追求是没有自由、民主的自由与平等。德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差异并不在于拒绝个人自由，支持专制的或极权主义的统治。[2] 历史的经验让德国人害怕混乱甚于害怕暴政，如果为了得到良好的秩序而要限制自己时，他们倾向于约束自己。他们一直小心谨慎地通过一种强制性的信仰保持着这一点，这种信仰并非自由，而是纪律。而这一点也保持了人民的自由。

---

① Ibid.

② 比较，Blackbourn and Eley, *Peculiarities* , pp. 55—59。

对德国人而言，魏玛共和国和民族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新经历，并不是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德国第一个民主政府仅仅维持了1919—1933年间的14年时间，民主政府失败后出现的第一个极权政府也只维持了1933—1945年的12年时间。历史学家们看到了前者与1848—1849年革命的相同发展方向，后者则与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具有同样的特征。然而，现代德国最显著的特征仍然是其历史经历中民主体制与极权主义的独特性。

所有这些都会使人产生疑问。超过2 000年的悠久文明能用过去的150年加以定性吗？谁是1848年和1933年之前的德国人？贯穿着这些意义重大却截然不同的事件的悠久德国历史，能有助于今天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吗？本书接受了“塔西佗的质疑”，试图通过尽可能久远地找到相关的合理信息来考察和阐释德国人所构成的历史。无论今天人们对德国人怎么评价，他们似乎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仍使敌人和自己幸存了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载入漫长的历史的记忆中。

目 录 Contents

第二编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第三编　启蒙运动反对革命　德意志新时代

第四编 现代德国

第一编

从早期部落到第一帝国

第一章　错综复杂的蛮族：古代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

17　公元前1世纪中期，日耳曼诸部落在莱茵河东岸站稳了脚跟。这时，“日耳曼人”（Germani，Germania）这个词开始为罗马人所使用。[①] 当时，日耳曼诸部落不是单一种族构成的，也不是跨区域的联合，而仅是“松散和变化着的民众结合体”，他们构成了没有核心的日耳曼人疆域。根据与罗马人的协议，他们以士兵、农夫以及土地与治安税的收税员身份为罗马人服务。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很快在罗马帝国境内或边界上定居下来。[②] 在这些部落中，法兰克人、哥特人和伦巴第人与最重要的首领或王室、家族结成联盟，并信奉他们的家系

① 但是，这一词汇不是“日耳曼人”自己的发明。“当被问及自身的归属时，很多日耳曼部落都会回答自身属于‘伦巴第人’、‘汪达尔人’、‘弗里西人’或者‘哥特人’，而不是‘日耳曼尼亚人’。” Malcolm Todd,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1992), pp. 9—10. On documenting German tribes between the Rhine and Loire, Todd, “The Germanic Peoples,”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ed. Averil Cameron et al. (Cambridge, 1998), pp. 464—471. A brief, up-to date overview is Clifford R. Backman's “Early Germanic Society,” in his *The Worlds of Medieval Europe* (Oxford, 2003), pp. 48—68。

② Lester K. Little and Barbara H. Rosenwein, “The Fate of Rome's Western Provinces,” in Lester K. Little & Barbara H. Rosenwein, eds., *Debating the Middle Ages: Issues and Readings* (Oxford, 1998), pp. 8—10; Walter Goffart, “The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How They Were Accommodated in the West”, in ibid., pp. 26, 38, 40.

神话，由此发展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认同。①

在数百年里，非日耳曼部落在罗马帝国内也有类似的蛮族经历，这有助于人们对日耳曼人的了解。多民族的日耳曼和非日耳曼部落一开始就显示了适应和结合古代罗马和拜占廷世界的能力。大约在这些蛮族出现5个世纪后，罗马化和基督教化的日耳曼部落将创立一个新的中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化，并在古罗马的废墟上茁壮成长。在5世纪末6世纪初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克洛维统治时期与10世纪初萨克森人康拉德统治时期之间，日耳曼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罗马基督教文化和拜占廷文化相融合，创立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西欧。 18

一、罗马化的日耳曼人

事情开始于公元前113年。这一年，在对寻找食物和土地感到失望的情况下，日耳曼部落的辛布里人穿过了位于今天奥地利诺里肯地区的罗马边界，第一次遭遇并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4年后，即前109年，这个日耳曼部落与另一个日耳曼部落条顿人一道，出现在高卢南部，击溃了一支企图驱逐他们的强大的罗马军队。前105年，这些日耳曼部落以更多的人数再次回来。这次，他们击败了两支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队，这是古代罗马最巨大的损失之一。通过这一事件，罗马人注意了觊觎边境的蛮族威胁，派出一支新的强大军队来打击他们。②

---

① 匈奴人、阿拉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族群的认同观念要淡漠一些。Patrick J.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in Glen W. Bowersock et al., eds. *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 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Cambridge, Mass, 2001), pp. 108—109. "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甚至匈奴人都不是罗马帝国的敌人，他们都是（起初是外部的）帝国的一员和帝国的同盟。他们对罗马帝国的袭击与其说是对帝国的入侵，还不如说是对帝国发展的推动。" Walter Pohl, "Conceptions of Ethnicity in Early Medieval Studies", in Little and Rosenwein, eds, *Debating the Middle Ages*, P. 18. See also Susan Reynolds, "Our Forefathers? Tribes, Peoples, and Nation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Age of Migration", in Alexander C. Murray, ed., *After Rome's Fall: Narrators and Sources of Early Medieval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Walter Goffart* (Toronto, 1998), pp. 17—36, esp. 26。Also relevant are the comments of James J. Sheehan, "What Is German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 in Ger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 (1981): p. 4。

② Todd, *Early Germans*, pp. 47—49.

当蛮族迁移重新开始时，日耳曼部落的早期观察者之一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根据他的描述，日耳曼部落的管理是非正式的和不一贯的，他们的社会是公社和平均主义的，军事技能方面显得杂乱无章和“卑鄙无耻”。说他们“卑鄙无耻”，是根据他们在战场上的“布置”能力（也就是奇袭和伏击）所得出的。部落由“头人”（西日耳曼人方言为“kuning”，意为“家族首领”）来统治，罗马人对之称呼不一，分别叫做 principes、duces 和 reges。头人由部落贵族和平民战士会议（部落主人）挑选，只有那些拥有王家血统、对家族有贡献并且特别英勇的最杰出的男人，才可能拥有这一高位。[①]

1. *巧妙应对和反叛*

19 在旧千年的最后数十年和新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年代，罗马人通过残酷惩罚部落的劫掠和寻找分化与同化他们的方法，消除了日耳曼各部落造成的威胁。[②] 在后者之中，简单的方法就是普通人难以抵制的诱惑。在罗马边界每侧 30 英里内，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有规律地相互混杂。[③] 当日耳曼人用牛和奴隶（这些都是在与外部部落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交换罗马的青铜器、玻璃器皿和毛皮时，罗马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就随着贸易车的车轮来到了部落里。在与罗马人接触前，部落头人更多的是通过说服而非专制来统治，通过平均分配土地和财富来维持部落内的和平。与罗马人的贸易中得到的新财富使部落社会开始分化，产生了新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鼓励了分配不均的部落土地分割。罗马的独裁统治和元老院生活方式也给日后的部落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罗马接受了教育。

罗马人另一个分化策略是鼓动部落间的冲突，而部落则很容易上

---

①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p. 112; E. A.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1965), pp. 1—16, 29—41.

② “与罗马军队跨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远征暴行相比，这些野蛮人袭击罗马帝国所造成的破坏却显得苍白而逊色。”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p. 114。

③ See the frontier studies of C. R. Whittaker,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e, 1994) and Benjamin H. Isaac,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Oxford, 1990).

当。在他们的敌人的眼里，这些蛮族人的强大力量恰恰也是他们的巨大弱点。塔西佗有些夸张地描绘说，他们垂涎于战斗，“不愿通过流汗而慢慢地积累……那些通过些许流血就能很快地得到的东西。”① 在罗马人干预之前，武士精神使得部落间相互敌对，使他们的敌人对部落间的不团结有机可乘。时间一长，对于派系首领而非正当选举出来的首领的效忠，以及对于得到部落财富的群体的安排，使得在部落内出现了自由散漫的亲兵侍从。他们是通过袭击临近部落夺取牛、奴隶和其他产生财富的战利品而获得特权地位的关系密切的集团。他们的受害者会整体向该部落复仇，而外来入侵则增加了由于亲兵侍从带来的内部分裂。这些蛮族人内部的混乱和暴政也给罗马人在各部落内部找到了立足点，允许这些部落不用遵守有关部落首领和战士会议的保护性规定。②

20

最后，罗马人将头人们的儿子迁移到罗马，让他们享受物质上的好处，使他们像罗马人那样成长，以此来使各部落按照罗马方式运行。这种移居是通过邀请和上交人质的方式进行的，被选择的蛮族精英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化了，许多人的余生在罗马度过，其他人则作为被同化了的罗马帝国的仆人返回故土。③ 说这些被遣返的部落精英为受到洗脑者有些过分，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他们乐意为罗马帝国服务，因为这样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和财富，还可以继续在国际性的罗马世界享有公民权。在那些亲罗马的首领们打败了其部落敌人的地方，他们也向罗马提供帮助，减少了蛮族世界对罗马人的威胁。④ 这些策略和措施的结果是：公元 4 世纪前，大多数生活在罗马边界内和边界上的日耳曼与非日耳曼蛮族都选择了服从而非挑战。

---

① Tacitus, *The Agricola and the Germania*, trans. H. Mattingly and S. A. Handford (London, 1970), pp. 113—114.

②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p. 48, 53—60; Todd, *Early Germans*, pp. 32—33.

③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pp. 18, 21—24, 28, 73—74, 79, 92—95; Todd, *Early Germans*, pp. 88, 90, 95, 100.

④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p. 110.

2. 谢鲁斯克人

考察谢鲁斯克人 4 代首领的历史表明，罗马人在促使蛮族自相残杀方面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公元 4—6 年，该部落 25 岁左右的军事酋长阿尔米纽斯指挥着罗马帝国军队的日耳曼分队，并因此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罗马公民权。公元 9 年，他率领战士反击罗马日耳曼尼亚总督帕布利乌斯·昆克蒂利乌斯·瓦鲁斯指挥的 3 个罗马军团。此次战役使用了诱导和伏击战术，后来被称为 Blitzkrieg①。阿尔米纽斯的军团在托依托堡森林赢得了让人无法忘怀的胜利，结束了罗马人把帝国扩张到莱茵河以东地区的计划。②（今天的德国人仍经常瞻仰 19 世纪竖在戴特莫尔德的阿尔米纽斯纪念碑。）在 15 世纪后期的印刷术时代，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和民族人士发现和出版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宣称阿尔米纽斯是日耳曼人的“解放者”，他的胜利标志着德意志历史的开端。③

21

为何罗马方面在阿尔米纽斯身上的投资没有得到回报？在他反叛时，谢鲁斯克人对罗马的税收和司法感到痛心，许多人与阿尔米纽一样，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只是寄人篱下。阿尔米纽斯家族的三代人在效忠部落还是效忠罗马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从未反叛。阿尔米纽斯的岳父西吉斯特长期为罗马人服务，当他得悉了阿尔米纽斯的计划后恼羞成怒，竟在攻击的前夜将反叛的消息泄漏给罗马人。阿尔米纽斯的兄长弗拉维乌斯同样效忠罗马。公元 15 年，罗马派出日耳曼尼库斯的强大军队去惩罚谢鲁斯克人，弗拉维乌斯和他的同盟军队则予以配合。出生于罗马并在罗马得到栽培的弗拉维乌斯之子、谢鲁斯克人首

---

① 德语，意为闪电战。——译者注

② 位于现在的比勒费尔德和北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鲁克之间。

③ 在塔西佗的新版作品全集（罗马，1515 年）出现之前，他的著作在 1451 年就曾被发现，1470 年在威尼斯和 1473 年在纽伦堡 1473 年印刷出版。1458 年意大利人对《日耳曼尼亚志》一书进行评注，1526 年该书被翻译成德语，增加了德国人对该书的兴趣。Todd, *Early Germans*, pp. 52, 256; Gerald Strauss, ed., *Manifestations of Discontent in Germany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Bloomington, Ind., 1971), pp. 75—81. On the waning of the myth, see, *Facts*, p. 90。

领伊塔里库斯则作为罗马忠实的走狗返回谢鲁斯克人部落。他的独裁统治引发了废黜他的起义。

尽管有诸如罗马灌输、军事上的成功和在罗马军队中极受信任的地位，阿尔米纽斯仍对自己的部落忠心不二。然而，他终于没有经受住独裁的诱惑，在公元19年时试图以罗马的方式治理谢鲁斯克人。结果，沙蒂部落的一名首领在部落自由的名义下揭竿而起，反抗他的统治。最终，阿尔米纽斯死在了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人手中。他的这些亲属尽管乐意与罗马人战斗，也愿意和蛮族战斗，却不能在自己的部落里容忍一个暴君，即使他是部落的英雄。[①]

谢鲁斯克人的例子清楚地说明，部落社会的裂痕并不是单独由罗马人的计谋所导致的，尽管罗马人会显示出令人吃惊的残暴一面，但他们也在边境上以文明和机会来应对部落。受到罗马人渗透的这些部落受到了引诱和挑唆，不少部落乐意为一己私利而行动。出于这个原因，对日耳曼诸部落充满敬意并将其历史记录下来的塔西佗，在某些方面也将日耳曼人作为罗马人的镜子，用对一个复杂民族既有赞扬又有批判的态度来描绘日耳曼人。 22

3. 令人敬畏的蛮族

塔西佗不仅观察到了日耳曼部落在种族方面的纯洁性，也赞扬了他们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上配偶平等、牢固的家庭纽带和对妇女的基本尊重（他声称，西托恩人部落将女性作为“统治性别”）。塔西佗发现，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日耳曼人都忠诚有加，值得人们尊敬。他相信，与其他敌人相比，日耳曼人给了罗马人“更多的教训”。[②] 当然，塔西佗也强调了他们性格上的缺陷：喜爱冒险甚于喜爱和平。他发现，部落民众无论在出席会议还是处理贸易和其他商业事务时，都“全副武装”。同样，他们在教育孩子时，教育他们使用武器是唯一的内容。蛮族青少年与罗马青少年一样，都具有男子气概。

---

①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p. 73—85; Todd, *Early Germans*, pp. 84—86.

② Tacitus, *The Germania*, pp. 102, 106, 108, 113, 116—118, 121, 132, 140.

他们在和平时期或者狩猎，或者无事可作，其所作所为都使这些日耳曼部落的战斗天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另一方面，塔西佗眼中的日耳曼人是那个时代最坦率的人，由于缺乏狡诈和不懂世故，他们“会不加思索地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每一个灵魂都显露在外”。他们待客时同样天真，允许客人要求任何可以从主人家里得到的东西，然而，在要求客人回报方面却显得很随意。[①] 尽管塔西佗赞扬了日耳曼人诸部落，但是他也认为日耳曼人要比罗马人低下。他将定居在罗马境内、臣服的、他认为最勇敢的巴塔维人描绘为“战斗中只会使用武器和穿上盔甲”的人。[②] 一般而言，受到罗马人傲慢态度的对待，是当时帝国境内蛮族的普遍经历。罗马人将蛮族人作为和平时期耕种罗马土地和征集税收、战时参加战斗的工具。

如果说部落首领们的儿子和高层的其他外来者们对罗马人的这种统治网开一面，那么其他蛮族人则会对4个世纪以来在罗马人那里所受到的歧视、残暴统治和剥削耿耿于怀。例如，公元28年，被罗马人统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贫困的弗里斯人举行叛乱，反对罗马从他们那里榨取大量贡赋。罗马起初要求得到动物兽皮，后来要求得到整个牧群、大片家园，甚至妻子和儿童。[③] 3个世纪过后的376年，20万哥特人为匈奴人所迫，从东部的各聚居地蜂拥而至多瑙河边境，要求得到食物和土地，却发现定居条件相当严峻。然而，此时一个巨大的不同是，到4世纪时，罗马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日耳曼诸部落身上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于是，376年揭开了罗马人地区与蛮族地区（哥特人地区）之间改变世界的对抗序幕。

二、蛮族化的罗马

如果说旧千年最后1个世纪和新千年最初3个世纪期间，罗马人

---

① Ibid., pp. 110—114, 119—120.

② Ibid., p. 125.

③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 104.

成功地打乱和掌控住了边境内外的日耳曼诸部落，那么在4世纪时，人们可以看到，这些部落开始在西迁的匈奴人、阿瓦尔人、阿兰人和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参与下，以类似的甚至更加成功的方式挑战罗马人。沿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定居的各部落，要么是经过特别允许的，要么是被征服的臣属民众。他们的官方地位是旅居者（peregrini），而非公民（cives）。只要他们安分守己，他们多会变成罗马的可靠同盟者（foederati）。由于他们有很好的军事经验（通常情况下，民事服务对非罗马人是没有限制的），被同化的蛮族人可以继续争取罗马的公民权，并且可以因其服务而争得其他荣誉。

24

臣属的各部落获得了公民权，他们拥有与意大利本土人同样的合法保护和权利。然而，罗马化的蛮族人，无论是非洲人、日耳曼人还是犹太人，尽管在文化上已经适应而且有所成就，但仍发现身处帝国城市中的他们被视为劣等人。对此，被同化的第一代人尤其感同身受。虽然罗马元老院认为，部落精英们在其本土社会中拥有的地位有如罗马的议员那样，但却没有考虑到罗马人与蛮族人之间的平等问题，仅仅看到他们是类似于罗马贵族的贵族，对罗马有用，却也很危险。①

对于罗马化的蛮族人来说，在罗马的生活是一种矛盾的经历。在拉丁语说得十分流利、本土语言和文化褪去之后，他们得到了社会认同。但是在罗马人的理解中，移居的蛮族人通常是“归化的”罗马人，表面高度的成功使他们处于双重的危险之中。首先，他们在罗马受到对手的嫉妒，认为他们忠于部落甚于忠于罗马。罗马化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也面临这种猜疑。同样，罗马化的蛮族人也有理由对他的部落同胞感到担心，他们会把他设想为一名外来的走狗，返回部落时会充当暴君的角色。②

---

① 当这些蛮族看见帝国的领土时，他们看见“伟大国王的疆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以及……一个强有力的……背弃信义的同盟”；在与帝国的所有交易中，哥特人“既没有赢得和平也未曾获得平等”。Geary，“Barbarians and Ethnicity”，pp. 110—120。

② Herwing Wolfram,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 trans. Thomas Dunlap (Berkeley, 1997), pp. 56—67.

法律方面一致和分歧并存、文化上混杂的罗马古代世界里，蛮裔的罗马人既不是鱼，也不是家禽。作为蛮族，他们是罗马帝国的潜在敌人，然而，作为同化了的战士和指挥官，他们也代表罗马的利益而与其他部落作战，并因此而赢得罗马的诸种荣誉。生活在边境上的部落，大多数没有公民权，他们发现自己尤其处于一种认同危机中。无论是罗马人从未接触过的日耳曼尼亚原始部落，还是经常与罗马接触的同盟部落，抑或在罗马追求职业而被同化了的蛮族公民，他们都必须谨慎行事。

1. 方兴未艾的蛮族

25

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尤利乌斯·恺撒在战斗中观察日耳曼部落时，认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 150 年后，塔西佗谈到了日耳曼人对罗马军团和敌对部落所取得的胜利。根据他的描绘，当赤裸的或着装很少的步兵与冲锋的马匹并列前进时，步兵与骑兵单位会组成楔型阵，而且步调一致。恺撒于公元前 51 年看到的情况与塔西佗于公元 98 年观察到的情况证明，受到罗马人指导的日耳曼人是快速的学习者。[1]

2 世纪上半期，30 万人的罗马军队仍能保护地中海盆地的 5 000 万民众。[2] 然而，罗马防备蛮族地区的多瑙河和东部前线正在出现防务上的漏洞。到 2 世纪中叶，帝国的边境堡垒和城墙网络需要进一步集中加强。166 年是标志性的一年，25 个部落觊觎罗马的边境，构成了未来笼罩帝国阴影的前兆。[3] 到 3 世纪，罗马正变成自己最糟糕的敌人。内乱和内战（235—284）迫使罗马军团从漏洞百出的边境撤退，以确保国内稳定。3 世纪的最后 25 年内，蛮族人在没有遭到反抗的情况下越过了罗马东部的边界，迫使罗马加速将蛮族酋长和军队与罗马军事力量一体化。[4]

---

① Tacitus, *The Germania*, p. 104;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pp. 6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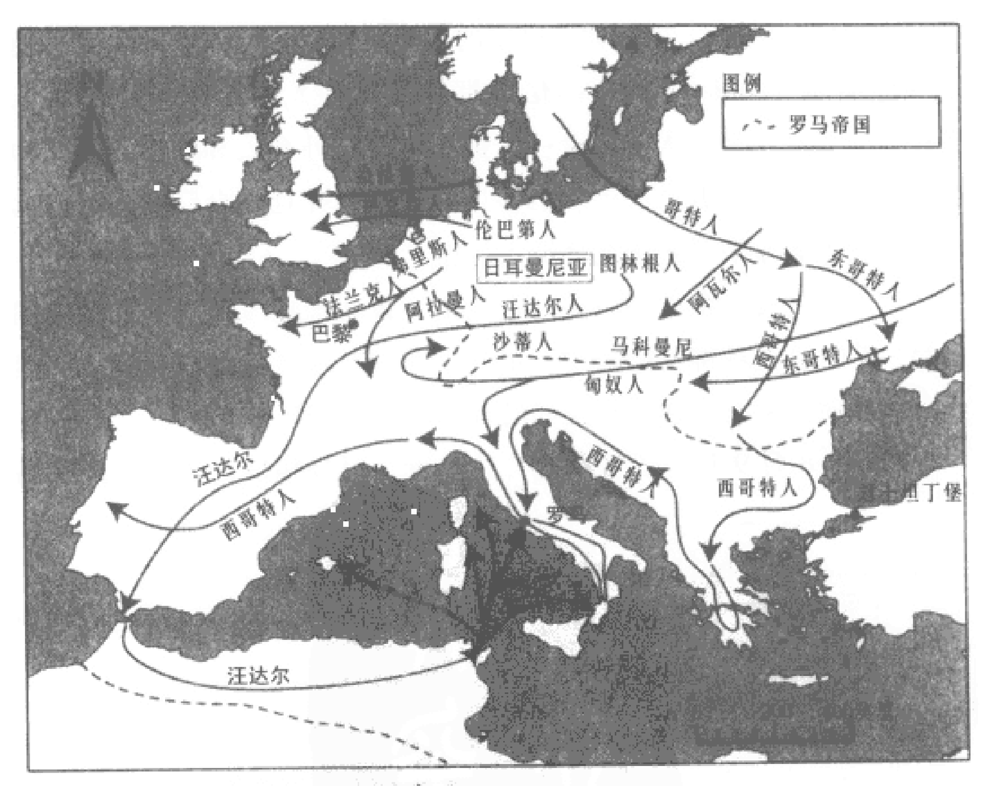
② Arthrur Ferr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1986), p. 26.

③ Todd, *The Early Germans*, pp. 53—57.

④ Geary, "Barbarism and Ethnicity", p. 115; Brent D. Shaw, "War and Violence", in Bowersock, ed., *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 pp. 135—136.

在康斯坦茨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法兰克人、阿拉曼人、哥特人和萨克森人都被征召进入同盟部队。他们代替了从边境召回来维持国内防御的罗马士兵，成为新组建的机动打击部队（comitatus）的一部分，以抵御一些新的部落对帝国边境的试探。① 在这些变化中，当务之急的问题是，无论如何布置，罗马军队是否足够强大到阻止东部边境上新的蛮族军队的进袭。帝国军队在东部地区两次战役的失败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场战役是试图在底格里斯河的马兰加附近阻止向西扩张的波斯人，结果是，罗马皇帝、变节者尤利安与其失败的军队一起阵亡于战场。第二场战役更是生死攸关，在今天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阿德里安堡发生了针对西哥特人（4 世纪从东向西穿越罗马帝国并最后定居西班牙的哥特人）先发制人的打击。

26



地图1 300—500年蛮族迁入罗马帝国

① Ferrill, *Fall of Rome*, pp. 31—32, 41—43, 45—49; Shaw, *"War and Violence"*, pp. 150—151.

导致阿德里安堡战役的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了蛮族与罗马人之间冲突的极端性。376 年，由于受到匈奴人的逼迫，贫困和脆弱的西哥特人在其国王弗里蒂吉恩的率领下穿越了罗马边境。而匈奴人也注定要与罗马人交战。与定居帝国境内的其他外来部落一样，西哥特人同意臣服罗马并为之服务。然而，西哥特人到来之际，恰值掠夺成性的罗马军队将蛮族移民作为其目标。由于人数太多且很仓促，以至于无法获得合适的手续和罗马官吏的监督，结果，在罗马奴隶市场上，一名哥特人的儿童只能给饥饿的哥特人换来一只狗的狗粮作口粮。①

27

这种状况的后果是，激起一场哥特人的聚众造反，定居在帝国内与哥特人有类似经历的其他蛮族也参加了进来。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西里努斯描绘说：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人“像残暴的野兽……挣脱了囚笼”。② 正如 6 世纪的编年史家、哥特人或阿兰人后裔的乔德纳斯（Jordenes）所回忆的那样：哥特人“结束了自己的饥荒……也结束了罗马人的安全……他们不再是外乡人和旅客，而要做公民和君主。他们开始统治罗马境内的居民，并且凭自己的力量将远至多瑙河的整个罗马帝国北部纳入掌控之中”。③

当时的冲突是蛮族将后期的古代世界重新构建成独立的部落王国的第一步，在这些部落国家中，最大份额的获得者将是法兰克人。但是，在当时，罗马人和哥特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④

378 年 8 月 9 日，天气闷热。这一天，过分相信自己优势的罗马

---

① Ferrill, *Fall of Rom* , pp. 59—60.

② Cited by Wolfram, *The Roman* , *Empire and Germanic Peoples* , pp. 83—84; see also Todd , *Early Germans* , p. 153.

③ Jordenes, *History of the Goths* , in Patrick Geary, ed. , *Readings in Medieval History* (Peterborough, Ontario, 1997), chaps. 26—27, p. 89.

④ 到公元 4 世纪末期，“数量可观”的日耳曼蛮族（特别是法兰克人）在罗马军队中居于高位，认识到这一点，Brent Shaw 的观点明显和 Ferrill 的意见相左。前者认为，北方的日耳曼蛮族是受邀请而不是作为入侵者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因此不存在罗马军队的“野蛮化”一说。我们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罗马军队并非是遭受蛮族的暴力才被蛮族接管，而是祸起萧墙之内。“如此大规模的种族军团，不止一位领导者，从阿拉里克到阿提拉，都被邀请进入罗马帝国为帝国提供军事服务。”参见“War and Violence”, pp. 151—152. 然而，这样也并未削弱蛮族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其对罗马军队的支配地位。

皇帝瓦伦斯率领多数配有重甲的约35 000人的罗马精锐军团，前来抵抗弗里蒂吉恩率领的哥特人与阿兰人的联军。哥特人与阿兰人联军在人数上估计是罗马军队的3倍，并运用了高超的战斗技巧。皇帝受了伤，后来有人发现他爬到了一间安全的小屋中。而捕获者竟将这位皇帝烧死于小屋中，然后将其骨灰撒在战场上，而他三分之二的军队也死在这一战场上。①

两年后，也即380年，此后又在382年，西哥特人作为罗马的同盟者返回他们在多瑙河东南部的家园，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随着西哥特人皈依阿里乌斯教派或反三位一体派，罗马正统的天主教也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传播开来。阿德里安堡战役的后果是：日耳曼诸部落巩固其对整个西方世界霸权的道路已经敞开。现在，他们的战士在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罗马军队的每一个高层军事职位②。

三、如日中天的日耳曼人

1. 西尔瓦努斯和阿博加斯特

4世纪下半期，两个罗马化的法兰克人成为罗马军队最高指挥官——“军队统帅”，分别夺取了他们曾经为之效劳的皇帝的宝座。第一位皇帝是西尔瓦努斯，他是4世纪50年代高卢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尽管是通过武力赶走统治帝国的康斯坦蒂乌斯二世而得到的皇位，却是查理曼之前第一个成为皇帝的法兰克人。第二个帝国的篡夺者是更加勇敢的阿博加斯特。他是388年后罗马帝国西部的军事指挥官，杀死了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并期望得到东部皇帝狄奥多西大帝的承认。狄奥多西拒绝了阿博加斯特的要求，理由是阿博加斯特是法

28

① Ferrill, *Fall of Rome*, pp. 60—61;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84—85; Jordenes, *History of the Goths*, chap. 16, p. 89.

② Ferrill, *Fallof Rome*, pp. 80—85; Todd, *Early Germans*, p. 60（“到公元4世纪后期，要辨认出军队高层职位的占据者已经变得困难了，这些人当然不是德意志人”）;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85—88; Shaw, “War and Violence”, p. 151。

兰克人且是个异教徒。作为回应，帝国西部的真正统治者阿博加斯特的军队认可了他们的指挥官的圆滑选择，将一位毫无政治经验的修辞学教师拥立为皇帝。

西尔瓦努斯和阿博加斯特两人都曾短暂地以非法的手段控制过帝国的权力，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前者为自己的士兵所杀，后者死于狄奥多西大帝指使发动的兵变。然而，对罗马人而言，他们的故事是一种警示，但这些罗马人还没有看到最后的或最强有力的蛮族酋长出现。①

2. 斯蒂利科和阿拉里克

罗马人仍然非常强大。451 年，他们在沙隆暂时打败了匈奴人首领阿提拉，取得了反击部落入侵的最后一场胜利。尽管现代的历史学家将罗马灭亡的时间确定在476 年，但是帝国的命运早在4 世纪进入5 世纪时的世纪之交阶段就已经决定了。两位日耳曼人主导了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最具决定性的阶段。他们处于各自世界的顶端，而且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位是罗马化的具有半个汪达尔人血统的斯蒂利科，另一位是西哥特人阿拉里克。前者指挥着西罗马帝国的军队，是实际上的皇帝，而后者的血统可追溯到古代日耳曼王族的巴尔特家族（勇敢者家族）。②

29

斯蒂利科的父亲是东罗马帝国军队的一名汪达尔人骑兵军官，母亲是意大利本土人。斯蒂利科从低层干起，一直上升到与皇帝狄奥多西大帝的养侄女联姻。这种王室关系使得斯蒂利科升迁至西罗马帝国军队指挥官的地位。此后，狄奥多西任命他担任 10 岁的皇子、未来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奥诺利乌斯的摄政王。奥诺利乌斯反过来娶了斯蒂利科的两位女儿为妻，使得家族关系更加紧密。③ 要不是正在入侵的哥特人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已经与斯蒂利科之子尤舍里乌斯订婚的奥诺

---

①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 p. 66; Ferrill, *Fall of Rome* , pp. 71—72; Todd, *Early Germans* , pp. 59—61.

② 以下来自 Jordenes, *History of the Goths* , chaps, 29—31, pp. 90—92。

③ Maria in 400 and after her death, Thermantia in 408.

利乌斯的御妹加拉·普拉希蒂娅，将会增加已深深缠搅在一起的这一罗马人—汪达尔人家族的王朝联系。①

与斯蒂利科形成对比的是，当时哥特人阿拉里克没有这样一层显赫的关系。他不向命运屈服，最后将毁灭性浩劫发泄到了斯蒂利科和罗马帝国的身上。② 392 年，两支军队首次发生冲突，若非罗马需要哥特人这样一支同盟军队为自己服务，阿拉里克与其失败的军队就已经在战场上被处决了。394 年，阿拉里克的军队参加了皇帝狄奥多西大帝惩罚阿博加斯特的弗里吉德河战役。声名远播的哥特人在第一天就损失了 1 万人，占其军队总数的一半。③ 阿拉里克期望得到将军的职位，他的战士们也希望得到土地，但尽管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帝国方面却对此避而不提。

这种失望在哥特人另一次造反中爆发出来，使得斯蒂利科与阿拉里克再度在沙场上兵戎相见。在这期间，狄奥多西已经死去，现在摄政王指挥着东西罗马帝国的军队，无论从任何角度讲，他都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力量的人。397 年，再度击败了阿拉里克后，他在马其顿给了哥特人一个新家园，并任命阿拉里克为罗马伊利里亚地区的军队统帅。斯蒂利科期望通过这种妥协来保留哥特人的服役，抵御席卷罗马帝国的新的蛮族浪潮。但是，与典型的罗马对蛮族的处理一样，他否定了阿拉里克的民事权威，阻止他在靠近罗马的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哥特人国家。④

30

由于在半心半意的臣服和愤怒的反叛之间摇摆不定，阿拉里克在 5 世纪的头十年返回意大利时，引起了斯蒂利科的蛮族同盟者的紧紧

① Ferrill, *Fall of Rome*, p. 86—89;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89—90.

② “如果有人冒犯了他自身或是他的人民，他就变成野蛮人，暴跳如雷，发起对罗马的进攻”。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 100。有关阿拉里克时期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结果，参见：R. C. Blockley, “The Dynasty of Theodosius”, in Cameron, ed.,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3, pp. 118—132, and in Cameron, ed,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3, pp. 118—32, and Peter Heather, “Goths and Huns, c. 320—425”, in ibid, pp. 488—515。

③ Ferrill, *Fall of Rome*, pp. 71—75;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91—92.

④ Ferrill, *Fall of Rome*, pp. 75, 92, 95—97;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93—95.

追击，并且遭受到代价更为惨重的损失。然而，在新的蛮族人侵意大利北部和高卢、发生威胁罗马的叛乱以及405—406年皇帝被推翻之后，阿拉里克被召回意大利居住。作为解救被围困的皇帝的报酬，阿拉里克要求得到4 000磅黄金。斯蒂利科指示罗马元老院拿出这笔钱。然而，元老们认为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羞辱，因为蛮族付出太少，而得到的却太多。阿拉里克得到了他想要的财富，但是斯蒂利科及其安定生活着的亲属们却付出了更大代价。408年，阿拉里克的死敌、新近归顺皇帝奥诺利乌斯的哥特人萨鲁斯推翻并处决了具有半个汪达尔人血统的斯蒂利科。这一举动释放了罗马人压抑已久的怨恨，推动罗马元老院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复仇：屠杀了数以千计和平生活在意大利的蛮族人。①

成千上万的非罗马人加入了阿拉里克的军队，阿拉里克发动了3次进军罗马中的首次进军。在封锁了罗马城的粮食进口后，阿拉里克要求得到城里所有的能带走的财物。② 很明显，在409年秋天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城期间，阿拉里克和他的军队希望与罗马平等对话，要求得到在诺里肯地区的省份，他们希望在那里再次建立哥特王国。皇帝认为这种妥协会使罗马丧失一切，因此尽力敷衍，期望帝国军队来解救他。

不幸的是，罗马方面先前主张抵抗的元老院渴望结束对城市的封锁，因而更倾向于迁就阿拉里克。根据阿拉里克的要求，元老院承认行政长官阿塔鲁斯为替代奥诺利乌斯的新皇帝。阿拉里克相信这位新皇帝会实现罗马人与哥特人友好和联合的梦想。③ 阿拉里克被元老院提升为两支罗马帝国军队的指挥官，即军队最高统帅（magister utriusque militum），成为第一个指挥正规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国王（而不是代表罗马来指挥自己本国的军队）。此后，阿拉里克匆忙准备罗马人—哥特人联军对非洲的入侵。这些宽宏大量的举措仅仅是用来清除

31

① Ferrill, *Fall of Rome*, pp. 99—101;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97—98.

② Ferrill, *Fall of Rome*, p. 103.

③ Blockley, "Dynasty of Theodosius", p. 126.

阴谋的打破僵局的决定。然而，不管阿拉里克抱有多大的善意，新皇帝阿塔鲁斯一上台，就站在了元老院中反对哥特人的派别一边，阻止了罗马人与哥特人的非洲联合行动。随着阿塔鲁斯站在被废黜的皇帝奥诺利乌斯的立场上来攻击哥特人，哥特人与罗马人平等相待的梦想永远消失了。阿拉里克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围攻罗马城行动。410 年 8 月的三天时间里，哥特士兵洗劫了罗马城，并带着当时只有 16 岁的加拉·普拉希蒂娅离去，据说她落到了阿拉里克的表弟阿陶尔夫的手中。[①]

3. 罗马地区与哥特人地区的融合

412 年，阿陶尔夫继承了阿拉里克的职位，带领哥特人来到位于西罗马帝国的新家园纳博讷。到达那里时，加拉·普拉希蒂娅仍是他的人质。对于这一部落而言，加拉·普拉希蒂娅是众所瞩目的一件瑰宝。她是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外孙女，也是最后一位统治帝国东部与西部的皇帝狄奥多西大帝的公主，更是统治西罗马的皇帝奥诺利乌斯的御妹。此外，她在同父异母的姐姐、斯蒂利科的妻子塞拉娜的监护下成长。控制了她，哥特人就等于控制了罗马帝国的三代人。当然，他们还不知道，通过这位女性，他们还控制了帝国的未来。在加拉被绑架前，斯蒂利科的继承者、西罗马帝国军队指挥官、未来的皇帝康斯坦蒂乌斯在感情和政治上已看上了她。

阿陶尔夫很清楚，从他绑架加拉的那天起，她就是他的人质。他和她的兄长进行了谈判。她可以返回罗马，交换条件是在高卢建立同盟的哥特国家，并大量供应谷物。但是，由于非洲粮食供应线的中断，这个协议失效了。[②] 尽管起初的努力失败了，据说，阿陶尔夫为加拉·普拉希蒂娅的“高贵、美貌和道德纯洁”所倾倒，打算使她成为

32

---

① Ferrill, *Fall of Rome*, pp. 103—104, 113, 121; Todd, *Early Germans*, pp. 158—159;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98—99。约得斯（Jordenes）记载，在阿拉里克死后以及他自己继承王位之后，阿陶尔夫在第四次掠城期间占有了加拉。*History of the Goths*, chap. 31, p. 91。

② Ferrill, *Fall of Rom*, pp. 113, 119, 121.

部落和平和获得土地的关键。① 414 年 1 月 14 日，20 岁的她成了阿陶尔夫的妻子和女王。

婚礼在一名罗马显贵的家中举行，成了数个世纪以来蛮族与罗马冲突的有力写照。典礼似乎是罗马式的：哥特人阿陶尔夫身穿传统的罗马戎装，新娘则穿着皇帝的礼服。阿塔鲁斯也在客人之中，他是被废黜的行政长官出身的皇帝，也是哥特人的朋友，412 年他与西哥特人做了次交易，允许他们离开意大利向高卢进发。他演唱罗马婚礼歌曲来向新婚夫妇表示尊敬。后来的事次证明，当康斯坦蒂乌斯向参加婚礼的罗马人复仇时，他这样的举动是危险的。婚礼最后的几首哥特歌曲打破了典礼的罗马主旋律。根据最接近这个事件的编年史家的说法，婚礼导致了大部分蛮族世界的恐慌，“因为罗马帝国和哥特人现在似乎成为一体了”。② 通过这次婚礼，阿陶尔夫有力地提醒罗马人和后期的古代世界：他和他的部落是谁。

这种结合并非是福气。与其外祖父同名的儿子狄奥多西出生后不久即夭折，来年一名不为人注意的部落死敌刺杀了孩子的父亲。通过与康斯坦蒂乌斯的谈判，哥特人与罗马达成了新的条约，允许哥特人作为罗马的同盟者在高卢短期住居。然而，一名叫瓦利亚的部落新首领中断了与罗马的联系，将部落迁移到巴塞罗那。415 年，哥特人在那里永久定居下来。次年，加拉返回罗马，以换取可以利用的粮食，同时以牺牲该地区其他部落为代价，使哥特人腾出手来巩固他们的王国。皇帝康斯坦蒂乌斯早年极其热爱加拉，她与蛮族的联姻也没有破坏这种情感，他将这个被抛弃的狄奥多西王朝的公主变成了自己的妻子。命运特别垂顾于她，5 世纪 20 年代，她担任了 6 岁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摄政王，实际上是统治罗马的女皇。③

33 在这个故事的后记中，西班牙的基督教教义捍卫者、《反对异教

---

① Jordenes, *History of the Goths*, chap. 31, p. 91.

② Ibid.

③ Ibid., pp. 71—75. 122; Todd, *Early Germans*, pp. 160—161; Wolfram, *Germanic Peoples*, pp. 146—147; Blockley, “Dynasty of Theodosius”, pp. 131—132.

徒》一书的基督教史作者保罗斯·奥洛西乌斯对阿陶尔夫身上的罗马文化与哥特文化进行了对比，认为他喜欢罗马文化甚于哥特文化。这也证实了一个更加真切的道理：尽管罗马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文化上却取得了对蛮族的胜利。在奥洛西乌斯的构想中，阿陶尔夫期望将罗马变成哥特人王国的首都，自己成为恺撒·奥古斯都。但是，回想起自己的人民行为放荡，没有遵守法律的能力（塔西佗评论说，蛮族喜欢冒险），阿陶尔夫得出结论：自己的人民永远无法创立与维持一个与罗马相同的共和国。哥特人的能力能更好地用到“恢复和增加罗马的荣誉”上。如果哥特人地区无法做得比罗马人地区更好，那么将尽可能遵从和模仿罗马人地区。[1] 根据奥洛西乌斯的说法，阿陶尔夫是在信奉基督教的妻子的影响下得出这一结论的。

奥洛西乌斯的解释向当时基督教的牧师们提供了对罗马人与蛮族人的看法，而不是对阿陶尔夫感情和思想的真实报道。476 年以后，基督教的主教们填补了帝国大城市中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空缺，他们使用和赞扬罗马的英名，好像罗马是他们的，而事实上罗马也确实已经变成他们的了。在古代晚期和整个中世纪，日耳曼人和其他部落民众都被灌输着一种思想，正如阿陶尔夫对罗马地区的认识一样，他们应该认识到罗马教会是一种高于其他文明的文明，应该得到各部落的保护和遵从。

对衰落中的罗马帝国和崛起的基督教会来说，很幸运的是，最有影响力的部落接受了部落以外的文化。许多取代罗马帝国的部落王国如同拜倒在罗马帝国脚下那样拜倒在了罗马教会的脚下。这种顺从使得基督教的信仰和罗马语言、法律和管理与日耳曼和平共处，在新的西欧文明里，甚至前者取代了后者。

---

① Cited by Ferrill, *Fall of Rome*, pp. 121—122. See*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Joseph Strayer, ed., vol. 9 (New York, 1987), p. 281, and Walter Goffart' s magnum opus, *Barbarians and Romans*, 418—584: *The Techniques of Accommodation* (Princeton, 1980).

第二章　从墨洛温王朝到霍亨斯陶芬王朝：中世纪日耳曼人的统治

35　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比罗马帝国存在长久的“蛮族”接受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文化。[①] 文化的连续性和多样性是后罗马时代欧洲发展的标志。[②] 与胜利者书写历史这样一句格言相反，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失败者书写了罗马—日耳曼时代的历史。以古代世界的标准看，日耳曼各部落是大度的胜利者，他们允许用罗马语言、法律、管理和宗教——罗马天主教会来塑造中世纪的欧洲。正是从这些密切联系着的文明中涌现出了第二个千年中的后继的王朝和社会。

早在6世纪，正在形成中的西欧世界已经可以从各地区部落的名字上显露出来：巴伐利亚（巴伐利亚人）；勃艮第（勃艮第人）；英格兰（盎格鲁人）；法兰西，法兰克尼亚（法兰克人）；德意志（日耳曼人，阿拉曼人，条顿人）；伦巴第（伦巴第人）；萨克森（萨克森人）；36

---

① “法兰克人走向融合的巨大力量对罗马帝国这个统一的社会而言是一种新生，它吸收了罗马和蛮族自身的传统优势，摒弃了相互之间的排斥”。Patrick Geary，“Barbarians and Ethnicity”，p. 125。

② Richard E. Sullivan，“The Carolingian Age：Reflections on Its Place in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Speculum* 64（1989）：pp. 281—297.

士瓦本，瑞典（苏维汇人）。还有其他少数地区。[①]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具重要性的当属在6世纪时击败和取代哥特人的法兰克人、507年的西哥特人和6世纪40年代的东哥特人（5世纪后期征服意大利的东部哥特人）。

为了创造与罗马人那样高贵的世系，6世纪的法兰克编年史家变戏法似的宣称，其神秘的祖先是移居来的特洛伊人。历史上既血腥又诙谐的争论是，尽管法国人和德国人试图相互拉开距离，但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法兰克人的真正后继者。18世纪，一名法国人将法兰克人描绘为日耳曼人，结果因侮辱祖先而在巴士底狱被禁闭3个月。[②] 20世纪后期，流行的法国喜剧剧本《阿斯特里克斯》（Asterix）将法国人说成是血统纯正的高卢罗马人，在边境上坚决抵抗了恺撒的军团和来自下层社会的蜂涌而至的日耳曼人。[③] 然而，历史提供的信息却是，尽管法国人和德国人双方努力将法兰克人与条顿人加以区分，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法兰克蛮族祖先，而任何编出来的神话都无法抹杀这一点。

一、墨洛温王朝

5世纪晚期，一个法兰克人建立的新王朝——墨洛温王朝（以其建立者墨洛维而得名）开始了长达3个世纪的登上西欧霸权顶峰的历程，并最终在查理曼的领导下获得了成功。该王朝的根据地是以贝尔吉卡—塞昆达闻名于世的连结兰斯、图尔奈、苏瓦松的三角地带。从455年最后一位公认的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驾崩到476年罗慕洛·奥古斯都被弑这一时期，墨洛维之子奇尔德里克有效地统治着高

---

① Pierre Riche, *The Carolingians: A family Who Forged Europe*, trans. M. I. Allen (Philadelphia, 1993), pp. xviii, 4。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见：M. I. Innes,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tate: The Middle Rhine Valley from the Merovingians to the Ottonians, 400—1000* (Cambridge, 2000)。

② Nicholas Frerel, in 1714. Edward James, *The Franks* (Oxford, 1988), p. 239.

③ Ibid., pp. 235—243; cf. Rene Goscinny and Albert underzo, *Asterix et les Goths* Neuilly-sur-Seine, 1973.

卢北部地区。在从481年奇尔德里克去世到742年查理曼出生为止的
37
260年间，法兰克的国王们创立了一个新的西欧帝国，这一帝国在8世纪和9世纪之交时被国际公认为罗马的继承者。[①]

奇尔德里克的继子克洛维在继承了北部滨海居住的法兰克人的王位后，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他生下来就是阿里乌教派的基督徒，是接受了反三位一体的异端、希腊神学家阿里乌的追随者。然而，克洛维和其部队在取得一场对阿拉曼人的胜利后，却皈依了罗马基督教。据称，战斗中他因祈求了耶稣的名字而获胜。当时的基督教主教、法兰克早期编年史家图尔的格利高里将克洛维的皈依归功于其妻、勃艮第国王之女、正统的基督教徒克劳蒂尔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降生，她就纠缠着要求克洛维抛弃异端的阿里乌教派。[②] 在宗教和婚姻的双重作用下，惯例被确定下来。从此，基督教教士和王室王后们在法兰克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种作用可能会是进步的，也可能具有阻碍作用。

从北部高卢的根据地开始，克洛维在东部击败了图林根人，在西南德意志击败了阿拉曼人，在瑞士北部击败了阿尔萨斯人，在高卢西南部击败了阿里乌教派的哥特人。他的胜利和在图尔附近皈依正统基督教的举动，将墨洛温王朝推到了征服和统一相互敌对的法兰克部落的位置上，而且通过刺杀这些部落顽固的国王就几乎达到了这一目标。[③] 其结果是法兰克帝国的建立。

至此，没有任何蛮族的统治比克洛维更加罗马化了。他采用了幸存下来的罗马人的治理之道，挑选了大量的罗马人充当世俗和教会的顾问。尽管他是事实上的皇帝，但他接纳了罗马皇帝从未采用过的地方势力和权威，依赖地方伯爵和公爵来统治帝国的边远地区。由于意

---

① George Holmes,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Oxford, 1988), pp. 65—66; James, *The Franks*, pp. 65—70.

② *History of the Franks*, trans, E. Brehaut (New York, 1969), bk. 2, nos. 29—31, pp. 38—41.

③ James, *The Franks*, pp. 80—84, 86—90.

识到教皇喜爱将自己凌驾于世俗国王之上，墨洛温王朝遵循了拜占廷皇权限制教会的做法。克洛维死后半个世纪，其孙奇尔佩里克就抱怨主教们“盯着所有的国王财富”，自以为教会比国王更受城镇居民的欢迎。在法兰克和后来的德国历史中，这种抱怨将愈演愈烈，触发了划时代的德意志与罗马的教会国家间的冲突，诸如11世纪的授圣职仪式争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民族和宗教抗争、19世纪教皇对现代主义的谴责和导致的“文化争端”（Kulturkampf）等。[①]

38

早期的墨洛温王朝是日耳曼部落对罗马人最后的效劳。6世纪以后向帝国的过渡使得他们站到权力的顶峰。此后，旧罗马的双重标准将不再成为时代的负担。旧罗马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吸收日耳曼人为同盟者并给予公民权的荣誉，但同时却没有慷慨酬劳他们的勇敢和牺牲。早先受到罗马怠慢的酋长和部落极端激愤，要么篡夺皇位（如西尔瓦努斯和阿博加斯特），要么以他们自己的选择方式不按体统地加冕一位皇帝（如阿塔鲁斯），要么通过强迫婚姻介入帝国王朝（如阿陶尔夫）。与之相反的是，6世纪的蛮族以充满自信的平等来推动中世纪早期的世界向前发展。

1. 克洛维的姿态

507年，克洛维取得对西哥特人的胜利后，以无可挑剔的完美姿态提醒罗马和拜占廷，要注意他和他的人民现在的身份。当时，克洛维依附于东罗马帝国皇帝阿那斯塔修，与自己的内弟、意大利东哥特人统治者西奥多里克大王作战，争夺西部蛮族诸国王中的领袖地位。[②]当克洛维获胜凯旋时，在图尔收到了阿那斯塔修的来信，将帝国执政官称号授予他，这是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前所未有的殊荣。

克洛维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中，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庆祝。当时他接近于统治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囊括了今天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未

---

① Ibid., pp. 163—168, 189—191.

② Robert S. Hoyt and Stanley Chodorow,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76), pp. 69—72.

来德意志易北河东部的土地，王室驻跸巴黎。为了这次晋升典礼，他身穿拜占廷皇帝的戎装，外罩皇帝的紫袍，头顶王冠。当他身着盛装骑马从城门走向教堂时，到处是“执政官和奥古斯都”的喊声。另一个具有刺激意味的姿态，是将黄金和白银撒向沿途的群众。这些安排意味着克洛维是位皇帝，这是阿那斯塔修所不能接受的。尽管克洛维在这个场合喜欢夸耀执政官的尊严，但自己再未使用这一令人得意的头衔。他的这种迟来的克制表明，在法兰克人上升为新的中世纪世界秩序的维护者时，他们是冷静自制的。[①]

39

二、加洛林诸王

230年后，后继的加洛林王朝源于有“铁锤”之称的查理·马特。他是8世纪法兰克王国三块领地中两块领地的宫相，第三块领地则为勃艮第。宫相这个称号用来授予维护贵族地主利益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查理生活在外敌入侵和内乱交织的时代，他的三大功绩使其孙子查理曼建立新帝国成为可能。732年10月，在普瓦蒂埃和图尔之间的地区为时一周的战斗中，他阻止了穆斯林通过西班牙对高卢的入侵，挽救了西欧的南部边境。在国内，他是和平的缔造者，他迫使分裂的贵族们屈从于自己的意志，自己则相当于法兰克王国的宰相。他也在罗马建立了使馆，由此在加洛林王朝和罗马教会之间建立了至关重要的联系。[②]

1. 查理曼

查理曼统治法兰克43年，是西欧地区的14个皇帝之一，在位期间完成了法兰克文化的罗马化。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蛮族统治者，身着的是部落服装而非罗马服装。他成功地使法兰克各部落

---

① Gregory of Tours, *History of the Franks*, bk. 2, no. 38, p. 47; Michael McCormick, "Clovis at Tours, Byzantine Public Ritual and the Origins of Medieval Ruler Symbolism", in E. K. Chrysos and A. Schwarcz, eds., *Das Reich und die Barbaren* (Vienna, 1989), pp. 157—158, 166—167; James, *The Franks*, pp. 84—87.

② Pierre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p. 34—39, 44—49.

服从于他的意志，与此同时却残酷地毁灭各竞争对手。萨克森战争期间，为了给被杀害的法兰克青年贵族复仇，据说一天内就将 4 000 名被囚禁的萨克森人斩首。[①] 他的家庭生活也是部落式的，有 5 个正式的妻子，分别是法兰克人、伦巴第人、士瓦本人、东法兰克人和阿拉曼人。他娶的每个妻子都出于政治原因，他真正爱的是士瓦本的希尔德加德。他有无数的小妾和私生子。[②]

40

他既是名副其实的部落首领，又是一位国际化的国王。查理曼的地位要求他能讲几种语言。在亚琛，他将自己讲的方言——Theodisk 或 Deutsch[③] 作为宫廷中各种方言的调节语言。他的代表们用一种相对粗略的后古典拉丁文来处理政务。查理曼讲这种语言，有助于建立王国外交上的法兰克通用语。由于敏感于日耳曼母语受到的威胁，因此他训令在歌曲和日历上保存日耳曼语言，而且御笔拟定了基本语法。加洛林王国除了有共同的语言外，也有一个使用共同货币的统一贸易区。[④]

为了建立一个有文化的宫廷和精干的王室官僚体制，查理曼在亚琛建立了宫廷学校。他招聘英国、法国和法兰克人本地的基督教知名学者，给予他们舒适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预算。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约克的阿尔昆指导下，这个宫廷学校成了法兰克的学术和文化中心。年复一年，这一学校驯化了这个新帝国，播下了日后更伟大的古代知识的文艺复兴的种子。

查理曼以《圣经》中的国王大卫为榜样，采取了拜占廷皇帝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亚琛也出现了拜占廷式的皇宫和教堂建筑，这种风

---

① Raul Fouracre, "Frankish Gaul to 814",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 c. 700—c. 900, ed., Rosamond McKitterick (Cambridge, 1995), pp. 102—103.

② Munz, *Life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New York, 1971)*, pp. 40—55;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 135; *Dieter Hägermann*, *Karl der Grosse: Herrscher des Abendlandes* (Munich, 2000), p. 634.

③ 即古德语。——译者注

④ Munz, *Age of Charlemagne*, pp. 55, 90;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p. 132, 135; Hägermann, *Karl der Grosse*, pp. 682—685;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1994).

格说明了一国之君同时也是高级教士。这种看法注定要对整个中世纪 41 及日后西欧的教会和国家关系产生巨大灾难。查理曼在耶路撒冷和巴格达也建立了外交使馆，将其影响扩展到中东。阿巴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哈鲁姆—阿拉施德将一头名叫阿布阿巴斯的大象送给了查理曼，作为承认新的西方皇帝的礼物。802 年 10 月，礼物送达亚琛。①

就查理曼而言，政教合一证明了其统治的特性，其目的并非要背叛或挑战教会的使命。这一点在 8 世纪晚期由他挑起的与对手拜占廷女皇伊林娜的教义之争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由于伊林娜统治的 22 年时间中有 17 年是担任其幼子的摄政，外界许多人没有像对待真正的女皇那样尊敬她。然而，那个时代没有别的统治者比她更决心行使万能的权力了。797 年，其子成年并要求亲政，她禁锢并弄瞎了他的眼睛来表明她掌握皇权的决心。这样的灾难也落在了他 5 个父系的叔叔身上，因为他们的血统威胁到了她的统治地位。同样的意图也表露在她发起的拜占廷的圣像崇拜运动上，并力图将之强加于西方，即在罗马天主教会的布道中的一种圣像崇拜活动。为了保护教会和提高自己的地位，查理曼不允许拜占廷的圣像崇拜在西方扎根。②

799 年，敌对的罗马贵族指控罗马教皇利奥三世犯罪并监禁了他。事后，效力于教会的举动给查理曼带来了新的地位和权力。教皇在躲到查理曼控制的安全城市帕德博恩后，便将罗马的民事权威授予了它的保护者。从那时起，国王和教会变成了盟友，教会将查理曼描绘成了圣徒彼得旗下的信使，并且教皇极富戏剧性地于 800 年的圣诞节那天为查理曼举行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典礼。③

加冕的前两天，查理曼迫使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洗礼。教皇声称只服从上帝的意旨。但是这一日耳曼 42 式的和解仪式却要求本只服膺于上帝裁判的教皇在其罗马论敌在场的

---

① Hagermann, *Karl der Grosse* , pp. 445—448.

② Munz, *Age of Charlemagne* , pp. 116—131, 150; Williston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1959), p. 189; Riche, *The Carolingians* , pp. 117—118.

③ Riche, *The Carolingians* , p. 119, 199—200.

情况下正式表明自己的清白。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利奥就告别了过去，曾经放在查理曼身上的不洁净的双手因此而再度变得干净。

加冕那天，也开始了一场教会与帝国的巨大竞争。在加冕典礼上，利奥试图通过重新安排传统的加冕典礼次序来获得一些已经衰减的声望。加冕典礼的次序要求这样的过程：罗马民众为查理曼而欢呼，这种呼声会成为接近上帝的媒介，赋予查理曼统治的权威。然而，教皇利奥却要求在他把皇冠放在查理曼头上时民众再度欢呼。根据法兰克人而非教会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教皇在查理曼面前下跪的举动却无意中放弃了他已经得到的东西，法兰克人将之解释为教皇服从新皇帝的姿态。这些微妙的操作是导向西欧教会与国家关系大纷争的小小步骤。

查理曼是唯一来过罗马的法兰克国王，加冕之行是他第 4 次到罗马，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他拥有了“奥古斯都与皇帝”的称号，但同时他也保留了“法兰克和伦巴第国王”的日耳曼称号。拜占廷人仍认为西罗马帝国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将这次加冕视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僭越行为。查理曼于是作出反应，向他们展示了日耳曼人的力量。802 年，他命令军队占领拜占廷重要的西部贸易商埠威尼斯。不久，伊林娜的继任者、东罗马皇帝尼克福罗斯一世就向西部的新皇帝送去了祝贺。①

2. 公正的帝国

尽管查理曼权力极大，但相较于与他对立的罗马皇帝和拜占廷皇帝，其统治的独裁色彩却较少。他统治期间公布的超过 1 000 条的法令和规定，都是由贵族、教士和战士组成的部落会议议事会撰写的。为了便于管理，他将帝国分成众多的“伯爵领地”，由“伯爵”以国王的名义加以统治，伯爵的成分主要是地方贵族。查理曼把从教会那里夺来的大量土地奖励给他们，而教会则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行为。

43

伯爵们通过名为 mallus（日耳曼自由人大会）的地方法院来行使权威，它起源于日耳曼语的“司法会议”。在法庭上，先由原告和被

① Ibid., pp. 121—123.

告陈述事件，然后由法院进行裁判。当证据确凿而允许法官作出裁决时，会征收估量过的惩罚税或犯罪赔偿金（wergild）。如果缺乏证据，法院会安排一场残酷的考验，让明察秋毫的上帝来判定被告是否有罪。引人注目的考验是，如果被指控者接触了沸水或火而产生的伤口有痊愈的能力，就证明被告无罪。尽管这种方式比较极端，但这样的考验是展示正义的原则性努力，表明了加洛林王朝期望治下能成为公正和开明的社会。

在查理曼统治末期，创立了名为"特派管理者" missi dominici，的帝国使节和名为"会办" scabini，的法律专家组成的特殊队伍来监督地方法院。前者从可靠的与宫廷有密切关系的贵族家庭挑选，他们定期造访帝国的各处法院，以告诫伯爵们"在没有欺诈、过高费用或借口拖延的前提下，全力、公平、公正地解决教会、寡妇、孤儿和其他人提出的司法要求"。①

然而，由伯爵和使节组成的皇家政府的强大仅仅体现在发出命令和使人服从上，皇家特派员似乎很少报告不端的行为。② 随着岁月的流逝，国王的土地赠与日益变成了世袭地产，新的皇家土地和权力加上已有的土地和权力使得伯爵们更倾向于在地方上自我扩展而不是服从王室司法的高标准。

3. 家族宿仇与法兰克的分裂

44

进入9世纪以后，法兰克的继承法与不断变化的家族成员及野心一道，创造着近现代欧洲的地理和政治景象。法兰克王室的习俗是将平等的或物质的遗产传给每一位男性继承人，这样的习俗是变革的主要结构力量。基于父母应对孩子一视同仁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法兰克人的这种分割继承习俗在德国特别是新教地区显著地保持到17世纪。③ 这种做法原期望带来更大的政治统一，但是，一个王国如果遭

① Munz, *Age of Charlemagne*, pp. 56—67;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p. 125—129.

② Fouracre, "Frankish Gaul to 814", pp. 107—108.

③ Paula Fichtner, *Protestantism and Primogenitur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New Haven, 1989).

到分裂，而且通常会再度分裂，它就容易招来掠夺者。随着分裂的加剧，法兰克人成了自己最糟糕的敌人。

墨洛温家族开创了分裂帝国的先例，但却没有带来麻烦的后果。克洛维的 4 个王子将王国加以均分，每人得到其中一份。在最年轻的克洛塔尔去世时，法兰克王国再度短暂统一，然而这仅仅是由于他的 3 个兄长先他而去的缘故。克洛塔尔遵循其父的惯例，将自己的王国平均分给了 4 个儿子。这样一来，在半个世纪内，法兰克王室的土地被第二次一分为四。使局面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克洛维和克洛塔尔的四个活着的儿子均是两次婚姻的结果，捍卫自我利益的母亲和相互竞争的异母兄弟使家族始终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就克洛维而言，长子乃发妻所生，其余 3 个较为年轻的儿子乃第二个妻子所生。克洛塔尔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儿子的境遇就是母亲的境遇，因此，王后们都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比他们的异母兄弟得到更少的遗产。一旦他们成年了，就会拿起武器以捍卫自己得到的公平的遗产份额。这样的环境使得法兰克王后和王子们在有关遗产和国家事务上有强大的发言权。[①]

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较高的兄弟死亡率，墨洛温王族避免了极度的嫉妒、帝国的分裂和抵御外来入侵的脆弱，而这些不良后果却在恭候着加洛林家族。查理曼唯一活着的儿子和继承者虔诚者路易在统治的早期就预见到这种危险，他曾考虑到自己临死时多个对立的继承者所带来的后果，试图通过他父亲所设计的长子继承法来取代分离继承法，以避免这种后果。[②]

45

到 817 年帝国进行安排时，虔诚者路易任命他的长子、第二个妻子埃尔门加德所生的 23 岁的洛塔尔为共治者，单独继承未分割的法兰克中心区域，年轻的兄弟丕平和路易分别得到阿基坦和巴伐利亚两份

① James, *The Franks*, pp. 91, 169。有关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的女性问题，参见 Edith Ennen, *Frauen im Mittelalter* (Munich, 1994), pp. 49—74。

② 虔诚者路易有关王位继承的安排是“直接借鉴于 806 年查理曼制订的没有贯彻的分治方案”。Janet L. Nelsom, “The Frankish Kingdoms, 814—898: The West”, in McKitterick, ed.,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 p. 112。

较少的遗产。这让其他权贵失望，因为分离继承和王室交替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①] 如果没有那种冲突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虔诚者路易的法令也许能使反对者幸存下来，同时确保法兰克的统一和早期国家地位的基础。

虔诚者路易的法令的最直接的敌人是819年虔诚者路易所娶的第三位妻子尤迪特。她是韦尔夫伯爵之女，而韦尔夫伯爵是巴伐利亚和阿拉曼尼亚地区的统治者，也是法兰克人在东部地区有价值的军事盟友。当时的说法是，她是一位拥有"传说中的美貌和智慧"的年轻女人。[②] 823年6月，她生下虔诚者路易的第四个儿子，即未来的秃头查理，从而获得了竞争王室权力的实力。秃头查理的出生使两个王室成员[③]间的亲密和担心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预示着他们之间相互毁灭的凶兆[④]。

洛塔尔在得悉其后母再度怀孕（尤迪特先前已生一女）的消息后，匆忙采取行动，以确保根据其父亲的法令来继承皇位。在823年复活节这天，教皇帕斯卡尔一世给洛塔尔加冕，他因此成为共治皇帝。3个月后，在其父的指示下，他在亚琛皇家教堂内，从圣水中举起了后母所生的儿子，从而成为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教父。当神坛上的每个人都考虑这个怀抱中的婴儿给新的继承法带来的挑战时，洛塔尔与尤迪特之间呈现出来的不调和不可能消失。洛塔尔会失去一个王国，或者受到削弱，而尤迪特的丈夫可能先行驾崩，她会成为继子们的牺牲品。[⑤]

46

对于皇后尤迪特来讲，她无法想象自己的儿子得到的遗产是一份

---

①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p. 146—147; Janet L. Nelson, "The Last years of Louis the Pious", in Peter Godman and Roger Collins, eds.,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Oxford, 1990), pp. 147—161.

② 后来路易和埃尔门加德最年轻的儿子，巴伐利亚的路易和尤迪特的妹妹艾玛结婚，给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韦尔夫家族带来了更加光明的政治前途。参见下面的注释。

③ 这里指虔诚者路易前两次婚姻中出生的三位王子。——译者注

④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p. 149—20; Elizabeth Ward, "Caesar's Wife: The Career of the Empress Judith, 819—829", in Godman et al., eds., *Charlemagne's Heir*, pp. 213—214.

⑤ Ward, "Caesar's Wife", pp. 213—214.

相对廉价的礼物，因此，不出10年，她就会要求把法兰克的中心地区在其儿子和洛塔尔间进行公平分割。地方和外来的其他维护自我利益的势力则与她联合，要求恢复原先的分割继承办法。虔诚者路易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已分割遗产的儿子们则担心，曾经迷惑了父皇的尤迪特也会取得较他们更多的好处。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829年在沃尔姆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皇帝决定在他们的异母弟弟16岁生日那天为他建立一个新王国，这一新王国包括阿尔萨斯、库尔、阿拉曼公爵领地以及先前属于洛塔尔的勃艮第的一块狭长地带。然后，皇帝突然派遣洛塔尔前往罗马执行一项使命。这一举动使3位年长的儿子再次惊惶失色。[①]

以上事件导致的结果是，830年，年长的皇子们发动了反对其父的一场叛乱，在王宫中逮捕了皇帝和年幼的查理，尤迪特被流放到阿基坦一所专门看管通奸者和巫婆的修道院。尽管虔诚者路易恢复了分割王家遗产的传统，但是加洛林王朝脆弱的政治秩序受到的震动过大，以至于在混乱的9世纪无以为继。832年，在教皇的支持下，长子继承制的支持者恢复了长子继承制。然而，这种反叛与其说瓦解了尤迪特的阴谋集团，毋宁说是瓦解了传统秩序。3个儿子迫使他们的父皇宣布将皇位授予洛塔尔。835年，权力的天平再度翻转，被废黜的皇帝在梅斯恢复了皇位。[②]

在这个漫长而充满冲突的故事结束时，法兰克分割继承传统要比革新的长子继承制更为流行，使得加洛林帝国在地理和政治上永久分裂。840年虔诚者路易死后，洛塔尔、路易和秃头查理三人（丕平已死）在公平分割父王的帝国之前又混战和争吵了3年，夸张一点说，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可以被称为“现代欧洲的‘出生证’”。[③] 通 47

① Nelson, “The Frankish Kingdoms”, p. 117.

②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p. 150—158; Nelson, “The Frankish Kingdoms”, p. 118; Johannes Fried, “The Frankish kingdoms, 817—911: The East and Middle Kingdoms”, McKitterick, ed.,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 pp. 142—145.

③ Riche, *The Carolingians*, pp. 160—169.

过该条约，洛塔尔拥有皇帝称号和以古都亚琛为中心的中部王国，粗略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瑞士、阿尔萨斯—洛林和意大利。后来以“日耳曼人路易”著称的巴伐利亚的路易得到了东部法兰克王国，约相当于今天的德国。生下来就触发了划时代的法兰克家族仇杀的秃头查理则统治帝国西部的广大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国，王廷驻跸巴黎。这是一份与活着的皇后的儿子相配的遗产。[1]

48



地图2　法兰克帝国及其分裂(814—843)

法兰克王国进一步碎片化。855 年，洛塔尔将他的中部王国平分给三个王子，从而在实际上为争抢构成的中部土地提供了机会，也使

① Nelson, “The Frankish Kingdoms”, pp. 118—119, 124.

得皇帝的头衔变得不确定起来。在888年以前，又出现了更多的分割和合并。于是，无法解决的中部王国的土地成为了西欧的一块肥肉，长期得不到治理，处于不稳定之中。意大利、勃艮第和洛林成了德意志诸公爵和居住在东部法兰克土地上的萨克森君王们公平的竞技场。此后，控制中部地区成了德意志统一和权力的关键，留下来的政治印记一直残留到20世纪。①

三、从法兰克帝国到德意志诸邦

加洛林帝国的分裂危害了自己。《凡尔登条约》之后，仍然依附于中部王国的帝国的继承者最终变得混乱不堪。正如面临一片混乱的现代交易所一样，帝国的统一有赖于处于引领该帝国的法兰克王族的外交和眼光，然而，他们却撤回了自己对帝国统一的支持。对跨地域的帝国一直抱有反感的地方伯爵们及时填补了这一空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放肆而泰然地依照自己的喜好统治着他们的领地。就近而最合适的地方统治能够使本地区免于烧杀劫掠，从《凡尔登条约》签订到新的萨克森王朝出现之间的黑暗年代里，这种地方性统治成为当时的主要政治景象。即使王室自我毁灭要少一些，加洛林王国的地理和文化割裂不是那么极端，面对这样的新的状况也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维京人和丹麦人从北部、马扎尔人从东部、萨拉逊人（穆斯林）从南部等不同方位的新入侵，使得9世纪后半期的帝国同样要出现一场新的灾难。

49

法兰克帝国的那些部落将走向何方？在东法兰克王国，在加洛林王朝的遗迹上，有各自的语言、法律和文化的五个松散的公爵领地（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图林根、士瓦本和巴伐利亚）自我构建起了

---

①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New York, 1963）, pp. 46—47; Nelson, “The Frankish Kingdoms”, pp. 121, 136。“法兰克人对西欧的划分方式催生了地缘政治的边界，这一边界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发生剧烈的变化。1945年之后，一分为二的德国成了西欧的中间地带，基于东西德而成立的新的更加强大的东西欧洲阵营之间相互竞争，两者分别以前苏联和美国为各自的结盟伙伴”。

等级结构的公国。此后，这些公国成了中世纪碎片化的和相互争斗不已的德意志王国的基石。这个规模较小的、为人所熟知的德意志国家开始于10世纪早期，也即东法兰克王国最后具有加洛林血统的统治者死后，法兰克尼亚的公爵康拉德继承了他的王位，是为国王康拉德一世。随着919年王权从法兰克人手中传到萨克森人手中，德意志第一帝国诞生了。而11世纪时，“罗马国王”和“罗马帝国”的称号代替“法兰克国王”和“法兰克帝国”的称号，反映出对德意志一贯的历史雄心的一种解读。到13世纪，古老的法兰克中部王国和东部王国诸邦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到15世纪末，考虑到新的德意志跨区域的认同和优越感，“神圣罗马帝国”变成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①]

1. 萨克森王朝的兴起

东部法兰克的公爵们之所以挑选法兰克尼亚的康拉德继承加洛林王朝的王位，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最有能力处理这个正在衰落的帝国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诸种挑战。然而，康拉德未能击败马扎尔人，而且在教会的怂恿下力图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东部法兰克诸邦，于是大多数公爵转而反对他，东部法兰克公爵们使得地对德意志皇位的要求变得捉摸不定。在康拉德弥留之际，皇位又转到了“捕鸟者”萨克森亨利一世手中，由此开创了德意志统一和权力的新时代。

50

在亨利一世自己举办的一次公开典礼上，他身着法兰克人颜色的服装，声称自己是承继克洛维和查理曼衣钵的帝国统治者。这向德意志公爵们和罗马教会发出了一个勇敢的信息：萨克森公爵不是德意志公爵们推选或教皇加冕的德意志君主，而是王权从古代国王未曾中断地转移到中世纪国王手中的结果。换句话说，亨利声称自己拥有的王权直接来自于上帝。日后的德意志国王们也和其他国家的国王和皇帝

---

①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vol. 1: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64), pp. 27—28; *Facts*, p. 91.

差不多，把这种看法一直保持到现代。①

在1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和11世纪初，东部公爵们和更小的地方势力反复考验着萨克森君主的忍耐力。亨利的儿子和继承者奥托一世像他父亲所做的那样，通过利用封君和封臣之间的传统契约关系应付了这种挑战。在10世纪，这种封君和封臣之间的传统契约是霸主们获得对手尊敬的唯一和平方式。萨克森君主们借助于王室自身的地位、忠诚的地方伯爵和被授予职位的管理人员，在德意志诸公国中建立了一套权威性的军事、财产和宗教体系。同样，奥托一世在法兰克尼亚的康拉德失败的地方也取得了战争胜利，两度击败了马扎尔人，确保了东部边界的安全，并为萨克森的扩张开辟出新的土地。②

确保萨克森领导下的新帝国的安全，这关系到奥托一世的统治。在德国的西侧，从弗里斯兰延伸到意大利的原先法兰克中部王国土地上的诸邦则是确保帝国安全的成功关键。整个9世纪，这些邦国一再遭到蚕食，如今已经到了夺取之际。由于意大利是这个地理上的庞然大物的强有力的尾巴，它就成了萨克森君主争取稳定的首选目标。对于奥托而言，拿下意大利不仅意味着帝国的皇权，也意味着确保萨克森家园安全的能力的展示。

通过征服，937—938年间，奥托实现了对伦巴第——意大利王冠的要求。为了确保这顶王冠，10世纪中叶，他再度入侵意大利。他的成功给人以深刻印象，包括得到了一位意大利王后。不过，随着国内的敌人与国外的敌人（包括教皇在内）密谋打败这位长期不在国内的霸主，奥托的德意志王国即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威胁。然而，奥托和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们更乐意冒这个险来确保他们所要求的意大利领土和称号。但是，由于奥托驻跸意大利，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公爵们掀起了叛乱，反对萨克森的统治，从而点燃了一场德意志内战，奥托不得不转回国内，进行镇压。

51

① Barraclough, *Origins*, pp. 14—25.

② Ibid., pp. 27—30, 41.

10年之后，奥托再次率军回到意大利，维护帝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他在961年返回意大利的目的是要去解救教皇。当时，教皇被意大利的敌对势力所围困，其中包括一些此前在德国策动诸公国起而反对奥托的人。他拯救了教皇。一年后，充满感激的教皇约翰十二世将奥托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这次加冕给奥托提供了对法兰克中部王国诸邦（包括勃艮第和意大利，洛林也在其列）无可置疑的要求，从而达到了意大利行动的战略目标，也即维护德意志西部边境的安宁。这种和平反过来使奥托成为东部德意志王国的无可争议的主人。他带着帝国皇冠返回了德意志，此后再也没有率军回到意大利。[①]

2. 与教会的争斗：萨利安王朝

1024年，萨利安法兰克的一个新支系成为强大的萨克森王朝的继承者。[②] 这时，就像在加洛林王朝时已经出现的那样，构成萨克森官僚体制的伯爵、高级教士和王室成员已经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自谋其利。萨利安王朝的国王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值得信赖的管理机构，转而依赖那些为自己服务的非贵族和非教士出身的家臣阶层。这些守纪律和有能力的人既无土地也无权力，但是现在他们两者都可以得到补偿，终身享有。他们占有土地和权力的条件近似于封臣，然而却没有个人自由和封臣的契约保证，这个缺陷最终将使萨利安王朝的实验变质。[③]

52

这个规划也不会让那些被家臣所取代的人们喜欢这一新王朝。而受到削弱的王室官僚体制则因失去高级基督教教士而特别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国王收回了事实上为教会拥有的王室土地，用来奖赏给家臣。几个世纪来，教会就一直对早期法兰克人侵占他们声称拥有的土地怀有怨恨，萨利安的回收政策无

---

① Ibid., pp. 47—48, 53—58, 63.

② Hoyt and Chodorow,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p. 673.

③ Barraclough, *Origins*, pp. 77—79; Hoyt and Chodorow,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p. 275.

疑是向旧的伤口上撒盐。[①]

其他的自由群体，如自由农民、小的贵族地产拥有者，其中最不妙的是那些决定着德意志未来的贵族诸侯们，也都抵制萨利安王朝的新路线。诸侯们早在11世纪就决定，不能让国王和他的新奴仆阶层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建设国家。最终他们与教会联手，采取了一种聪明的阻碍方式：他们变成了数以百计的新基督教修道院地产的独立拥护者，也就是说是修道院财产的奠基者和保护者。[②] 这种联合制造出的产业在法律上属于教会所有，这样就超出了国王的势力范围。通过这种机会主义的结盟，诸侯和教会大肆地扩张自己的财产和权力。到14世纪中期，他们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王室进行国家统一的努力。

自从墨洛温王朝时代以来，国王与教会的结盟能很好地服务于双方，它给教会带来了新的土地和王权的保护，也给王权提供了一个具有杰出能力和近乎无可匹敌的王室集团管理机构。然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潜伏着危险。通过教皇加冕而给国王带来的精神地位使国王增添了新的尊严，使国王和教士合二为一（rex et sacerdos）。这种崇高形象可能会引诱一名怡然自得的国王将自己想象为与教皇平等，或更高一筹。更直接的王室行为是，将王室授予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作为国家机构，由此削弱教会庇护之下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如果代表上帝批准国王的教皇野心膨胀，就可能会认为，没有他的赐福，世俗统治者只能有名无实。在这样的方式下，中世纪的教会和国家都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对方提出至关重要的问题，互相提出巨大的要求。在11世纪后期和13世纪后期之间，双方将会这样对抗下去，加大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毁灭性影响。 53

导致王室与教会之间的联盟瓦解的因素是一种王室的典礼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国王在授予教士们土地和王家权力的同时，还将教会

---

① 这些包括“行省、宫廷意大利和罗马城的一些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地区”，教会宣称君士坦丁堡大帝已经将此捐赠给了教会。Henry Bettenson, ed.,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1964), pp. 141—142。

② Barraclough, *Origins*, pp. 85—90.

职位的象征（主教的戒指和权杖）授予教士。11 世纪的头 25 年内，王室向高级教士授职成了例行公事。亨利二世统治期间任命了 50 名主教中的 49 位。在他召开并主持的主教会议上，他也集中指示了他们的职责。教士们也成了军事征服的合作者，尾随着在斯拉夫人土地上向东行进的王室军队，所到之处建立新的教堂，为管理被征服的异教徒而建立新的教区。这位国王利用向教会财产征税来支持自己的军队和宫廷，在宗教改革家们的眼里，这只能是突显了王室对宗教的亵渎。①

1075 年 2 月，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抛出了杀手锏，将教士的授圣职仪式谴责为买卖圣职罪（出卖灵魂的罪恶）。由于当时反对萨克森人的生死攸关的战役正在进行，国王亨利四世因此无暇关注教皇的挑战。然而，教皇通过这一行动点燃了将毁坏中世纪教会与国家之间同盟的烈火，加深了德国一度被弥合的政治分裂。

教皇对德意志王权的挑战的背后动因，一方面是德国国王们实在是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则是肇端于法国中东部的克吕尼本尼狄克修道院的过于理想化的宗教改革运动。教会期望能将教士从国王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特别是要让教会职位脱离王室授职仪式。而对于亨利四世而言，这种挑战的结果却是悲惨的，王家机构无法任命效忠的教士，这对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和有效率的政府而言，近乎一种致命的打击。宗教改革者看到的是清楚的宗教原则，而国王看到的只是抢夺权力和教会怂恿下的混乱状态。②

54 到了 12 月，格利高里直截了当地提醒亨利：国王是基督教的俗家弟子，要遵守教皇根据宗教教义制定的法令。这一最后通牒并非是在亨利四世最困难的时刻发出的。由于刚刚击败了最后的萨克森公爵，亨利四世准备使德意志诸邦都服从他的意志。他憧憬着德意志的统一，并没有在意格利高里的威胁，并且授意主教会议谴责格利高里的虚伪。

对早期的德意志国家来说应感到不幸的是，格利高里为确保他的

---

① Ibid., pp. 35—36, 41—42; Brian Tierney, ed., *The Crisis of Church State* 1050—1300 (Toronto, 1996), pp. 33—34.

② Barraclough, *Origins*, pp. 97, 103, 106; Tierney, *Crisis*, pp. 45—52.

王国而反对德意志国家的决心与亨利四世反对教会的决心相比更为强大。格利高里掌握了诽谤和让亨利四世丧失合法性的强有力的武器，他将亨利四世逐出了教门，剥夺了他统治德国的权力。至少在上帝的眼里，这意味着国王的臣属们免除了服从于他的统治的义务，实质上等于认可了任何想挑战国王者的反叛和无秩序状态。在缺乏宗教支持的情况下，亨利四世再度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应，指示忠于自己的德意志主教们组成的会议将格利高里逐出教门。在信仰的时代，这是一个徒然的行动，亨利摆脱内战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求得教皇的赦免和取消革除其教权的禁令。因此，这位德国国王跪在卡诺沙的教皇冬季住所外面悔罪求恕，这是一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历代德国统治者在处理教会事务时都无法忘怀的情景。①

尽管亨利四世获得了赦免，但已经对王权和帝国造成了破坏。自此以降，围绕着德国君主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表明了王权的削弱。德意志诸侯们抵抗亨利的王家权威，另选了对立的国王。格利高里再次将亨利逐出教门。亨利作出反应，亨利的教士们则另立教皇。每一次新的冲突升级带来的回报不断减少，冲突也就变成了悲剧。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敢作敢为的萨克森和萨利安王朝统治带来了德国的政治统一，而打打停停的德意志三十年内战则结束了这一状况。②

55

亨利四世死于 1106 年。继承者亨利五世在其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内，打算并试图通过放弃与教会的争端来挽救德意志王权。他通过与诸侯的结盟消除了教会获得的对其先人的优势，亲自给诸侯们这种优势，并且成为诸侯们的消极代言人。由于无法打败诸侯们的联合，亨利五世只能以诉诸诸侯庇护这种唯一可能的方式团结德意志。贵族的德国对君主的德国的胜利，其标志性事件是 1122 年在沃尔姆斯召开的诸侯会议，会议提出了和平条款，并为亨利五世接受，从而结束了由授圣职斗争导致的王室灾难。国王放弃了向主教们授与戒指和

① Tierney, *Crisis*, pp. 53—57; see chap. 7.

② Barraclough, *Origins*, pp. 109—110, 125.

权杖的授职仪式，同时又保留了授予财产、土地和称号的自由。简而言之，这种矛盾性标志着主权控制和诸侯对国王效忠的丧失，而教会却取得了威望和教士的忠诚。①

四、皇权的回光返照：霍亨斯陶芬王朝

11 世纪最后的 25 年和 12 世纪最初的 25 年，教皇的干预和内战成了德意志的标志。在长达 50 年的时间内，德国转变成了诸侯主权国家的拼凑体。② 其后果是，德意志人丧失了对教皇和诸侯们的信心，转而强烈倾向于恢复强大的君主制。

1. 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

新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是亨利四世之女阿妮丝与霍亨斯陶芬的弗里德里希联姻的结果，注定要统治德意志一个世纪（1138—1254），这是中世纪的德意志建立统一国家的最后的好机会。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是两人的孙子，他制定了新的王家案例，用以反对教皇所宣称的高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在具有挑衅意味的《1075 年的教皇宣言》一文中，教皇格利高里七世规定国王和诸侯要准备亲吻教皇的脚，而 12 世纪中叶的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却认为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皇冠和帝国都得益于对教廷的谦恭。③ 与之前的亨利一世和日后 19 世纪的德意志君主一样，弗里德里希一世声称他所拥有的王权直接来自于上帝，他通过将形容词“神圣的”加在国号前这个举动来使国人理解这一点。④ 弗里德里希一世为后来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王朝各自成功地反对后格利高里时代的教皇神权主义开创了先例。

55

由于缺乏将其意志强加于德意志诸邦的资源，与先前萨克森王朝的君主奥托一世一样，弗里德里希一世也在古老的法兰克中部王国土

---

① Ibid., pp. 128, 131—133.

② “奇异的地图：德意志分离主义和诸侯不受限制的主权”。Ibid., p. 153。

③ Hoyt and Chodorow, p. 673; Tierney, *Crisis*, pp. 46, 49, 100, 105.

④ Barraclough, *Origins*, pp. 169—171; Barraclough, “Frederick Barbarossa and the Twelfth Century”, in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1955), pp. 73—96.

地上寻找所需要的资源。他通过联姻方式和平地占有了勃艮第和普罗旺斯，他着手把意大利变成新帝国的支撑点。在他能利用王权的政治和物质资源前，首先必须在国内安抚德意志诸侯。他利用亨利五世谕书的部分内容，允许诸侯在自己土地上自由行动，并相信他们对维护和平的封建誓言的忠诚。他这样做等于对所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这样的许可只会弱化君主和封臣之间的联系。①

德意志本土安全了，于是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开始了长达20年的5次进军意大利中的首次行动。他成功地击败了教皇的对手，在1155年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加冕，这是恢复帝国合法化的重要一步。最终，米兰人的抵抗粉碎了他的意大利使命。1167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行动迫使意大利北部商业城市组成了伦巴第联盟，旨在将当时令人讨厌的德意志人驱逐出意大利。经过断断续续的与反帝国势力间将近10年之久的战争，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行动以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的失败而终结。这通常被视为德意志人帝国梦想的终结。

然而，弗里德里希一世有不应得的好运气，最后的和平条款给他在意大利中部留下了立足之地。如果说弗里德里希一世在完成他的原初目标方面完全失败了，那么这种重新获取似乎是天意，提高了这位德意志统治者的威望，民众认为他是典范，优秀且战无不胜。1190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死于第三次十字军进军途中。在未来的神话传说中他变成了弗里德里希的同名人物，德国人普遍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会在正义的复仇中回来迎接基督教的千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将这个预言用到了最后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者、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身上。值得商榷的是，这是所有神圣罗马皇帝中德意志因素最少的一位，也是那时最忽略德意志王国的人。②

由于弗里德里希一世长期不在国内，德意志诸侯们毫无顾忌地确保自己领土的安全。他们中最具有野心的是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他

57

① Barraclough, *Origins* , pp. 176—177.

②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1961), p. 103。更积极的评价见 David Abulafia, *Frederick II: A Medieval Emperor* (London, 1988)。

将其边界延伸到斯拉夫人土地上，同时与英王亨利二世之女联姻，从而与亨利二世建立了王朝联系。12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他向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统治提出了挑战。帝国军队受辱于莱尼亚诺战役，其诸多原因之一就是狮子亨利拒绝派出曾经答应过的增援力量。这种对封臣义务的违反使他在帝国内被剥夺了权力，最终被流放英国。①

弗里德里希一世不在国内期间，诸侯们没有完全割裂德国。这好像是与他从完全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一样伟大的一个奇迹。可以这样说，他成功地保持了王权的完整，并维护了王室的传承。然而，德意志诸侯的势力在莱尼亚诺战役失败后更加强大了，他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受到抑制。现在，帝国的其他敌人在罗马和英国大胆地浮出了水面。

2. 西西里人的皇帝

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是亨利六世，他继承了这种灾难性的局势。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的许多举动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与他的父亲一样，他也经受不住外来帝国的海妖式的诱惑，这个诱惑来自于西西里王国。他通过与西西里的康斯坦茨公主联姻而得到了西西里王国的王位。与其父入侵伦巴第一样，亨利六世拥有西西里对教皇构成了威胁，霍亨斯陶芬的阴影正从北部和南部笼罩着他的统治区域。不过，亨利六世还是成功地获得了教会和德意志诸侯对其西西里出生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继承帝国皇位的认可。然而，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好运。1197 年，亨利六世驾崩，一年后王后也撒手而去，这样一来就将年仅 4 岁的继承人留给了西西里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使他任由具有高度派系特征的陌生人摆布。

58

王后在临死前已经敦请教皇英诺森三世担任蹒跚学步的弗里德里希的监护人和西西里王国的摄政，直到孩子成年为止。与此同时，德意志的诸侯们则看好亨利六世的兄弟士瓦本的菲利普，推举他为帝国临时监护人和摄政。从这些协定的订立到年幼的弗里德里希成年，时

① Barraclough, *Origins*, pp. 180—186, 188—190; Hoyt and Chodorow, *Europe*, pp. 354—364.

间仍然很长。尽管关键的权威都承认孩子是其父母的继承人，但没有人坚定地支持霍亨斯陶芬家族对帝国皇位和西西里王位的继承要求。在这期间，在谁将取代这个孩子来统治德意志和西西里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阴谋和争吵。①

作为年幼的弗里德里希的监护人，教皇英诺森三世从未怀疑过弗里德里希会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最初，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霍亨斯陶芬家族对西西里的控制和国王神圣权力的观念。英诺森三世联合了两个同样维护自我利益的大国——英国和法国，利用德意志黯淡的局势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得到了英国国王"狮心"理查一世的帮助，策划了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对手推上王位：这个人就是来自韦尔夫王朝的不伦瑞克的奥托四世。他是英王理查一世的外甥——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老对手狮子亨利之子。1198 年，奥托在亚琛加冕，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则迅速站到霍亨斯陶芬家族一边，抵制英国的新优势。这种行为开启了外国不断介入德意志内部事务特别是法国干预德意志事务的大门。

59

新的韦尔夫家族皇帝为教皇在德意志心脏地带效劳。作为报答，教皇在罗马为之加冕。然而不到一年，奥托就被逐出教门，使得皇冠黯然失色。奥托在加冕后犯了与霍亨斯陶芬家族同样不可饶恕的罪恶，他将军队开进南意大利，并试图将其并入德意志帝国。这种行为是教皇通过给他加冕称帝这种方式来力图予以避免的。② 在这次背叛之后，教皇英诺森三世认为是结束韦尔夫王朝空位期③的时候了，他有合适的人选：年轻的霍亨斯陶芬的弗里德里希。他已经被培养为一名西西里意大利人，现在已经到了获得德意志王权的年龄，而且正为此做准备。

1212 年 12 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美因茨登基，宣布恢复 15 年前被韦尔夫家族所中断的德意志国王的霍亨斯陶芬世系。但是，直到

① Barraclough, *Origins*, pp. 196—201; Hoyt and Chodorow, *Europe*, pp. 462—463.

② Barraclough, *Origins*, pp. 204—211; Hoyt and Chodorow, *Europe*, pp. 463—469.

③ 原文如此。——译者注

1214年7月法国人在布维纳战役中击败英国和韦尔夫家族军队后，王室传承才得到真正的修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将坠落的德意志帝国之鹰捡了起来，送给了新皇帝弗里德里希，它象征着韦尔夫家族的失败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恢复。次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亚琛进行了第二次加冕，成为确定无疑的德意志国王和皇帝。[①] 对德意志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21岁的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孙子是否真的是其祖父的继承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位能应付各种不利形势的德意志武士吗？或者说，教皇英诺森三世将这个男孩儿培养成完美的德意志复仇者了吗？

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意大利外交政策使德意志帝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尽管新皇帝具有德意志血统，他却在西西里长大。从这个观点上看，德意志似乎是块禁地。他也是在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支持下才掌权的。这么说来，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冷不热地对待德意志王国也就在预料之中了。他的先人们追求意大利是为了确保德意志帝国，但他却利用德国这块基地来加强他的西西里王国以实现其在意大利的野心。在他抛弃德国之前，德意志的诸侯们给他提供了逐鹿意大利所需的两样东西：皇帝称号和物质支持。在他37年的皇帝生涯中，只有9年时间待在德国国内，其中有6年时间还是在他25岁前。[②]

霍亨斯陶芬家族有向德意志诸侯贩卖无限制的政治权力的习惯，弗里德里希二世则将这种习惯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为了得到的皇帝称号及其抵押品，他不惜与诸侯做很合算的交易。他也授予德国教会以类似的权力，允许教士们随心所欲地统治自己的土地。1232年颁布了名为《诸侯自由宪章》的文件，德意志贵族成了自己领地内的法庭的唯一仲裁者。[③] 这与查理曼时代的帝国使臣和由此演变的数量较少的

① Barraclough, *Origins*, p. 214.

② Ibid., pp. 219—224。比较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一位英雄般的德国人，受益并钟情于异域文化（法国）的熏陶，胜过其对自身德国文化的喜爱。See chap. 5。

③ Ibid., pp. 236—237.

皇家守卫者相去甚远，过去他们是代表皇帝在帝国内巡行或驻扎。

最终，这样的全权委托治理既破坏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德意志基地，也破坏了他的意大利计划。他通过弱化自己在德意志的地位来换取自己在意大利的强大，但是转过来看，他在意大利的强大却使他的意大利敌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付他。在13世纪的教皇中，英诺森三世是一位有天赋的、强有力的教皇。对他而言，霍亨斯陶芬家族要求得到的伦巴第和西西里，就像要求把德意志帝国的统治扩张到罗马教会的前后门那样不能接受，它们都直接威胁着罗马。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敌人们已经目击了三代霍亨斯陶芬人将权力扩展到整只靴子①上的努力，因此他们在教皇的领导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终结德意志人在意大利的存在。

在政治创造和政治破坏的循环轮回中，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君主们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将自己的存在归因于德意志诸侯和意大利的教皇的同意。反过来，霍亨斯陶芬王朝通过在意大利获取称号和财富来增强在德意志的地位这样的战略目标，也使得德意志的诸侯和教皇在德意志的力量远比他们单独的力量要大得多。诸侯得益于王权的疏忽而加强了自身力量，教皇则通过与王权的对抗加强了自身力量。诸侯与教皇屡屡发现，通过结成反对德意志王朝的同盟，他们的利益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因此双方都尽力创建这样的同盟。 61

由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一直坚持德意志帝国对西西里和伦巴第的统治要求，先前曾挫败了其祖父占领伦巴底意图的伦巴第同盟在13世纪30年代向他宣战。教皇通过收买德意志诸侯的效忠而卷入了这场冲突，德意志诸侯在挑动教皇和皇帝相互争斗方面也是行家里手。1227—1250年间，罗马教皇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不服从和侵犯教皇而4次将其逐出教门。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外国军队和心甘情愿的本国的后代们将金瓯无缺的德意志领土转变成了众多力量强大的邦国，使

① 地图上的意大利呈靴型，这里用靴子指代意大利。——译者注

得德国的碎片化和非中央集权化一直持续到19世纪。[1] 1257年，诸侯们召开非正式的德意志诸侯选帝侯团会议，挑选德意志的君王，并禁止其拥有世袭继承的权力。一个世纪后，即1356年，选帝侯团有了更强大的选举和政治操作能力，并且得到帝国法律的承认。[2] 接下来的6个世纪中，诸侯领土国家将凌驾于德意志国家之上。

① Ibid., pp. 227—233, 240.

② Hoyt and Chodorow, *Europe*, pp. 623—625.

第二编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第三章　人与神：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65　16世纪初，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捍卫了德国基督徒礼拜祷告的权利，基督徒有权用罗马教皇许可之外的其他方式祷告。这些举动让德意志人想起历史上曾发生的而且仍在持续的两次冲突斗争。第一次斗争追溯到近乎3个世纪之前，那时，德意志诸侯们反对他们的政治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二次斗争出现于15世纪，同样是那些诸侯，他们反对势力较弱但各自独立的政治团体——骑士、帝国城市和领地城市，其中还有无数的乡村也卷入了冲突的漩涡。在两次冲突中，诸侯们都是引人注目的赢家。

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对抗中，到1356年时，较大邦的诸侯占据了相对有利地位。当时，来自捷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承认了德意志诸侯势力的强大和帝国势力的虚弱，对诸侯做出让步，以皇帝的金玺印盖确认了德意志的新宪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金玺诏书”。金玺诏书满足了各诸侯自霍亨斯陶芬王室衰微之后早已梦想得66　到的一切：授予诸侯在各自邦国内的准君主权力。从此以后，包括4个非教会选帝侯和3个教会选帝侯在内的7个诸侯，在不受教皇干涉

的情况下，通过协商选举帝国皇帝。[1]

在颁布金玺诏书到宗教改革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德国的诸侯们对国家统一并不感兴趣。他们利用新获得的政治影响不断加强自己邦国的实力，将一些较小的贵族、市民和农民置于本邦的法律和文化影响之下。因此，宗教改革兴起之时，国内的政治冲突一触即发的局势并非偶然。

在德意志，宗教改革在那些新近受到其包围的城市和乡镇得到了热烈欢迎。15 世纪后期，德国约有 3 000 多个城镇，大部分都比较小（超过 1 000 人的城镇有 200 个，少数超过 2 000 人），有 65 个帝国自由市归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接统治，不受当地诸侯的管辖。但无论受帝国管辖还是受诸侯管辖，根据宪章的规定或特别的契约关系，城市对于诸侯和皇帝都有一定的义务。比如，宗教改革滥觞之地维滕贝格是萨克森选帝侯的主要居住地，萨克森选侯则是维滕贝格的最高统治者，热情好客（提供食宿），拥有征税与招募军队的权力。

在 16 世纪的德国，65 个自由市中有 50 个城市实行了宗教改革，其中半数以上城市的宗教改革极为彻底。在诸侯领地城市和城镇中，少数派新教徒与占多数的天主教教徒可以共存不过，在短暂的相互制衡之后，少数城镇开始联合压制宗教改革运动。但更多的城镇，特别是人口在 1 000 人以上的城镇，则长期支持宗教改革运动。[2]

城镇居民对罗马教会的怨愤极大，他们渴望社区自治，新教改革自然对他们充满吸引力。新教徒将他们自身看成是专制统治的沙漠上的共和治理的绿洲，自治的城镇居民认为他们在道义上高于那些拥有土地的贵族和王侯。他们能处于当前的地位，不是通过出生、财富或军事力量取得的，而是通过他们的天生才干以及辛勤劳动获得的技能

67

---

① 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侯爵、波希米亚国王、莱茵行宫伯爵以及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伦大主教。

② Karl-Heinz Blaschke, *Sachsen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Gütersloh, 1970); Steven Ozment, *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 (New Haven, 1975), pp. 125—129, 143—145; Bernd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in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Three Essays, Trans. M. Edwards and H. C. Erik Midelfort (Philadelphia, 1972), p. 9.

获得的。[①] 城市编年史家用源于亚当和夏娃以来的故事记载城市的自尊。特殊的信仰在帝国自由市中不断加强，每个帝国自由市都是跨地区和跨越历史的帝国的自我意识体，其广泛性在帝国的通行往来以及帝国道路附近的居民聚居区都可以感觉到。由于有了这种自我重视的意识，到中世纪后期，本土民众用曾经被牧师用来称呼异教徒的侮辱性称号“土耳其人”和“胡斯派”来抨击可怕的诸侯和农民，而这些侮辱性称号是用来控告精神上的蹂躏者的。[②]

16世纪的城市自许为全人类的中心，城市充满着自由的气息，是一个高度安全和充满机遇的地方。然而，城市议会和市政官员却像寡头政治执政者和君王一样，他们被冠以 Oberen 和 Herren[③] 的称呼。对于生活在城市之外的贵族和农民来说，中世纪后期任何政治实体都不如城市那样以自我为本位，城市认为自身就是一个世界。[④]

贵族领主和诸侯对于城市引以为豪的各种法律规章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城市用来对付地方势力的法律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城市和村庄都可以充当自己的最高法庭，因此王家法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可以通行于全国。15世纪，诸侯们颁布的新的领地法规压倒了地方法律，他们在公平的名义之下实施这一举动，从而使自己成了法律统一的提倡者。对于被征服者来说，这样的主张不过是赤裸裸的侵略借口，格拉尔德·施特劳斯称之为“国家规范铺就的爬向死亡之路”。[⑤] 新的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把罗马法作为帝国所有世俗法庭的指导方针，新法典于1495年开始认真

---

① Blaschke, Sachsen, p. 74.

② Heinrich Schmidt, *Die deutschen Städtechroniken als Spiegel des bürgerlichen Selbstverständnisses im Spätmittelalter* (Göttingen, 1958), pp. 34—37, 69—72, 77; Blaschke, Sachsen, pp. 34, 49—55, 72.

③ 德语，上司和主人之意。——译者注

④ Willy Andreas, "Die Kulturbedeutung der deutschen Reichsstadt zu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6 (1928): pp. 62—113;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pp. 9, 13—15, 17; Mack alker, *German Home Towns*, 1648—1871 (Ithaca, 1971), chap. 4.

⑤ Gerald Strauss, *Law, Resistance, and the State: The Opposition to Roman Law in Reformation Germany* (Princeton, 1986), pp. 65, 80, 150.

执行。在罗马法系中，一国之内的最高官员就变成了该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也是为什么罗马法会成为欧洲各个实行中央集权的政府的工具。在德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数十年里，一直存在这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痛苦冲突。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城市也是相互对立的混合体，就此而言，它就是从前历史编纂中所称的现代德意志国家的“原生质”。[①] 一方面是令人烦恼的命令快感（Verordnungsfreudigkeit），对城市每个居民的住所、可以穿着的服饰、城镇中人们可以居住的路段甚至人们应该说什么恰当的话语等，都予以毫不含糊的规定。这一切都反映出这个社会与其说害怕专制倒不如说更害怕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是令人欣慰的安全和自由。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德国，这种安全和自由意味着人身的安全与物质的繁荣。1520 年，马丁·路德在一篇以“论基督徒的自由”为题目的著名论文里对“基督徒的自由”进行了定义，他并没有谈到“一个人，一种信仰”或人们有任何权力根据自己的意愿礼拜和信仰。他只是描述了一种状况，即人们应生活得如同“主宰一切的主人同时又是服务于一切的仆人”。这也意味着一种超越精神冲突的生命，他从罪孽、死亡和邪恶中获得安全，在内心深处足以保证他有信心根据自己和邻居们的利益来行事。在路德的论述中，精神和道德与城市的人们所寻求的自由和安全类似，那些在乡村地区逃避迫害和衣食无着的人们也希望得到它们。

68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封建割据政权和城市的统治者加紧了他们的控制，受到包围的城市、小镇以及乡村都纷纷与反叛的路德教徒结成联盟。路德教派的《圣经》教义倡导基督教社区的自我管理，不受外国教皇影响和剥削，这些教义在很多已经超越社会阶层范围的人看来是一方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柱，支持市民在面对城市寡头和各领地诸侯过度伸张的权力触角时奋起斗争，维护地方平等性共和制度的生存。路德曾经说过，教会可以成为一个 Gemeinde，即具有相同信仰的人的

① Andreas, “Die Kulturbedeutung”, pp. 55—56.

社区，他们精神上平等，在道义上为他人的福利承担责任，而不是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下，普通俗人要通过神职人员和教皇祈祷才能进入神圣的天堂。①

德国城市并非当时唯一能与新教宗教改革产生共鸣并支持和欢迎新教改革的社会群体，但是这些群体支持新教改革的出发点与先前改革者的思绪大相径庭。一些帝国骑士在改革中看到了建立新教联盟的机会，农村地区的普通百姓也希望如此。② 由于信仰的分裂，有观点一针见血地认为，宗教改革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不加区别地帮助并鼓动城市、乡村和诸侯起来抗争，三者相互之间在政治上既互相撕咬又相互支持。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的一切都依赖于他们各自的教会制度的发展和胜利。

69

一、首位新教选帝侯

没有人比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更关心宗教改革的发展与成功。1517 年之后，他成了路德的捍卫者，并且允许宗教改革与之前兴起的德意志民族运动相融合。德意志民族运动则较先发展起来，它也支持宗教改革运动。尽管宗教改革运动导致新的信仰的分裂，但两股运动相互融合不仅增强了德国人的自我意识，也促进了德国文化的统一。为什么这位德国最虔敬的天主教诸侯却成了一个年轻的异教徒的保护者呢？

弗里德里希的宫廷牧师兼内阁秘书奥格尔格·斯帕拉廷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人。1509 年，斯帕拉廷进入维滕贝格宫廷之前，在爱尔

① Gerhard Pfeiffer, "Das Verhältnis von politischer und kirchlicher Gemeinde in den deutschen Reichsstädten", in*Staat und Kirche im Wandel der Jahrhunderte* , ed., W. p. Fuchs, (Stuttgart, 1966), p. 85; Peter Blickle, *Communal Reformation*, trans. Thomas Dunlap (Leiden, 1998), chap. 5; Steven Ozment, *Protestants : The Birth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chap. 6.

②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pp. 35—38; Heinz Schilling,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in Hans - ulrich Wehler, *Scheidewe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zur Wende, 1517—1989 (Nördlingen, 1995)*, pp. 15—27, esp. 20.

福特大学和纽伦堡大学学习法律和神学。爱尔福特是严守教规的奥古斯丁派宗教团体的大本营，1505 年路德就加入了这一教派。纽伦堡大学则成了重要的人文主义学者的聚集地。1511 年，斯帕拉廷帮助路德进入维滕贝格，他在促使维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尔的纽伦堡人文主义团体成为第一个宗教改革宣传阵地方面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在斯帕拉廷这里，德国本土的宗教和教育改革运动找到了一个身居萨克森政府上层的极具影响力的朋友，他愿意而且能够促进民族的融合。

像德国历史上其他重要的诸侯一样，弗里德里希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不仅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也属于德国的未来。在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静养之处洛豪城堡周围的禁猎地中，各类猎物异常丰富，他就在这里和游客与客人一起打猎。城堡之中则陈列有许多猎物和禽类（208 只熊，200 只猞猁以及许多狼、野猪、鹿和家禽，据传这只是一次简单的秋季猎狩的猎物）。[①] 游人与选帝侯还在维滕贝格的比武场上进行比赛。宫廷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画下了这些名垂千古的场景（后来，毕加索在转向立体主义绘画风格时，曾对卢卡斯的素描进行了重新创作）。[②] 运动之余，弗里德里希还在 15 世纪与 16 世纪之交时新建立的维滕贝格大学以及装饰一新的城堡教堂进行演讲和布道。 70

作为德国第一批接受过开明教育的诸侯，弗里德里希精通拉丁文，翻译过一些古典文论并且搜集了塞内加、特伦斯、西塞罗和加图等人的一些名言警句。我们能够从卢卡斯·克拉纳赫在维滕贝格城堡所绘的壁画中看到弗里德里希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这幅壁画描绘了珀尔修斯从海怪中解救安德洛墨达，赫斯帕里得斯守护着金苹果树果园，

---

① Ernst Borkowsky, *Das Leben Friedrichs des Weisen. Kurfürsten zu Sachsen* (Jena, 1929), p. 33.

② Claus Grimm et al., *Lucas Cranach. Ein Maler-Unternehmer aus Franken* (Regensburg, 1994), pp. 309—313, 320—321; *Cranach und Picasso, Ausstellung, Nürnberg, 22. Sept. – 20. Okt., 1968*, ed. Albrecht-Dürer-Gesellschaft (Nuremberg, 1968).

而阿尔戈英雄则在寻找金羊毛。① 弗里德里希于22岁时加冕，就职伊始便积极游说，给不拘俗套的康拉德·策尔蒂斯举行德国第一个桂冠诗人加冕典礼。康拉德是德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诗人，他非常崇拜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是把阿波罗②引入德国的文化运动领袖。弗里德里希与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斯以及意大利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经常联络。还有德国基督教希伯来语学者的领军人物约翰内斯·罗伊希林，弗里德里希曾保护他免遭多明我会狂热信徒毁坏犹太人著作的迫害，阻止这些人惩罚他及其基督教朋友。早在1849年，丢勒就成了弗里德里希的御用画家，丢勒给他画过两次肖像画，第一次是和康拉德·策尔蒂斯一起。第二次画了一组圣坛装饰画，画面中弗里德里希作为3位国王中的一位在庆祝耶稣诞辰。每年一度的莱比锡交易会上，维滕贝格都是久负盛名的最大买家，现代艺术史家把弗里德里希收藏艺术品称为"维滕贝格油画文艺复兴"。③

1. 信仰者

71

传统的宗教虔敬被认为是伟大而高贵的热情，这种宗教虔诚也是与路德接触的关键所在。弗里德里希曾数度朝圣，其中包括1493年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他敬畏处境悲苦的朝圣者的庇护者圣徒圣安妮④。这些悲苦的朝圣者祈祷的就是："请帮助我，圣徒圣安妮。"后来弗里德里希把这一幕印在了萨克森的货币上。⑤ 在耶路撒冷朝圣期间，弗

---

① 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pp. 38. 有关弗里德里希作为一个"文艺复兴君主"的局限性，参见：Bernd Stephan, "Kulturpolitische Massnahmen des Kurfürsten Friedrich III., des Weisen, von Sachsen, *Lutherjahrbuch* 49 (1982): pp. 50—95, esp. 61—65"。

② 此处指主管光明、音乐、诗歌等的神。——译者注

③ 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pp. 39—40, 44—46; Bernd Stephan, "Kurfürst Frederick III. Der Weise", in Rolf Straubel et al., *Kaiser Konig Kardinal. Deutscbe Fürsten 1500—1800* (Leipzig, 1991), p. 31; Jane C. Hutchison, *Albrecht Dürer. A Biography* (Princeton, 1990), 65—66, 69—70; Charles Nauert,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1995), pp. 110—111; Georg Spalatin, *Friedrichs des Weisen Leben und Zeitgeschichte von Georg Spalatin*, in *Georg Spalatins historischer Nachlass und Briefe*, vol. I (Jean, 1951), p. 28.

④ 圣安妮系圣母玛利亚的母亲。——译者注

⑤ 马丁·路德在去爱尔福特的路途中遭遇闪电和风暴，他惊慌失措，向这位圣徒求救，答应如果她不伤害他的性命，他就进入修道院修行。

里德里希收集了许多圣物，这便是北欧最大的圣物收藏的开端之举。他的圣物藏品包括一具肱骨化石，这是他从与他同名的乌得勒支主教圣·弗里德里希那里得到的礼物。16 世纪 20 年代晚期，弗里德里希的文物收藏达到了顶峰，有 19 000 多件文物，陈列在城堡教堂的 10 个陈列室里。如果朝圣者对这些圣物恰当参观并表示敬畏，圣物就会许诺这些朝圣者赦免其 1 902 202 年来未忏悔的原罪，否则这 100 多万年的原罪就只能在炼狱的烈火中加以涤洗。①

路德不喜欢弗里德里希收集伟人遗物的举动，更反对圣物免罪的允诺。他在等待时机张贴他那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1517 年秋天，弗里德里希离开维滕贝格去洛豪狩猎，恰值弗里德里希的收藏物最崇拜的日子（万圣节），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了出来。可是，在此时，为了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诡计多端的赎罪券贩卖者约翰·特策尔受到美因茨大主教的指使，开始在萨克森选侯邦的边界上卖赎罪券。这种行为不仅激怒了路德，也冒犯了弗里德里希，这不仅是宗教上的错误之举，更是一种政治性的侵扰。1518 年教会开始反对路德，弗里德里希也停止了在自己的领地上出售赎罪券，这一举动也是对他的权威的一次考验。同年，弗里德里希禁止将路德移送至罗马，从而拯救了路德，使之死里逃生。②

2. 统治者

弗里德里希终生未婚，他之所以称为“智者”，是因为他拥有能够维持和平安定的能力。在机敏地处理路德事情之前，他已经从其他竞争对手的挑战中脱颖而出，其中包括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莱希特。在统治末期（1525 年），弗里德里希成了宿命论者，他被称做“中庸之人”，从他的座右铭“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且总是不慌不忙地

72

① 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 pp. 56—57; Ozment,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 , p. 139.

② 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 pp. 62, 71—72; Spalatin, *Friedrichs Leben* , pp. 28—30, 50; Stephan, “Kulturpolitische Massnahmen”, p. 70.

前行”中可以看出这一点。[①] 斯帕拉廷是弗里德里希的传记作者，他认为，发生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的两大强有力的挑战验证了弗里德里希的大智大勇：1519 年，弗里德里希作为“诚实的掮客”促成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选举；16 世纪 20 年代初，他同样娴熟巧妙地处理了新教徒的起义。

在帝国选举中，与查理一世同时竞争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还有其他两位统治者：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和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他们都知道弗里德里希的投票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许可以相信斯帕拉廷的话，首先是英国国王想贿赂弗里德里希，但弗里德里希对此不予理采。[②] 在这次争夺皇帝的过程中，时年 19 岁的西班牙国王占据了全面优势。他是驾崩的马克西米里安皇帝的孙子，既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者，又统治着从西西里到奥地利的诸多王国。教皇利奥十世也害怕出现一个比查理曼帝国更大的西班牙—德意志君主国，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法国这一边，支持法国国王，然而，法国国王的实力相比之下显得苍白无力。

教皇、法国人和瑞士人想尽最大的努力除掉查理，他们转向德意志人的至爱弗里德里希。罗马教皇的使节、刚在奥格斯堡审讯路德的红衣主教卡耶坦明确主张支持这位 56 岁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的脑海里也出现过角逐皇帝的想法，然而，他所面对的两个严峻的挑战使这一想法逐渐消弭：其一，他缺乏足够资源去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其二，如果他孤注一掷，就将面临一旦与查理的战争遭受失败，德意志选帝侯团可能被解散的局面。

73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德意志人都不能没有选帝侯团。选帝侯的权利使得德意志在欧洲社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使帝国的诸侯可以从帝位候选者那里榨取财政和政治上的巨大让步。实际上，选举是一个机会，德国也许欢迎外国人出来，以便趁机利用他们。选帝侯团也给

① Bernd Stephan, “Kurfürst Friedrich”, pp. 26—27; “*Kulturpolitische Massnahmen*”, pp. 57—59.

② Spalatin, *Friedrichs Leben*, pp. 58—59.

德国人带来了最美好的希望，即一个在功能上的统一与实际性的和平的德国。当然，这还不具备早期的国家地位。

根据斯帕拉廷的建议，弗里德里希抵达法兰克福寻求其他3个选帝侯的投票支持。这样，只要弗里德里希投票给自己（在皇帝的选举中少数服从多数，即所谓一致同意投票），他这个德意志人就能够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1519年6月27日，7个选帝侯身披貂皮做衬里的红色斗篷，戴着贝雷帽进行了投票。就像斯帕拉廷所授意的那样，弗里德里希联合其他3个选帝侯投票给他自己，从而使自己一举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过，这次选举仅用了3小时，而且只是在选帝侯的秘密会议室内进行的。在一致投票支持查理的结果出来之前，弗里德里希向其他的选帝侯解释了为何最强大的德意志诸侯不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原因，他曾说将自己的选票以及其他的投票都转投给了西班牙国王。

由于这件事并没有官方记录（只有斯帕拉廷带有崇拜性质的传记以及弗里德里希周围的人的传言），这件事具有传奇色彩，是对弗里德里希的讨好奉承。一些历史学家视这一事件为真实的存在，他们认为这是弗里德里希用预设的投降再次扭转了命运多舛的德国历史进程。如果萨克森选帝侯在1519年能成功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么1871年成立的小德意志帝国或许早在3个世纪之前就成了现实。[①]

这次皇帝选举之后，在西班牙的掌控之中的萨克森诸侯们遭到了侮辱。西班牙出于对弗里德里希支持的感激，新当选的皇帝提出了联姻政策，即弗里德里希外甥和教子、未来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与查理的妹妹凯瑟琳结婚。1521年维滕贝格宫廷收到了正式婚约。弗里德里希和年轻的约翰·弗里德里希的父亲约翰亲王都不倾向于赞同这门婚事，因为这桩婚约潜藏着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干涉萨克森政治的目的。然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提出的联姻建议是不能被 74

---

① 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 pp. 18—20. On the entire episode, cf. Spalatin, *Friedrichs Leben* , pp. 40—41, 57—59; Heiko A. Oberman,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 trans. E. Walliser Schwarzbart (New York, 1992), pp. 24—34.

轻易拒绝的。

最后，西班牙王后提出异议，表示不想让女儿离开自己身边——当然，就是不嫁给远方的德国王子，从而使萨克森从这场对抗中解脱了出来。不过，这粗暴的变卦也使德国人受到了羞辱，使萨克森诸侯们增添了新的怨恨。当宗教改革在萨克森爆发时，这种怨恨最终让西班牙皇帝付出了昂贵代价①。

弗里德里希对路德实施保护，其背后的动机是想让西班牙哈布斯堡的力量与罗马教皇在德意志的影响尽可能保持温和一些。除了传统的宗教虔敬和保护他的国民的需要外，路德的声望也是弗里德里希决定保护他的原因。一旦皇帝和教皇成功地将维滕贝格大学的风云人物路德处以死刑，弗里德里希的威望和他统治的土地上的和平也将随之遭受劫难。1521 年 4 月，路德成为被诅咒的异端分子，被召唤到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为自己的教义进行辩护，萨克森选帝侯作为路德的保护天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②

预料到路德会在沃尔姆斯的被宣判以及由此带给萨克森的政治影响，弗里德里希采取行动把路德置身于瓦特堡城堡的监护之中，以拯救他的生命。路德为了避开敌人，在那儿躲藏了一年。其间，他把《新约圣经》翻译成了德文，并且通过信件往来谋划宗教改革。沃尔姆斯帝国议会闭幕时，德国大部分地区和城市都站在萨克森选帝侯一边，拒绝接受会议备忘录，也拒绝在自己的土地上发表谴责路德的声明。

尽管弗里德里希有足够的政治理由获得路德的支持，但是在回应路德的教义时，他本人的宗教虔敬丝毫没有减弱。1522 年，弗里德里希在其冬衣的袖子上镌绣着新的座右铭的首写字母：上帝的世界是永恒的（VDMIA——Verbum Dei Manet in Aeternum）。③ 那一年，弗里德

75

① "Beschwerlich genug gewest und wehe gethan … also soll umzogen warden." Spalatin, *Friedrichs Leben*, pp. 61—62.

② Stephan, "Kulturpolitische Massnahmen", pp. 89, 95; Stephan, "Kurfürst Friedrich," pp. 33—34. 关于路德的教义以及对他的恐吓，参见：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pp. 64—65; Oberman, Luther, pp. 246—247, 299—300。

③ Stephan, "Kurfürst Friedrich", p. 33.

里希完全理解了路德的教义，深思其精髓并以此作为判断的尺度。他敬仰路德博士贝雷帽的权威，也一直承认路德具有教授《圣经》以及检验传统教会的教义真实性的权力。斯帕拉廷曾写道，在路德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弗里德里希对上帝之词的不敬感到“不满和惊愕”，他坚持认为“信仰的事物应该用肉眼能够看到”，是透明圣洁的。弗里德里希不愿看到先前迫在眉睫的宗教暴力，宣布自己准备过一种隐士般的生活，而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不明智挑战上帝意愿的罪名。这种个人对上帝的虔诚促使弗里德里希在 1523 年就采取早期的行动阻抗托马斯·闵采尔的行动，闵采尔随后不久领导了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之前 10 个月，即 1524 年 7 月，弗里德里希让这位具有煽动性的布道者拜会萨克森选侯们，允许其谈及用激进的平均主义重建社会来取代路德温和的改革计划的设想。[①] 1525 年春，农民军聚集起来反对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声称上帝的福佑胜过诸侯们的意愿，他发誓，如果这些起义农民的意愿被证明是上帝的意志，他就接受农民对这片土地的统治。[②]

76

3. 遗言

从 1524 年春到 1525 年春的这段时间，弗里德里希退出了公众的视线，隐居到洛豪城堡。据经常伴随弗里德里希左右的斯帕拉廷的回忆，在他去世的这一天，这位著名的选帝侯坐在安装有固定轮子的凳子上，以便能让他在住地附近转悠。他的弟弟约翰每天全副武装地来探望他，时刻准备着与业已组成的 32 000 余名农民军交战。临终前，弗里德里希遣人去召唤路德，而此时路德去了图林根旅游，不能及时回到他身边。[③] 在记下了他的遗愿和遗嘱之后，斯帕拉廷询问弗里德

---

① Ibid., pp. 33—34; Steven Ozment, *Mysticism and Dissent* (New Haven, 1978), pp. 79—97.

② 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pp. 66—67, 76; Spalatin, *Friedrichs Leben*, pp. 29—30; Stephan, "Kurfürst Friedrich," p. 34.

③ Spalatin, *Friedrichs Leben*, pp. 64, 68; Heinrich Bornkamm, *Luther in Mid-Career* (Philadelphia, 1983), pp. 376—377.

里希“是否有什么重负在心头”，弗里德里希回答道：“只有痛苦。”

76

这是弗里德里希有记录的最后遗言，在接受了路德教方式的圣餐礼，吃了面包喝了红酒之后，显然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受路德教的圣餐礼，弗里德里希于5月5日在睡眠中辞世。10天后，萨克森和黑森的军队在法兰肯豪森对农民军进行了屠杀。在弗里德里希最后的遗愿中，他对获胜后洋洋自得的诸侯提出了“对农民要仁慈”的劝告，不要让农民背上遥遥无期的、苛刻的货币惩罚的重负。斯帕拉廷相信，如果弗里德里希活着，“他肯定将会给他们一些安慰”。弗里德里希可能会将这些劝告制作成路德式的宣传小册子铭记于心，警示后人。数月之前，路德谴责诸侯的暴政激起了农民起义，认为起义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正是神意对暴政的惩罚。与弗里德里希选帝侯相反，路德作为牧师，矿工的儿子，出于对农民起义的后果的考虑，主张对起义的农民进行冷酷无情的惩罚，这是他基于《圣经》教义和萨克森的法律作出的判决[1]。

弗里德里希逝世后，用香油涂过的遗体放在棺材里用焦油封存，五天之后被运往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存放。在祭拜仪式上，路德的同事，维滕贝格人文主义者和希腊语教授菲利普·梅兰希顿诵读了一段拉丁文的颂词为弗里德里希祈祷，接着路德用德文诵读了《保罗圣徒书》中的《致帖撒罗尼迦人书》。[2] 在第二天的葬礼上，路德依旧进行了另一次布道，两次用弗里德里希的遗言为他的遗体布道。弗里德里希是路德的资助人也是他的保护者，在有生之年，路德从未与他有过直接的交往，他们之间的交流都是通过斯帕拉廷进行的。

4. 德意志暴动

马丁·路德学术成就的时代感很强具学识渊博，他因此而成了为诸侯加冠之人。据说路德也曾被恶魔、基督即将降临等说法所困扰，他也忧心发生于时代末期的宗教改革，这是一个人以及一场从社会和

---

① Borkowsky, *Leben Friedrichs* , pp. 75—77; *Spalatin* , *Friedrichs* Leben, pp. 42—43.

② Spalatin, *Friedrichs Leben* , pp. 69—75.

政治中分离出来的运动。先前的成见让路德转而反对他所处时代的进步的反权威运动：城市中的工匠举行抗议活动，农村的农民举行起义，还有新的宗教分离主义团体等，这一切都使人期望着能把中世纪的德国从黑暗的政治和道德中解脱出来，迈向现代社会。

77

当代人对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在他思想形成的年代，即1518—1528年的10年间，路德投身于德国民族主义运动与市民改革运动，力图重新恢复基督教《圣经》的威信。1520年，路德以雕刻画像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背景是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学者和维滕贝格的宫廷。丢勒创作了这幅肖像画，并在画上签上“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德国”的字样，但他与路德素未谋面。[①] 他们彼此间的沟通是通过各自的作品以及在维滕贝格和纽伦堡其他朋友的介绍来进行的。

路德的早期作品通过斯帕拉廷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丢勒早先受到路德作品的影响是在他成为皮尔克海默尔宴会团体的特许成员之后。该团体在1517年后以路德的良师益友约翰内斯·冯·施陶皮茨的名字改名为施陶皮茨协会。[②] 这个团体的成员齐心协力对德意志人进行谆谆教导，支持德意志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在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中间的影响力。这一团体的成员致力于恢复、保存和发扬德国的历史与文化。由于聚集了纽伦堡的学者、法学家、商人和政治家，这一团体的影响已超出这个城市，他们也定期讨论当时的一些紧

① “Albertus Durer Noricus ”意思是“来自诺里克姆”（ Noricum：诺里克姆，古代国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位于多瑙河南岸，即今天奥地利维也纳西部。公元前1世纪被并入罗马帝国，作为一个边疆殖民地而繁荣，直到 公元5世纪被日耳曼人侵占。——译者注），位于阿尔卑斯和多瑙河之间，它不是意大利人的，而是德国人的。

② 奥古斯丁教义修道士约翰内斯·施陶皮茨——维滕贝格大学的首任院长，是路德的良师诤友、心腹知己。继施陶皮茨之后，路德于1512年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的宗教神学讲座教授。

迫性问题。①

1519年，施陶皮茨协会成员纽策尔·卡斯帕尔把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译成了德文。丢勒是第一批阅读这一德文版《九十五条论纲》的人之一。正是纽策尔·卡斯帕尔的这一翻译把路德的抗议直接转变成了德意志民族运动。1518年3月，路德通过斯帕拉廷发给丢勒一份感谢信，或许为感谢丢勒新近创作的一幅基督受难的木刻画。两年后丢勒写信给斯帕拉廷，对智者弗里德里希送给他的一本有关路德思想的小册子表示感谢，这本小册子或许与1520年宗教改革的宣传册一起将路德的教义思想以及改革设想呈现给了广大读者。当路德成为最有争议的民族人物时，丢勒也在祈求斯帕拉廷采取措施确保路德的安全，“这个基督的信徒帮助我摆脱了巨大的痛苦”。斯帕拉廷提到，在1514年到1515年整年间，母亲的突然离世使丢勒一直处于消沉和忧郁之中。在这一年中，作为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御用画家，他心灵的创伤有所减缓，但缺少感恩之心，也无以回报。出于对路德的崇敬，丢勒在他的一件艺术作品里表达了要使路德名垂千古的意愿。②

78

写完这封信之后，丢勒找了个机会，又送了3份他复制的最新的铜版画。铜版画描绘的是弗里德里希的老对手美因茨新任红衣主教阿尔布莱希特，很显然，这是丢勒怀念路德的一个实例。阿尔布莱希特

① 其成员包括：市政议会秘书拉扎鲁斯·施宾格勒（Lazarus Spengler）、司库希罗尼姆斯·埃伯纳（Hieronymus Ebner）和安东·图赫（Anton Tucher）、市政议会法学家和外交官克里斯托夫·舍约尔（Christoph Scheurl）；大贸易公司的老板安德里亚斯（Andreas）和马丁·图赫（Martin Tucher）；纽伦堡奥格斯堡韦尔泽帝国银行经理雅各布·韦尔泽（Jakob Welser）。Hutchison, *Albrecht D ürer* , p. 123; Oberman, *Luther* , p. 136; Lewis W. Spitz, *The Religious Renaissance of the German Humanists* (Cambridge, Mass, 1963), pp. 155—196; Steven Ozment , *Flesh and Spirit : Family Lif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 1999), chaps. 2 (Christoph Scheurl) and 4 (Sebald Welser)。

② “如果上帝能帮助我见到马丁·路德博士，我将小心翼翼地为他绘制肖像，并将之雕刻成铜像以资永久纪念。” Hutchison, *D ürer* , pp. 124—125; Martin Warnke, *Cranachs Luther. Entw ürfe f ür eine Image* (Frankfurt-am-Main, 1984), p. 15. 关于丢勒敦促伊拉斯谟斯保护路德，见 Joseph L. Koerner, *The Moment of Self-Portraiture in German Renaissance Art* (Chicago, 1993), p. 76。

也是丢勒的资助人，他在德国教会中职位最高，因支持圣彼得教堂卖赎罪券而在萨克森大名鼎鼎。斯帕拉廷希望给路德画一幅正式宫廷画像，他把丢勒所画的阿尔布莱希特复制品交给了维滕贝格宫廷画家克拉纳赫。

官方要求用“丢勒风格”为路德绘制铜版画像，克拉纳赫首先复制了丢勒的阿尔布莱希特画像，当然，他无意奉承这位红衣主教或他的同行竞争对手。他把这位红衣主教画成了矮胖与乏味的年轻人，与丢勒所绘的成熟自信的教会诸侯的神态相似之处极少。相比较之下，克拉纳赫所绘的路德却是一位强健、正直的修道士，他的肩膀上围着一块大披肩。[①] 对绘画意象处理的不一致反映了克拉纳赫和丢勒在创作上的竞争，也暗示了他与路德有深厚的友谊（1520 年路德成了克拉纳赫女儿的教父）。而对赎罪券争议中阿尔布莱希特角色的回忆也引发了他们自己的酸意。[②] 3 年之后，克拉纳赫整修了红衣主教在哈勒的住宅，与此同时，他还承担着另一项使命——为教皇绘制以宗教改革为题材的连环画。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艺术家的思想意识并未能超越资助人的恩惠。[③]

早些时候，萨克森艺术界、政界和宗教界人士聚集在斯帕拉廷、丢勒、克拉纳赫和智者弗里德里希周围，形成了宗教异端人士的洪流，后来发展成为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两股运动潮流即新的宗教改革和以前的政治运动在 1521 年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在这次会议上，尚未有新教徒的德国社会集团把 102 个“罗马教廷在德意志帝国滥用职权和加重人民负担”的理由呈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是一份民怨沸腾的清单，人们对政治、经济、教会和精神信仰上的抱怨与路德的教义产生了共鸣。[④]

79

---

① Warnke, *Cranachs Luther*, pp. 15—20.

② 此后，在 1525 年，克拉纳赫成了路德与卡特琳娜·冯·波拉（Katherine von Bora）的新婚伴郎。1526 年，他更是成了路德第一个儿子约翰尼斯的教父。

③ Andreas Tacke, Der katbolische Cranach (Mainz, 1992), pp. 9—15.

④ Strauss, *Manifestations of Discontent*, pp. 52—63; Ozment, *Protestants*, pp. 11ff.

然而，这还不是消弭德意志人苦难的时候，还不能让他们奋不顾身地投身于运动之中。民族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改革的策略与训练。这让我们想起了克拉纳赫所绘的有争议的路德蚀刻画像。在委托克拉纳赫创作画像之后，萨克森选帝侯宫廷认为路德画像太具有煽动性，并暗示克拉纳赫在新的路德画像里将路德描摹成一位不易动怒的德国人。[①] 其结果是，路德出现在圣龛之中，他手中握着打开的《圣经》，一幅改革家的神情，他乐于聆听与沉思，也许还带有一点疑虑与关切。这是一幅连诸侯们都可与之共事的路德画像。[②]

克拉纳赫画室创作了多个宣传性的路德肖像，萨克森宫廷和改革者们希望以此把各个社会集团争取过来。在这场为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画像狂热中，路德不顾风险，竭力配合，允许他的肖像被政治人物根据需要进行塑造，只要伴有《圣经》短句和《福音书》解说词，能突出路德的教义要旨就行。[③] 对于城市显贵和富有的市民而言，路德就如同长有胡子的容克耶尔格，是《新约全书》的德语版翻译家。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路德的形象就是一位戴着鼓囊贝雷帽的博学教授。而在饱学之士和头脑简单之人的眼里，路德的形象就被汉斯·贺尔拜因描绘为德国的赫拉克勒斯[④]，开始用棍棒打死科隆的多明我会宗教法庭的审问官雅克布·霍赫施特拉滕，并且把他的尸体增添到死在从亚里士多德到约翰·敦斯—斯考图斯等教皇职业学术队伍之下的芸芸众生的巨大焚尸堆中。最后，所有德国人都想把掠夺成性的外国人从自己土地上驱逐出去，于是，手拿《圣经》的路德被画成与手中执剑的法兰克尼亚骑士抵抗运动领袖乌尔里西·冯·胡滕肩并肩在一起，站

80

① What Warneke, in criticism of Robert Scribner, call , die Angst der Obrigkeit vor der vollen Entfaltung der Wahrheit . " Warnke, *Cranachs Luther* , p. 65.

② 新版路德的肖像与克拉纳赫最先绘制的路德肖像非常不同，以至1900年之后专家们开始怀疑克拉纳赫绘制路德肖像的权威性。Warnke, *Cranachs Luther* , pp. 27—29; R. W.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the Simple Folk :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1981), p. 16。

③ Warnke, Cranachs Luther, p. 65.

④ 赫拉克勒斯：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因完成赫拉要求的十二项任务而获得永生。——译者注

在一面写着“基督徒的自由”的旗帜之下。①

人文主义者、萨克森宫廷、力推改革的人们以及服务于他们的艺术家们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宣传与成功作出了贡献。他们认识到，教皇在德国政治和拯救人们的灵魂方面，力量和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政治人物把罗马教皇看作是“加重负担和滥用职权”，宗教改革家则把罗马教皇称为“说谎者和编造谣言者”。德国的法学家、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都在寻找德国过去的文化传统和典型例证来反击外来的批评，主要是来自罗马教会的批评，以重新确立起德国的主权与文化平等。②

虽然路德是一位复杂而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以匿名方式编辑和出版了题为《德意志神学》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使他部分吻合上文提到的德意志人寻找的典型例证的特征。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路德赞美道：德意志神学“把德国人民引导到了上帝那里，而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书籍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进一步宣称，这就是德国神学家超过了罗马、希腊和犹太神学家的优越性。他严厉警告图谋不轨的外国人，不要把德国人的质朴当做软弱。③ 这个小册子是所有德国人团结在一起的又一民族之根，用以支持和回忆受过历史伤害而仍未治愈的德意志人的自豪感。这本书的出版是整合反对罗马教会的新教力量和传统民族运动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复兴德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一步。

---

①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 pp. 14—34.

② Strauss, *Manifestations* , pp. 3—34, 64—82, 196—207; Harold J. Berman, and John Witte,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 in Lutheran Germany”,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2 (1989)* : pp. 1575—1660; John Witte, Jr., “The Civic Seminary: Sources of Modern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of Germany”,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12 (1995—1996)* : pp. 173—223.

③ *Luther's Works* vol. 31. ed. H. G. Grimm (Philadelphia, 1957), p. 76; Ozment, *mysticism and Dissent* , pp. 18—19.

二、新神学体系

81 基督徒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绝对的主人，他不属于任何人。

基督徒是一个完全谨守职责的所有人的仆人，他受所有人的支配。

——马丁·路德，1521 年①

自我超越与自我谦卑的名言警句在德国的文学和艺术、哲学和神学以及政治小册子和各类演说中随处可见。在这种光怪陆离现象的一端，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这些神秘主义者渴望失去自我，与上帝融为一体，"就像一滴水融入一桶酒里一样"，变成了"单一"；② 另一端呈现出来的则是现代超人，他个人就能够克服不完美的世界或合力将这种不完美的世界打造成千年王国。中世纪的教会把宗教异己人士变成了虚无主义者，当今的世界则还在捡拾超人已经破碎的理想的完美境界。

1. 自我的意象

德国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思想家，无论信仰天主教还是新教，对于灵魂与社会的困境的思考比 19 世纪以前的任何其他德国人都要深刻，对革命的结果的研究让这些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在 16 世纪，对灵魂与社会的困境的思考的结果就是对人类本质和命运的描绘，它在此后的 3 个世纪中成了德国新教徒思想和文化的中心。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画家丢勒和最著名的神学家路德则是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丢勒的直觉世界与德国人文主义之父（鲁道夫·阿格里科拉）息息相关，也与德国的新教（路德）紧密相连，他们的事业对丢勒的事

①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Lutber' s Works, 31, p. 344

② Das Buch der göttlichen Tröstung, in *Deutsche Mystiker des 14. Jahrhunderts*, vol. 2: *Meister Eckhart*, ed. Franz Pfeiffet (Leipzig, 1875), p. 431; Steven Ozment, "Eckhart and Luther: German Mysticism and Protestantism", *The Thomist* 42 (1978): pp. 259—280.

业发展有正面的支撑作用。在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中，丢勒所作的个人自画像是最多的。15 世纪与 16 世纪之交，丢勒画了两幅自画像，一幅绘制于 1500 年，另一幅在 1502—1503 年间完成，在宗教方面，这个时期正是迈向德国宗教改革的过渡时期。 82

在这些画像中，首先就是丢勒将自己的脸相移植到了耶稣基督的画像上，现代艺术批评家将之称为“基督肖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是现代艺术的诞生和自我感知的形成的早期表现。① 在这些画像的背后以及在这些画像之中，都承载着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演说家所宣扬的人的尊严。可以说，丢勒在 1500 年所作的自画像把这种宣扬人的尊严的文学和绘画传统带向了顶峰。

相比较之下，丢勒从瘟疫的灾难中康复之后，于 1502—1503 年间呈献的自画像则仍然延续着中世纪的题材——救世主的悲伤。他把这时的自己描绘成了人的无常和丑陋的形象。与 1500 年丢勒自画像中如基督举止一般的风格迥异，画家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位在黑暗中裸露身体的孤独者，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不加任何对力量、美丽或天赋的矫饰，只是对下身进行了掩饰。②

从主题角度而言，丢勒的两种自画像模式原本就存在，路德对于高贵与自卑的辩证的神学思辨已初现端倪，这种神学思辨将对这两种绘画作出新的解读，进而将丢勒纳入宗教改革之中，也使路德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德国历史舞台。

2. 德国的新基督徒

在获得博士学位 5 年之后，1517 年 10 月，路德公开批判以亚里

---

① Koerner, Moment of Self-Portraiture, pp. 40, 42, 122.

② 科纳（Koerner）将 1502—1503 年的画像称之为“自恋的危机”，1500 年的画像所呈现出来的身体美感使得绘画者魂牵梦萦。*Moment of Self-Portraiture*, pp. 251—253, 268, 495, n. 44; Peter Parshall, “Albrecht Dürer and the Axis of Meaning”,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Bulletin* 50（1997）: p. 20. 有关中世纪艺术中描绘死的象征的传统，见：Alberto Tenenti, “Death in History,” and Donald Weinstein, “The Art of Dying Well and Popular Piety in the Preaching and Thought of Girolamo Savonarola”, in *Life and Death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ed. M. Tetel et al.（Durham, N. C., 1889）, pp. 88—104, and James M. Clark, *The Dance of Death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Glasgow, 1950）, pp. 1—4, 22—24, 106—110。

士多德思想为基础的神学体系，特别是其行善与自我调适的思想。[1]大门上张贴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的教堂与弗里德里希选帝侯的城堡毗邻。在这儿，开设有大学的法律课程，二楼是大学的图书馆，因此，这一教堂就成了那个时代交织在一起的教育、政治与宗教运动的象征。[2]

83

路德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已经堕落或是迷失了方向。他宣称，他对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进行批判的基础就在于他要让真正的《圣经》教义复活，要回答人是谁和人是怎样得救的这些问题。与此相类似的对基督教教义进行的解构直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才又得以重现。人们对新教富有成果的持续的学术研究起始于伊曼纽尔·康德，尼采的研究则将之推向顶峰。他们均对基督教提出了相似的探究性批判。16 世纪，路德的神学对中世纪宗教领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正如后来尼采提出“上帝已经死了”的哲学观会成为现代社会中革新后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一样。路德不仅创立了敌对的西方各派基督教信仰，他的著作还将德国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罗马教皇，与民族文化运动潮流相呼应，强化了德意志人的领土主权意识。

不管是路德的神学还是他所攻击的罗马教会的神学，都把基督教徒引向了有关救世的《圣经》诺言，这一点通过基督的具象化和受难得到了确认，这些都保留在新教教会和罗马教会的圣礼和布道说教中。尽管新教与基督教方式有所不同，但两种信仰在面对未来时，都认同死后复活的基督等待末日审判。在 16 世纪及其以后的岁月里，德国和欧洲基督教分裂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在面对末日审判准备做什么以及如何从这种末日审判中生存下来。如果向前看的话，天主教的圣地朝拜者经历了一段从仁慈怜悯到宣判的道路，虽然救世主耶稣基督诺言宽大，但仍然要面对基督审判的复查。中世纪神学教导世俗的人们要通过以苦行赎罪、赦免和行善的方式解决这种冲突。所以，直到 15 世

---

① *Luther's Works*, 31, pp. 3—34.

② 关于大学的建立情况，见：E. G. Schwiebert, *Luther and His Times* (St, Louis, 1950), pp. 221—253。

纪，虽然受到人们的质疑，赎罪券仍在出售。

路德认为，这一类的观念都是令人厌恶的，它们可以追溯到犹太教的教规与宗教仪式。他认为，正是这种古代犹太教的教规与仪式与削弱了犹太教的先知与赞美诗的力量。中世纪的教会则教规与破坏了源自《圣经》的基督教的权威。而在新教神学体系中，只有正义才能使人们从末日审判中生存下来，而这种正义就是具象的、受难、复活、升天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路德教的方案直接抛弃了中世纪由爱或行善堆砌起来的信仰方式。路德信仰方面的圆满时刻比作新郎和新娘的“幸福交流”。 84

> 当基督和灵魂化身为一个肉体（Eph. 5：31—32），接下来的是，一切事物，不论善或是恶，都有了它们的共同体。每个信仰的灵魂都有了基督所拥有的（仁慈、生命和救世）荣耀和辉煌，好像是它自己所拥有的那样，同时也有着基督宣称都是他所拥有的灵魂所具备的一切（罪孽、死亡和诅咒）。①

对当时的神学家团体而言，救赎对于信仰的作用受到了严重忽视与亵渎。1526年，科隆多明我修会的宗教法官雅可布·霍赫施特拉滕在这一问题上吸收了传统天主教教义的精华，奚落路德的“幸福交流”原则：

> 除了相信上帝……以及信任上帝将提供它所许诺的一切外，（路德）没有列出灵魂与基督的精神联姻的前提条件。对于相互之间的爱却只字未提，正是通过相互之间的爱，灵魂才能与基督之爱相伴……我们也没有听说其他任何神性戒律，对于守护者而言，永恒的生命既是一种承诺又是一种恩惠。

①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pp. 347, 351; Ozment, “Luther andLate Medieval Theology”, in R. M. Kingdon, ed., *Transition and Revolution: Problems and Issues of European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History* (Minneapolis, 1974), pp. 109—151.

> 那些鼓吹这样一个光景的人除了理解灵魂还能做什么……妓女和奸妇她们明白并且故意谋划欺骗她的丈夫（基督），每天干着性交和通奸的勾当，使最纯洁的男人变成了拉皮条的人。好像耶稣基督毫不费力……在选择……纯洁和高尚的爱人！好像上帝只要求她的信仰和信任而并不在乎她的正直和其他品德。好像正义和邪恶可以相互交织，上帝和魔鬼可以彼此相依，它们可以成为一种混合体。①

85 路德关于信仰之联姻的阐述，既不是一种中世纪神秘主义的统一，也不是什么对信仰传统角色的误读。与中世纪神学相比，他重新界定了来生之前“被拯救”的人，这种思想有些偏激。不像基督一样墨守成规，一个好的基督徒宁可承认和接受与基督永远不一样的来生之前，而不是像基督一样的内在的形成。不过，路德对“完美的凡人”进行了新的定义，上帝和人类完全可以相互妥协，就如同他们可以在来生相互协调一样。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亵渎性地降低对上帝的敬意，也未增加对人类的颂扬。正如霍赫施特拉滕所斥责的，“正义与邪恶交织在一起”是肯定存在的，但不至于使耶稣成为鲁莽的皮条客或灵魂变成水性杨花的妓女。在德国的新教传统中，信仰者既是正直的人，同时又是罪孽之身，正直是因为他在信仰上与上帝相联，罪孽是因为无法根除的人性与堕落使然。

这种辩证的神学体系是丢勒一系列自画像的一条规则，他将自己描绘成复活的耶稣和一个遭受死亡的折磨充满苦难的人。在路德看来，基督福音的佳音在于，它并不强迫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好像”与上帝合为一体。在信仰的漫漫人生中，“幸福交流”的时刻会不断重复出现，信仰者就能不断感知信仰的透彻与确定性，上帝就不是一种虚构的意识，《圣经》的承诺“信仰上帝就能得救”就不是谎言。

---

① *Iacobi Hoochstrati Disputationes contra Lutheranos*, in *Bibliotheca reformatoria Neerlandica*, vol. 3, ed. F. Pijper (The Hague, 1905), pp. 609—610.

与“幸福交流”这种闪现出的光明的精神灵感相伴的是，在灵魂中还有一种黑暗的意识，也即除了有神性的新郎外，还有一个不幸的人，他既不能在此生履行“幸福交换”，也无法在来生通过上帝的审判。在路德看来，德国的基督徒不像罗马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中，从日益减少的罪孽到日益增多的正义中，并没有看到精神的持续存在。他的灵魂跨越了两个极点，他过着双重的生活，在现实的世间他过着绝望和疯狂的生活，然而信仰也会时时刻刻将他抬升到永恒的高点。

86

德国基督徒已经获得了一种自我理解，他们或是通过传统的忏悔或是通过某些世俗的经历，得到一种良机永存的感觉。路德教的构想包含了无以计数的早期宗教情结和灵感。总而言之，在历史上，神学总是和一个民族的兴起和终结相伴随的，最终靠自己努力出人头地的哲学既不允许自我满足也不允许自我绝望。这也是日后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重新叙述16世纪的德国民间故事浮士德博士中提出的适应现代的警示教训。[1]

三、新的市民社会

新的神学不仅对涉及灵魂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评价，而且也对所面临的一般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在路德教看来，基督徒在意识和灵魂上是“绝对的主人”，但在世俗和日常生活中有责任成为“所有人的仆人”。宗教改革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的影响日益扩大的同时，路德教各级神职人员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农民和工匠们也打着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旗号，提出了各种要求。

现代学者以大量笔墨来描述路德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认为是这种思想使得专制性德意志诸侯国家获得了成功。因此，路德教的公民社会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矛盾性的说法。然而，德国宗教改革者不仅接受了德意志民族运动而且为所有德国人制订了一种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的

① 参见第七章。关于路德各种“疯狂”的感知认识，参见：H. C. Erik Midelfort, *A History of Madness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Stanford, 1999), pp. 80—100。

目标。在路德宗教改革改变单个乡镇或村庄的教会法之前，他发表的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政治哲学、穷人救助、婚姻和家庭、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以及教育改革等方面。

在那个时代，处于对抗状态的改革者们有两点看法是一致的：胜利就意味着改革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得到了保证，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取得现存的政权。因此，路德教徒将分裂主义和革命描述为逃避基督教道德与市民职责的行为，认为这是对社会的抛弃和毁坏，而不是自身内在的改革。再者就是领导农民起义的托马斯·闵采尔以及在明斯特市建立了恐怖统治的尼德兰和德国的激进的再洗礼论派，他们都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前者将自身希望的和平的改革方案呈递给了萨克森的诸侯，后者则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了政权。[①]

在这一时代，政治、社会福利、家庭生活和教育领域中继续进行的各项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些也都是教会和宗教所追求的。为力争公正的法律与诚信合理的制度，上帝和恶魔相互之间既争夺着对个人的灵魂的控制，也争夺着统治人间的权力。路德预想应该由上帝之任命的两类并存的权威人士来管理世俗和教会的生活领域。诸侯和领主监管身体与财产，牧师和神父捍卫道德和灵魂。

对于路德来说，16 世纪德国的主要问题是邪恶成功引诱了统治者、神职人员、信徒以及世俗之人，使他们出卖自身的灵魂，逃避道德和精神的责任。为此，政治家让正义得不到伸张，福音得不到传播；神职人员虚假保证上帝的救赎，抱有不恰当的世俗野心；百姓则自甘被愚弄，对于人类的命运放任逐流。除了掠夺成性的外来教皇之外，在宗教改革运动早期的几十年中，两股敌对势力威胁着德国的市民社会：天主教统治者镇压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背弃新教的传道士和革命者则鼓动普通人拿起武器捍卫基督徒的权力。

在追求既定目标时，路德也犯了最致命的错误，即他模糊了权威与权力之间的界限，他自己曾经在这两者之间做了划分。他首先联合

---

① Steven Ozment, *The Age of Reform, 1250—1550* (New Haven, 1981), pp. 269—270.

德国的基督教贵族以世俗社会里的基督徒的身份来帮助他对抗难以控制的教会。1523 年他把德国小镇莱斯尼格的世俗圣会作为样本，用路德派自己挑选的牧师来取代天主教的神父，称赞这一举动是抵制错误的“人类法律、原则、传统、风俗和习惯”的行动。[①] 如果这是一门新的教会学，那么它也是适应时代的理性之举。

1528 年，路德视察萨克森后，再次发现乡村教区的教友宗教常识错误，道德水平亟待提高。路德规劝德国的诸侯作为世俗社会的基督徒，成为新教“非常时期的主教”。他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羽翼未丰的新教教会提供适当维持和遵守纪律所需的管理、职权以及军队。[②] 尽管限定的条款强调诸侯的世俗地位以及他们获得新权力的例外性特征，但这种妥协为德国人埋下了不祥的先例。

1523 年，当诸侯开始迫害新教徒时，路德试图将魔鬼装入瓶中。他训斥诸侯们，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但徒劳无益。到 1528 年，德国的统治者不再——如果他们还曾经——把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对人身与财产的统治。路德将世俗与精神的权力交织在一起，使得襁褓之中的新教教会得以生存发展，并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实现自身的使命。路德教会慢慢变成了更具合作性的国家教会，通过创办新学校、实施福利制度和家庭安排等，把大量的宗教因素融入了市民生活之中。

1. 中小学校和大学

德意志民族最初的统一是跨区域的语言与文化的统一，而语言文化的统一是围绕着路德用本地语言进行的布道宣讲、写作的小册子、翻译的《圣经》、创作的赞美诗和教义问答手册来进行的。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能像路德那样，有资格检查德国中小学和大学的改革。在 1520—1546 年间，所有德语出版物中的三分之一是路德的原作

① “Das eine christliche Versammlung oder Gemeinde Recht und Macht habe, all Lehre zu urteilen,” ed. Otto Clemen, *Luthers Werke in Auswabl*, vol. 2 (Berlin, 1959): pp. 395—396; Ozment, *Protestants*, pp. 135—136.

② Karl Holl, “Luther und das landesherrliche Kirchenregiment”,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Kirchengeschichte, vol. 1 (Tübingen, 1923), pp. 361—369; Ozment, *Protestants*, pp. 91. 136.

或翻印的他的作品。路德的德语口语和写作用语比较简洁、明晰、富
89 有节奏感，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未被列入“可怕的德语”① 之列。在他的作品中，框架结构、多个主语的句子缓慢铺展开来便于寻找到与之搭配的动词。② 他声称这种语言也是萨克森宫廷的语言，应该被“所有的诸侯和国王们”模仿，这样他就可以向整个民族呼唤。③ 这种方言成为泛德意志语言的雏形，今天我们把它称为“高地德语”④，它是从德国中东部和低地德语方言演化而来的。路德用来自德国其他地区的学生和同事们的德语词汇与句子丰富了德语，也包括他那来自西萨克森的妻子凯特琳娜·冯·波拉的语言，路德称赞她的语言能力令他望尘莫及。⑤

1524 年，路德呼吁整个德国的市政官员和议员们为所有的男孩和女孩建立公立学校。新的学校制定的教育目标是，“男人能够统治国家与人民，妇女能够正确地照料家务、照看孩子、做好服务”。新学校同时提供新的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⑥ 男孩一天至少接受两小时的正规教育，女孩一天至少一小时，其他时间则忙于父母指派的家务劳动或做生意当学徒。⑦

宗教改革者认为，不能按规定做事的人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整天无所事事的诸侯也不能成为称职的诸侯。宗教改革者期望市政府提供技术熟练的男女教师，能够“寓教于乐”地教授孩子语言、历史和

---

① 马克·吐温把德语称做 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中文意思是“可怕的德语”。——译者注

② Herbert Wolf, “Pioneer of Modern German”, in Thomas Nipperdey, *Martin Luthe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ermans* (Bonn, 1983), pp. 30—31. “可怕的德语”是马克·吐温一篇散文的标题，克雷格（Craig）在其所著《德国人》中原封不动的以此作为一章节的标题。Craig, *The Germans*, pp. 310—311。

③ Wolf, “Pioneer”, pp. 26—28.

④ 即标准德语。——译者注

⑤ *Tischreden*, ed. Otto Clemen, *Luthers Werke in Auswahl*, vol. 8 (Berlin, 1950): p. 223, no. 4081 (1538).

⑥ “To the Councilmen of All Cities in Germany That They Establishand Maintain Christian Schools”, *Luther's Works*, *45*, ed. W. I. Brandt (Philadelphia, 1962), p. 368.

⑦ Ibid., p. 370.

艺术。路德回忆起自己在学校读书的日子，简直是一种地狱和炼狱般的生活，经常“挨打、生气、担心和痛苦”。他因此提议为生活在新世界的德国孩子提供一种综合性的教育，也即一种能够直接面对他们的教育，“就如同整个世界的一面镜子，性格、人生、忠告、目的……（从中他们可以）得到合适的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①

教育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是培养通晓德国历史的合格人才。路德认为，由于缺乏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许多人对德国历史知之甚少，这就让生活在其他土地上的人们有遐想的空间，认为德国人“是野兽，只知道怎样搏斗，狼吞虎咽，暴饮暴食”。② 90

16 世纪 20 年代后期，对乡村进行再教育的雄图大略似乎遭受了彻底失败，前期进步的教育家又陷入了旧体制的沉疴陋习之中。从路德对德国教育视察报告的反应看，失望之意非常明显，激动的他说出了乡村牧师“与其说适合看守基督徒的灵魂倒不如说更适合养猪看狗的行当”，因为他们似乎认为新教福音仅仅是一种肉体的自由。③

教育困境的解决之道就在于本土的教义问答手册，这是更具亲情的家庭范围内以及教堂用来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义问答手册有针对孩子和成年人的不同版本，人们白天背诵十诫、使徒（指耶稣十二使徒）信条，进行祈祷，所有这些教育会对德国人的灵魂进行洗礼，启迪民智，这些都是之前的牧师无法完成的重任。④

认为家庭的教义问答式训练的出现和学堂讲座中亚里斯多德式的回归会使人们停止追求更好教育的方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信仰的幸福交流没有变成一夜之间的讨价还价。几个世纪以来，新的新教机构并没有放弃学术的高标准，也没有回归它在早年曾经反对过的经院

---

① Ibid., pp. 368—370.

② Ibid., pp. 376—377.

③ *Dr. Martin Luther's Large Catechism* (Minneapolis, 1935), pp. 35—36. 关于报告对于改革者们的冲击力，参见：Gerald Strauss,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Indoctrina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Baltimore, 1978), chap. 12。

④ *Large Catechism*, p. 42.

式的解说窠臼。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与路德教的神学理论在文科中学以及大学中渗透，在德国公共教育中灌输宗教知识,[①] 这反过来也加剧了信仰的分裂。不过，这些宗教知识也使德国人成了欧洲最具有神学文学色彩的民族，便利了这两种教义与国家的合作。

有人认为，宗教改革使德国大多数人在宗教与世俗以及中世纪与现代之间有时空错位的感觉，他们总是处于“质问与怀疑、探索与追求，缺乏防护与安全”的惊悸之中。[②] 而这也一直是宗教改革者批判中世纪的拯救灵魂的方法和他们为宗教改革进行法理辩护之所在。一些德国有识之士在16世纪皈依新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许多传统的精神拯救都是虚假的，对于虔敬的灵魂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相比较而言，路德关于信仰的幸福交流，甚至于他的教义问答手册的新的教学规范形式，对教徒来说似乎是一种更值得信赖的精神交流。

2. 救济贫困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三分之二的萨克森人口生活在乡村。但是，就像今天一样，城市对穷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贫困的人们纷纷涌入城市，因为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乞讨机会。[③] 按照大多数的中世纪社会和家庭立法，对穷人的传统关怀主要出于宗教的授意和鼓舞。对于苦行赎罪的基督徒来说，直接施舍是源自《圣经》的最初救济模式，作为回报，那些提供施舍的人则希望能够分享上帝给穷人的恩赐。数百年来，这种宗教的信念一直推动着虔敬的基督徒给穷人提供救济如衣、食、住所以及教育。

相比之下，新的路德教会把慈善福利作为一种道德与市民的责任，

① “Crypto-theological core”, in the words of Thomas Nipperdey, “The Protestant unrest Luther and the Culture of the Germans”, in Thomas Nipperdey, *Martin Luthe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ermans* (Bonn, 1983), pp. 8—14, 20.

② Nipperdey, “Protestant Unrest”, pp. 14, 16.

③ Blaschke, Sachsen, pp. 56—68; cf. Robert Jütte,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4).

而不是精神上的义务。路德教会相信，中世纪的那些基督徒并没有救人之举，只不过取悦于上帝而已。行善属于接受救济的人，而不是提供救济之人，上帝出于提供救济之人的仁慈之心而非他的行为而考虑拯救他。这样的论述有助于为理性化的救济体系铺平道路，扩大救济的范围并把济贫体系置于更可靠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和路德教两大信仰都希望有这种济贫体系。其结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济贫责任通过地方和各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从教士和教会向社会的转变。

路德教徒帮助创立了各种范式化的福利规章，把值得救济的本地穷人与外国人、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以及游方的行乞修道士区别开来，后者都被赶出了城门。[①] 这种歧视背后的指导原则是后来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用来解决当时宗教分裂的规定的早期版本，该规定允许各邦统治者自由选择其官方的宗教（教随国定）。在福利体制方面，一国之君则在他统治的领域内对济贫负责（济贫随国定），并且遵守政府誓言，不允许自己领土上的穷人去增加别国的负担，也不允许外来的穷人从他这里得到救济。

92

在分发救济时，既有施舍物资也有借贷钱款，最重要的是为了恢复被救济者的生活，福利被视为一种恢复性的手段而非一种长久之计。维滕贝格当地的救济受到路德及其同事的影响，为穷人提供一个小心看管的“公共救济箱”或固定的箱子。申请者必须满足社区的公共道德标准（审查过去的行为和目前的态度），一旦受助者能够重新自力更生，他们就要回报之前接受的恩惠和资助。勤劳奋斗的工人和工匠能够申请低息贷款，培训穷人的孩子也能够获得补助。

这些资金最初来自于世俗化的教会财产以及关闭的修道院与牧师会的财产。考虑到这些资金可能会被用作其他用途或是最终会被用完，救济法规把寻求向神职人员与市民收税作为保持公共救济箱资金不断

---

① 有关维滕贝格（1522 年）和莱斯尼格（1523 年）的贫困救济情况，见 Carter Lindberg,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s* (Oxford, 1996), pp. 114, 118—120, 122—123; also Lindberg, *Beyond Charity: Reformation Initiatives for the Poor* (Minneapolis, 1993)。

档的最佳方法。通过维滕贝格的牧师约翰·布根哈根的不懈努力，到16世纪中期，早期的路德教的福利救济制度在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维纳亚的土地上蔚然成风。

3. 婚姻和家庭生活

15世纪末16世纪，欧洲人已经从单身生活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向婚姻生活为主导的生活方式转型。无论在新教盛行的国度还是在其他国家，路德教的家庭模式成为了人们心向往之的生活模式。[①] 神职人员想过正常人的婚姻生活，也是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动力，为此，宗教改革者摆脱了最初由国家认可的教会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的保证，重新制订了相关条款，有效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婚姻制度；[②] 重新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举措与其他的市民改革举措一起，成为反对中世纪教会和社会的更为广泛的组成部分。

93

1520年，路德讽刺那些制定与《圣经》不相符的婚姻法的中世纪教会宗教法规学者，称他们是"出卖阴部和生殖器的商人"，谴责他们制定的新的法规只是"赚钱的圈套"，这主要是指教会官方通过废止不法的婚姻而从中获利。[③] 在中世纪，天主教会把《圣经》关于禁止婚姻的规定扩大到第四层的姻亲和血缘关系，或者是第三层的表亲关系。甚至共教父或教母和收养关系，也在被禁止结婚之列。只有非基督教配偶同意皈依基督教，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结婚才可获得教会的认可。

相比较之下，宗教改革运动恢复了《圣经》中的第一层姻亲关系和第二层血缘关系的原则，允许超过第一代姻亲关系和第二代血缘关系的远房表亲结婚。路德声称宗教法规方面有众多妨碍婚姻组合的规

---

① Heide Wunder, *"Er ist die Sonn, sie is der Mond": Frau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1992), pp. 59—63; Steven Ozment, *Ancestors: The Loving Family in Old Europe* (Cambridge, Mass., 2001), pp. 34—38.

② Steven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83), pp. 3—9; John Witte, Jr., *From Sacrament to Contract: Marriage, Religion, and Law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Louisvlle, 1997), pp. 42—73.

③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p. 45.

定，他对此都予以谴责，认为这些观念非常迂腐，基督教徒不能娶非基督徒就是一例。“正如我可以与一个异教徒、犹太人、土耳其人或是一个异端分子一起吃喝、睡觉、行走、骑马、买东西、说话一样，我也可以和他（她）结婚”。[1]

同时，改革者们也认为，限制对某些失败的或无用的婚姻进行解除婚约判决，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在整个 16 世纪，他们确认了几种可以接受的结束婚姻状态的理由：通奸行为、性无能（没有性能力）、一夫多妻或者婚姻欺骗（隐瞒了第一次婚姻）、长期抛弃配偶或完全无法相处。中世纪的教会允许夫妻分床而卧、分桌而坐，但绝不允许离婚。宗教改革运动却与此不同。他们认可现代的离婚，并且允许那些有结婚愿意并对婚姻有清醒认识的人再婚。不过，直到 19 世纪，再婚的人仍然比较少。斯特拉堡的改革者马丁·布策尔在这个问题上抱着一种极其自由的立场，他将婚姻定义为“完全确认”，包括“心灵的应和”、“频繁的肉体交流”等。因此，宗教改革者们是期望将约翰·米尔顿所说的并非“真正的侣伴”当作离婚的合适理由，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双方“不可调和的分歧”。[2] 94

四、宗教改革和犹太人

1523 年，路德以一种友好的笔触向德国犹太人提出建议，令他同时代的人们惊诧不已。直接动因是路德驳斥哈布斯堡大公斐迪南诽谤他像犹太人一样，都认为耶稣的母亲并不是处女。路德抓住这次机会，将犹太人纳入他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之中。路德指出，新约已经清楚谈到，耶稣是一位犹太人，由一位处女所生。他既是在为自己辩护，反对斐迪南大公，也是在讨好德国的犹太人，而德国犹太人也欢迎路德的善意给他们所带来的安全和机会。他希望，作为基督教徒善待犹太人的结果，能够把犹太人融入基督教社会，最终使“某些”犹太人甚

① Ibid., p. 46.

② Ibid. pp. 63, 90—93, 96—98.

至是“许多”犹太人皈依基督教。[1]

宗教改革者曾期许从文化和宗教的视角来统一德国，他们期望统治者宽宏大量，体恤农民，同化犹太人，甚至给他们施洗礼，但到16世纪30年代，犹太人拒绝同化，农民起义造成重大伤亡，宗教的分裂连绵不绝，人们抱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处世。正如16世纪20年代中期路德在他的小册子中反对农民一样，在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路德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反对犹太人的思想，与他最初的设想产生了很大的距离。1523年，路德曾恳请基督徒要和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睦共处，不要言语尖酸，如今他再次就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关系发表公开的意见时，15年的时光已然飞逝。由于国内战场并没有取得进展，国外基督徒伤亡严重，这些报道促使他采取严厉的姿态。据他所知，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些被诱导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世主），他们拥护犹太人的法律，遵守犹太安息日，他们甚至割除自己的包皮，以去邪念。[2] 因此，路德现在不是要争取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他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他早期对犹太教徒太仁慈会让犹太人抢先对基督教发起挑战。因而，在1523年，他对追随的基督徒表示，在外国人劫掠德国的漫长历史中，德国犹太人是另一个掠夺者，犹太人不再是值得仁慈相待的对象，对他们皈依基督教也不再抱有幻想。

95

在路德所写的最长且最严厉批判犹太人的小册子《论犹太人及其

---

① “That Jesus Christ Was Born a Jew”, *Luther ' s Works* , vol. 45, ed. W. I. Brandt (Philadelphia, 1962), pp. 195—230; Scott Hendrix, “Toleration of the Jews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Urbanus Rhegius and Braunschweig (1535—1540)”,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81 (1990); pp. 189—215. 关于犹太人对于宗教改革的反应，见：Hraim Hillel Ben-Sasson, “Protestant-Jewish Relations,” Diogenes 61 (1968); pp. 32—51; “The Jews vs. the Re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srae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4 (1971): pp. 652—713; and “Jewish-Christian Disputations in the Setting of Humanism and Reformation in the German Empir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59 (1966): pp. 369—390. 有关犹太人在19世纪的社会状态，见第七章。

② “Against the Sabbatarians” (1538), *Luther ' s Works*, vol. 47, ed. F. Scherman (Philadelphia, 1971), pp. 59—62; Mark U. Edwards, Jr., *Luther ' s Last Battles* , 1531—1546 (Ithaca, 1983), pp. 125—126. 没有有关基督徒卷入这种亲犹活动的证据。

谎言》中，开门见山地直指出："犹太人试图诱惑他们自己甚至引诱我们（基督徒）。"[①] 他列举了他与犹太人在维滕贝格的两次正面接触，其中一次有3位犹太教学者来到他这里，希望"在我这里找到一个新犹太人"，因为他们听说路德正在研习希伯来语的《圣经》。[②] 若是在宗教改革正好开始的1523年，而不是在他相信他的宗教改革已经达到顶点且处于失望之际的1543年，那么，他那德意志—基督教的意识或许不会遭受这般深深的刺激。

德国犹太人的阴影成功地起到了魔鬼的作用，它勾起了德国人的疑虑与记忆。对于已处于生涯后期的路德而言，最让其颜面尽失、仿佛被抽了一记耳光的事，莫过于一个犹太教徒试图使其皈依犹太教。作为一个基督教神学理论家，他相信，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就意味着上帝已经将火炬从犹太人那里传递到了基督徒手中，其后到了"真正的上帝的选民"的手中。对路德这样的德国人而言，德国人遭受聪明有加的外国人侮辱、同化、威吓，已经成为古老而令其心烦不堪的历史的组成部分，这种记忆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而在他最近领导德意志社会奋力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中，这种历史又重现出来。他指控犹太人，把他们描述为身处德国的"傲慢的、有报复心的外国鬼怪"的形象，为了用文件支持他的指控，他把许多类似的事情都列了出来，如犹太人亵渎神明耶稣（"被吊死的拦路强盗"）和圣母玛丽亚（"非处女"），嘲讽教皇（"被偷换下的婴儿"）和他的母亲（"娼妓和澡堂侍者"）等。现在他相信，犹太人已经证明他们是可拉（Korahites，可拉是与摩西意见相左，进而起义反抗摩西的失败的领袖）的后代，不再是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或真正的德国人。[③]

96

路德发现，犹太人斥责非犹太人为异教徒，这件事情就如他所指

---

① "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Luther's Works*, vol. 47, p. 137.

② Ibid., pp. 166—167, 192.

③ "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pp. 166—167, 192, 254, 260. 关于天主教对路德母亲的诽谤，参见：Ian Siggins, *Luther and His Mother* (Philadelphia, 1981)。关于可拉，见P57注释①。

出的，也揭示出了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描述不是基于偏见而是含有故意诽谤的意思。

> 脏乱的粪蛆，异想天开之徒、恶臭和污秽……又脏又穷一无所有……愚昧无知的异教徒……一个不善学习的愚笨的（民族）……。犹太人吹嘘他们是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与之相比，我们这些异教徒并不是人，（因为）我们没有高贵的血统、出身。①

犹太男人们在祷告仪式上十分感谢上帝，因为他们天生是上帝的选民而不是异教徒，是人类而不是动物或者奴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在这一点上，对于非犹太人来说，也有类似的蔑视性的规定。在这样一种民族自豪感与偏见之下，路德听到了希腊人的吹嘘夸耀（他提到了柏拉图），还有意大利人关于不像日耳曼人那种天生的"野蛮人"的自傲。在这种伟大文化的继承中，相比之下，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廷人，罗马天主教徒以及少数的德国犹太教徒"把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想象成了可怜的鸭子或老鼠"。其实，掌握犹太法典的犹太学者与有权颁布教谕的教皇没有什么不同，与拿着福音节录的、分离出来的新教徒也没有什么区别。所有自以为是的宗教精英们都想成为"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主人"。②

在拯救灵魂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受到伤害的德国人的自豪感与基督教徒的过分的信心聚集在一起，催生了路德晚期反对犹太人的作品。其中缘由，一方面是许多世纪以来，德国人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处于衰退中的劣等民族；另一方面，基督徒过分狂妄自大已成为一个古老的传统。路德得出的结论是：

> 这就是基督徒与犹太人冲突的来源与争论的焦点，如果犹太

① "On the Jews", pp. 140, 144, 255, 259.

② Ibid., pp. 141, 147—148, 175, 218, 226—227.

> 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他们却不期望（也）不能忍受我们这些异教徒……他们不断地嘲弄、诅咒、谴责、诽谤和辱骂我们……弥赛亚不仅是他们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安慰与幸福。①

最后，路德希望德国诸侯用"粗暴的仁慈"来回报犹太人的背叛，这是一种矛盾修辞法，意思是要迫使犹太教徒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在上述举措失败之后，路德想将他们流放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去，他们在那儿也许能够实现他们少数人的宗教梦想而不至于劝诱他人或嘲讽基督徒的灵魂。为达此目的，路德指使人们焚毁犹太教的会堂、学校和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房子，没收犹太法典《塔木德经》以及禁止犹太法学博士的教义；收回犹太人的安全通行权；禁止高利贷并把现有的钱返还给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最后，对犹太人实行强制劳动。要"把连枷、斧头、锄头、铁锹、卷线杆或者锭子放到这个游手好闲却又神圣的民族的（手中）"。如果这些措施还不能迫使犹太教徒皈依基督教，建议德国统治者应该结束对犹太教徒例外性的容忍政策，"仿效法国、西班牙和波希米亚民众的情感，（这些国家已经）把犹太教徒永远驱逐出境"。②

路德对德国犹太人的失望超过了犹太人对路德的失望。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犹太人发言人罗斯海姆的约泽尔通过一位基督徒学者发表了上述观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令路德这位《耶稣基督天生是一个犹太人》的作者始料未及。当时，德国的犹太人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利己主义联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犹太人。那时，路德对犹太人的尖刻言语的小小冲击甚至对当时的犹太人更有益，当然，对宗教改革也有利。在萨克森选侯国，1536 年就已经失效的不给未皈依的犹太人居住权和安全通行权的敕令重新生效。在黑森，马丁·布策尔为犹太人制定了更为苛刻的新法令，

---

① Ibid., p. 215.

② Ibid., pp. 269—276, 288.

试图限制黑森的犹太人只能从事低等工作。然而法令实施的过程中，黑森侯爵菲利普将这些强迫性的措施局限于限制犹太人的利益攫取，禁止犹太人建立新会堂，禁止犹太教徒改宗，禁止犹太人参与提升意识的布道等。所有的诸侯都采纳了路德的建议，他们烧毁犹太教堂，将犹太人的房子夷为平地，还查封犹太教的书籍。[①]

路德的反犹太人的短文集中于路德全集著作中，但并未作为一种教规置于路德教的信仰、教义问答手册和赞美诗中。少数的例外之一是路德教派协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中的一个犹太人的新名册。对于兴起中的新教而言，犹太人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异教徒，那些未曾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似乎是路德教的另外的偏离分支，也即“圣礼派（茨温利派）、加尔文派、狂热者（再洗礼派）、享乐主义者（唯心论者）和犹太教徒”。[②]

1523 年，路德向那些在文化上非德意志的德国人敞开了大门，20 年后，这扇门又砰然关上。德国的路德教人士中，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改革者，包括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同事尤斯图斯·约纳斯和下萨克森的改革者乌尔班努斯·莱吉乌斯，他们与新教的大多数政治领导者一起，准备无限期等待犹太教徒皈依基督教，拒绝采用恫吓或强制手段。[③]

在民族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在基督教反犹太主义与现代德国政府灭绝犹太人方案中的种族反犹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路德从来就不支持摩尼教关于“上等”人与“末等”人的二元主义，也不支持 19 世纪的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兴盛的雅利安人和没落的犹太人的说法。对于路德来说，恰恰是刚刚发展羽翼未丰的福音派教会而不是德国的犹太人，其未来有赖于 16 世纪的力量平衡。尽管人们

---

① Ibid. , P. 135; “Against the Sabbatarians”, ibid. , pp. 61—62; Hendrix, “Toleration of the Jews”, pp. 201—202. 关于罗斯海姆的约泽尔，参见：Selma Stern, *Josel of Rosheim*, *Commander of Jewry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Philadelphia, 1965）。

② Johannes Wallmann, “Reception of Luther’ s Writings on the Jews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utheran Quarterly 1*, (1978); pp. 75—78。

③ Heiko A. Oberma, “Three Sixteenth-Century Attitudes Toward the Jews”, in Heiko A. Oberman,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1994), p. 115.

怀疑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并无诚意，但这主要是态度与意志而非种族与血统造成了这种差异。[①] 即使在其支持基督徒反对犹太教的顶峰时刻，对照中世纪后期基督徒迫害犹太人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背景，路德的反犹主义也从决非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那种种族反犹太主义。种族反犹太主义这个术语不是诞生于16世纪三四十年代，而是出现在1879年。[②] 如果路德依此行事，不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就会被当时的政府驱逐出去，就如同把"固执的"再洗礼派教徒和其他的不同于路德教和天主教的偏执的异议分子逐出德国一样。在德国或帝国的法律中，犹太教并没有像1529年再洗礼运动那样，被定为死罪。

当然，后来纳粹在大屠杀中实质上利用了路德的言论。至于更早的反犹太主义的形成道路并非源于路德，而是源于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后，他们揭露和攻击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后来德国的加尔文主义者安德里亚斯·艾森门格尔收集了这些揭露和攻击并于1711年出版了《揭露犹太教》一书，该书收集了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臭名昭著的诽谤事例，并因此成了19世纪反犹太人的所谓"文艺武器的军需库"。[③] 在这部超过两千页的论集中，从未提到过马丁·路德的名字。

今天，几乎没有什么学者抱着寻找到可靠的传记体或历史文本的希望来考察路德晚期的反犹太主义作品，而这些真实的历史记载将可能使这位神学家和他所进行的改革置于较少受到谴责的背景。相较而言，人们一直研究他的老年、健康以及他对改革的失望，而当时的改革不仅对新教徒及天主教竞争对手正在迅速失去威信，而且路德确实认为，改革也在迅速失去对机会主义的犹太人的吸引力。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解释是一种被指称的困扰，即耶稣即将第二次圣临，这是一次明确的标示，意味着犹太人要么皈依教基督教，要么把他们从基督徒

① "路德是反对犹太人的……但他并不反对闪米特人，也不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一名受洗的犹太人就是一名彻底的基督徒……并非因为种族，而是因为金科玉律的信仰，流传千古的佳作造就了犹太人的今天。" Oberman, "Nazi Conscription", in ibid. pp. 69—78。

② 参见第八章。

③ Wallmann, "Reception of Luther' s Writings on the Jews", p. 135

中排除出去。①

在此，最可信的解释或许是最有可能得到历史和文献佐证的观点。从路德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路德指责犹太教的墨守法规导致了其腐败，使得早期的基督教把基于信仰和希望的原始宗教转化成了遵循仪式和行善的宗教。到16世纪30年代，路德担心类似的命运正威胁着他的宗教改革。路德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与他对德国饱经外国掠夺与蹂躏的历史的解读相互交织，而且变得极端化。因此，他将当时的犹太人放到了长期以来使德国遭受羞辱的那些民族与国家的行列。路德的反犹太主义著作是历史和神学的结合，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极易被19世纪和20世纪的反犹太主义者所利用。②

五、现代批判视野中的宗教改革

从路德同时代的死对头托马斯·闵采尔到美国的德国历史学会主席戈登·A. 克雷格，都认为德国宗教改革的伟大史诗在于专制的德国领土国家的“无限制的扩张”。③ 对此，可以从宗教改革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的考察中得出相似的结论。新的路德教的家庭被认为是“绝对家长制与权威家长的原型”。④ 然而，起初宗教改革曾答应要在原来的领主与臣民、犹太人与基督徒以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方面开辟一条新路。新的神学声称，所有基督徒不论何种社会等级，都享有精神上的平等和自由，它将诚实的农民与贪婪的封建领主及腐化的神职人员相提并论，斥责基督徒欺凌犹太教徒，保护基于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家庭权利的婚姻模式。然而，当农民用暴力威胁时，路德对他们的领袖作

---

① Oberman, “Three Attitudes”, pp. 106—109; also, ed’s introduction, “On the Jews”, pp. 126, 132—134; “On the Lies of the Jews”, pp. 126, 132—133.

② 参见第十一章。

③ Volker Press, “Germany Betwee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James F. Harris, ed., *German-American Interrelations: Heritage and Challenge* (Tübingen, 1985), pp. 67—78; Craig, *The Germans*, pp. 85—86.

④ 详情参见：Ozment, *Ancestors*, pp. 31—32. 有关宣称的“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参见：Lyndal Roper, *The Holy Household: Religion, Morals, and Order in Reformation Europe* (Oxford, 1989), chap. 7。

出了激烈的反应（“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随后，农民在萨克森和黑森发动了起义，他们纵火掠抢甚至杀死他们的领主。路德于是向领主们发出了同样无情的劝告（“狠狠地打、杀死、猛刺”）。[①] 在这些场合他都为当时的德国做了辩护。

路德对农民战争的反应促使现代学者和权威发出强烈质疑，即支持宗教改革的人们是否为后来的德国人种下了社会和政治的苦果。有观点认为，由于直接呼吁没有能够赢得大众的响应，宗教改革只得削弱可供选择的准民主、社区自治政府，转而接受专制的德国领土国家政权，结果早期的德国民族国家和议会制政府都被长期排除在外，无法实现。[②] 这种解释认为，德国宗教改革在起始阶段是具有进步性的，然而，最终（1525 年）却毫不费力地吸纳了资产阶级运动。这样一种解释反映在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所阐释的 19 世纪的德国社会演进历程中。历史学家们也认为，软弱屈膝的中产阶级背叛了尚在襁褓中的德国民主。[③]

101

在评价宗教改革时，现代评论家尤其关注那个时代处于突出位置的著名人物的特征和作品。卢卡斯·克拉纳赫是 16 世纪第二个最著名的德国画家，路德的好友，曾在维滕贝格担任了两届市长，在他去世时已是该市最富裕的人之一。对于他在现代历史学家中的声誉来说，有一点很不幸。这些现代历史学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发现了与其与社会保持密切关系的倾向。克拉纳赫活了 81 岁，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他完全可以留下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的作品的痕迹。他的创作题材范围广泛，从代表穷人利益的福音派抗议者，到后来裸体的愉悦的小市民形象，以及阿谀奉承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等，克拉纳赫的人生经历和作

① Ozment, Age of Reform, pp. 281—284.

② Pete Blickle, *The Revolution of 1525*, trans Thomas Dunlap (Munich, 1975), pp. 156—161, 183—185; Brady, *Turning Swiss*, chap. 5; and Strauss, *Law, Resistance, and the State*, pp. 268—271. 与此相反，参见 Ozment, *Protestants*, pp. 118—148。

③ 见引言。

品等也同样蕴藏着宗教改革起初的目标以及后来的失败历程。[1]

丢勒的绘画作品也模糊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的利益，而丢勒在去世时的财产比克拉纳赫还要多。但是，由于他比路德和克拉纳赫去世都要早，因此并没有卷入到日后数十年的无情的宗教和政治冲突中。他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人心目中获得像克拉纳赫早期那样较好的名誉，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他们迅速地将丢勒安置到了现代以前的无产阶级英雄的伟人祠里。在丢勒的学生中，有3位后来成为纽伦堡著名的无神论画家。[2] 由于在农民战争爆发后鼓动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他们三人遭到了逮捕，受到审讯。他们三人对于神的力量以及纽伦堡市政官员的权务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这些行为和观点与革命者托马斯·闵采尔的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丢勒手下的一位雕刻家也因支持农民战争而被关进了监狱。[3]

102

与丢勒可能存在的激进情感更具明显关联的，是他在1525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已经是在诸侯们镇压了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之后。从一种艺术的研究视角呈现出的是，这幅作品描绘的可能是一幅农民起义的纪念作品。在画中，一位农民坐在鸡笼上面，一把剑极其醒目地刺入了他的后背。这是一种经典的背叛者的肖像画法，画作之上还点缀着一个标题："期望纪念战胜起义农民的人也许最终会用上我在此所画的这一幕。"[4]

这幅画表达的是对农民起义的同情还是否定呢？尽管现代学者有

---

① Karl Lüdecke, "Lucas Cranach in Seiner Zeit", in *Lucas Cranach . Der Künstler und seine Zeit* (Berlin, 1953), pp. 104—108, 116—120; Ernst Ullmann, "Lucas Cranach der Aeltere, Bürger und Hofmaler", *Lucas Cranach, Künstler, und seine Gesellschaft* , ed., Cranach-Komitee der DDR, (Wittenberg, 1973), pp. 59—61.

② 即巴特尔·贝哈姆兄弟和格奥尔格·彭茨（Barthel and Sebald Beham, and Georg Pencz）。

③ Hetchison, *Albrecbt Dürer* , pp. 181—182, 200—204.

④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ed., *Martin Luther und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Ausstellung zum 500. Geburtstag Martin Luthers* , (Frankfurt-am-Main, 1983), no. 338, pp. 262—263.

的认为是同情有的认为是否定，但更为正确的解读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幅纪念作品似乎对诸侯和农民之间相互带来的伤害表达了哀伤之情，显示其与路德的定位是一致的，即在农民起义之前认为对双方都是一场灾难，农民起义之后，路德则将抢劫杀人的农民描述成了“疯狗”。在创作这幅画期间，丢勒的同辈、朋友们还有合作者都强烈谴责农民起义。在冲突过程中，丢勒自己的专业创作和个人的活动也表明，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当黑森和萨克森的士兵对农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时，丢勒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当时的银行界巨头富格尔家族的肖像画，以及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卡什米尔的妻子和姊妹的肖像，而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则是一位残酷镇压起义农民的残暴刽子手，他在将再洗礼派从他的领地上驱逐出去之前也曾蒙蔽过他们。[1]

当然，丢勒与纽伦堡的无神论画家们在职业上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他赞成无神论和农民反叛，而他与政治和社会精英的联系也并不意味着他并非不同情农民的困苦。同样，在农民公然袭击领主进行反抗之前，路德也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农民遭到诸侯的镇压之后，路德也对他们显示怜悯之心。[2] 若以此为评判之标准，路德也许会和丢勒一样，被放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伟人祠之中。当然，如果依据当时之标准，路德和丢勒本人都不想让自己被置于这样的神龛之中。

在丢勒去世400年之后，民族社会主义者总是极不情愿地把他和克拉纳赫用作宣传。1943年，丢勒绘于1500年的《自画像》被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创办的杂志《民族和种族》（People and Race）作为封面画而受到推崇。希特勒公开称赞丢勒是“最具德意志特色”的艺术家，而纽伦堡则是“最具德意志特色”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对德国各个博物馆里的“颓废的”现代艺术品进行清洗，克拉纳赫和丢勒的作品则成了接替相关作品位置的显要

103

① Hutchison, Albrecht Dürer, pp. 181—182; Ozment, *Mysticism and Dissent*, p. 143.

② Ozment, *Age of Reform*, p. 287.

之作。①

就像路德早期和后期的作品反对犹太人一样，路德对农民起义的谴责是最为今天的批评家所诟病之所在。② 16 世纪 20 年代早期，新教宣传册的作者们许诺城市里的市民和农村的农民具有一种新的精神平等主义（"基督徒的自由"，"所有信徒皆神父"）取代了天主教会的等级制的"灵魂安慰"。和 1523 年的犹太人一样，普通民众也在宗教改革中听到了适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自治和社会团结的信息。而这些新时代信息的开端就是路德斥责诸侯和领主的暴政以及他们的臣民的懒散懦弱：

> 我们的统治者（是）疯子。他们真的认为能够随心所欲并命令他们的臣民跟随他们，反过来，他们的臣民则错误地相信他们必须遵守统治者发出的任何指令。③

尽管对农民这般同情，但路德认为，处理生命和财产的纠纷应该由世俗宫廷裁决，而不是由福音传道士和革命者的自由行动而定夺。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清醒的劝告：

> 根据自然之理，农民们应该像一个不愿意也不应当忍受错误和邪恶的人那样战斗。（你们的不满诸如）打猎、抓鸟、捕鱼、砍伐树木等（不公平地征召的）各类劳役、什一税、关税、货物

---

① Hutchison, *Albrecbt Dürer*, pp. 200—204.

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路德列为历史上政治人物中"最会对政府当局溜须拍马之人"。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者、战犯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在纽伦堡审判中援引路德的反犹太文章为自己辩护。Günther Vögler, "*Die Gewalt soll gegeben warden dem gemeinen Volk*":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1525* (Berling, 1975), pp. 16—24; Oberman, "The Nationalist Conscription of Martin Luther", in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ation*, pp. 69—78。

③ "On Temporal Authority: TO What Extent Should It Be Obeyed [1523]", *Luther's Works*, vol. 45, pp. 83—84. 在农民战争爆发初始阶段，路德直接将责任归咎于教会和世俗的地主阶层。"An Admonition to Peace: A Reply to the 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 in Swabia (1525)", *Works of Martin Luther*, vol. 4 (Philadelphia, 1931), p. 220。

税和死亡税等，是律师的事情……并不涉及到一个基督徒。当男人和女人期望人权与自然权力时……你们不得以基督徒的名义行事……①

104

依法治国是一个良策，但是这样的劝告对于农民而言是痛苦而无法接受的。当农民领袖试图把宗教改革的教义转向社会政治革命并因此而危害到宗教改革时，他们也就丧失了获得路德支持的任何可能性。在农民战争前夕，路德曾在他的圈子里发表谈话，谴责农民拒缴小什一税的行为就如同"盗贼和拦路抢劫"，讥讽农民呼吁耶稣释放农奴是一种"肉欲主义"的基督徒的自由。农民革命者们提出的无神论和无阶级的社会与宗教改革想建立的团结的市民社会背道而驰。路德指出，"除非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一些人自由而一些人受到束缚，一些人是领主而另一些人是臣民"，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但是路德也没有找到让基督徒站到诸侯这一边的办法。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压迫和暴政引发了伟大的农民起义和无政府状态。最后，虽然明知是徒劳的，他还是向双方作了恳求："统治者请接受建议，反抗者请采用正义的法律手段解决纷争，不要使用武力或争吵，不要使德国陷入无止境的血泊之中。"②

当农民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根攻击领主之后，面临着大规模的革命的可怕幽灵，路德向诸侯们发出了劝告，要对反叛者进行无情的镇压。③

如果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在1525年之后，路德的政治哲学将

---

① "Als die gerne menschlich und natürlich recht wollten haben", ibid., p. 234; Ozment, *Protestants*, p. 129.

② "Admonition to Peace," pp. 241—242.

③ "Against the Robbing and Murdering Peasants (1525)", *Works of Martin Luther*, vol. 4, pp. 249—250. 很多学术研究已经接受了皮特·布利克尔（Peter Blickle）看待战乱的观点，他认为暴动不只是农民在进行，而是一场乡野村民和城镇居民都卷入其中的"普通人的革命"。Blickle, *Communal Reformation: The Quest for Salv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trans. by Thomas Dunlap (Atlantic Highlands, N. J., 1985), chap. 7。

德国提升到了新政治权威与权力的水平之上，那么，这也只是诸多提升政治权威和权力过程中的最近的一环。若是这种政治权力的提升只是宗教改革给诸侯带来的唯一好处，宗教改革就难以更多地获得诸侯的支持。中世纪后期，德意志国家成长较快，令人印象深刻。到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诸侯们已经成为其领地内的最高统治者，至15世纪后期，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都已经全部如此。[①] 在很久以前就有一次支持诸侯的改革运动，他们已经按自己的意愿对当地的教会和修道院进行了改革，惩罚神职人员滥用权力，帮助人们对灵魂进行救赎。德国各邦从宗教改革中获得的最大利益是有机会建立德国独立的文化，并且与罗马教皇决裂。到1519年，与当时依然对德国有利和受到尊敬的哈布斯堡皇帝相比较，罗马教皇已经成了一股更具分裂性的外部势力。

捍卫新教宗教自由的需要催生了一个诸侯邦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即新教诸邦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引发了一场与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的政治和宗教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德国宗教多元主义的确立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分裂。1555年以后，一些混合着各种宗教信仰的邦国的统治者开始指定官方宗教。在一些地区，天主教与新教学会了合作共生。[②] 如果有异教信仰者发现他们信仰的公共礼拜遭到了禁止，他们可以迁移到其信仰合法的邦国去，或在节日期间到实行其信仰的附近地区去，或者雇用一个经年行走的神父或牧师，在一个领地或城市的边界上提供人们想要的服务，并且（或者）在他们自己屋内的私人空间中静静地实践他们的信仰。

路德教派接受德意志领土国家的统治不仅提升了其主权，也赋予其伦理与文化使命，在这方面，新任牧师和正式被任命的下层市政官

---

① 到世纪末，帝国的改革使诸侯获得了控制帝国立法法庭和一个曾短暂存在的帝国理事会的权力。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进程，参见：James A. Vann and Steven W. Rowan, eds., *The Old Reich: Essays on Ger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1495—1806* (Brussels, 1974), and J. W. Zophy, ed.,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Dictionary Handbook* (Westport, Conn., 1980)。

② Marc Forste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the Villages: Religion and Reform in the Bishopric of Speyer, 1560—1720* (Ithaca, 1992).

员都有责任保持警惕，加强守护。[①] 在16世纪40年代中期，这种守护逐渐发展为一种原则性的教义，即路德教徒在面对皇帝和教皇的军队时要抵抗暴君。16世纪后半期，在法国和尼德兰也发生了加尔文教徒进行的类似的宗教战争。随着1572年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而来的是，约翰·加尔文的继任者泰奥多尔·贝扎出版了他为下层市众官员推翻包括诸侯、国王和皇帝在内的暴君的权利进行辩护的著作。他的著作似乎是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出版于路德派城市马格德堡。这里也是德国抵制皇帝占领和专制统治的中心。[②]

---

① Ozment, *Age of Reform* , p. 271，由于受到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的法律秘书斯帕拉廷的启谕，路德减弱了其抗议选帝侯美因茨主教在哈雷地区的买卖神职的放纵行为，表达了他愿意"放过"他们的意愿："阁下有关不要打扰公众和平的意愿是顺服人心的，但您可乐意让我们永恒宁静的上帝遭受……遭受毁灭之子的滋扰吗？别这样，斯帕拉廷！别这样，选帝侯！"参见：《致斯帕拉廷的信》，1521年11月11日，*Luther ' s Works* , vol. 48. ed. G. Krodel (Philadelphia, 1963), p. 326. 有关早期萨克森律师和教士的抵抗理论发展研究，参见：Heinz Scheible, *Das Widerstandsrecht als Problem der deutschen Protestanten* , 1523—1546 (Gütersloh, 1969)；参见：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vol. 2 (Cambridge, 1978), chap. 7。

② Julian H. Franklin, trans. And ed., *Constitutional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Three Treatises by Hotman , Beza , & Mornay* (New York , 1969)；Ozment, *Age of Reform* , pp. 270—272, 419—422；参见：David M . Whitford, *Tyranny and Resistance : The Magdeburg Confession and the Lutheran Tradition* (St. Louis, 2001)。

第四章　饱经蹂躏的欧洲大地：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

107　“三十年战争”在20世纪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曾经被称为“德国人的创伤”。[①] 德国人首次发现，他们处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性冲突之中，这是一场国际性的、漫无止境的战争。在这三十年中，冷战与热战交替进行，德国不自觉地成了各军事强权之间解决冲突、攫取财富的战场。尽管是德国的诸侯们首开战端，但战争一旦爆发，无论是遭受巨大痛苦和牺牲的德国人民还是他们的那些引狼入室的领导者，都无法控制战争的进程，也难以预知战争最终结束的代价。

一、战争起因

这次战争的根源是，一个世纪以来，占据皇帝宝座的奥地利决意控制关键的选帝侯邦波希米亚，使之继续处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

---

① Volker Press, “Germany Between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in Harris, ed. *German-American Interrelations* , p. 70. 0, p. 270—72, 419—22; cf. " Mond” 有关三十年战争及其和约在19世纪的德国所激起的现代政治争论，参见：Kevin C. Cramer, “Lamentations of Germany: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1790—1890” (Ph. D. diss. ,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pp. 270—278. 有关宪法冲突的最近研究状况，见 Ronald G. Ash , *The Thirty Years War , the Holy Roman Empire , and Europe* , 1618—1648 (New York, 1997) . 大量旧的经典性历史文本来自：R. J. W. Evans, The Making of the Hapsburg Monarchy, 1550—1700 (Oxford, 1979)。

围之内，同时消灭这一邦国中迅速发展的新教势力。自 1438 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德国最高统治者一直出自哈布斯堡家族。根据 1356 年颁布的德意志选帝侯团的敕令，7 个选帝侯依据一致通过原则选出新皇帝之前，要确定每位新任皇帝的各种条件。然而，一旦皇冠戴到了新皇帝的头上，新任皇帝便会迅速形成自己的意志理念，这一点在 17 世纪时最为明显。 108

宗教和政治势力的混杂性的刺激是三十年战争爆发的主要推动力。第一位刺激因素是奥地利南部地区施提利亚的斐迪南大公，也即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1598—1600 年间，斐迪南大公在他统治的土地上大规模驱赶新教徒，其中包括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这位天文学家在不久之后便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并进入斐迪南堂弟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工作，而鲁道夫二世是那个时代文化与科学的开明倡导者和资助者。另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或更确切地说，战争的肇始之地，就是坐落于奥地利北方的波希米亚王国，这是一块充满着狂热的宗教自由的国度。1575 年，当地的胡斯派和路德教徒已经融合成一种新的新教教派——“波希米亚教派”。

在 1602 年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现代的罗马尼亚西部）的新教徒被迫重新皈依天主教之后，天主教势力在 17 世纪的最初 10 年得到了增强。对于东欧的新教徒而言，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威胁已经日益急迫。波希米亚人担心他们会成为下一个被迫重新皈依天主教的对象，于是写信请求皇帝提供保证以使他们消除疑虑，皇帝陛下以至尊身份给予回信。皇帝鲁道夫的兄弟、未来的皇帝马蒂亚斯也承诺，接受信中条件是其继任波希米亚的王位的一项条件。但是，这个承诺最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他一当上波希米亚人的国王，就废除了他们的宗教自由。[①]

---

① Goffrey Parker,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1997), pp. 5—10. On the confessional side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background, Robert Bireley, S. J.,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Emperor Ferdinand II, William Lamoraini, S. J., and the Formation of Imperial Policy* (Chapel Hill, 1981), and Menna Prestwich, *International Calvinism, 1541—1715* (Oxford, 1985).

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分裂，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君主，而且是德意志大家庭中的一位强大的君主，新教方面试图扭转这种霸道性做法的各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帝国人口接近2000万，包含有2 500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规模大小相差悬殊，既有帝国选侯又有低级的掌酒官（服务于高一级皇家贵族的低级贵族）。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前夕，由于国内领地诸侯邦国的主权的增长、皇帝的反击以及新的宗教分裂等因素的影响，15世纪创建起来用于确保神圣罗马帝国和平与安全的一些机构，诸如帝国议会、帝国最高法院和大家所熟知的由各邦组成的"圈子"防务集团等，已经遭到了削弱。[①]

109

16世纪中期，为了避免信仰分歧而引发无休止的战争，帝国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帝国在通过实际认可诸侯主权以避免宗教冲突的同时，还授予邦国的统治者决定治下官方宗教的权力。与此同时，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也接受了"教士保留意见"，同意1552年签订的《帕绍条约》。这个条约的条款禁止任何1552年以后皈依新教的大教主、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将其所执掌的教会或教会财产归为新教所有。皈依新教的天主教高级教士丧失了天主教教会的尊严和作为天主教会合适继任者的权利。这个保留意见的目的在于防止当反叛的新教力量足够强大时，趁机一下子将教会采邑领地世俗化。

当时，出于鼓励新教徒自我约束的考虑，时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并在不久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斐迪南一世，曾私自与新教徒达成协议，允许1552年以前皈依新教的各个城市仍保留新教。然而，这个声明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上并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制定有关与随之而来的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徒集会等引起混乱的枝节问题相应的条款。[②]为此，新教徒们就继续援引斐迪南的政策，认为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地内，用新教的牧师取代天主教神父是正当的。

110

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的"保留意见"和斐迪南的"声明"，一个

① John G. Gagliardo, *Germany Under the Old Regime*, 1600—1790 (London, 1991), pp. 2—3; Parker, *Thirty Years' War*, pp. 12—14; Holborn, pp. 43—44.

② Holborn, *Reformation*, pp. 244—245, 285; Parker, *War*, p. 17.

有利于天主教，另一个有利于新教，但两者都具有绝对权威性。因此，这些额外条款给双方冲突埋下了伏笔，即何时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某个王国或城市归属于新教，或重新回归天主教的范围。在17世纪之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越出可控范围。在16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新教徒对于这类混乱的局势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将新教牧师安排到出现空缺的职位之上，就如同早在1523年时路德鼓励当地福音派教徒们所做的那样。[①]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了30年，直到16世纪80年代中期天主教在科隆画下一条分界线才结束。当时有一位大主教皈依了新教，其执掌的教会也归入新教，教皇随即罢免了这位大主教，由另外一位效忠于天主教的主教取而代之，从而结束了新教对天主教会财产的窃取。[②] 这次成功的收复之举鼓舞着天主教会通过战争以外的方式夺回威斯特伐利亚先前皈依新教的其他主教职位。

到16世纪末，一种新的因素加入到已经毒化的氛围之中，即帝国士兵所控制的新教城市被强迫重新皈依天主教。此事首先于1598年出现在德国西北部的城市亚琛，而该城市早在16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新教城市，9年之后，两种宗教并存的帝国城市多瑙沃特在路德教徒赢得城市议会控制权的情况下，被迫回归到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一年之后，天主教诸侯占主导地位的雷根斯堡帝国议会要求收回天主教会的“所有”土地、财产以及新教在1552年所占的教会职位。占少数的新教代表团立即退出了会议，此后40年没再参加帝国议会。两大教派已经到了无法妥协的地步。

敌对性的军事同盟很快就形成了。一方是新教同盟，其领导者是上帕拉蒂纳特的统治者、安哈尔特的路德教转为加尔文教的基督徒；另一方则是巴伐利亚公爵领导的天主教联盟。此后不久，这两大联盟各自开始寻找欧洲盟友。新教同盟转向了英国、尼德兰和丹麦，天主教联盟则直接得到了它自己的一位成员、上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大公的

111

---

① 参见第四章。

② Holborn, *Reformation*, pp. 289—290; Gagliardo, *Old Regime*, pp. 16, 20—21; Parker, *War*, p. 18.

支持。[①]

二、战争的爆发

1618年，捷克和德国的贵族发动了反对新任波希米亚国王、施提利亚大公斐迪南的起义。斐迪南接受的是耶稣教会的教育，他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于1617年登基成为波希米亚国王。由于堂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无嗣，不久斐迪南将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基于此，富于挑战性的波希米亚人选择了信奉加尔文教的帕拉蒂纳特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为他们的王位继承人，接替斐迪南，由此引发了战争。预见到波希米亚人的这次选举会给国际秩序造成混乱，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岳父、谨小慎微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弗里德里希在1614年与他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劝他的女婿放弃这一王位。[②] 尽管弗里德里希希望得到其岳父的指教，但他既没有足够的耐心听取他的岳父的意见，也不愿顺从地听其所言。

尽管战争开始时局势对皇帝不利，但德国新教徒并不是帝国军队的对手。面对帝国一系列优秀的军事领导人如约翰·策尔克莱斯·蒂利伯爵、贡扎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安选帝侯和阿尔布希特·瓦伦斯坦，新教军队在1631年之前没有取得过一次重大胜利。在这种一边倒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是1620年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展开的激战。皇帝重新夺回了波希米亚并将其主权延伸到帕拉蒂纳特。在这样的失败之下，四分五裂的德国诸侯们却无法形成统一阵线。如果德意志诸侯中实力最强大的路德教领地萨克森愿意与信奉加尔文教的帕拉蒂纳特联合对抗神圣罗马皇帝，战争的结果也许是另一种样子。但他们非常憎恨他们的新教竞争对手，而且波希米亚的战争也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威胁。由于历史与宗教的原因，

---

① Simon Adams, "The Union, the League,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 " in Parker, *War*, pp. 21—25, 28—29.

② Michel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1477—1806* (Philadelphia, 1992), pp. 86—87.

他们接受帝国的统治。实际上，1619 年到 1620 年间，他们在劳齐茨地区和西里西亚为皇帝作战，以期从中渔利。 112

尽管有屈辱的失败，而且同盟者也不可靠，被罢黜的帕拉蒂纳特选帝侯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与波希米亚国王弗里德里希五世作战。他宣称，帝国法律和宗教真理都在他的一边。[1] 除了自己的岳父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之外，丹麦国王是他的叔叔，因此他有足够的理由期待获得充足的支持。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支持并非及时雨。在战争的 113 第一年，这些支持只是杯水车薪。当时，英国国王只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当帕拉蒂纳特的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所谓的盟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时，来自奥地利的皇帝却以他们最大的痛苦为代价确保了自己的所得。为了奖赏他的大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在波希米亚和帕拉蒂纳特的大获全胜，斐迪南指命他为帕拉蒂纳特选帝侯，以取代弗里德里希的位置。这显然是极不合法的。[2]

尽管西班牙人无论从王朝的因素还是从条约的角度考虑，都有理由卷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冲突之中，但是他们一开始也是没有准备地陷入其中。17 世纪 20 年代早期，英国国王为其儿子暨后来的王位继承者查理寻求与西班牙联姻，与此同时，他计划通过这桩联姻帮他那位在帕拉蒂纳特的倒霉女婿找到一种外交解决的途径。1623 年，包括查理在内的英国代表团抵达西班牙，就联姻合同进行谈判，并继续讨论帕拉蒂纳特事宜。然而，好事未成之际，这位 23 岁的英国王位继承人接到了一项他无法接受的建议，即他只有皈依天主教才能与西班牙公主联姻，当然其中也暗含着他将成为未来的帕拉蒂纳特选帝侯之意。西班牙的这一傲慢之举，促使英国派往西班牙的使团结束了帮助弗里德里希的努力。此后，英国转而与哈布斯堡王室的敌人法国开始联盟。

---

① 有关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的动机、法律制度以及宗教信仰，参见：Brennan Pursell, "The Constitutional Cause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Friedrich V, the Palatine Crisis, and European Politics, 1618—1632"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② Geoffrey Parker, "The War for Bohemia", in Parker, *War*, pp. 42—54; Simon Adams and Geoffrey Parker, "Europe and the Palatine War", in ibid., pp. 56—60.

查理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之妹的联姻促成了新的英法联盟，从而让弗里德里希有了恢复他在帕拉蒂纳特的失地的希望。

但是，再次令人沮丧的是，宗教搅乱了政治。新任法国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立即向法国国王禀明了有关的困难，即一旦法国支持德国帕拉蒂纳特的新教事业，那么法国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将存在如何面对天主教国际社会的问题。起初，红衣主教黎塞留秘密地给德国新教提供财政援助，此后，他在德国的浑水中遍布诱饵，在众多举措中，首先是以训练名义派遣法国军队进驻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这似乎离他们应该去作战的帕拉蒂纳特很远。①

三、丹麦人

114

令德国新教徒感到幸运的是，丹麦人已经认识到，一个战败并且被帝国军队占领的德国北部地区将会成为他们自己出击和占领的理想前进基地。瑞典也对这片土地觊觎已久，欲与丹麦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及德国沿海港口。作为荷尔施泰因公爵，丹麦国王克利斯蒂安四世已经拥有位于帝国所属的下萨克森地区最北部的领地控制权。② 英国和荷兰这两大列强也同情德国新教事业，相信丹麦国王的这块领地可以作为他们阻止帝国进一步向北部扩张的立足点。

丹麦两次入侵德国北部，最终却被皇帝斐迪南的军队所击败，1626 年在不伦瑞克的巴伦贝格附近的路特尔战役中，丹麦军队尤为严重地遭到凄惨的失败。随着丹麦的战败，帝国军队占领丹麦就似乎成了必然的事。而这一点正是丹麦曾经进入帝国要加以阻止的。现在，丹麦人已经不是唯一的胆颤心惊者了。在蒂利取得路特尔胜利之后，帝国军队总司令阿尔布希特·瓦伦斯坦的军队经由梅克伦堡和波美拉

① Adams and Parker, "Europe and the palatine War", pp. 61—63. 关于马克西米里安和巴伐利亚在战争的作用的变化，参见：Dieter Albrecht, *Maximilian I. von Bayern , 1573 —1651* (Munich, 1998)。

② 关于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基督徒和丹麦人，参见：Paul D. Lockhart, *Denmark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 1618 —48* ; *King Christian IV and the Decline of the Oldenburg State* (Selinsgrove, Pa. , 1996)。

尼亚向荷尔施泰因进发。在这一转折性时刻，帕拉蒂纳特选帝侯的潜在的欧洲盟友则见风使舵，想从皇帝那里得到好处。法国人加入到西班牙人的行列之中，与之一道反对英国，而瑞典人则把矛头指向了波兰人。

帝国的危险扩张不仅威胁着斯堪的纳维亚，也破坏了欧洲的均衡局势。其他欧洲列强不会允许这种扩张继续下去。英国、荷兰和瑞典在重建1625年的领土现状方面进行了努力，并于1629年恢复了丹麦国王克利斯蒂安丢失的领地。[①] 然而，丹麦忘记了这次领土的恢复，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退出了帝国，德国的新教徒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寻找新的联盟。 115

哈布斯堡王朝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加速了德国新教徒寻找新联盟的步伐。白山战役之后，哈布斯堡王室使整个欧洲陷入了恐惧之中。它在帝国东部领土上实行残酷的重新天主教化的政策。这种滥用权力与法律的情形已经在波希米亚发生并且依然在继续。斐迪南二世自己俨然就是教皇，他随意处置神职人员和教会的财产，显示出他集恺撒和教皇于一身的可怕景象，表明了这是既有害于新教地区也有害天主教地区的一种极权主义权力。1625—1628年间，支持皇帝的巴伐利亚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以封锁和密集驻军的方式来惩罚新教的莱茵兰。在新教的波希米亚和帕拉蒂纳特，新教的财产被没收，领导人被驱逐，信徒被强迫像孩子们一样倾听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们的布道。[②]

就在丹麦撤退和北德意志新教徒们犹豫不决之间，皇帝瞅准时机，将信仰的时钟拨回到77年前。他于1629年颁布了“归还教产敕令”。这份强有力的声明再次援引帕绍条约的规定，将1552年视为天主教各邦中皈依新教的最后截止日期。他宣布确认自1608年以后天主教的要求，即向天主教会归还新教徒在1552年以后在各地夺取的管辖权。这

---

① 关于吕贝克和约，见 E. Ladewig Petersen, “The Danish Intermezzo”, in Parker, *War*, pp. 65—71; Holborn, *Reformation*, pp. 327—334。

② R. W. J. Evans, “The Imperial Vision,” in Parker, *War*, pp. 75—78, 82—84; Parker, “The Practice of Absolutism I: 1621—1626”, in ibid., pp. 82—84.

项命令让下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教辖区陷于危险之中，相同的命运也降临在数以千计的势力更为单薄的新教团体身上。[①] 尽管在这些地区新教根深蒂固，如果不是因为信奉路德教的瑞典军事力量，这种被迫改宗的危险是实实在在存在并有可能发生的。

对于德国的新教社会来说，“归还教产敕令”的颁布处于一个特别敏感的时间点上。自从1608年宗教联盟形成以来，一直没有召开过帝国议会。20多年来，德国人没有找到一个帝国的最高讨论的平台来表达他们遭受的各种痛苦。1630年7月，形势发生了改变。在雷根堡帝国议会上，选帝侯们成功地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皇帝。这是自1608年以来为数不多的选帝侯会议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德国的新教徒听到消息后，促使他们所憎恶的瓦伦斯坦被解除职务，回到了波希米亚。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点短暂的慰藉。

116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瓦伦斯坦是唯一一位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统一德国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的退出对于帝国一方来说是毁灭性的。不过，即便皇帝凭借占据绝对强势的军队去强制执行他的敕令，不与新教作出任何现实的政治妥协，由此而产生的统一会持续很长时间吗？[②] 在1629年时还要回归到1552年的现状，显然是可笑的。在这个阶段，帝国的解决方案在于，统一必须以承认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为条件。新教选帝侯要求解除瓦伦斯坦的职务，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准确确认了和平的最大障碍。

四、瑞典人

1630年，在丹麦被击败以及帝国重新天主教化之后，信奉路德教的瑞典人受到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的劝诱——他们都不希望看到天主教的皇帝成为那里的无敌人物，突袭了饱受战争蹂躏的

---

① 到1552年之前，教会的土地、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王家城镇都已经世俗化，因而逃地过了这一敕令。Gerhard Benecke, “The Practice of Absolutism II: 1626—1629”, in Parker, *War*, pp. 87—89。

② Bodo Nischan, “On the Edge of the Abyss”, in Parker, *War*, p. 101.

德国新教世界。像丹麦人一样，瑞典人长驱直入德国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帮助他们的新教徒同胞。由于受到哈布斯堡王朝在瓦伦斯坦领导下迅猛扩张到达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威胁以及出于北部波兰人的侵略活动的警惕，瑞典打算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皇帝统治的奥地利德意志之间，建立一个北德意志的可靠缓冲地区。为达此目的，瑞典企求两个北德意志巨人的支持，也即信奉路德教的萨克森和信奉加尔文教的勃兰登堡，而它们在意识到帝国军队给它们带来的危险时为时已晚。然而，这些德意志大邦并不想让瑞典信奉路德教的国王古斯坦夫·阿道夫对其主权形成挑战。[1]

斐迪南看到了德国人的恼怒。他在早先的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曾安抚选帝侯们，要修改“归还教产敕令”。现在他摇晃着经过修改的“归还教产敕令”，许诺在年内就这一问题召开新的会议。这一允诺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选帝侯们采取急躁的行动，尤其是建立法德联盟。然而，德国北部的新教徒最终是在与帝国玩老鼠戏猫的游戏。1631 年 3 月，莱比锡的新教徒会议采纳了神学家的提议，用武力抵制敕令。他们要通过这种举动表明，17 世纪 30 年代的新教诸侯不会再像 16 世纪 30 年代创立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路德教诸侯们那样，盲目地服从更高一级的帝国权威。莱比锡宣言的结果是，1631 年 4 月，4 000 名新教徒集结起来，誓死保卫受到皇帝敕令损害的帝国宪法以及德国新教徒的自由。[2]

117

德国北部的诸侯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斐迪南皇帝试图用武力征服他们并让他们遵奉天主教，而瑞典国王古斯坦夫·阿道夫则想掠夺德国的财产和建立他的外来统治，比斐迪南更加危险。与此同时，法国抱着机会主义的态度，密谋反对各方。它希望看到天主教势力足

---

① 有关瑞典国王以及瑞典战争的阶段，参见：Michael Roberts, *Gustavus Adolphus* (London, 1992)。

② Parker, *War*, pp. 102—104, 106—109；参见：the description of Elector John George of Saxony (1585—1656) as a practitioner of "Lutheran pacifism, quietism, legalism, and xenophobia." Ibid., pp. 85—86.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 90.

够强大，能够恢复对德国地产的控制并遏制住被征服的新教邦国再次回到新教控制状态；与此同时，法国也想驱逐哈布斯堡家族在德国的势力。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法国与巴伐利亚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如果不是由于瑞典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并决意根据他们的意愿来平定北德地区，不论是莱比锡的新教徒还是法国—巴伐利亚天主教徒，这些新的宗教联盟一旦能得到适当的支持，都可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瑞典对德国北部的占领使人看到了在欧洲大陆上建立另一支反哈布斯堡势力的希望。法国人相信，这样一股势力是决不会与德国北部的诸侯结盟来反对他们的。正如与巴伐利亚所做的那样，法国向瑞典提供了5年的补助金，作为其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补充。然而，当战争的烽烟再起，在1631年5月蒂利将军率领的帝国军队将马格德堡夷为平地，而瑞典人只把德意志联盟投入战斗的情况下，瑞典人和德国人（巴伐利亚人不在其中）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无法分开。这场20 000居民遇害的大屠杀是战争的残酷性的最写实的画面之一，它使得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结成了预料之外的军事联盟。[①]

118

4个月后，也就是1631年9月，新教联盟以优势兵力、恰当的战术以及灵活机动的调配在布莱滕费尔德取得第一次新教的胜利。帝国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阵亡的比例与新教战士在马格德堡的遭遇相当。1632年5月，蒂利去世，古斯坦夫·阿道夫的军队与帕拉蒂纳特选侯弗里德里希的军队一同进入慕尼黑。[②] 瑞典通过成功地置身于德国战局而阻止了帝国在波罗的海的支配地位，实现了它的欧洲大陆任务的最初目标。

五、最后的战斗

瑞典在战场上逆转局势之时，皇帝无法成眠。1632年春天，他重

① Hans Medick, "Historisches Ereignis und zeitgenössische Erfahrung : die Eroberung und Zerstörung Magdeburgs 1631", in Medick et al., eds., *Zwischen Alltag und Katastrophe :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aus der Nähe*（Göttingen, 1999）, pp. 377—407.

② Geoffrey Parker, "The Intervention of Sweden", in Parker, *War*, pp. 112—116.

新启用战无不胜的瓦伦斯坦，配给他一支新的帝国军队。瓦伦斯坦的确名不虚传，1632 年 11 月初，他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两周以后，当他派军队先期进入避冬营地时，才被瑞典人吓了一跳。在 1632 年 11 月的吕茨恩战役中，瑞典国王古斯坦夫·阿道夫战死，而瓦伦斯坦也遭受败绩逃回波希米亚。然而战争并没有结束，敌人的军队迅速招募新兵，重振士气。瓦伦斯坦也重新披挂上阵，最后一次指挥帝国的军队。瓦伦斯坦的权力膨胀对皇帝构成了威胁。1634 年 1 月，皇帝发现了他阴谋反叛的证据，于 2 月派人杀死了这位大将。[①]

1633 年和 1634 年间，瑞典人主要在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活动，将信奉天主教的美因茨变成了西德意志的军事活动中心。由于位于战争的必经之路，这座被围困的城市 25% 的住宅受到损毁，失去了 40% 的人口和 60% 的财富。这是德国城市在这场战争受到蹂躏的典型景象。[②] 尽管勃兰登堡选帝侯自 1632 年以来就与瑞典结盟，但却谋算着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暗中勾结，除掉瑞典人，因为北德意志的人民对瑞典人的占领早已深恶痛绝。但是，这种愿望却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1634 年 9 月，哈布斯堡的帝国军队在诺尔德林根大败瑞典和萨克森联军，12 000 名新教徒被屠杀。让北德意志人感到高兴的是，1634 年 11 月，精疲力竭的瑞典军队开始撤离回国。

119

信奉路德教的瑞典人离去之后，只有天主教诸邦有足够的实力从皇帝手中拯救北德意志人以及新教事业。不过，在诺尔德林根战役之后，天主教徒们已经不再只属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阵营。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再一次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敌人法国结盟，这是孤注一掷的倒退之举，双方都知道这种情形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幸运的是，事情并未发展到这一步。新教徒与法国结成新联盟的魔影让皇帝回到了谈判桌上。到 1635 年 5 月，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与皇帝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三股形同陌路的力量此刻达成一致，共同阻止

---

① Geoffrey Parker, "1633—1635": Oxenstierna vs. Wallenstein, in Parker, *War*, p. 155.

② Ibid., pp. 117—120.

掠夺成性的外国势力涉足德意志的领土。和约的最后条款规定，禁止诸侯与外国势力结成同盟，提议组建帝国控制下的常备军，命令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波希米亚和帕拉蒂纳特除外）恢复到1618年的状态，终止“归还教产敕令”，将德国合法的教派分裂时间实际挪移了75年，即从1552年延到1627年。[①]

尽管《布拉格和约》被称为是实用主义策略对宗教的一次胜利，它在事实上是一个双赢的政策，至少是双方已经筋疲力尽以及历史的惯性作用的结果。[②] 自13世纪以来，在联系松散的帝国框架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德国诸侯时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而又握手言和。在17世纪的持续的危机中，《布拉格和约》变成了另一种扭曲了的维持德国平衡局势的举措。

120

六、和平降临

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缘于德国人对本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恐惧，以德国从瑞典和法国等外国同盟者中抽身出来而宣告结束。这本是德国人自己引狼入室。《布拉格和约》以及1637年斐迪南二世的去世使得第一种害怕之心荡然无存，但第二种担忧却从未完全消失过。其原因在于，瑞典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投入过多，而一个内部安定和平的德意志将让这些投入烟消云散。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帝国与新教徒之间缔结的《布拉格和约》再次复活了帝国军队北侵和占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曾经招致丹麦和瑞典军队开进德国。因此，持久的战后条约必须要弥补它们的损失，确保它们未来的安全。如果没有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或其周边找到保障安全的前进基地，法国人是不会开走的。因为有了这些安全的前进基地，他们就能在日后德意志帝国或德国的邦国进行侵略时轻松方便地重新登场。

1641年，闵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两个城市成为代表德国利益的哈

①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 91.

② Richard Bonney, “France’s War by Diversion”, in Parker, *War*, p. 129.

布斯堡王室分别与法国和瑞典的代表谈判的地点所在。经过 6 年的谈判，三方代表在这两地制定了最后和平条款。可是，在和谈的过程中，德国北部并没停止敌对行动。然而，即便是那些极端顽固的黩武之人，也不得不考虑冲突持续下去的政治与经济代价。对哈布斯堡皇帝而言，冲突的继续将意味着对帝国无法弥补的伤害；对法国国王来说，冲突的继续将会点燃内战。在德意志境内，战争所导致的暴政与无政府状态交替出现，已经积淀了巨大的破坏，积压了巨大的恐惧。所有这些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恐惧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光才能消弭。在一些地区，成百上千的村庄和城市家庭就此消失了，而在另一些地区，121 人们遭受的苦难无以复加。帕拉蒂纳特、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符滕堡遭受了最重大的损失和破坏。在战争中被杀、由于营养不良以及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难以确切计数，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最大程度的减税以及政府对乡村、城镇或是地区重建的最大限度的资助，在战后的报告中夸大了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根据现代的估计，当时总人口约为 1 800 万，死亡人数最低占总人口的 15%—20%，最高则达到 30%—40%。①

最终和约是统一的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和约，瑞典得到了波美拉尼亚的一些地区以及它渴望已久的波罗的海出海口，另外还得到了两个主教辖区和 5 000 塔勒尔的赔款。这比它最初的要求有所减少。它最初的要求是占有整个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的一部分和 30 000 塔勒尔。法国人获得了期望得到的帝国境内以及周边地区的一些重要战略要地：三个相邻主教区、莱茵河上的两个要塞以及最

---

① 保守的估计参见：Parker’s (*War* , pp. 147—148, 187—188)；高一些的估计，参见：Hughes’s (*Early Modern Europe* , p. 109)。最近的研究倾向于保守的估计数量，有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在战后呈报的人员伤亡数字被有目的的夸大，以寻求中央政府的税收减免以及战后重建资金的政策支持。John Theibault, “The Rhetoric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7 (1993): 271—290, and “The Demograph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Re-revisited”, *German History* 15 (1997): 1—2。

重要的阿尔萨斯和洛林。[1] 在日后的法德冲突中，以上的地区都成了法国人的前进基地。与此同时，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些损失也是后来造成德法冲突的原因之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帝国境内的德国诸侯是其领土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与外国自由结盟，前提是后者不得对皇帝造成威胁。反过来，和约只是重申了帝国皇帝的历史角色。皇帝是生活在帝国境内的人们的最高统治者，有颁发大学特许证和授予贵族头衔的权力。[2] 和约解决了最棘手的少数人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有关恢复世俗化的天主教邦国的问题，将通过把《布拉格和约》设定的皈依新教有效日期后退3年的方式，也即到1624年1月，加以解决。在这一日期之前已经存在少数派宗教礼拜的地方将依法继续存在，在此以后，天主教对于土地和财产的管辖权也将继续存在。最后，和约规定，122 加尔文教为帝国境内的第三种合法宗教，与此同时，继续禁止再洗礼派以及类似的宗教派别。

从宗教角度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接受了信仰上的差异，减少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17世纪后期，信奉路德教的萨克森选帝侯仍能皈依天主教并且在帝国议会上仍然是萨克森官方代表团的领袖。[3]

1648年之后，笼罩在德国人头顶的外国势力的阴影较之以往更加 123 严重。这一点得到了由法国和瑞典军队确保的国际证条约的保证。战争中，德意志诸侯的力量得到增强，但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与此同时，皇帝已经下降到只和一个大的德意志诸侯大体相当的地位。从此以后，法律战将优先于武力战争。通过这次战争，大德意志已经成为国际法和外国自私利益博弈的场所。[4] 最后，德国人发现自己又

---

①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 p. 92, 98; Parker, *War* , 140—141, 159, 165, 194—195.

②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 p. 94.

③ Ibid., pp. 95—96; Geoffrey Parker, "1647—1650: The Making Of Peace", in Parker, *War* , p. 163; Parker, "The War and Politics", in ibid., p. 195. 29. Press, "Germany between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p. 70.

④ Prss, "Germany between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p. 70.

回到了牢笼之中，他们有理由产生怨恨情结，整日提心吊胆。未来他们摆脱外国势力干涉而重获自由的新生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内部的纪律。在强敌如林的欧洲，德国要保持自身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内部的井然有序，那就是，不挑衅别人但能够反击他人的挑衅。



地图4　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德国(1648)

第五章　帝国之敌：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125　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就是国际贸易的中转站，17 世纪，它又成了欧洲列强的战场。到 18 世纪，德国已经成为拥有诸多专制主义邦国的国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授予了德国各邦主权，这些主权邦逐渐与历史上曾将德国统一在一起的哈布斯堡的皇权中心渐行渐远。历史学家把这种发展称为“小邦割据状态”（kleinstaaterei）。但是在德国历史上，这些日益增长的邦国权力和竞争所形成的后果却不可等闲视之。奥地利、巴伐利亚、勃兰登堡—普鲁士、萨克森和符滕堡已经变成了帝国内部中央集权的强权邦国，它们拥有职业军队、国家官僚机构、外国同盟者、国际性的宫廷、巴洛克式的宫殿，甚至自命为法国人或以说法语为荣耀。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主持的德国诸侯与城市具有等级制度已历经 3 个世纪，但 1648 年之后，皇帝发现自己在谈判中与各诸侯的使节实际
126　上已经处于同等的地位。而普鲁士则更为突出，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德意志各邦中的优胜者。《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很少涉及各邦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历史关系，而是让各邦多少有些随意地就具体状况

---

①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Cambridge, 1999),

进行谈判。势力更大的邦在处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时，就像对待外国势力一样。[1]

法理学家萨穆埃尔·普芬多夫是“三十年战争”这一术语的创造者。针对这种情形，当时的他把1667年时帝国的政治结构描述为一种政治与宪法的“畸形怪物”：一方面是君主政体——皇帝和皇权，另一方面却是邦联制——诸侯和各邦国。然而，1648年以后，帝国宪法却允许地方性诸侯统治逐渐升级。[2] 这种制度是欧洲列强的创造物。为了揭露欧洲列强的险恶用意，一名帝国的市政议员曾用悲叹的语调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使德国人“成为其邻居的掠夺物和嘲笑的对象，（民族被）分裂……而且由于分割……而虚弱不堪，（现在）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伤害他们自己，却无力去拯救（他们）自己”。[3]

尽管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削弱了传统的限制，但是，专制主义时代也并非处处通达。在许多邦国和城市中，仍然存政治性的检查与平衡问题，法学家们从来都忙碌不起来。比如，符滕堡公国的特权阶层，包括贵族、神职人员和普通官员等组成的功能性议会一直维持到19世纪。[4] 此外，分裂也进一步加剧了古老的德意志帝国的脆弱性。17世纪后期，商人在莱茵河上航行进入北海，在某些邦国的边界上，平均6英里就有一个关卡，在沿途边界都得交税。[5] 17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占领了阿尔萨斯和帕拉蒂纳特的大部分土地，这一点说明，1648年之后，要入侵德国已经不会再遇到多大的挑战和风险。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族没有收复帝国的失地，也没有修复帝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它的统治基础的核心却日益受到动摇，面临着新的

---

① Gagliardo, *Germany Under the Old regime* , pp. 96—99.

②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 pp. 115—116, 120.

③ Schulze, *Germany* , pp. 87—88.

④ Fulbrook, *Concise History* , pp. 83—84.

⑤ Schulze, Germany, p. 70.

外国和本国强权的威胁。17 世纪后半期，利奥波德一世与法国交战，付出了惨重代价，土耳其坐享渔翁之利，威胁奥地利，甚至包括皇帝宫所在的维也纳。1683 年皇帝携全家逃离了维也纳。[①] 18 世纪上半期查理六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皇室试图通过重新颁布皇家继承法令来确保其领土的完整，并且对失去的德意志领地提出要求。由于查理的所有儿子都在婴儿阶段夭折，他在 1740 年发布了具有争议性的文件，史称“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宣布将皇位传给大女儿玛丽亚·特雷西亚。[②] 在这一时期，奥地利一直在注视着普鲁士军队屯兵北部，普理士很快就成为奥地利的主要劲敌和德意志帝国新霸主。而奥地利既无力改变这一切，也无力掌控这一切。

尽管还有一些影响力，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变化中的德意志帝国的控制。于是，它组建了自己的直辖帝国，在这一新帝国中，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成为奥地利之外的主要领土构成，而它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应付土耳其人。18 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顶着德意志帝国皇帝空名者寥寥可数。哈布斯堡家族制止德意志人之间自相残杀近 3 个世纪，如今这一家族却要被他们撇到了一边。整个 18 世纪，德国的统一已经不再是哈布斯堡皇帝的任务，这一历史重任已经转交给了德国最强大的诸侯。在 18 世纪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强大的诸侯非普鲁士莫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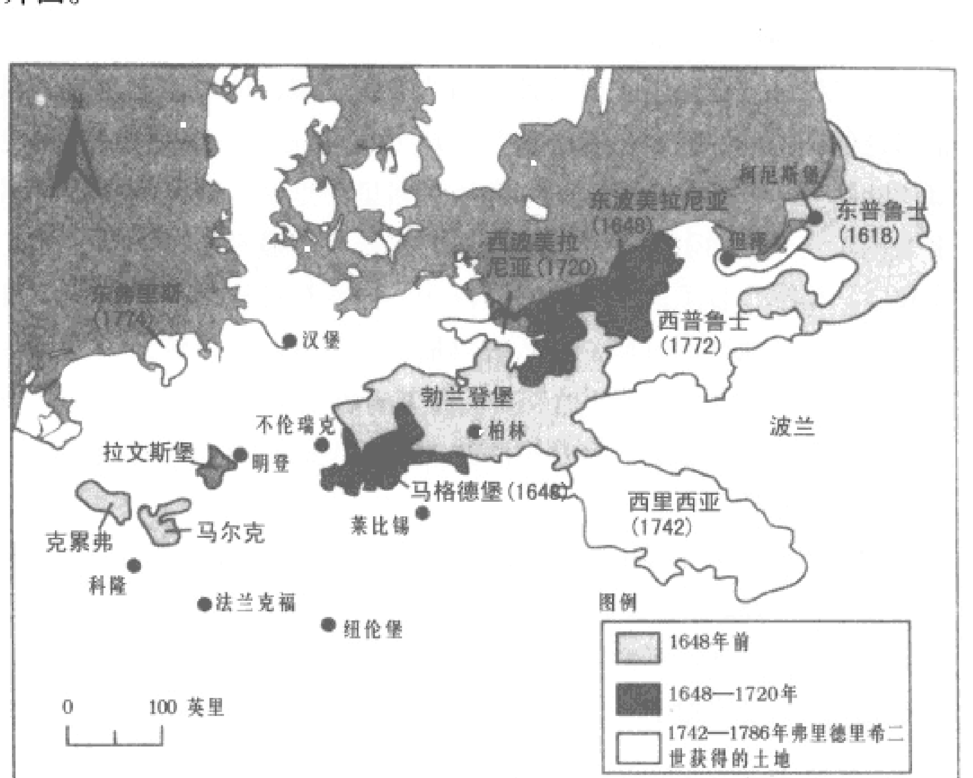
一、勃兰登堡—普鲁士

1700 年的历史画卷缓缓铺开，信奉天主教、拥有 900 万人口的哈布斯堡奥地利仍然拥有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头把交椅。相比而言，普鲁士只是拥有 300 万人的小国，有 10 个欧洲国家的面积比它大。然而到 18 世纪中期，信奉新教的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已

① Detlef Plöse, “Kaiser Leopold I”, in Rolf Straubel et al., *Kaiser König Kardinal: Deutsche Fürsten 1500—1800* (Leipzig, 1991), pp. 188—189.

② Gagliardo, *Germany under the Old Regime*, pp. 2—3, 13;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24—128, 131.

经拥有名列欧洲第三的强大军队，并且将奥地利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在这两个对手冲突之前，这个北方的斯巴达吞并和统一了周边的许多土地。经过一个多世纪不间断的发展，现代普鲁士国家逐渐形成，其地理与其构成领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一样，都具有多样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普鲁士的发展之路，它将东波美拉尼亚、明登、马格德堡和莱茵兰地区归入普鲁士的两个大领地的支撑点中，即由条顿骑士团开拓出的东普鲁士东方边疆和选帝侯所在的勃兰登堡中心邦国。 128



地图5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扩张(1648—1786)

普鲁士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历代国王寿命都比较长，都具备举世罕有的治国之才，能征善战，亦能安邦。弗里德里希·威廉，史称“大帝选侯”，成功地让贵族臣服于他的统治，为普鲁士的发展

奠定了经济和军事基础。[1] 他的儿子、继任者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位时非常强大，以至于1701年加冕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2]，跃上了欧洲的历史舞台。如今，普鲁士不再是臣服于波罗的海列强的一个小公国，它已经成为霍亨索伦家族拥有世袭王权的王国，而且这种上升的势头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仍将延续。弗里德里希也制定了以挑战奥地利为目的的扩张政策。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竞争由此 129 开始，这种竞争将使得德意志帝国的权力从哈布斯堡家族转移到霍亨索伦家族的手中，进而使得以奥地利为基础的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解体，从而使奥地利徒具虚名。

弗里德里希也热衷于推动教育和艺术的发展，他采用巴洛克的风格修建他在柏林的宫殿，资助建立了18世纪德国最早的大学——萨克森的哈勒大学。他的儿子、王位继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重申霍亨索伦王朝保留加尔文教的积极进取的传统，用遵奉普鲁士严明的纪律和服从精神代替了他父亲的宫廷浮华。这些精神也是普鲁士军队素质的支柱。在他统治时期，军队的数量翻了一番，他告诫公民把服兵役看做是公民最高的自我献身精神。虽然普鲁士军队在1720年将西波美拉尼亚并入了普鲁士，但是军队花在检阅中的正步走的时间比冲向敌人的时间要长。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年在位。在他继位时，普鲁士的军队数量达到8 000人，与人口的比例极不协调，80%的国库收支用于军队。这位新国王还将军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使普鲁士六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军

---

① 作为勃兰登堡的统治者，他也位列德国负责推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八位选帝侯之一。

② 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弗里德里希三世以向皇帝出租8 000士兵为代价换取了1 300万塔勒尔的补助金和承认其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德语为 König in Preussen），称弗里德里希一世，意即其国王称号只能用在普鲁士而不能用到勃兰登堡等领地。174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时才称为普鲁士国王（König von Preussen）。——译者注

事相关的服务工作。[①] 此外，他还成功完成了他父亲的两个愿望：向中产阶级开放国家公职人员职位和制定了普鲁士法典。[②]

二、虔敬主义与政治

1711 年，信奉加尔文教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皈依了虔敬派，在国内兴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运动中心在哈勒。批评者认为，这是一场反对已经确立的新教信仰的运动。虔敬派是三十年战争的产物，它向追随者们许诺要实现国家政权和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正统新教无法做到的事情，也即从精神、道德和社会层面重建德意志。在一个等级森严僵化、宗教信仰流于形式、采用铁腕统治的社会中，虔敬派的诺言打开了很多人的想象空间。

虔敬派开明而坦然地面对世俗世界，它直接将宗教运用到为社会和国家的服务之中。为了表达对虔敬派改革运动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向哈勒大学毕业的学生们敞开了政府、军队、医院以及学校工作的大门，这些学生纷纷进入行政管理人员、牧师和教师的岗位，获得职位数与其人数极不相称。事实证明，这种新宗教和旧政治的上下整合对双方都有利，不仅增加了教会与国家合作的机会，也顺势推动了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向前发展。[③] 另外，在大学教育方面，哈勒大学的教育制度包括了为女孩、孤儿和贫困学生提供教育的学校，为上层阶级的男孩提供教育的拉丁寄宿学校以及一个著名的学院。 130

有 3 位指引路德教前行的灯塔式人物领导着这场运动，他们分别是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约翰·阿恩特、菲利普·雅可布·施

---

① Fulbrok, *Concise History*, pp. 76—81 (map); Schulze, *Germany*, p. 79; Philip Woodfine,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Huddersfield, 1990), p. 14; 参见：C. A. Macartney, *The Hapsburg and Hohenzollern Dynast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70).

② Giles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A Life in Deed and Letters* (New York, 1999), pp. 17—18, 24—25; Rolf Straubel,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Kaiser König Kardinal. Deutsche Fürsten 1500—1800* (Leipzig, 1991), pp. 32—13; Fulbrook, *Concise History*, p. 79.

③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42—144.

佩纳。约翰·阿恩特是神秘而带有虔诚色彩的《真正的基督教》一书的作者；菲利普·雅可布·施佩纳是虔敬派经典著作《虔敬之愿》(Pia Desideria) 的作者；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东方语言和神学方面的教授，他接替施佩纳成为虔敬主义运动的领导者。霍亨索伦王朝的国王们看到虔敬派非常乐于为市民与臣民们奉献，遂鼓励虔敬派的教育哲学在普鲁士传播。虔敬派的教育思想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心灵深处对宗教信仰的渴望，向人们的心灵灌注道德法则，而且能让学生接受现实技能的教育，要求学生学习法律与修辞，在掌握古代语言的同时要掌握现代语言，并熟悉现实世界的贸易流程，而学习世界贸易是对传统的大学学习的一项实用技术的补充。[①] 虔敬派通过这些方式向正统提出挑战，拓展与深化了宗教改革推进市民社会的努力，使之基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主动和规范合作之上。

尽管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们对虔敬派慷慨赞助，虔敬主义在当时的神职人员中并不是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怀疑虔敬派的正统性，担心它会影响到宗教神职人员的自由，这种担心害怕可以从施佩纳评论所用的激烈言辞中得到明证：教友派信徒、蔷薇十字会员（Rosicrucian）[②]、千禧年信奉者和宗教狂热者。[③] 虔敬派与世俗权威的结盟把虔敬派带入了更深层次的政治之中，并采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方式，靠着加给诸侯权力的道德约束，来确保教会与国家的适当分离。这些道德的约束把诸侯描绘成了世俗的基督徒，成了公众信任的管理人员。在不危及教会的道德使命的情况下，教会也可以分担起诸侯的国民政治目标，并且为之提供帮助。在这种合作中，双方都能获得很

131

① F. E. Stoeffler, *German Pietism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1973), pp. 24—27; Gagliardo, *Germany Under the Old Regime*, p. 191; J. V. H. Melton, *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 (Cambridge, 1988).

② 17—18 世纪流行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宣扬宗教的神秘教义。——译者注

③ Editor's introduction, p. J. Spener, *Pia Desideria*, trans. T. G. Tappert (Philadeliphia, 1964), pp. 8—21; Gagliardo, Germany, p. 183.

多利益，但这种合作若超越了界线，也会弄巧成拙，造成重大损失。[1]

霍亨索伦王朝对虔敬派神职人员和各教派的影响引发了关于虔敬派与世俗社会妥协的指责。据说，弗兰克本人就是一个骑墙派，在教会与政府之间游走。当然，两者的界限要做到泾渭分明既不可能也显得很虚伪，就如他有一天与专制的国王交谈共饮，第二天却在街上尽力去帮助孤儿。[2] 批评者认为，虔敬主义的完美主义情调使之难以被启蒙运动所吸收。施佩纳喜欢提到“我们有义务取得某种程度的完美”，其含义是，在人们的道德行动中有一种受到圣灵引导的可以感知的道德责任。在这里，他提前使用了伊曼纽尔·康德关于意识中存在一种绝对命令的世俗观念，是要求对道德挑战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反映。[3] 然而，人们从弗兰克的暧昧态度中可以看到的是辩证的德国人，而非丑陋的德国人。诚如教会所教导的那样，这类德国人相信，人们必须同时生活在并行着的宗教和世俗的世界中。

三、开明君主

1740年以后，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军事上的冒险以及对内改革，使普鲁士完成了向德意志各邦中最重要的王国和欧洲的强国之一的转变。弗里德里希成长的年代并没有体现出会有这样一种辉煌的结果，若非看不见的历史之手的帮助，今天他也许只能以“弗里德里希小帝”著称。他成长于一个矛盾复杂的帝王之家，家庭的情感不和使他身心疲惫，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他的母亲和祖母是汉诺威的公主，她们的兄弟先后成为英国的国王，这一血统为弗里德里希在国内外获得广泛

132

---

① Gagliardo, *Germany*, pp. 107—110, 116. 这里所说的诸侯的专制权力（诸侯对立法拥有独一无二的控制权）并不等同于专制政府（个人权力的缺失以及诸侯对人和事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统治者被置身于国家的法律的约束和对上帝的敬畏的信仰束缚之下，“履行其为臣民谋求幸福生活的义务和职责……这是统治者义不容辞的权力职责”。Ibid., p. 121. 参见 Mary Fulbrook, *Piety and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England, Württemberg and Prussia* (Cambridge, 1983).

② Stoeffler, *German Pietism*, pp. 37—38.

③ *Pia Desideria*, p. 80; Stoeffler, *German Pietism*, p. 69.

影响提供了重要平台。弗里德里希的母亲气度非凡，与他父亲阴郁冷酷的男子汉气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不允许普鲁士的传统德行教育窒息她的孩子。她想让她的长女和长子与英国王室通婚，也即威尔士的王子迎娶威廉明娜，英国公主则嫁给弗里德里希。而弗里德里希的父亲首先考虑保持皇室的德意志血统以及与哈布斯堡皇室的友好关系，其次再确定他们与英国的联盟关系。[①]

父母有时为了培养孩子的内心和思想而发生矛盾。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如果没有纵容孩子的母亲的干涉，他将使他的子女一直处于孤独之中。他担心王后过分溺爱孩子，使他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过于"脂粉气"，危及到普鲁士王国。当儿子 12 岁时，国王告诉他，周围的邻国"都只想把我们赶到海里"。弗里德里希·威廉既是父亲又是国王，他一直关注着英国和法国引起的地缘政治变动，体现了德国人自古以来一直的担心。他说："我将把匕首放在我孩子的摇篮中，以便让他们能够把外国人赶出德意志！"[②] 他很早就把弗里德里希安置到胡格诺教徒士兵的手中，直接教他战争的方略。在威廉的整个孩童和青年时代，胡格诺教徒士兵都在教他学习数学、经济、筑城学、普鲁士法律和现代历史知识。在母亲的帮助下，弗里德里希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有几千册藏书，这就能够让他在十几岁时就阅读法国、英国和德国主要作家的书籍。[③]

国王担心王后对儿子的影响，更担心被其宫廷内的皇室的敌人打败。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拒绝了父亲让他迎娶不伦瑞克—贝弗恩公主伊丽莎白·克里斯提娜的计划，使上述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如果要挑选妻子，他想娶他的英国表妹为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进入法定年龄并且可以加冕的那几年中，曾 3 次试图逃往英国。[④]

---

①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29, 52—54; Straubel, "Friedrich II", p. 314.

②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35, 42; David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New York, 2000), p. 24.

③ Straubel, "Friedrich II", p. 314; Woodfine, *Frederick the Great*, p. 6.

④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25, 37, 40.

弗里德里希与父亲关系疏远的另一个因素是弗里德里希显露出明显的同性恋或双性恋倾向。这也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话题，其中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基本上有节制”的特征，尤其要考虑到他已经娶了妻子。[①] 不过，有证据存在，而且各种结果也与这一传闻极其一致，因此不能仅仅当做恶毒的法国人的闲话而避开这一话题。对于男性的性倾向也许就是当时他父亲所指的这个男孩带“脂粉气”，或许这源于他与他的男性军事教官们的亲密关系，至少这些军事教官中有一人是有名的同性恋者。[②]

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是，弗里德里希与一个比他大 8 岁的警官在 1729—1730 年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名警察名叫汉斯·赫尔曼·冯·卡特。据说他与弗里德里希维持着“爱人与情妇”的关系。[③] 卡特陪伴着这位未来的国王第三次踏上以失败告终的联系英国王家亲戚之路，他们一起被拘捕并被发现试图与英国大使密谋逃往英国。事情败露后，国王用藤条迎接这位归来的儿子。之后，弗里德里希成了普鲁士军队中的一名中尉，他可能因开小差和叛逃而受到审判，在有可能被执行死刑的情况下，欧洲王公贵族们都团结起来支持他。在不守秩序的 18 世纪，任何有关对国王执行死刑的传言，特别是一位未来的国王被其父亲和长辈处死，都不符合王室的利益。

尽管父亲最后宽恕了弗里德里希，但他仍然被捕，投入监狱，从 1730 年到 1732 年，在奥得河畔的屈斯特林城堡中关押了将近两年半。在此期间，唯一与之相伴的就是《圣经》和约翰·阿恩特的《真正的基督教》一书。在监狱里，他遵循惩罚的机制，即试图让他改头换面，成为一名庄严的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由于他的母亲和姐姐参与了他逃往英国的事件（国王后来对威廉明娜处以鞭打惩罚），她们被

---

①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38—42.

② MacDonogh 认为，在 1729 年，弗里德里希的私人侍从似乎“确定年届 70 的弗里德里希有些欲念（性）已经半有半无”。*Frederick the Great* , pp. 48—49；有关弗里德里希同性恋观点的研究证据，参见：ibid. , pp. 106, 169, 195, 202—204, 221—222, 242, 230。

③ Ibid. , pp. 48—49；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28—29.

禁止在一年内与弗里德里希有直接接触。不过，如果她们用德语而非叛逆的外语给他写信，他可以收到她们的来信。弗里德里希被禁闭期间遭受的最残酷的打击发生在他被投入屈斯特林监狱的早期。他的父亲命令将卡特在屈斯特林监狱的后院斩首，并强迫弗里德里希透过监狱的窗子观看斩首的情景。[①]

134 在被禁闭结束时，弗里德里希已经屈服，开始按照他父亲的意志行事，至少表面上是这样。1732 年 2 月，在有关对异性没有感情的风言风语中，弗里德里希与不伦瑞克—贝弗恩公主成婚。据说这是一对没有性爱关系的婚姻结合，当然也就不会孕育后代。[②] 直到 18 世纪 30 年代中期，这对王家夫妇一直居住在莱茵斯贝格，这是一处特别修建的法式城堡，位于柏林西北方向 40 英里处。1733—1735 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弗里德里希第一次体验了战争，普鲁士与奥地利、俄国军队一起共同抗击法国，他首次亲眼目睹了未来普鲁士的敌人的军事策略，得到了第一手的有价值的资料。[③]

弗里德里希的生活主要是学问与战争，要么专注于书籍、争论之中，要么潜心于战略规划和战争。他继承王位之后不久就在柏林创办了艺术与科学学院。由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佩尔蒂出任科学院的负责人，科学院召集了当时欧洲所能得到的最杰出的人才，他们在国王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术圈。[④]

弗里德里希处理政务主要有两个处所，一是在重新装饰的位于柏林近郊的夏洛滕堡宫殿，还有一处就是特地在波茨坦修建的静养修身

---

①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63—75, 80—88; Straubel, "Friedrich II", p. 315;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29—31.

② 弗里德里希的兄弟威廉孕育了王朝的继任者，未来的国王威廉·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 (1744—1797)。

③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99—100, 105, 135, 194; Straubel, "Friedrich II," p. 315.

④ 除 Maupertuis 之外，另有德国哲学家克里斯提安·沃尔夫、一位来自哈勒的教授，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的挚友、意大利哲学家 Count Francesco Algarotti，为弗里德里希提供最新的英语书籍。这些人成了第一批入住柏林科学院的知识精英。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123—124;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33, 257—258。

处所——无忧宫，此处是他最为欣赏的知识分子云集之地，但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法国人。这些人包括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和让·勒隆德·达朗贝尔。而后者是17卷本《法国百科全书》的编辑之一，该百科全书可称为融合了启蒙运动智慧的法国哲学、政治和宗教交织的索引。

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娱乐时，国王和他的助手们都说法语。尽管在他统治普鲁士的后半期是在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陪伴下度过的，当时在泛日耳曼文学方面出现了歌德、席勒、莱辛，音乐方面出现了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他们开始大放光芒，但弗里德里希蔑视本土德语，称之"蛮腔"。此时属于德国的文学时代还没有到来。[①] 1780年弗里德里希公开批评德语，引起了人们极大的不满。即便在对法国的一切都极度痴迷的时代，他在这方面也有些过分。他是德国的国王，同时代的人们视之为最伟大的人物，他阅读法语著作却比阅读德语著作更容易一些，以至于他让人把当时他想阅读但又难懂的德文书籍翻译成法语后再供他阅读。这是一种讽刺。因为他同时深信，即只有1.25%的法国人拥有些许智商。[②]

弗里德里希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歌、政治和军事策略、哲学论文以及他与当时知识界领军精英们的大批往来信函。他对时下流行的共济会纲领和虔敬主义的思想兼容并蓄，共济会的普世主义和虔诚派的完美主义与他自己的勃勃雄心相得益彰。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反对马基雅维里》，批判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他称赞那些为臣民服务并为之作出牺牲的国王，不赞成国王欺骗和操纵臣民。[③] 但是，

---

① 1770—1880年之间，"歌德、谢林、莱辛、康德和莫扎特使得德语世界成为欧洲文化的摇篮，持续半个世纪，终结了法国文化价值体系长久以来对欧洲文化的支配地位"。William Carr, *The Origins of the Wars of German Unification* (New York, 1992), p. 16; Fulbrook, *Concise History*, pp. 85—95。

②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10, 137—139, 206, 323, 350, 370;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p. 608; Schulze, *Germany*, p. 89.

③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24, 137—140; Straubel, "Friedrich II," p. 316.

在西里西亚战争中，这种充满活力的理想主义破灭了。在西里西亚战场上，他发现，即便是好的诸侯，也必须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不管怎样，弗里德里希对诸侯的定位的确证明，18 世纪德国高度发达的政治理念坚持的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东西。[①]

四、哲学家国王

一位认真而充满理想的国王，他若能像伏尔泰那样有时模棱两可，有时却愤世嫉俗，那么，如果他不是一个十足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必定具有诗人的气质。尽管这两种气质相互难以调和，但国王的这两种情怀——精神生活和制敌于死地，都与他个人的秉性和时代之要求完美结合在一起。伏尔泰能帮助他实现这种抱负，他将弗里德里希塑造成了一位充满哲学智慧的国王形象并在全欧洲范围内加以宣扬。作为回报，弗里德里希尊崇伏尔泰。作为一国之君，他渴望这位法国人能够启迪他的心智。

在登基以前，时年 24 岁的弗里德里希就曾写信给伏尔泰，希望能够邀请他到柏林来，以便拜师门下。通过 42 年断断续续的学习，伏尔泰将这位国王糊涂痴迷的秉性祛除一空，使之对嘲讽、诽谤、欺诈等伎俩能迅速作出反应，也能够刺探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分享他的知识和恶意的流言蜚语。然而，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像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那样，是“伏尔泰的仆人”，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个知道怎样伺机反击之人。[②]

136

1740 年，他俩第一次在克莱沃见面，此后，两人志趣相投，私交甚笃。1743 年，伏尔泰第一次到柏林拜访，两个人一起造访法兰克尼亚的拜罗伊特。这期间正值弗里德里希的军队入侵西里西亚，伏尔泰遂询问这位哲学家国王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正当性何在。在柏林，伏尔泰无法寻觅到与之智慧相当之人享受精神的盛宴。在与王室成员交

---

①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78, 80, 625.

② Ibid., pp. 81—82; Woodfine,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2.

往中，他行为举止拙劣，在弗里德里希的鼻子底下明目张胆地向弗里德里希的妹妹乌尔莉卡大献殷情，并获得了成功。这次拜访使双方之间开始了相互侮辱与嘲讽。伏尔泰公开宣称国王是同性恋，而弗里德里希则较为审慎，只在诗中讥讽伏尔泰背弃信义。[①]

18世纪50年代早期，伏尔泰再次造访柏林和波茨坦，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知识方面，弗里德里希没有质疑过法国语言和文化比德国优越，但他也准备接受意大利人的文化。也许国王谦卑地认为德国文化依然落后，但伏尔泰却幸灾乐祸地注视着德国民族文化的分裂，这一点却是无法原谅的。而弗里德里希与伏尔泰的交情也足见这位国王的宽宏大量。弗里德里希的散文创作或许不如他的诗歌那样好，但伏尔泰以自身的智慧来看，弗里德里希的散文和诗歌创作都只是雕虫小技，他甚至讥讽国王的诗歌创作仍处于启蒙阶段。尽管伏尔泰在无忧宫享受了热诚慷慨的招待，他却继续向饶舌的文人们提供闲话，将弗里德里希奖赏的知识分子圈子称为“妓院中的希腊七贤”。[②]

在无忧宫时，伏尔泰就曾让弗里德里希陷入尴尬之中。伏尔泰接受一名犹太经纪人的资助，进行非法的货币投机活动，被当场捉住。伏尔泰的丑行是在反犹主义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对国王的忍耐性是一次考验。1751年初，弗里德里希将他这位著名的客人驱除出了无忧宫，让他返回了柏林。斯文扫地的伏尔泰恼羞成怒，将弗里德里希所喜爱的无忧宫描绘为同性恋的杂耍场，这也许让一向听惯了奉承话的国王也许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这个伟大的法国人的真实面目和丑陋的一面。早在1749年，弗里德里希恳请伏尔泰到柏林时，他就曾描述伏尔

137

①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145, 165—169. Daniel Gordon 援引证据表明“伏尔泰对弗里德里希的爱恋满足在1740年达到巅峰”。第一次相遇，伏尔泰就被弗里德里希“那蓝色的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的微笑”所吸引。弗里德里希“那诱人的身材”让伏尔泰情迷心窍，“我要将我自己奉献给他，带着激情、带着盲目和冲动”。Voltaire, *Candide* , trans, and ed. Daniel Gordon (Boston, 1999), p. 27。

② 引自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213—214, 234; Wood-fine, *Frederick the Great* , p. 5.

泰既是一位值得钦佩的天才又是一个卑鄙的胆小鬼。[①]

伏尔泰离开无忧宫时，国王给了他一些表示敬意的礼物，以及国王自己创作的一本诗集，前提是，诗集不能被带出普鲁士。弗里德里希担心他的诗集落入别有用心的人之手。显然，父亲成功地使他有了那种非国王所为的女人气的圈套。他采取了两次报复行动，一个是私下里的，另一个是做给全世界的人们看的。弗里德里希将自己的不高兴情绪展露无遗。他将伏尔泰在无忧宫住过的房间重新进行了装饰，贴上一些富于象征意义的动物图案（猴子、孔雀、蛇、蟾蜍），寓意着伏尔泰道德的败坏。此外，他怀疑他的诗集难以归还，下令逮捕在逃的伏尔泰。[②] 1753 年 5 月，被打得浑身青紫、惊魂未定的伏尔泰在法兰克福的寓所被逮捕。这样，哲学家国王给了那个哲学家之王一剂清醒剂，让他知道谁是普鲁士的国王。而就是这样一次教训却使得伏尔泰在法国和伦敦的沙龙集会中不断造谣生事，使弗里德里希为此付出了代价。

五、西里西亚战争

1740 年，时年 28 岁的弗里德里希登上了非他莫属的普鲁士王位宝座，而时年 23 岁、极具争议的未来女皇玛利亚·特蕾西娅也登上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的王位。此后不久，弗里德里希的军队就侵入了当时还属于奥地利帝国一部分的西里西亚，公然挑衅女皇已经得到实际认可的皇帝继承人地位。[③] 在德国这片广阔的新教徒的土地上，奥普之间曾经有 3 次令人震惊而且一次比一次血腥的战争。第一场战争的序幕即由此揭开。战斗大部分在西里西亚进行，战火波及萨克森、梅克伦堡、波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于是，西里西亚战争变成了欧洲事件。

---

①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209, 217—221, 225—226.

② Ibid., pp. 227, 229—230; Straubel, "Frederick II", pp. 316—317.

③ 关于玛丽亚的生平，见：Ingrid Mittenzwei, "Köngigin Maria Theresia", in Straubel et al., *Kaiser König Kardinal*, pp. 325—338.

普鲁士起初采用“灵巧战争”的方式夺取敌人的领土，集中普鲁士的兵力对敌方战线的一个环节发起进攻，而这种分散战略可以追溯到日耳曼部落时期。[①] 1741 年，普军与奥军在莫尔维茨发生激战，弗里德里希即采用了这一战略。这是他的第一场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为人所称道和记忆的不是国王的军事才能，而是这场战役使德意志两个大邦开始了竞争角逐的历程，这种角逐最终以 125 年之后的柯尼希格莱茨（现捷克共和国的赫拉德茨—克拉洛韦）战役宣告结束。最初，弗里德里希作为战争新手犯了排兵布阵的错误，失去了指挥权，大将军库尔特·冯·什未林承担起了这一职务，最终扭转战局取得胜利，成为了这场战役的英雄。随着普鲁士士兵将宗教信仰自由的宣告张贴在教堂门上，弗里德里希这位空挂着指挥官头衔的信奉加尔文教的君王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后宗教时代，他承诺一视同仁地保护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138

1742 年，弗里德里希与法国、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组成的联军在科图西茨交战，他再次失去了对战场的控制权，然而却又一次击败了奥地利，从而使他实际上控制了西里西亚。在这次胜利之后，他用“普鲁士国王”取代了他父亲时代表示统治区域小一些的所谓“在普鲁士的国王”。在第二次相对短暂的西里西亚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又在霍亨弗里德贝格和索尔战役中取得胜利，国王凯旋之后被欢呼的人群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经过 5 年断断续续的征战，普鲁士的领土增加了一半，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②] 欧洲大国的行列现在增添了一名新成员。

经年的征战掏空了普鲁士的国库，弗里德里希通过对新兼并的地区进行掠夺和增加原有土地上的税收来充实国库收入。国王自身也缴

---

① 参见第一章；Woodfine, *Frederick the Great*, p. 14. MacDonogh 认为，西里西亚战争是闪电战传统的开端。*Frederick the Great*, pp. 152—153。

②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pp. 84, 89—94, 117—119;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55—158, 174—176;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40; Woodfine,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2—13.

税，这一点在新近介绍他早期所写有关马基雅维里的论文时得到清楚的反映。当时他认为，统治者不能求得人民的奉献，会比败在敌人之手还要糟糕。这是他对取得西里西亚战争胜利所付出的军事和民事的代价的承认。到1745年时，经验丰富的国王已经认可了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他相信，一名成功的统治者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取得胜利。

18世纪的统治者们践行不带感情色彩的现实政策，但是，在20 139 世纪以前，很难找到一位德国诸侯或国王认为自己的统治完全是专断、庸俗和玩世不恭的。虽然经过了战争的磨炼，在1746年时，弗里德里希对于善良与公正的社会的期待与在1739年时一样，依然充满光明，这些促使继续将之付诸笔端：

> 国君是国家的第一公仆（这是其责任所在），以报偿服务和美德，在富者与穷人之间建立平衡，慰藉各行各业中之不幸，在国家机构的各个方面培育宽宏大量。①

然而，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场西里西亚战争，即所谓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这种充满王家气度的高贵理想主义和明智遭遇了最严重的考验。在16次单调的连续性大型战役中，既有令人震惊的失败，也有付出惨重代价而获得的胜利，还有一些奇迹般的逃奔或胜利。在这些战役中，普鲁士虽然取得了半数的胜利，但每场战役都几乎有重大的人员伤亡。在最后一轮攻坚战役中，受到英国支持的普鲁士面对着似乎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奥地利、法国和沙俄的联军，它们决定将西里西亚归还给哈布斯堡并遏制普鲁士在其他方向的扩张。弗里德里希发现自己的国家很容易受到这3个国家的包围和袭击，也许他记起了父亲在他幼年时期反复对他说的话，表现出一种被“被暴

---

① Frederick's *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 (*1746*), cited by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96—197. “A monarch is not raised to his lofty rank…to grow fat on the people's substance and enjoy himself while everyone else suffers; the monarchy is the first servant of the state.” Cited by Woodfine, *Frederick the Great*. p. 19.

徒包围……”的恐惧感。[①] 在这次新的战争进程中，俄国人两度占领柏林，并伙同瑞典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和诺伊马克，法国占领了明登和克莱沃，奥地利则重新占领了西里西亚。

弗里德里希仿效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做法，将萨克森作为缓冲和集结待命的地区，在战略上对抗反普联盟。在一年之内，1757 年的科林战役使普鲁士遭到第一次大败。就士兵的伤亡比例而言，这是西里西亚战争中普鲁士最惨重的失败，损失了 9 428 名士兵、281 名军官、22 面团旗和 45 门大炮。[②] 同一年，普鲁士军队在罗斯巴赫战役中以 2∶ 1 的优势兵力，在洛伊藤战役中以 6∶ 4 的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当时的人们认为，罗斯巴赫战役是普鲁士取得的最大胜利，与此同时，在洛伊藤战斗中，所有奥地利士兵要么战死，要么被俘。措恩多夫战役的胜利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在这场战役中，俄军死亡 18 000 人，普军阵亡 13 000 人。紧接着，在 1758—1759 年的 3 场战役中，普鲁士遭到惨重失败。在霍赫基尔希战役中，弗里德里希的军队阵亡人数达三分之一；在库纳尔斯多夫战役中，普军 48 000 人估计仅存 3 000 人；马克西姆战役中，普军的伤亡人数比例仅次于科林战役。在德国军事史上，这是一个最低点。后来，在 1945 年，当第三帝国面对彻底的军事失败时，希特勒就曾提到过这一时刻。这位元首在他的骨干成员会议上挥动着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剪报，声称美国总统的去世是 1763 年“勃兰登堡家族”奇迹重现的预兆。正是在这一年，由于联军的变化，弗里德里希获得了完全的胜利。[③]

140

西里西亚战争除了夺走数以万计的士兵的生命之外，还造成了大约 50 万平民的死亡，相当于战前普鲁士人口的十分之一。1763 年战争结束时，普鲁士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依靠从垃圾

---

① Cited by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 247;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29—131.

② Simon Millar, *Kolin 1757: Frederick the Great's First Defeat* (Oxford, 2001), p. 41.

③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Memoirs*,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1969), pp. 453, 463.

中捡拾腐食为生。这种灾难让弗里德里希极为震惊，以至于他将负责统计战争损坏的部门负责官员投入了监狱。①

六、现代型国家

从长远看来，普鲁士人流的血和损失的财富并没有白白浪费。普鲁士已经成了欧洲强国并将保持其欧洲大国的地位。在弗里德里希统治初期，他面对挑战的反应，总是不断地建设与重建，这是战争结束之后数个月内他的政府开始要做的事情。他的统治被称为“开明专制”，因为这种统治既保持分明的等级和强大的武力保障，又能保持时代的乐观与进取精神。在他统治的46年中，他创立了特殊的政府机构，负责经济战略发展，这一首创有助于把柏林打造成为不朽的欧洲文化之都。国王给予民众足够的新闻自由，这也为他死后赢得了“新闻无限自由的提倡者”的称号。②

141 另一项巨大的进步是普鲁士法典的编纂。该工程从1780年开始，严谨不苟，到1793—1794年才完成。而此时弗里德里希已经去世。而这一时期，法国呈献给欧洲的是新一轮的无政府状态、去基督教化、弑君和以“恐怖统治”著称的内战。法国大革命没有兑现它的诺言。正是在它的迅速蜕化变质的影响下，德国的法律编纂者完成了普鲁士总法典，即《普遍国家法令》（Allgemeine Landrecht）的最后定稿，并于1794年出版发行。《普遍国家法令》比观察家们事先所期盼的要保守一些。不过，从那个时代来看，它还是一种进步。法典只允许对一小部分政治罪犯执行死刑，而以政治理由处以死刑在其他邦国是很普遍的。与此同时，法典禁止用酷刑折磨、随意逮捕和对情节轻微的罪犯执行死刑。而这些到近代法国一直存在。

弗里德里希的国民改革目标在于解决当时的家庭生活所造成的社

---

①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55—58;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260—266, 282—283, 286—289, 316—318.

② Straubel, “Friedrich II”, p, 318.

会问题，尤其是私生子和孤儿的抚养问题。[①] 接受教育成了全民的强制性义务；国王还鼓励宗教多元化，对基督教的教义也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末期，新型的中等阶级和市民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于德国的知识分子竟然认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一种迟到的追赶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努力。[②]

尽管弗里德里希进行了诸种改革，但他处理国内事务时最终并不像在战争中那样彻底和赏罚分明。上层阶级依然在公共职位的任命方面受到青睐。国王在他的王家领地上废除了农奴制，但他并没有对土地贵族地产中继续使用农奴提出异议，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让步妥协，很明显是国王对这些贵族在战争年代提供的至关重要的支持和服务的回报。弗里德里希对待普鲁士犹太人的态度是不变的。他认为，犹太商人在大城市中与基督徒相比占据了不公正的优势，因此，这位自身并不信仰宗教、能够容忍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并要求他们彼此相互接纳的国王把大量的犹太人从普鲁士的城市疏散到了边境地带。[③]

七、真正的音乐家

有关弗里德里希的最新传记将他描述成了一个左右为难的统治者：一方面，他醉心于君主的专制；另一方面，他关爱个体的权利与尊严。国王一生钦佩约翰·洛克以及美国民主的发展，在他最后所颁布的一份官方法令中，就曾提到美国是18世纪最令他佩服的国家。[④] 142

弗里德里希身上的专制与自由主义理念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了18世纪政治观念的演变和发展。与美国、法国、英国的政府体制相比，弗里德里希的统治体制突出了它更为保守的选择，它包含了德意志古

---

① Nicholas Boyle, *Goethe : The Poet and the Age , II : Revolution and Renunciation (1790—1803)* (Oxford, 2000), pp. 26—27;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 pp. 145—46; Straibe, "Friedrich II," pp. 316—318.

② 参见138页注②。

③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 pp. 160, 164—166;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342—344, 347.

④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599, 601, 614, 616.

老的平衡统治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权威、秩序是对自由、平等的一种补充，也是一种保护。统治者对个体的权威并不是因为他是至高无上或绝对的，而是因为他代表并强制实施一种在市民社会内部保证个人自由的秩序。①

在这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可以与同时代的另一个人做一个比较，这个人在另一领域具备统治地位，同时也竭力倡导另一古老的传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747 年，他来到波茨坦看望他的儿子、在弗里德里希宫廷里当大键琴演奏者的卡尔。在获悉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将现身波茨坦后，弗里德里希盛情邀请老巴赫与他会面，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尴尬的会面。弗里德里希要求这位萨克森的宫廷作曲家尝试演奏这位国王极为喜爱的音乐，而巴赫只是勉强而为。弗里德里希还请求巴赫即兴创作赋格曲，但巴赫却在两个月后才满足了这一要求。他从莱比锡向弗里德里希呈献了《音乐的祭献》。

这次会面令两人都感到不舒服，这是可以事先料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国王，也在音乐上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他更喜欢轻柔的洛可可风格的音乐。18 世纪末，奥地利音乐家海顿和莫扎特曾让这种音乐风格广为流传。而巴赫则喜欢传统143 的、教会的巴洛克式风格的音乐。② 其二，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人中，一个（巴赫）受古老的德意志传统的处事原则的影响，喜欢按部就班的做事风格，而另一个（弗里德里希）则喜欢尝试新事物，喜欢挑战自我。因此，他们不仅在音乐风格上各有所好，而且政治和哲学上见解也各不相同。这种冲突在弗里德里希相对谨慎的带动下，在 19 世纪的德意志达到了极致。

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都奉行世界主义，在各自的领域奉行折衷主义，在欧洲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十字路口，两人既受到生活的赐福又受到生活的诅咒。身处无忧宫的哲学家国王是一个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兼容并

---

① 见 117 页注①。

② MacDonogh, *Frederick the Great*, pp. 198—199; Gagliardo, *Germany*, pp. 211—216.

蓄者，期望他的王国能跟上潮流和时尚，即要法国化。巴赫这位萨克森的音乐家是善于借鉴之人，就如同18世纪后半期的亨德尔、海顿和莫扎特的做法一样，他娴熟地掌握了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模式并对之进行改进，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曲目。甚至在音乐风格上，一般也认为，德国那个时代的古典音乐也是起源于更古老的波希米亚的曲调。①

从1723年至1750年去世为止，巴赫在莱比锡为城市的各个教堂创作合唱曲。② 他的资助者希望他的音乐能反映出神学与政治的真谛，真实、恰当地表达和提升路德教的教义。作为雇用他的前提条件，他还被要求忠恪16世纪的协和信条，这是指在纯正路德派（保守派）和菲利普派（自由派）之间文化论战结束之后，重新界定的路德教信条。作为一个虔敬的路德教徒，巴赫把高深的神学知识和忠诚的政治意志与他充满责任的心捆绑在了一起。由此创作出的作品大约有300首合唱曲，它们是200年的主流宗教信仰和民族的信仰的综合表达。

然而，这些音乐作品不是启蒙音乐，尤其不是法国人的启蒙音乐。巴赫的作品能够熠熠生辉、长久不衰的原因在于，他的作品是人类对于超然存在和庄严崇高的渴望，是这种渴望的音乐与情感的宣泄，不过人类根本无法拥有或掌握它们。相比之下，新的启蒙信仰，特别是 144 当它在19世纪表达出来时，却相信人类有解开历史之谜的能力，不仅嘲笑而且戏弄诸神。如果说堕落前的亚当和夏娃是启蒙运动的原型，纯正的理性之光是它的工具，那么，自古以来一直驱动着各种现代化运动的雄心在此时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雄伟的顶点。与之相比，巴赫的音乐却重申了现实的辩证特征以及人们心灵深处的两极性，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极其神秘和复杂，超越了整个人类的智慧。

巴赫通过音乐来传达上述思想。他将坚定不移和战无不胜的主题运用于不断变换的和音和不谐和音中，重复性地破坏与重构了听众希

---

① Pamela M. Potter,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Music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End of Hitler's Reich* (New Haven, 1998), pp. 201—202.

② Ulrich Siegele, "*Bach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Electoral Saxony*", in John But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ach* (Cambridge, England, 1997), pp. 17—34.

望建立的听觉堡垒。在音律的跌宕起伏中，变化与统一、混乱与秩序相互依存，同时它们之间又互相竞争。和谐在不断地受到破坏和重建，这一过程让听众拥有一种断断续续的愉悦感，但并非最后的或无忧虑的和谐之感。这种感觉也正是当时的路德教训诫中将法律与信仰并置于一起的目的，即统一只存在于分裂之中，正义仅寓于罪恶里面。[1]与此极为相似的是，在德国相同的主流传统中，歌德也曾谨慎地提醒人们，不论启蒙运动多么美好，它不会“长此下去”。[2]

① 参见 John Butt, “Bach’ s Metaphysics of Music”, in ibid., pp. 46—59, and “Bach and the Rationalist Philosophy of Wolff, Leibnitz, and Spinoza”, in ibid., pp. 60—71.

② 参见第六章。

第三编

启蒙运动反对革命　德意志新时代

第六章　特洛伊木马：从法国革命到德意志革命

147　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相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的宫廷以及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的统治者所采取的应对革命的开明举措要显得谨慎一些。在美国和法国，暴政被推翻，公民拥有新的自由，新的政府建立于全新的基础上。在民族统一方面，当历史即将迈向19世纪的时候，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跨地区的议会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保障在此时的德国仍面临着扑朔迷离的前景。[①]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人给德国人树立了自由社会的榜样，强烈驱动着德国人对自由社会的渴望。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人就曾试图援助德国人，使其免于后来的皇帝、1634年诺尔德林根战役的刽子手之一的匈牙利的斐迪南的统治，自此之后，法国人却将灾难带给了德国人。[②] 而今，法国人又一次以解放者的形象越过了莱茵河。148　而这一次，却孕育着划时代的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到来，承载着将德国人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使命。

---

① Diether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Medieval Empire to the Present*, trans, Bruce Little (Oxford, 1988), pp. 34—37.

② Parker, *The Thirty Years' War*, pp. 126 ff, 137.

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唯有其15世纪、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能与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相媲美。这两场运动成功地使德国在语言、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脱离了意大利教皇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革命中的法国政府在实施寺院土地世俗化、制定宗教法令以及将对学校和婚姻的控制权从教会转移到国家手中的变革时，其手段如同早期德国进行的宗教改革一样，但其变革更加激进。新的世俗化的法律确保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根据业绩而非出身考虑就业与职业提升的优先权。① 尽管当时的德国知识精英们认为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的底蕴相比较未免流于肤浅，矫揉造作，但德国人很清楚，他们应该奋勇直追。②

一、启蒙运动的冲突模式

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文明进程中最绚丽的光环。处于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激流影响中的德国人，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是选择融入这个全新的世界，或是紧守逝去的岁月，还是寻求一条中间的发展道路？在上下求索的思索中，德国人并非踽踽独行。欧洲大陆上，从瑞典到意大利、从英格兰到俄罗斯，每一个欧洲大国最终都相继经历了各自的启蒙运动，与法国的脚步如影随形。在启蒙运动席卷的国度，人自身的尺度得以提升，人们对思想自由的期待、避免政治暴君、寻求社会公正的期望等变成了现实。从此以后，穿越人类理智的疆土，激扬分别是非的智慧，成为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

启蒙运动发轫于英格兰和法国。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启蒙思想家勾勒出了可验证的法则驾驭下的自然界。这是一座极具抽象的假设和历 149

①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71;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39—40.

②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pp. 372; 见139页注③。

史法则的殿堂，用伏尔泰的话说[①]，就是“精确分析自然界的事物”，并以此为准则探究上帝和自然世界的真实面目。康德曾为这种源于传统的特别是宗教权威的新自由奋笔疾书：

> 启蒙就是人摆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就是在没有他人引导的情况下无法施展其自身的知性。如果这种不成熟不是由于缺乏知性，而是由于缺少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人自己造成的，要敢于知道，要有勇气施展你本人的知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格言。[②]

卢梭的思想为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镌刻着时代的光辉，就其原创性的思想对于法国启蒙运动以及大革命的影响而言，同时代的思想大家无人能出其右。“世间万物源于造物主之手，其性本善”，卢梭在其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中如此宣称，“但一经人手，一切就变坏了”。人类从初始的自然属性进入到文明状态，其善良、自尊自爱的本性也由此而退化成虚情假意、背叛自我的状态。[③]卢梭用夸张的言语将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们的善良本性呈现出来，而开化的文明却无可争辩地磨灭了人性的善良。基于卢梭的哲理，社会方方面面的革命便有了行动的准则。[④]

18 世纪最后的 10 年中，法国相继涌现出一批政治家，包括皮埃尔—雅克·布里索、乔治·丹东、让—保罗·马拉、马克西米里安·

---

① 引自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Princeton, 1951）, p. 12。另参见：Norman Hampson,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 *in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ed. Roy Porter and M. Teich（Cambridge, 1981）, pp. 41—42; H. R. Trevor-Roper”,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H. R. Trevor-Roper, *Religion ,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London, 1967）, pp. 193—236。

② 引自 Cassirer, *Enlightenment*, p. 163。

③ 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 or On education*, trans, Allan Bloom（New York, 1979）, bk. I, p. 37; Cassirer, *Enlightenment*, p. 156.

④ 关于下层革命，见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New York, 1996）。

罗伯斯庇尔以及路易·德·圣鞠斯特等，他们使处于启蒙思想浇灌中的法国出现了社会政治的电闪雷鸣。所有这些政治家都死于暴力：马拉在浴室中被刺死；布里索，这位吉伦特派的领导者在1793年被送上了断头台，其余的几位政治家也在1794年殒命。罗伯斯庇尔曾这样解读卢梭的看法，"如果人就此堕落，责任就在于这些邪恶的社会制度"。在巴士底狱风暴和法国国王以及皇后被处死4年之后，罗伯斯庇尔认为，法国不仅只是一个新生的国度，它更将承担起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的梦想"职责。[1] 150

德国的思想家们很早就为法国的启蒙思想所吸引，并为之充满热情。自18世纪中期以来，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也同时在德国掀起了启蒙运动，国王本人成了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性的人物。尽管弗里德里希大帝更多时候选择说法语，其法语水平高于德语，在无忧宫[2]的座上宾客中法国人更受青睐，但和同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一样，弗里德里希认为柏林曾给予法国的教诲如同巴黎给予德国人的启迪一般多。国王本人对伏尔泰的造访更强化了他的这种信念。在国王看来，伏尔泰无拘无束、轻率鲁莽，还厚颜无耻地宣称以其自治的思想挑战王权的统治，以个体的自由反对国王治下的国家的权威。

18世纪80年代，在一篇由柏林科学院发起的征文比赛获奖作品中，德国的选择初露端倪。征文比赛是由弗里德里希亲自发起的，但未及结果出炉他就逝世了。这一主题征文比赛盛况空前，吸引了前所未有的人参与其中。征文比赛辩论的主题是：欺骗人民是否有益？掌权者，不管是世俗的统治者或是宗教的领袖，是应该对其臣民启迪民

---

① Hampson认为要注意卢梭对布里索、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的影响。"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pp. 49, 51, 53. 有关德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时期的论述，请参见：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pp. 330—338, and Darrin M. McMahon, *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New York, 2001).

② 即波茨坦的无忧宫。无忧宫取名自法文Sanssouci（无忧），意指国王可在宫中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因坐落在沙丘之上，故又有"沙丘上的宫殿"之称。该宫由著名建筑师克诺伯尔斯道夫（Knobelsdorff）设计，外观模仿法国凡尔赛宫，并加入弗里德里希个人的爱好，是18世纪德国洛可可式建筑艺术的精华。——译者注

智还是简单地命令他们？掌权者是该信任下属去探究与他们自己相关的真理还是必须采取适当方法慢慢灌输？一部分征文作者认为给予人们理智和自由行动的权利比其他有待发掘的真理更为重要，而其他的人则纠缠于真理的阐明和强调对真理的尊崇。1789 年的巴士底狱风暴点燃了所有征文作者心中固有的疑虑，这正与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德国专制君主心中萦绕的问题相吻合：德国当局对大众进行启蒙开智的成功可能性有多大？这种启蒙有多大的风险？

与法国不同，德国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在当时并没有被“理性”这一新的上帝的名字弄得神魂颠倒，德国人也没有仔细考虑过以法国的方式追求启蒙会带来什么后果。[1] 柏林科学院征文比赛的最佳论文获奖由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平分秋色，这清楚地表明 1792 年的德国还没有变成当时的法国。对德国人而言，个体的启蒙（理性和自由）和主观的真理（更高的权威并服从于它）是恰到好处的共存方式，这也是德国社会的道德伦理信念使然。法国的启蒙运动、大革命以及其后对德国的占领都没有颠覆德国人的这种信念，半个世纪后德国自身的民主革命也未能将这一信念荡平。

151

吸引德国人关注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原因，在于后者所催生的自由解放的条款，它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铲除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基于工作者的能力和技术而不是社会阶层出身来决定其是否得到聘用和提升。这些权利和自由也曾是德国人在中世纪时一直抗争和改革的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柏林的酒吧和沙龙里争辩着一个问题，受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影响的法国人是否“力图建立一个基于完善的普鲁士原则的国家”。奥地利的知识精英们也在酒吧和沙龙中就法国人是否建立“基于完善的奥地利法则”的国家而争辩。[2]

两者对比之下，差异性显然大于相似性。普鲁士学派没有勇敢地

---

① Joachim Whaley, “The Protestant Enlightenment in Germany”, in Porter, *Enlightenment*, pp. 108—109.

②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71;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00—1866*, p. 372, Boyle, *Goethe*, p. 26.

正视处于“堕落社会”的未来公民，也不主张以法国式的革命方式反对“不合乎自然的政治权威”。德国的启蒙教育不是法国人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式的革命启蒙教育。① 其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公民在政府的管理下渐趋成熟，使个人囿于社会并支持既有的社会。

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威廉·冯·洪堡对于德国教育的贡献就如同谨小慎微的康德对于德国哲学的启迪开智之功绩一样。洪堡有关个体与国家权利的思考文章最先于1792年出版，虽然早在3个世纪之前新教改革的倡导者马丁·路德就曾发表过相似的文章，洪堡则注入了新意。马丁·路德曾警告当时的统治者，不要把他们的政治权威扩张到心灵和道德的隐私领域。② 洪堡捍卫个人成长和成熟的权利是德国国家开始形成公民意识的最初体现。容许年轻人自由地展现生命的精华，按照自然的属性成长。普鲁士国家的这一政策也有利于国家的利益，使得公民了解自我，忠于国家。因此，德国的个人自由，与法国不同，不是主要体现在公共领域，不是以对抗业已建立的政府为首要目标。 152

很多历史学家在比较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的不同模式后认为，德国的启蒙运动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治，是德国人在审美或是精神上所作的准备，而非有针对性的对现代政治生活的训练。③ 德国人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持更加肯定和积极的态度，他们拒绝在政治上采取法国式的暴力，而是更倾向于服从国王和国家的稳定。基于此，他们集体表现出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而宁愿选择专制的统治。在德国人看来，法国构建自由的过程威胁到了自由与权威、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

---

① Whaley, “The Protestant Enlightenment in Germany”, p. 111; Gagliardo, *Germany, Under the Old Regime*, p. 187。

② 洪堡1792年的文章的标题是：*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 Luther's 1523 Von welltlicber uberkeytt wie weytt man yhr gehorsam, schuldig sey*。

③ Thus Boyle, Goethe II, pp. 18—31, Sheehan 阅读这一时期有关自由的文章后认为，洪堡的思想“更接近于18世纪道德观念的改革而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因此，其思想与 Justus Möser、Adam Muller 以及 Edmund Burke 一样，他们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有助于德国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正统性，他们的思想反对法国的革命，倾向于德国国内的改革”。*German History, 1770—1866*, pp. 364—365, 368—370. 参见 Klaus Epstein,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Conservatism* (Princeton, 1966)。

从路德的“因信称义”到康德的“智慧之人”以及洪堡的“自然发展”之人，固执的德国人将自身束缚于君主的统治和自我牺牲的公众生活的理念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宗教信仰自由，深受哲学的启迪，蒙受社会的教育，有义务为邻居和国家服务。

德国人所赞赏的法国启蒙运动的举措，其他欧洲人都不以为然，心存恐惧，疑虑重重。曾经认为自由就是个人绝对政治权力的法国，最终与启蒙运动的旋律渐行渐远。

二、法国病症

153 1789年6月的法国，革命的国民制宪议会取代了旧政权的三级会议，德国和其他邻国一样都在驻足观望。在这场变革中，法国社会的第一、第二等级即教士和贵族，变成了人数众多的第三阶层的附庸，这一等级包括拥有财富的商业和专业技能的社会阶层，其中也包括很多政府官员。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勉强同意之下，新的政府管理机构得以形成，但投票权利不再按照社会等级阶层依次进行，而是依照不分阶级、每个阶层的代表在议会中平等投票的原则进行。当年7月，巴黎手工业者和商人掀起了巴士底狱风暴。8月，农奴制得以废除，《人权宣言》颁布实施，每一位法国人在生命、自由和财富方面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10月，武装起来的巴黎妇女加入到凡尔赛宫外的群众大军中，要求国王向革命者投降。

1790年夏天，法国国民会议下令废除商业行会。这一举动使德国人的疑虑得到证实，即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并非大革命的唯一目的，或者甚至远非其真实目标。对普通人群而言，新的平均主义代价非常昂贵。18世纪90年代[1]革命时期的法国，成了人们纷纷外迁、避之唯恐不及之地。7月，新政府通过没收教会的土地，以土地券的形式支付革命所产生的堆积如山的债务。“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2] 这一新命名的没

① Boyle, *Goethe II*, pp. 8—9.

②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教士要宣誓尽忠于国家。——译者注

收教会财产的法案，使得法国政府成为法国教会的实际掌控者，并减少了教士的数量，使他们转变为新型内政服务人员。这一法案使得早些时候加洛林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的国王对教会的掠夺行径相形见绌。它将天主教徒从启蒙运动中排挤出去，使之投身于反动统治者的怀抱，也由此埋下了日后教会和国家之间冲突的祸根。德国也曾演绎过这种冲突的历史，在德国统一以后的几十年间使德国人饱尝痛苦的滋味。①

革命不可能洞悉未来的发展，一场不知何去何从的革命最能让旁观者感觉到胆战心惊。法国的军队在靠近德国西部边界大规模集结的时候，对法国革命发展方向的关注让曾经相互充满敌意的普鲁士和奥地利这样两个竞争对手迅速结成了联盟。普鲁士显然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于是有意提升有组织、反君主政体的共和主义团体雅各宾派的影响，以此搅乱法国的政局，让法国靠近奥地利的南部和北部（今天的比利时）的地区不得安宁。后来，结盟的双方认识到这一策略极其愚蠢，于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新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二世达成了一项外交协议，于 1790 年缔结《赖兴巴赫协定》，同意共同铲除法国革命给两国君主制度带来的致命性影响。 154

其后，即 1790—1792 年的两年间，普奥两邦不断扩大其安全行动，接纳成群结队地从革命的法国迁徙过来的难民，张开怀抱欢迎那些在法国受到迫害的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教徒。普奥联盟还发出威胁，一旦法国王室处于危险之中就将入侵法国。到 1792 年，由于法国于莱茵河沿线集结军力，奥地利撕毁了业已存在 36 年的法奥互不侵犯条约。此后，普奥两个德意志大邦之间两年来在外交上的协调一致政策很快就被相互协防的条约所取代。②

---

① Williston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1959), pp. 521—522. The story of the Revolution is memorably told by Georges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R. R. palmer (Princeton, 1967); Keith M. Baker, et al.,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s. 1—3 (New York, 1987); and Patrice Higonnet, *Goodness Beyond Virtue: Facobin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98).

② Boyle, *Goethe II*, pp. 10—11.

并非每一位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最初一接触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时就心存喜爱。相关的著名事例表明，这种接触很多时候是很谨慎的。德国启蒙运动之父康德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接受，就是基于其摒弃了给予公民任何反叛既有合法政府的权力。律师尤斯图斯·默泽对此亦非常警觉，他警告说，“属于每个人的抽象的权力”的概念听起来似乎会促使人因只考虑自己而处于“危险的幻觉之中”，当然是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①] 歌德最初和拿破仑交往甚笃，拿破仑在巴黎对歌德的作品公开表达了很高的评价和敬意。然而，歌德并不希望德国模仿法国的所作所为。他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记录为法国的“动乱加剧时期”，与德国路德教的“平静沉思”的破坏作用作了尖锐的对比。[②] 对于歌德如此超然于革命的时代之外的态度，现代历史学家批评其是在“逃避权力之责任”。詹姆斯·J. 希恩斥责歌德道：“（歌德）认为激进的变革是冒险，其理想虚幻莫测，认为贫苦大众是一群薄情寡义的暴民。他更倾向于对一种治理得当、慈爱仁善的独裁政权采取政治上中立的态度，而保持中立……就等同于接受现状。”[③]

155

歌德倾向于“个人的甜美幸福”生活而不愿“介入政治权力”。基于此，法国军队就被歌德危言耸听般地解读为政治的权力试图控制世界的预先的警告。回顾德国走向联合的“悲惨历史”，歌德怀疑德国人在政治运动方面是否具备模仿法国人的智慧，他或许忧虑的是，德国人更善于帝国主义的那一套。[④] 他和黑格尔一道坚定地反对启蒙运动之后的浪漫虚无主义。浪漫虚无主义认为，在现实的背后存在一种充满着敌意而非善意的超常力量。[⑤]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也认识

---

①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214;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51; 参见：Schulze, *Germany*, p. 106. 有关德国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关系，另见 Jacques Droz, *L'Allemagne et la Revollution Francaise* (Paris, 1949).

② “Fränztum drängt in diesen verworrenen Tagen, wie ehemals! Luthertum es getan, ruhige Bildung zurüch.” 援引自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359.

③ Ibid., pp. 358—359, 358—386, 573—577.

④ Ibid, pp. 211, 384.

⑤ “Not God or nature, but a dark demonic force [was] behind phenomena.”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Chicago, 1994), pp. xvii, xix.

到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存在于革命年代的德国，而且“根深蒂固，挟裹着破坏的冲动……威胁着人类漫长的从蛮荒时代到文明状态的险象环生的进化历程”。[①] 对于其他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而言，法国革命的阴暗面只是在其演变为对内的残暴统治和对莱茵兰的虎视眈眈之时才变得清晰明了。

最终而言，即便法国的启蒙运动震撼了德国人的思想意识，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也不可能在德国社会出现。德国社会缺乏像法国大革命那种大规模革命的领军人物。德国社会还未孕育出革命所攻击的对象——商业上比较成功、拥有大量财富的有产阶级，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无套裤汉群体向富人以及特权阶层发起攻击。[②] 尽管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充满着自信，但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的创伤依然历历在目。很少有德国人会像法国人一样乐观地认为人类有能力超越自己。[③]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埃德蒙德·布尔克撰写的法国革命的手抄本在德国比在英国更为畅销。当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导者阅读布尔克的作品时，路德所称的诸侯的明镜——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就会在他们那博学的思绪中闪烁。像布尔克一样，路德也思考过当时的政治是否需要“一个路德”这样的不妥协的改革者，以便清除那种担心社会可能授权予“一位闵采尔”的思想，而正是这个闵采尔带来了一场灾难性的革命。同样，像布尔克一样，路德也曾经提醒他所处时代的革命者，历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改天换地的机遇，应该更加适度、更加执著地完善自己。“因为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内不可能再组建新的政府……而改变现存政权并非明智之举。因此，只能让那些有能力的 156

---

①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360—361.

② Boyle, *GoetbeII*, pp. 24, 2 6—27;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70—171;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215—220. 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这一名号源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不穿贵族男子盛行的紧身短套裤。

③ “Germans were skeptical of the French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ir confidence that the world could be set right by drafting the perfect constitution.” William Carr, *The Origins of the Wars of German Unification* (Lodon1991), p. 13.

人对其修修补补，对使用暴力者予以惩罚，给早已千疮百孔的政体打上绷带，涂抹膏药。"①

1. 法国老师

1792 年夏天至 1794 年夏天，大革命呈现出的不可抵挡的革新的需要使得欧洲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巴黎。诡计多端的雅各宾派和其充满斗志的革命同盟者无套裤汉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第二次革命的决议确定保留原来的乌托邦宪章的内容，结果导致街头大屠杀，国王和皇后相继被处决。伴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崛起和垮台，就是所谓的革命恐怖时期。

在法国国内，自由和启蒙运动的伟业被大屠杀和断头台的威慑钳制着；在国外，法国开始向北面和西面输出其革命的模式。1792 年 4 月，法国向奥地利及其懦弱胆怯的盟邦普鲁士宣战，大军挺进至德意志莱茵兰地区，"解放"了施佩耶尔、沃尔姆斯和美因茨等城市。然后向东挺进，开始了跨越欧洲的军事扩张，持续 20 年，最终止步于幅员辽阔、深不可测、寒冷刺骨的俄国。

157

最初几年，奥地利和普鲁士拥有的兵力还可以阻挡法军的攻击。然而，当时这两个邦国联合的努力出现了分歧。贪婪的两邦伙同沙俄瓜分波兰，战利品的瓜分大部分却对普鲁士有利，因而引起了两邦的争斗。奥皇弗朗西斯二世直到 1793 年 3 月才宣布对法国宣战。宣战之后，德意志各邦的军队根本无法和法军相抗衡，莱茵兰便成了法国启蒙运动和革命的新实验基地。

在莱茵兰，如同其征服的每一片土地一样，法国人移植其革命的模式：镇压当地贵族，废除农奴，在当地推行男性普选权，投票选举新的政府。为了安抚被其击败的德意志各大邦，法国人允许他们自由进出一些小邦。他们想出了一套有效的方式来巩固其在德国莱茵兰的

---

① *Expossition of Psalm 101* （1534），*Luther's Works*， vol. 13， p. 217. 有关布尔克（Burke）1790 年"对法国革命的反应"以及 1796 年的"弑君的和平的函件"，见：*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vol. 2（London， 1855），pp. 277—518，and vol. 5（London，1861），pp. 152—355，358—434；另见：Boyle，*Goethe II*， pp. 6，8—9。

管理并补选它的统治者。这种领土自治形式的开展，也磨灭了德意志的民族感情，泯灭了德意志人统一的愿望，为法国进一步侵占和掠夺德意志的土地提供了便利。然而，岁月也会证明，这块现代化的和更易管理的莱茵兰，在法国占领期间进行了巧妙的重构。一旦这里的德意志人要重回祖国的怀抱，他们对法国人的抵抗将更加容易。①

在与法国冲突的初始阶段，普鲁士决定从冲突中全身而退，从而使法国的控制得以加强。由于普鲁士担心雅各宾派抢夺其新占领的波兰土地，又缺少两面作战的实力，于是便以其控制的莱茵河地区西岸的领地与法国作交换，换取法国对德意志北方保持中立，并承诺将德意志莱茵河东岸的新领地的控制权（1795 年巴塞尔和约）给予普鲁士。通过这种方式，普鲁士从法国的大漩涡中抽身出来独立行事，换来了 10 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使之能够平定和巩固新占领的土地。

无论如何，普鲁士的行动都是背弃信义的举动，它为其他德意志邦国（1796 年，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也效而仿之）开创了一个有害的先例，使奥地利更加脆弱，从而加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② 158 在两年之内，迫于入侵者法国的淫威，奥地利相继放弃了莱茵河一带以及在比利时和伦巴第的领地，退缩到更接近它的帝国边界。像法普签订的《巴塞尔和约》一样，法奥在 1797 年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加强了普通的德国百姓对于地域认同感，把帝国变成了一个邦。③

1801 年，霍亨林顿战役的失败使奥地利遭受了第二次严重打击，被迫割让莱茵兰西部地区给法国。至此，法国在东部前线建成了一个防御体系和一条通达东欧的畅通路径。④ 其后，拿破仑作为这片土地的掌控者，迅速对莱茵兰地区进行了重新划分。这一举动羞辱了退位者却取悦了新主人。帝国议会接受了在巴黎拟定、签署于雷根斯堡的

---

① Boyle, *Goethe II*, pp. 14—16;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74;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40—41.

② Sheehan, German*History*, pp. 233, 239—240.

③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41;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77—178;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241.

④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243—246; Carr, *Origins*, p. 9.

"代表报告"，边界分界线的更改获得了官方的批准，同意法国巨人在占领期间对吞并的德国领土进行合并重组。1803年4月17日，皇帝弗兰西斯二世正式公布了这份报告。除了莱茵地区的3个教会邦国外，其他教会邦国一律世俗化；51个帝国城市中，有45个不复存在；一些较大的邦则吞并了帝国骑士的私有领地。南部和西部的112个小邦也永劫不复，其中的大部分被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吞并。自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以来至1800年法国入侵之初，德意志曾经涌现出多达300多个拥有主权的邦，到法国人离开之时，这些邦国被合并调整到了35个。[①]

2. 最后的稻草和最后的一击

普鲁士遵照与法国签订的中立协议保持中立，法国却打破了其与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的条约承诺，这迫使奥地利与俄国和英国结成新的同盟，试图最后一搏，以挽救帝国的生存。在新的法奥战争中，来自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联合部队与拿破仑的法军共同战斗，而此时的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依然保持中立，这就宣告了由哈布斯堡主导的帝国终于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走向覆灭。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斗，也许是拿破仑取得的最重大的一场胜利。在德意志诸邦中，唯有奥地利昔日的盟邦、沉默的普鲁士对受到沉重打击的奥地利不管不问。

159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正式解体。当年8月，弗朗西斯二世投降，随后拿破仑加冕称帝。拿破仑在废墟之上建立了莱茵联盟，它是法国和很快就会出现的东方敌国间的另一个缓冲区。这一新的联盟从最初的帝国时代的16个中等莱茵邦国，成长为39个邦国的联盟，它包括一些原来在旧帝国中与普鲁士、奥地利一道的邦国，还有丹麦所属的荷尔施泰因以及瑞典属地波美拉尼亚。

---

① Hughes counts forty, Schulze thirty.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78—181;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42; Schulze, *Germany*, pp. 97. Sheehan calls the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 "one of the greatest territorial rearrangements in all of European history". *German History*, p. 343.

法国占领期间，普鲁士苟且偷生，得以发展壮大，现在它却以最猛烈的方式力图唤醒所有德意志邦国的意识。1806 年 10 月，对南部垂涎已久的法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两场类似的战役中踏平了普鲁士。在普鲁士王国东部，法军占领了柯尼斯堡（现加里宁格勒）；在王国的西部，法军建立了一个新的邦国——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将普鲁士的西部、汉诺威以及其他 12 个小邦合并到这一王国中，由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出任国王。1807 年的战争解决方案最终只允许普鲁士保留其王国东部地区的领土（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普鲁士的人口数量被削减了一半，占领军法国士兵的数量与普鲁士士兵的数量比例达到了 4∶1。若非俄国沙皇要求将残缺不全的普鲁士作为俄国和法国之间的缓冲屏障，普鲁士就会被彻底消灭。[①] 这就是普鲁士在德意志其他邦国在与法国作战时保持中立所付出的代价。

随后的 6 年中，法国对被占领的德国领土进行了彻底的重建，特别是在莱茵兰地区。《拿破仑法典》鼓励建立相对开放的社会，构建更大的社会平等，赋予个人更多的权利（整个莱茵兰的农民都得到了解放），倡导自由贸易，实施宗教宽容政策。[②] 在法国的压力下，奥地利和普鲁士也被迫进行顺应时势的自由改革，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它们从法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普鲁士认识到，如果给予人民更多的土地，赋予人们更多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力，普鲁士人就会更加勇于牺牲，驱逐法国侵略者。普鲁士大臣卡尔·冯·楚·施泰因帝国男爵和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伯爵实施了革除官场陋习、解放农奴、扩大中等阶级等改革措施。此时的普鲁士军队只剩下 42 000 名士兵，为了挫败拿破仑试图消灭普鲁士军队的企图，必须要让士兵知道为了普鲁士、德意志的统一事业而战。同时，改革也给予底层人民更大的自立和自由，使得普鲁士人在能力、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不

160

① Martin Kitchen,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Cambridge. 2000), p. 152;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247—249, 359—361; Carr, *Origins*, p. 9.

② Carr, Origins, pp. 10—11.

断提升。①

激起领土问题上的憎恨一直是击败德意志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也是唤醒德意志民族情感的过程。在德国战败所郁积的灰烬中饱含着对法国的仇恨。莱茵兰的人民早在被占领初期就知道法国人不是为解放和教化他们，而是为统治和剥削他们而来的。与同时代的法国人和许多现代历史学家所描绘的莱茵兰人民欢迎法国入侵者相反，他们大部分人"看到他们自己的财产被掠夺和任意破坏，庄稼遭蹂躏，所有物资被强征，他们的马匹、马车还有人民被迫充军，教堂也被亵渎，牧师遭到迫害"。②

法国的改革加速了德意志被占领区的法律和管理的现代化。法国改变的事物越多，德意志人越希望维持原状，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尤其如此。这种反弹更多的是源于德意志人在法国占领军统治下的个人遭遇，而不是源于改革自身。对德意志人而言，改革既不是完全的新生事物，也不触及他们的禁忌。然而，在德意志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传统背后，法国占领军自身就是最大的敌人。如果说法国占领军在给德意志人进行启蒙培育，整合他们的土地，催生了整套的政治制度，刺激了工业发展，他们却也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强征德意志人入伍为法军效力。新的贸易壁垒将先前国际化的德意志经济集中转向法国市场。除了征缴新税，奥地利和普鲁士还必须赔付战争赔款，应对法国军队的大规模征兵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驻扎在这片土地上的法国士兵和高级军官在与德意志人的频繁接触中，将自己看成是德意志人的领主和老师，蔑视德意志的本土文化和宗教。③

161

长远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和暂时性的障碍同时存在。如果德意志人

① Schulze, Germany, pp. 103—104;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303 - 311, 421—422.

②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 (Oxford, 1983), pp. 13, 16.

③ Hughes,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83—188;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42—44; Schulze, *Germany*, pp. 102—104; Kitchen, *Germany*, pp. 154—157; Carr, *Origins*, pp. 21—23;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255, 273.

对于法国式革命在哲学的理念和社会学的思考方面还准备不足，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也不会去追求那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和乌托邦式目标的改革。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法国将国王和皇后处以死刑、革命派审判官粗暴的量刑判决等，都意味着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已朝混乱的方向发展，充满杀气。德国社会不同的政治阶层都在试图让拿破仑的专制主义走投无路，难以为继。[①] 历史上，德国人曾依靠政治上的认同和效忠而走在了一起，不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村民或市镇居民，他们都是某个独特的领地或邦国的臣民，也是跨地区的帝国的子民。

德国的教育和职业课程培训也对德意志民族远离法国革命模式起到了引导作用。从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和人文主义者对当时的诸侯和选帝侯提出忠告，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学者、公职人员，还有后来魏玛共和国内阁专业人员的更替，德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们一方面挑战业已建立的社会体制，另一方面又对之进行捍卫。[②] 德国社会更倾向于谨慎而又能控制的改变，崇尚有秩序地发展进步，也即一个自由与保守共存的社会。

法国军队的傲慢无礼、传统和惯性的内在的压力等，使得法国在德国占领区业已取得成功的启蒙运动和革命受到理所当然的限制。所有这些在告诉德国人，《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并非医治遭受病痛折磨的德意志人民的灵丹妙药。如果德意志人民大踏步向前迈进，他们就无需法国人的更多教导。1813 年之后，德意志人所真正需要的是自由，自由能让德意志人站稳脚跟，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进程。 162

三、德国崛起

德国人对法国开始了另一轮挑战，复兴的奥地利第一个参战却被

---

① 参见：*Origins*，pp. 13—15；Sheehan，*German History*，p. 217.

② Carr 描绘了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的新兴职业阶级（Bildungsbürgertum），他们被赋予管理政府运作的大权，以此作为人们“反对陈腐的专制主义但又受到尊敬的君主统治以及他们所（缺乏）的无权无势和遭受社会剥削的苦难情怀……而对于后者，他们的法国同行却感受至深”。*Origins*，p. 15. But were not such men ever thus? 参见格奥尔格·斯帕拉廷的例子（第三章）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例子（第十章）。

打败。只剩下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处于进攻态势，培育着西班牙的叛乱。俄国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一时机，最终挑起拿破仑作出一个战争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军事决定：将他的大军推向俄国。为了这一任务，拿破仑募集了至少70万征俄大军，除法国本土人之外，大军总人数中有三分之一是德意志人。此外，意大利人、荷兰人和波兰人也被征召入伍。1812年9月，部队抵达莫斯科，这时才发现这座城市已经被焚毁并被遗弃。征俄大军于秋季开始撤出，俄国严寒的冬季提前到来，哥萨克骑兵则在背后袭击征俄大军。

1812年12月，普鲁士指挥官路德维希·冯约克感觉到机会来临。他带领部队与俄国人会合。在一场战斗中，普俄联军虽然失利，却让法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迫使法军不得不休战。惨重的伤亡代价也将拿破仑逼回谈判桌前，而奥地利却在这场谈判中为德意志人充当了诚实的掮客。[①] 谈判的失败为1813年莱比锡战役拉开了序幕。在这次战役中，奥地利和英国联合普鲁士、俄国和瑞典，击败了拿破仑的大军。虽然拿破仑撕毁了和平保证条约，再次挑起战争并且再遭失败，但正是莱比锡战役使他走上了不归路。

1. 复辟

1814年签订的巴黎和约让战败的法国退回到1792年的疆界，维也纳会议决定重绘欧洲各国的边界版图，几乎所有的疆界都恢复到了革命前各个国家的边界状态。根据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维也纳会议决定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允许其保留阿尔萨斯。在所有战胜国中，普鲁士获得的利益最大，原来失去的从莱茵兰直到威斯特伐利亚的领土都重新回到了普鲁士的怀抱。

163

战后的任务是重新恢复旧欧洲的秩序。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

---

① 日后，专横残暴的希特勒两次重演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愚蠢错误。第一次希特勒派遣德军长驱直入莫斯科（1941年12月），而后又包围了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是扼守南部、通往里海油田的战略门户。在斯大林格勒，德军第六军的30万士兵被包围，受命战斗至最后，惨遭杀戮，少有幸存者。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47—50, 309，参见第二章。

斯·冯·梅特涅充当了欧洲旧秩序的代言人。在经过 20 年的战争和 300 万人丧生之后，现在欧洲最恐惧最担心的是一个新的帝国强权再次崛起，能够发动像拿破仑战争一样规模的新战争。以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欧洲社会觉察到统一的德意志具备这种潜力，于是寻求一种暂时的解决之道，倡导建立德意志联盟，将奥地利、普鲁士纳入这个联盟之中。联盟包括 35 个邦和 4 个主要的自由市（不来梅、法兰克福、汉堡和吕贝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松弛的政治联盟，是业已废止的毫无威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联盟的立法议会设在法兰克福，奥地利代表主持联盟议会。奥地利已在东部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并不打算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并将自身融入其中。基于立法授权和严格的国际监督，这个联盟很少有机会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则更为困难。许多问题在采取行动之前需要得到成员邦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同意才能实施，有些决策甚至要求一致通过，这使得联盟最终陷入僵局而无法自拔。英国、丹麦以及荷兰的国王依靠他们对联盟中的一些属地拥有主权的头衔，也各怀鬼胎，参入到联盟的事务决策中来。[①]

梅特涅公爵公然为复辟的反动举措辩护。他宣称"从旧的社会结构过渡到新的社会结构"比"从新的社会结构退回到已被瓦解的旧社会形态"更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②] 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现状使它无法对邻国形成威胁，由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联盟构成的新三方德意志，似乎倒退回到了《凡尔登条约》之后分裂的法兰克帝国的局面，也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的境况一样。然而，这种感觉具有欺骗性，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现在都具备强大的力量，正孕育着针对其他重要国家的巨大仇恨，而普奥之间彼此的怨恨则甚至要更猛烈一些。解决这些交错的怨恨的结果是，它会把欧洲推向冲突的漩涡，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

164

---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51—54; Schulze, *Germany*, pp. 106—110;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403—405

② 引自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56—57。

2. 社会和家庭秩序

回归旧的地缘政治边界也意味着欧洲旧的社会结构和国内等级制度重获新生。到 19 世纪世纪中期，自由主义评论家使用“毕德麦耶尔”（Biedermeier）[1]（字面意思为，一个诚实、符合常规的管家）这样一个专业名词来描绘 19 世纪 20 年代之后复辟的欧洲的社会百态。这个术语内容朴实，形式简洁，成了不关心政治、注重内心世界、崇尚微不足道的中产阶级生活，以及远离贫瘠的土地和喧嚣的工业世界的生活理念的代名词。“毕德麦耶尔式家庭”的中心是知足常乐的家长，这些家长被刻画成淡漠生活、和蔼可亲、值得信任的“德国人米歇尔”的形象。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淡漠生活的形象表明，德国已不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淡漠的态度很容易被对手加以利用。[2] 然而，世纪之交的德国人却屡屡回头，渴望重回那被认为充满舒适和安宁气息的毕德麦耶尔时代。[3]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这类讽刺漫画显然将德国的部分历史放大了，而这些历史的片断并非是命中注定必然发生的。长久以来，彼此相依、温和谦良的家庭关系和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一直被描绘成德国人对待家庭和社会的理念。与 19 世纪之前或之后的德国社会相比较，这种理念在 19 世纪的德国或多或少是名副其实和贯彻始终的。[4] 19 世纪毕德麦耶尔式的生活理念盛行的历史时期，也是各种价值观念混合交错的时期。一方面，人们依然固守基于个人的出身和特权获得固定社会等级的理念；另一方面，时代也向社会的精英阶层和创业阶层敞开了怀

---

① 毕德麦耶尔（Biedermeier）原来是巴伐利亚诗人埃西·路德笔下的一个人物。他正直、快乐，热衷于音乐和艺术，沉湎于舒适的小家庭，不问政治。在梅特涅统治时期，德国人普遍逃避政治，沉醉在个人生活和艺术闲情中。因为太有代表性，这个虚构人物的名字就被后人用来形容维也纳和会以后至 1848 年革命前夕整个文化时代的特质。——译者注

② Kitchen, *Germany*, p. 168; Schulze, *Germany*, p. 113;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270; Veit Valentin, *1848 : Chapters of German History*, trans. E. T. Scheffauer (Hamden, Conn., 1965), pp. 428—429.

③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536.

④ Steven Ozment, *Flesh and Spirit : Family Lif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1999)，特别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五章。

抱。在19世纪，个人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日益成为在工厂车间衡量谁是德意志人的标准，这是改革时代有关教育和公民改革期望的推进和发展，并为普鲁士在18世纪末期的农业和军事改革[①]奠定了基础。

然而，旧的贵族依然拥有自身的手段，即土地、资金以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他们用这些手段来维护其对公众生活的掌控。即便遭受了失败而被迫解放了自己土地上的农民，这些贵族却因失去无偿的劳动力而获得了大笔的补偿。各阶层贵族为了阻挡社会中间阶层获得公务职位的升迁机会，人为设置了很多障碍，其中尤以任职于皇家法庭、政府部门和军队的贵族阶层为甚。当然，改革的阻力也会来自于那些从旧的贵族政治体系消亡中获得好处的人。野心勃勃、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也不能避免贵族特权的诱惑。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贵族支持社会改革，提升市民的地位。[②]

19世纪的德国社会更为开放，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更加频繁。1830—1840年间，中产阶级形成了自己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作为一个富有高度创造力的精英团体，他们的脱颖而出不是源于他们有关自由运动的平等言论，而是因为他们累积的财富所孕育的强大经济力量使然。然而，当被流放和失去工作成为对那些在复辟后数十年间的告密者的惩罚代价时，中产阶级由于与权力的中心太过于接近而开始束缚其自身的批判精神。尽管如此，公务人员对于改革者的请求和革命者恳切要求的事业不可能言听计从。[③] 公众呼吁要求给与新闻和结社更大的自由，司法体系不能对阶级和特权问题视而不见。这些问题都是公务人员要经常面对而无法回避的。

除公务员队伍之外，中产阶级的力量在知识阶层中也已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包括自由撰稿的作家、诗人、记者和编辑，自谋职业的律师

---

① 原文如此。普鲁士的农业和军事改革应该是在19世纪初。——译者注

② Wolfram Sieman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1849*, trans, C. Banerji (New York, 1998), pp. 15—16; Thomas Nipperdey, *German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Dublin, 1966), 224—226.

③ 有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见 Nipperdey, *Germany*, p. 227;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 20。

和医生等。这些专业人士都对一个更加开放和公正的社会抱有浓厚的兴趣。与置身于政府体制内部的中产阶层的公务人员不同，像海因里希·海涅和卡尔·马克思那样，这些专业人士可以肆意批评政府。作为政府 166 体制之外的人，这些中产阶层人士也为更低等级的阶层呼吁，更低等级的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物质上的安全保障。由于既受到下层工人阶级竞争的威胁又迫于自身等级从业人员数量飞速增长的压力，手工业者和商贩们摇摆不定地游走于趋向保守的社会和向往革命的两难抉择之间。在动荡不安的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受过些许教育的更低阶层的人们成了德国最具革命意愿的新生力量。①

四、迈向1848年革命

复辟之后的20年中，德国依旧保留着其自身的“1789年”式的特殊集会。德国的历史发展既受保守传统的束缚又受自由理念的驱使，在19世纪的欧洲，德国人是最能做到让社会政治的转换协调发展的。尽管维也纳会议试图扭转乾坤，然而太多的德国人都已见识了不断增加的机会和自由带来的福祉，而不再愿意安静地回归由首相梅特涅所设定的、等级森严的世界。如今德国人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对新旧社会调和的拿捏程度，德国人素有包容两者之能力。

1. 1817年的瓦特堡

位于图林根埃森纳赫的瓦特堡城堡，是路德将《新约全书》翻译成德文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这里也是现代的、泛德意志文化的发源地。拿破仑战争之后，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德意志民族集会就在这里举行。1817年10月18日至19日，德国人聚集在瓦特堡城堡庆祝德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三大事件：新教改革300年纪、新近成立的全德大学生协会运动以及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战役4周年纪。

167 德国大学生协会运动是新生代学生为反对法国对德国的占领、反

① Nipperdey, *Germany*, pp. 228—229, 231;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24—25, 34.

对维也纳会议企图阻止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作出的反应。这一组织主要吸纳富有理想的新教青年，决心要在一个自由、革新和统一的德国内将纯正的德国文化发扬光大。虽然他们歌声中也有法国的迭句，但他们的歌声充盈着德意志的曲调，用绚丽的诗篇编织着中世纪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德国历史。

加入大学生协会运动的学生数量相对较少，参加瓦特堡庆典的学生更少。尽管如此，他们却代表着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信念，其影响远远超出其成员的数量，而且他们忠心耿耿（许多人蓄着胡须，着装体现出早期德国人的风格）。[①] 在民族主义者中间，一些狂热者认同革命应由梅特涅首相领导。参加瓦特堡城堡集会的人们高举着印有莱比锡民族会战英雄阿道夫·冯·吕措夫男爵所率领的普鲁士军团的红、黑、黄三色旗帜游行。日后，这一旗帜也在另外三大民族大会上飘扬，它们是1848—1849年的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1918—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9年德国议会委员会。这便是现代德国民主的滥觞。[②]

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盲目狭隘的沙文主义。这个学生联盟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一切未受洗礼的犹太人排除在外，迫使他们自组团体。在瓦特堡庆祝大会上，一系列“外来”书籍都被焚烧，包括普鲁士治安法、《拿破仑法典》以及希伯来语著作等。[③] 在这一点上，3个世纪前的马丁·路德似乎成了这些新教大学生协会成员们的效仿对象。1522年12月，路德和他的弟子们在维滕贝格将教会法规、教皇的教令和宗教学术研究等书籍付之一炬，以此来抗议教皇和皇帝对宗教改革的谴责。

1819年，一名思想偏激的学生卡尔·桑德刺杀著名作家奥古斯

① 18%的在校大学生（8 000学生中的1 500名）参加了这次运动；486人参加了埃森纳赫的庆典（Eisenach Festival）。Carr, *Origins*, p. 25; Kitchen, *Germany*, p. 166;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406.

② "Why the Books of the pope…Were Burned", Luther's Works, vol. 31, pp. 383—395.

③ Mosse, *Crisis*, pp. 5, 191; Nipperdey, *German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pp. 244—245.

特·冯·科策布。这项刺杀行动给各邦诸侯提供了禁止大学生协会运动和关闭当地城市报纸的借口，此后，又有两家倾向于革命言论的媒体被关闭。1819年，在卡尔斯巴德（即现在的卡罗维发利）举行的会议上，各邦诸侯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领导下，强制实行新的镇压手段，相关法律一直维持到1848年。

168

学生们的首要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他们抒发政治抱负，慷慨激昂，率性而为。在维也纳会议以后的回归保守的暮气沉沉的年代里，大学生协会运动成了奋勇向前的生力军。1819年之后，由于受到诸侯暗地里的支持，这一运动以更加成熟和谨慎的面貌重新浮现在世人面前。[①]

2. 法国七月革命

1820—1830年间，对于德国自由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而言，暂时的蛰伏是其审时度势之后的最好选择。然而，在瑞士、意大利、波兰和法国，零星的抗议和起义使得民族自由运动既充满活力又陷入危机。特别是法国波旁王朝的覆灭，更使当时的各国政府越发气馁。1830年，自由派人士在一场未曾预料到的选举中获胜，国王查理十世力图颠覆选举结果，激起了自由派人士的强烈反弹，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舞台就此拉开序幕。查理十世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然镇压和对新选举结果的公然绞杀激起了中产阶级对王室君主政体的抨击，而这种抨击之声又将贫苦的法国人民带上了街头的抗争之路，最终导致2 000人丧生。这一冲突的结果是，法国议员中的自由派策划让国王退位并实施新的立宪君主政体。虽然天空飘扬着革命的三色旗，但新政府更偏爱中产阶级和中庸的政治道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起义的恐惧使得下层阶级如同对专横的国王那样心生厌恶。

法国七月革命犹如传染病毒一般在其他国家激起了众多抗议和预警防范。尽管柏林和维也纳在很大程度上对之置之不理，但在德国其他诸多邦国，警察和士兵却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德意志北部（不伦瑞

① Nipperdey, *Germany*, pp. 245—249;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407.

克、黑森—卡塞尔、汉诺威和萨克森）和南部（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当地的民主运动成为各类抗议活动的有力支持者。在立法院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国王和中产阶级再次发现，不管从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层面看，人民大众都具有巨大的力量。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忘却七月里的令人恐怖的日子。他们将这次教训牢牢记在了心中。在这些人之中，包括未来的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时年 15 岁。[①]

3. 青年德意志

一些有影响的德国团体在观察法国的革命斗争后，也准备将德国推向民主发展的方向。青年德意志运动要求为所有德国人民，包括妇女和犹太人，争取权利和自由，这种争取权利与自由的运动在其他国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之中，有著名诗人兼随笔大家海因里希·海涅，他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一位为七月革命大唱赞歌的支持者。他的旅行见闻演讲盛赞激进民主，并且受到广泛欢迎。他因此而于 1830 年被迫流亡法国。他并非唯一的一位在德国受到言论压制的人。有如 1817 年的德国大学生协会运动，青年德意志运动也于 1832 年在巴伐利亚帕拉蒂纳特的汉巴赫举行了煽动人心的城堡集会。大约有 30 000 人参与游行，狂欢的人群围绕着城堡的废墟逶迤而行，故被称做“早期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巅峰”。[②] 一年之后，再度出现的大学生协会运动成员突然袭击了位于法兰克福的政府军需仓库。

在几十年逐步升级的抗议和镇压对抗中，自由主义运动获得了实业巨头们默默的支持。就像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者所做的那样，这些实业巨头们的举动犹如一记记重拳，打在他们职业领域的大门上，唤起改革，促进进步。在 19 世纪中叶，煤气灯的出现让柏林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64—67;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604—607; Gall, *Bismarck*, I, pp. 6—7.

②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126—27;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581—584, 610—613.

变成了不夜城。第一辆客运火车连通了南部的纽伦堡和菲尔特，衔接了北部的柏林和汉堡。纺织和编织工厂在德国南部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第一艘蒸汽船也成功地跨过大西洋，从不莱梅驶向纽约。

170 贸易自由化对德国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1834 年之前，38 个关税区的存在迫使跨地区的贸易陷入绝境，并给依赖本地贸易和工业的新商贸造成了威胁。这些关税区就像一座座中世纪的城堡点缀在德国大地之上，它们公开实行“排他主义”，引发种种矛盾冲突。按照普鲁士最初的构想，1834 年创立的关税同盟将囊括和整合 2 300 万人口的各邦，但奥地利被不怀好意地排除在外。[①] 关税同盟的建立，使得加入这一同盟的德意志诸邦的经济得到迅速增长，成为受益于统一和自由贸易的永恒回忆。

五、1848—1849 年革命

到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大多数中产阶级领导人都已接受了具有开拓性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社会政治目标。对于革命者而言，在公开选举组建的政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掌控法庭的运作、控制行政事务和军事调配等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而这又牵涉到几项重要的权利：男性普选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工作自由和陪审团审理。

尽管各种抗议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但革命的基本困难和期望依旧清晰明了。在一份 19 世纪中期为移居外国的德国人准备的德—英生活指南中，这些诉求得到了最好的表达。这些移民于 1848 年前后相继离开自己的国家。移民指南由一位定居波士顿的德国移民牧师编辑而成。指南对新世界充满讴歌，对旧社会充满指责，声称移民者到达北美海岸是上帝的恩赐。然而，指南也直截了当地向自由和平等的新世界传达了旧世界的权威和秩序的信息。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62—63, 66, 96.

德国的移民……来到一个自由国度……没有专制……没有特权和专断……没有无法忍受的苛捐杂税，没有信仰和心灵的遏制。每个人都可以四处旅游……在任何他喜欢的地方定居。无需护照，没有警察干涉他的生活或阻碍他的行动…… 171

没有什么……比君主制的歧视更危险和邪恶的了。君主制度宣称，有些人生来就是王室贵族，而其他人却天生卑微，他们本身乃至于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无法改变。这些错误的观点应该被永远消除。人生来平等……在这里，忠诚和荣誉才是英雄的出处。富人和穷人平起平坐，学者并不比卑微的技工高人一等，没有德国人会为自己没有工作而羞愧……

在这里，财富和土地的占有并不等于政治权利的授予，土地所有者并不享有高于穷苦人民的权利。这里没有贵族，没有特权，没有常备军从肉体和道德上奴役人民，没有赋闲无事的官员坐享穷人的劳动果实。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代表着所谓与生俱来君权神授的诸侯王公和腐败的法庭。在这样的国度，一个人的才能、精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比在君主制社会中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

劳动者应得劳动报酬……我们强烈反对那些以违法手段试图强行占有权利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的要求被采纳，法律途径将是他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手段……言论和出版自由、普选权和不受限制的结社权利消除了一切违法暴力行径的托辞……人民是自己的支配者，是投票箱，是公正的法庭和立法议会，华盛顿庄严的国会大厦就是为公共社会福利进行无硝烟的博弈的……舞台。①

1846 年以后，农业危机和经济危机给革命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在整个德国境内，工人和学生占据整个街道要求政治改革，地方议会强迫统治者召开国家议会制定宪法。1848 年 3 月，这些联合起来的力量 172

① F. W. Bogen, *The German in America* (Boston, 1851), pp. 7, 39—41, 57, 61.

迫使首相梅特涅逃亡伦敦并将奥地利皇帝斐迪南驱逐出了维也纳。①

在柏林，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四世痛苦地目睹着鲜血浸染着王宫前的草坪。他在无可奈何和万般绝望中，决定对革命者的修宪要求作出妥协。他被囚禁在家中，看着他的政府被软弱无力的自由派所接管。迫于起义者的要求，威廉四世批准在五朔节期间选举新的国民议会。在这几个月中，未来的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他毅然决然地站在了王家成员一边。②

1848 年 5 月 18 日，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辩论议会与君主制之间的关系，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决定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员邦。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辩论一直持续到 1849 年 5 月，其后便在 6 月的斯图加特议会讨论中草草收尾。③ 参加议会辩论的代表来自德国的各个地区，他们是中产阶级社会在各个行业中的代表。尽管只有少数代表是由实际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指导纲要仍允许 649 名代表任职。开会期间的任何一次会议上，参加的代表人数都没有超过 450 名，只有一次会议例外。大多数代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职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超过 600 名代表拥有大学的各类学位，80% 的代表从事法律职业，所有的代表都被认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尽职尽责。④

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就可以给出为什么代表们时而无所畏惧时而优柔寡断的答案。除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对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的信仰之外，代表们个人的因素也掺杂其中，使其无法担当重任。就当时的情况看，少数特定阶级的代表少之又少。下层中产阶级几乎根本不受重视，代表中没有一名工人。当然，如果由崇尚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德意志人来主导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他们不会忘记普通大众的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这些都已被他们写入了法律之中。

---

①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82—85, 139.

② 参见第九章。

③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162;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706.

④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120—231; Schulze, *Germany*, p. 124.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宣称代表全体德意志人，其政治权威性高于其他任何成员邦。国民议会成了临时的权力中心或者说是正式的国民政府，有控制军队、指挥战争、缔结条约的权力。国民议会倾向于与临时的帝国摄政或行政人员合作，授权他们以联盟的名义指挥军队并向各成员邦委派大臣。尽管摄政拥有较高头衔和行政权力，他事实上只是新的立宪君主制政体的从属合作者。 173

起初，全德国民议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尽可能大的德意志联盟，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的领土，其领导者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摄政，即奥地利的约翰大公爵。在奥地利能够参与并领导"大德意志联盟"之前，国民议会要求奥地利将奥匈帝国[1]的非德语区的领土分割出去，但被奥地利拒绝。即便奥地利答应依此行事，成立大德意志联盟的障碍依然层出不穷。尽管国民议会承诺对德意志人提供大规模的保护，但对于拥有7 000万人口的联盟来说，这种保护显然是相当棘手的。国民议会最想建立的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德意志国家，以此削弱奥地利的突出地位。无论得到或是没有获得其非德语区的帝国的帮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导地位都意味着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将为争夺德意志霸权而继续进行对抗，这种对抗让近代德国演绎着分裂和灾难的历史。1849年3月，全德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选择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弗雷德里希·威廉四世领导下的面积更小但关系更为紧密的德国。[2]

由于有先前的德意志同盟和联盟，国民议会的成功有赖于其他欧洲列强的认可，因此，需徐徐而进，节制而为。欧洲各列强并不愿看到德国的统一及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强。只有美国承认全德国民议会是德国的官方政府。更令人泄气的是，德意志几大主要强权都保持沉默。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和汉诺威等，没有一个承认帝国宪 174

---

① 原文如此。这里应该是奥地利帝国。——译者注

②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79—80;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189—193. 关于施瓦岑贝格首相就此施加的压力，见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689, 715, 715.

法高于自己的宪法。[①] 德意志许多邦国的首脑都认为，法兰克福议会是一座巴别塔，而非能唤醒国家意识的号角。在一些较大的邦，相当多的民众支持拒绝国民议会凌驾于各邦权力之上的军事权力的要求。当新的国民政府准备起航时，汇集强大民意的各邦国使其注定成为只是一艘没有蒸汽动力的国家航船，它不可能从暗流汹涌的欧洲浑水中脱身，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在港口码头。1849 年春天，这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变成了事实。

1. 基本权利

1848 年 12 月，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把历经几十年的自由运动的成果写进了 14 条条款的《基本权利法案》中。随着农奴身份的废除，这些对人身、政治和财产权利的综合性保护条款被有些夸张地宣称为标志着"德意志中世纪的终结"。[②] 不仅中世纪时代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终结，近代农奴身份的废除也没有严格的原则，更非条款里所述的"废除"。贵族地主们因释放他们的农奴而获得数量相当可观的赔偿金，而农奴获得自由也没有什么收获，取而代之的新的阶级社会依然是像等级社会那样进行社会分层与惩罚。而德国人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试图逃脱这样的等级社会。繁荣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依旧要面对来自于社会底层或濒临社会底层的大批依附性劳动者和情绪低落的大众。正是他们为革命政治党派创造了新的机会。从术语的角度看，在 1848—1849 年间，"中世纪"并未在德意志的现实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消失，它只是转移到了城郊或城市中去了。[③]

随着法国启蒙运动和拿破仑革命的进行，基本权利立法已经从教堂（教会法规）和政府（世俗法规）的法律中分离出来。先贤们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尝试此举。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选举规定，允许公民像选择议会议员那样选举当地的教士。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宗

175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77;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127—130.

②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 132.

③ Nipperdey, *Germany*, p. 231. 解放的农民"换成了另外一种依赖性"。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756—757。

教改革中形成的世俗化宗教从来就没有考虑建立一个彻底脱离教会的国家。[①] 也不像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数百年前的统治者和教士们都认为他们各自的权力来自于神授，这使得世俗统治者和教会在世俗宗教的联合行动中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临时性的教会和国家间的相互敌对。

从长远的历史学角度来看，法兰克福议会使中世纪繁盛时期以来的一项争论被重新点燃，即保王党人认为应该让教会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在使早期国家与教会间对抗的现代化方面，1848—1849 年的革命为一场现代的文化战争拉开了舞台，这是一场罗马和柏林之间的文化战争，新教徒的怒火对抗着罗马人的愤怒。[②] 在这方面，与 19 世纪发生的众多事件一样，1848—1849 年革命与德国历史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它既未获得下层宗教信仰者对社会的认同，也未获得教会对国家权力的认同。从历史的观点来说，德国人偏好二元主义，也即在公民生活和宗教领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和合作。

为避免国内外激进的言论，《基本权利法案》通过加强对自由的教育来寻求建立一个开明先进的社会，那就是，通过扩大平等、增加机会，让尽可能多的德国人进入中等阶层。然而，这个明智之举却激怒了国王和公共舆论，因而未能预防 1848 年 5 月在柏林举行的一次特殊集会。根据宪法规定，普鲁士国王的第一项任务是，提议 19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者们万世流芳。也就是说，这些革命者作为“祖国的功臣”将永垂史册。尽管没有成功，但这个提议给了普鲁士国王错误的暗示。从被迫召集会议之日起，他就非常担心法兰克福的宪政集会。这些“四八年革命者们”意在改写历史以及法律吗?[③]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有足够的能力来拒绝接纳 176

---

①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 132; John Witte, Jr., “The Civic Seminary,” pp. 173 ff.

② Nipperdey, *Germany*, pp. 359—371, 383. 关于中世纪的状况，见：Brian Tierney, *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 (Toronto, 1988), pp. 172—210.

③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134, 137—138.

仅由国王个人所撰的宪法。会议期望普鲁士国王遵从宪法条例原稿，但未获成功。1848年12月，弗雷德里希·威廉解散了雄心勃勃的柏林议会并颁布了他钦定的宪法。他自认为有正当理由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因为国民议会宪法旨在使其被降级到从属受支配的地位。他发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提供的王冠带有“革命的淫荡味道”，因此他私底下藐视那如狗项圈般的王冠。1849年4月3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团将王冠授予他，对此他的反应是，要求就这件事对德意志帝国内的国王、选帝侯以及各自由城市进行询问。这只是一个口头暗示：他作为君主，忝列历史悠久、世纪相传的德意志统治者之列，其前辈都是直接从上帝手中获得他们的皇冠权位的。[1]

至此之后，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奥地利代表团于4月5日拂袖而去，5月14日普鲁士也紧随其后，抛下小部分左翼分子辗转至斯图加特延续希望之光，这些残余灰烬也最终在6月灰飞烟灭。尽管表示同情的历史学家们也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宪法中蕴涵着“革命过度”和“不可靠的民主”的因素，但现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已经发现了君主政体缺乏生机的弊病，而君主制度的权欲熏心也须对1849年德国民主制的失败负责。[2] 然而，这一观点却忽视了国民议会所设定的政治梦想给世俗的中产阶级、更加脆弱不堪的下层中等阶层和工人阶级带来的万分惊恐。在这进退繁复的几十年中，德国人并不想因穿梭于不确定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中而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置于危险之中。为了各种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充满光明的未来，1848—1849年革命使当时的德国人出现了分裂和政治化。

2. 向前跌倒

1849年6月18日，普鲁士士兵结束了在斯图加特苟延残喘的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在德国历史上，这次王权拒绝民主运动的行为

---

①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161;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196—98.

②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198; Facts, pp. 100—101; 参见：Kitchen, *Germany*, pp. 84, 185—187.

经常被拿来和镇压1525年伟大的农民起义相提并论，两者都是愚昧之举，试图扭转历史的车轮。① 然而，这种观点不足以对1848年之前德国历史的复杂性和进步性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1525年之后，温和的改革以及对农民遭受的苦难进行制度纠正的举措也时有发生。在许多地方，矛盾无法调和的什一税、劳役和死亡税被废除。小溪、森林、牧场和农田重新成为公共用地。农民的一些权利也得以恢复，如圈围庄稼和田野养狗——用来防范饲养的动物被其他动物捕食。② 更重要的是，每一方都重新意识了对方利益的临界点：对于农民而言，难以承受之重在于统治者的独断专行以及各种习惯权力和特权不受约束的恢复；对于王权而言，难以承受之重在于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乌托邦式的革命。

1848—1849年的德国经历着政治和社会结构重组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既受到国王的驱使又受到革命者的钳制，既寻求希望又反目对抗。这段历史承载着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也由此造成了国王们的逃跑和被捕，而议会和宪法则受到任意颠覆。如果说在以后的岁月中君主和贵族势力依旧强大，那么德国中产阶级的势力则更为强大，并因此而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机会和安全的渴望也在与日俱增。许多德意志邦依旧拥有自己的宪法，统治者和议会依据宪法而共同分享统治权。与1525年时的诸侯和农民起义者一样，冲突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哪些可以容忍，哪些无法容忍，这和1525年起义之后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异。③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激起了很多人的恐慌，却并未寻觅到一条平息恐慌和害怕的途径。大部分德国人欣慰地得知，他们国家并没有直接跳上带有实验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在回顾整个德国的历史时，欧洲列强再一次高兴地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依然遥不可及。

---

①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222—223.

② Blickle, *Die Revolution von 1525*, pp. 217—223, 242.

③ Schulze, *Germany*, p. 129; Siemann, *German Revolution*, pp. 210—220.

178　1848—1849年的历史对德意志未竟的民主事业而言并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却像是浮士德博士两个灵魂之间一长串的冲突的故事，那是德意志人心灵深处的自我冲突。[①] 就某种程度而言，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失败原因即在于此，而不是因为代表们过于学术化或充满哲学的思辨，也并非源于持反对态度的诸侯们让人失望的顽固守旧，或德意志人病态地遵循等级统治的观念。最终，王室贵族和中产阶级、保守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都成了国民议会的敌人。出于相同的原因，1848—1849年革命同早期的德意志改革或起义一样踌躇不前。同时代的人认为，革命没有处理好权威与自由、安全与平等以及基本权利的协调问题。国民议会曾力图在涉及德意志人民的最基本权利需求方面取得进步，它将因此名垂青史，并在日后各届议会恢复寻找德国式的混合政治机制时重新焕发生机。

① 参见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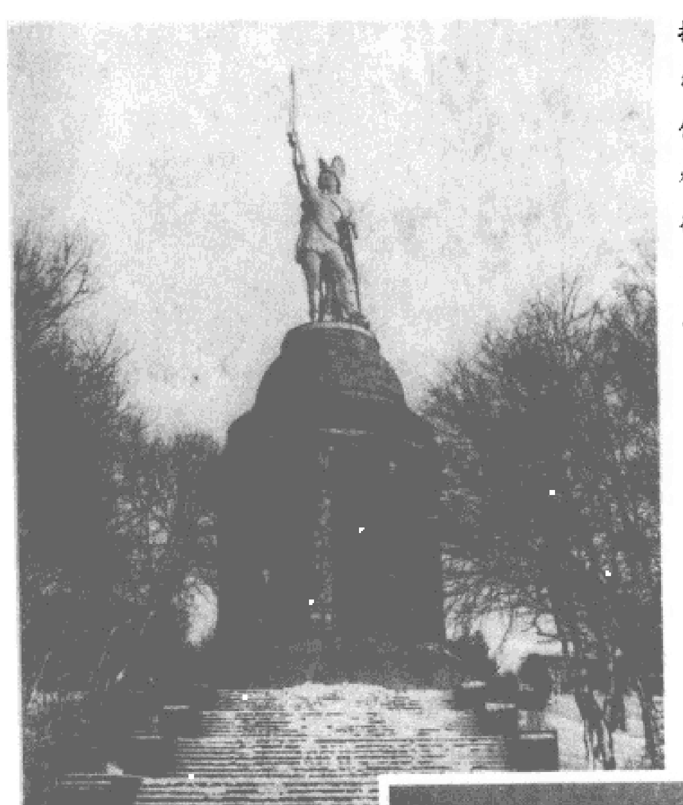


插图1　19世纪阿尔米纽纪念碑，位于托依托堡森林中的戴特莫尔德附近。（科隆大学考古学研究所/马丁·威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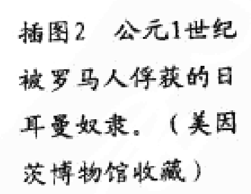


插图2　公元1世纪被罗马人俘获的日耳曼奴隶。（美因茨博物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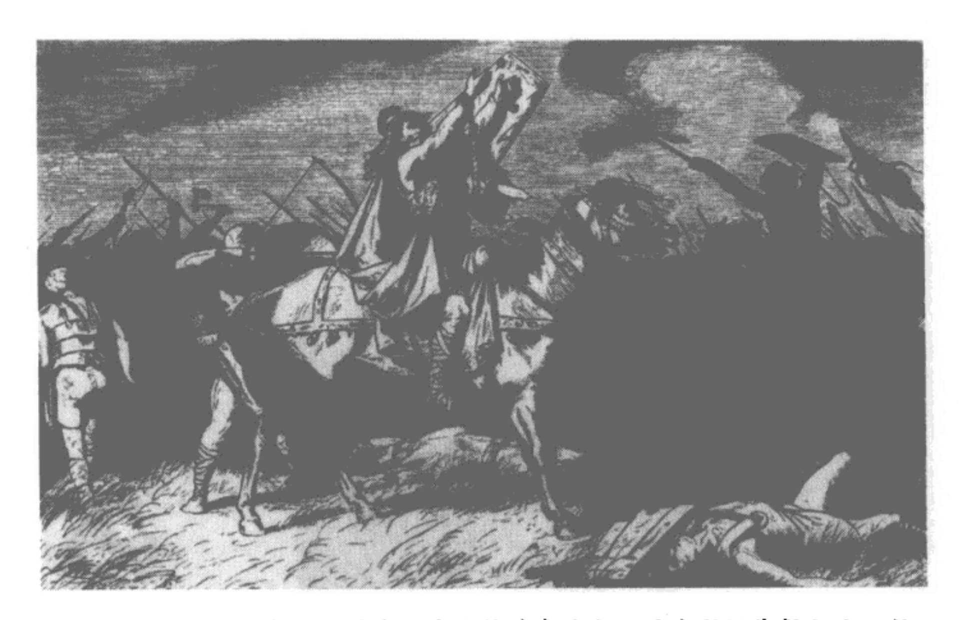


插图 3　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克洛维骑在马上，呼唤耶稣基督之名，祈祷战胜阿拉曼人。作为报答，克罗维允诺如果战斗胜利，他将成为一名受洗礼的基督教徒。(贝特曼图书馆/科比斯)



插图 4　汉斯·荷尔拜因绘制的马丁·路德肖像。画中的马丁·路德如同德意志的赫尔克利斯。他脚下躺着的是被处死的哲学家和学者，他们构建了中世纪教会的谬误教义。其中有亚里士多德、彼特·隆巴德、托马斯·阿奎那、威廉·奥卡姆、尼古拉斯赫雷拉，即将被处死的是雅科布·霍赫施特拉滕，而下一位是垂挂在路德牙齿下方的教皇。(苏黎世中央图书馆)



插图5 丢勒自画像，1500年，拟画耶稣像。（巴伐利亚国家绘画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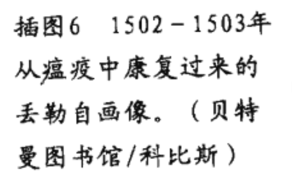


插图6 1502－1503年从瘟疫中康复过来的丢勒自画像。（贝特曼图书馆/科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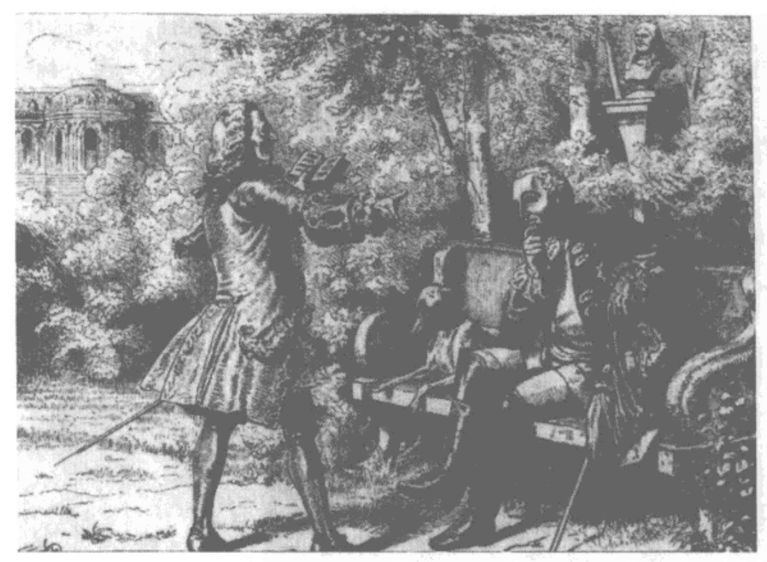


插图 7　伏尔泰在无忧宫花园启蒙弗里德里希大帝。（贝特曼图书馆/科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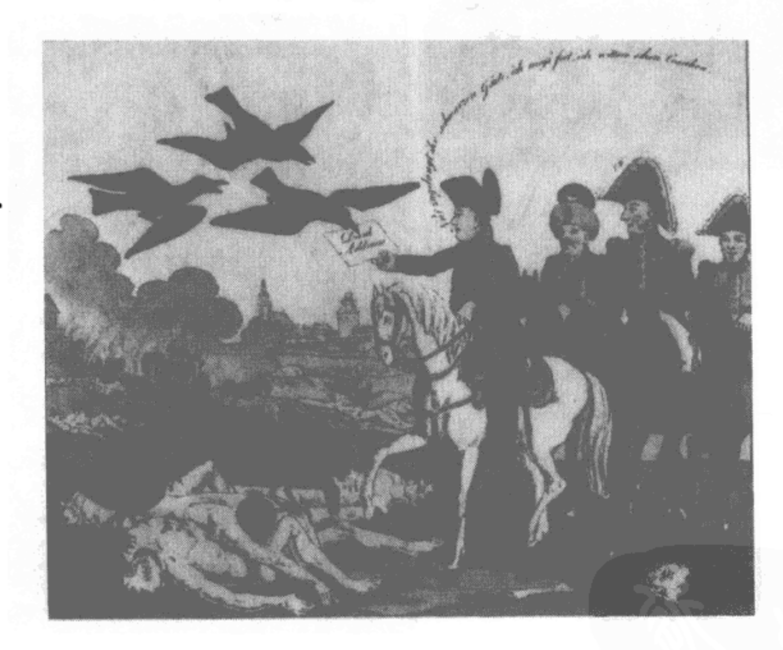


插图 8　1813 年卫国战争后，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骑马穿过莱比锡战场。人群中有一位埃及骑兵长，察看战场上牺牲的 37 000 名法国士兵的尸体。当拿破仑告诉乌鸦“失败了”时，他随着追逐中的哥萨克骑兵消失在画幕里。（普鲁士文化遗产图片档案馆）



插图9　作为德意志化身的质朴诚实的德意志人米歇尔。1848年，一个自由团结的德意志民族崛起，反抗欧洲那些分裂和压榨德意志的势力：法国人被打倒在地，俄国人屈膝求饶，英国人慌张逃跑，教皇撤退了，自私的德国贵族也躲到了一边。(日耳曼民族博物馆/纽伦堡)



插图10 德意志皇家宗室（从左至右）：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1888年继位，在位99天）；皇帝威廉一世（1871—1888）；（孩子）威廉王子（1882年生，皇帝威廉二世的长子）；威廉王子，后来的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贝特曼图书馆/科比斯）



插图 11　1919 年 6 月 28 日签订了德国人难以忘怀的《凡尔赛条约》。该图是 14 年后新纳粹政府撕毁条约后，某教室里一位教师向学生们讲解一战以后战胜国对他们国家的肆意掠夺。(贝特曼图书馆/科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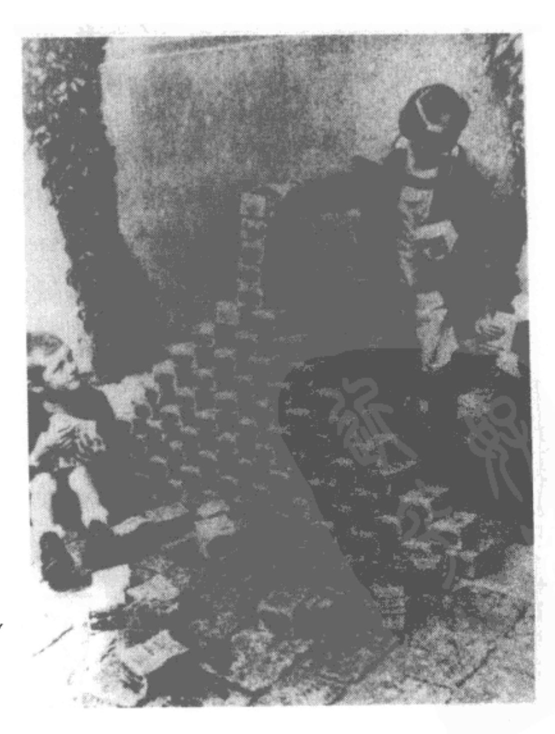


插图 12　1923 年，1 美元可兑换 420 万德国马克，德国孩子们用没有价值的一沓沓纸币当作堆房子游戏的砖块。(贝特曼图书馆/科比斯)



插图 13　神情不耐烦的希特勒与纳粹新闻代言人汉夫施坦格尔以及国会新主席戈林商谈战略计划。翌日，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成为德国宰相。7 周后，希特勒上台成为宰相。（贝特曼图书馆/科比斯）

第七章　绝对之精神和绝对之人民：19 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洪流

19 世纪前半叶，民主运动在德国的很多邦国蔚然成风，迫使统治者或者逃走或自愿选择下台，允许创立新的议会制政府。与法国革命相比，德国革命显得黯然失色。德国人民对雅各宾派执政下的无政府状态深感恐惧，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人士都不希望法国式的自由快速传导至德国社会各阶层。当德国人不得不做出明确的抉择时，比起自下而上的革命，他们更愿选择政治上的僵持或屈从。然而，无论是左派或右派都对德国的启蒙运动持批评态度，前者批评批评德国启蒙运动的改革力度不够，后者却责备德国启蒙运动复辟不够。 179

日后的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却将这两种不同观点的辩论组织在一起。在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垂死挣扎的后期，俾斯麦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人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德意志政治领域中熠熠生辉的引路人。他玩弄相互敌对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议会党团，使之反对一种在他看来经常转变的挽救民族的中间道路。[①] 在知识分子的王国中，鱼贯而出的伟大思想家几乎都是离经叛道的路德教人士，他们在思想和文化的重大议题上思想激进，富于攻击性，以 180

① 参见第八章。

相对谨慎的伊曼努尔·康德为开端，以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极端思想为其顶峰。这些思想相互交织，彼此发展，而德国的宗教、哲学与社会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曾偏离。最终，知识分子的反抗促使德国的政治僵持转变成德国历史上最具创新的也最具破坏力的过渡时期。在21世纪初期，这一转变仍然在德国社会内部如静水深流。[1]

一、从康德到尼采

1.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

生于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康德是德国启蒙运动中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观点开启了很多长期处于封闭之中人的眼界，却又给他们蒙上了新的障眼物。作为德意志二元论传统中一位辩证思想家，康德把知识限定在严格的科学性上——他称之为“纯粹理性”——通过展示先验的精神道德的一面，把它置于崇高的地位，或称为“实践理性”。康德把人类的天性崇拜为上帝的主旨，并把它简化地定义为内省的良知，以此批判个体，而非批判社会和政治。对于一个面对变化的保守的德国而言，康德的教义既讨好了新世界，也讨好了旧世界，似乎是完美的哲学。

康德在他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学说中分析过人类理性、意志和判断的力量。同样，对于普通的道德，康德的结论也是既让人欣喜却又令181 人泄气。普通的道德力量之所以令人欣喜，是因为康德阐述了已知世界是心智的创造物而非真实世界本身的镜像；说令人泄气是因为心智认识可能有限制和不够客观。真知的范畴，确切地说，是纯粹理性的严密性，从未如此之小。

哲学家和神学家信誓旦旦地谈论充满活力的精神的真实性，即上帝、灵魂、自由和永恒，发现了新康德哲学令人气馁的局限。[2] 确切地说，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力量可能会感知、加工在其周围的世界上的

---

① 参见：Müller, *Another Country*, *an incisive critique of post-World War II thinkers*。

② Karl Barth, Trom Rousseau to Ritschl, trans. B. Cozens (London, 1952), chap. 4.

物体，并对之进行归类。但现世的真实仅仅作为“现象”而可知；它们确定的特性或“本质”（Dingen an sich）仍永远隐藏在背后。超越了羽毛和鱼鳞，何谓之鸡又何谓之鱼？理性不可能完全表述出来；事物的内在本性仍是“实体”，它超越了感觉的感知和相关的领悟。总之，人类的心智仅理解直接入眼的事物，而那仅是表面现象。康德认为这并非是怀疑主义或无神论，只是人类肉眼认识世界的局限性。

然而，在纯粹理性或科学的理性马上碰壁的情况下，理性在它的广泛区域里却有意志和判断能力来超越经验实证。康德于是设定了“实践理性”，一种在精神和先验世界里无法证明的状态之下的道德智慧到达崇高地位的境界。这种知识的起点在纯粹理性之后，而实践理性能“直观”这一世界。纯粹理性认识事物较少但更确切，而实践理性理解更多事物但不够确切。

康德归纳理性的先验力来自对善的感觉倾向，而这种善在他看来是普遍存于人类社会的，因此，约束不住的道德法则之中的首要原则是：“让自己的行为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准则，遵照这一法则行事。”当实践理性面对道德困境时，康德相信内心的行为准则会经常进行敲击，提醒人类对更高层级准则负责，能够自由地选择善或是从心所欲地选择恶。这种内在法则成为超越纯理性认识范围的充满活力的精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帝，灵魂，自由和永恒。 182

与法国的哲学不同，康德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无助于推动传统宗教向前发展。然而，他们首创了它的道德构造，并最终使之世俗化。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限制范围内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在这一宗教中，耶稣变成了“历史的原型”或实践理性能直观了解的完美化身。与此相对应，圣灵是“人类善和纯粹善的性情倾向”完美的速

写。《圣经》中的黄金法则则可理所当然地被称做"绝对命令"①②。

2. 激烈的冲突

在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和1871年德国统一的这些年中，自由派思想家竭力煽动政治变革的火花，而保守派人士则高筑防火墙，以阻挡政治改革的火花点燃德国的历史。这种政治斗争以同样激烈的学术争辩作为它的补充。哲学家和作家们试图从激进的法国革命以及保守的德国启蒙运动中吸取经验教训。斗争在横纵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学术争辩的高地，鱼贯而出的德国哲学大家们在康德的率领下，逐渐破除了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哲学家费尔巴哈以经典的路德教义中的反直觉论点来解构基督教义。由于紧密贴近民众生活，反动知识分子则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种族理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汲取精华，酝酿成新时代的沙文主义文化。这些学术思想与民众运动并行发展，势倾一方，共同哺育了脱离过去传统的社会文化反叛，最终导致了20世纪德国社会的灾难。

3. 费希特和黑格尔

183 康德有关理性的划分，激起了浪漫主义者和类似的唯心主义者的反对。由于认为绝对的真理遥不可及，新的批判哲学就破坏了思想家们设定的实在的统一，威胁到他们先验智慧中的善意和良知。③ 围绕着康德令人费解的现象世界，出生于耶拿的约翰・戈特利普・费希特是首位提出理性方式的哲学家。他重新统一了理性，重建理性的广义范畴，通过宣布人类意识的终极实在的行为，重新确立了理性能触及

---

①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是康德的哲学命题，指没有任何目的、利益和欲望的道德原则，即良心至上的道德观。国内对此译名颇多，如绝对命令、定然律令、定言命令、定言令式、无上命令等。——译者注

② 其他的康德格言："So act as to treat humanity, whether in thine own person or in that of another, in every case as an end withal, never as a means only"; "Act so that the maxim of thy will can always at the same time hold good as a principle of universal legislation."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trans. T. M. Greene et al. (Chicago, 1960), pp. 23—31, 54—56, 65; 参见: Boyle, *Goethe II*, pp. 49—50.

③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330—341.

的范围。现象的世界变成了自我特有的客体化：康德认为的“实在”后面的现实，并非是不可触摸的“实体”，而是创造一切、知晓一切的人类自我。基于这种看法，费希特赋予理性以绝对的创造力，而中世纪的哲学家将这种绝对的创造力归功于上帝。总而言之，人类被设定为绝对了解其周围的世界。[①]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哲学史上掀开了“绝对精神”的面纱，绝对精神是万物背后的终极力量和意义。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以此为契机，倾全力反对启蒙运动。黑格尔曾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条，即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与康德对理性的各种限度的谨小慎微的研究相比，[②]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就是穿越本体世界的一种大胆的学者式的嬉戏。在这一波哲学发展的遥远的尽头是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位预言上帝已死的先知站了出来，他期待着“超人”，即 Übermensch 的降临。所谓的超人，就是所谓的具有超常能力的人，或是人外之人，一种自己创造，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和权力的新人类。

对于普通的德国民众而言，超人的样子就是“万物的尺度”和“孤行者”。它并不拥有大学教授职位所拥有的特权和保护。而普通老百姓也希望成为具有“世界精神”的人，即成为“集体的人”。质朴者，则参加合唱团或狩猎俱乐部；过度自信者，则加入政治党派。于是，就如整个 19 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们狂热地所做的那样，他们与众所周知的“绝对精神”的等同者，超越历史的泛德意志民族融合到了一起。

184

---

① “This ‘I’replaces God as the transrational source of nature and natural law.” Michael A.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Chicago, 1994), p. xvii; “Individual ego opened onto the one immediate spiritual Life, which is the creator of all phenomena.”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 334.

②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Spirit's evolu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o the present…the rational pattern that gives meaning to [man's] tragic history.”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350—351; Gillespit,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pp. xv-xvi.

4. 黑格尔的大德意志方案

康德和启蒙运动把信仰和认识这对古老的矛盾冲突渲染上了现代的色彩——称为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在哲学和神学的沙滩上画出了一道更深的鸿沟。正如哲学家热衷于将宗教的统一经历由原始感觉上升到理性感知，黑格尔发现他毕生的工作因康德割离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而陷入危机。但康德在自己限定领域的自我掌控让黑格尔略感欣慰。处理康德学说的挑战让黑格尔成为他所处时代的哲学家。

然而，他在一定程度上有回归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之势。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的"信仰寻求理解"的一体化格言和他的理论基本吻合但是略逊一筹。根据这一格言，黑格尔相信如果上帝不能被理性正确地认识，那么将会在这个启蒙的世界被遗忘。只有当上帝和道德法则被最高层次的人类所掌握——对黑格尔而言，这体现为超越宗教和艺术的哲学意识——人们才能获得命中注定的认识。

> 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人们）精神上依然存在的是那个不虔诚的、有限制的王国。（因为人们也必须生活在那个较小的世界里）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生活中存在一个安息日使得他能超越日常的事物……将自己投入到寻找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之中，并理性地意识到它。[1]

虽然人们认为宗教改革催生了黑格尔的哲学，但他巨大的恐惧更类似于路德曾与之交锋的经院哲学家。这种恐惧是来自于对上帝的不可知，甚至认为上帝有可能不存在。但这两种思想都没有对路德形成困扰，对于他来说，上帝的先验和真实性由单纯的对于《圣经》的信仰就可以确认。困扰着路德派的是对于胡乱相信神的意志的责骂的可能性。上帝既是真实存在又是一种谎言，因此，上帝是一个真实的、

185

---

① From *Reason in History* (1832), 引自 Karl Löwith,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he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New York, 1964), p. 331。

邪恶的对立体。这种看法奠定了16世纪路德教的虚无主义观念，虚无主义不仅使人们愚昧和孤独地存在于这个世界，还被不确定的巨大的力量所摆布。路德教的信仰在于，首先确证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而且可以肯定是值得信赖的。

黑格尔和歌德所见证的潜行于19世纪的无神论和虚无主义，是与传统的经院哲学家们相呼应的（没有对上帝的认识，就没有上帝；而没有上帝，就没有人类的未来）。因此，只有现时的新一代哲学家才将它们看成是人类解放的机会。后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解释了康德学派严格限制理性的原因，他们相信，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并没有超越个人意识的先验或真理。他们否认人类心智之外存在任何了解和评价世界的客观标准，世界本身只能像心智所认为的那样真实和善良。[1]在黑格尔看来，这些结论不仅充满了认识论的危险，也充满了存在主义论和政治上的危险，面对这个问题，他通过论证其哲学上的存在，即通过理性批判而竭力挽救神的超然存在。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创作集中在19世纪最后25年。正是他承接了为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所想象的虚无主义，并使之变得更具危险性。这种虚无主义使得人类完全迷失在自我设计的被虚假的上帝所控制的世界中。通过设想出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尼采揭露了犹太—基督教的上帝正是路德也曾为之恐惧的幽灵，是一个没有持久力量的赝品，一旦达不到他的期望，他便对人类失去兴趣并收回他的怜悯。尼采从这里发现，没有一个为了人类而逝的上帝，却有一个上帝因为人类而死去。他对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感到可怜和羞耻，因为这是由他创造的人类营造出来的。[2]

186

5. 黑格尔之后

通过大量详尽地证明理性的诸种先验联系，黑格尔相信他能拯救

①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pp. xvii, xix.

② *Thus Spake Zarathustra*, *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trans. and ed.,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1968), pp. 202, 208.

上帝、人和宇宙的原生统一。通过将这种统一提升到完全理性的意识，他为包括从从约翰·高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尔到歌德的浪漫主义者们的广阔的世界观赋予了新的生命。无论是黑格尔所称道的唯心主义者还是非常鄙视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者，都追求康德哲学所否定的认识的统一性和确定性。随着教会自身的不断现代化以及使其自身历史和教义理性化和道德化的取向，教会也参与到了这些哲学讨论之中。[①]在出版的关于宗教的"文化鄙视"的演讲中，柏林的神学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施莱尔马赫迅速成为继路德之后最著名的路德教徒，他指责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抛弃是"冷酷的世俗观念"，好像宗教只是"一团乱七八糟的形而上学的和伦理的碎片"。[②]

这些新的同盟组织，包括浪漫主义者、唯心主义者、自由天主教徒以及虔敬的路德教徒等，面对的是比康德和启蒙运动更难以对付的敌人。尽管他们和康德以及启蒙运动有过激烈的交锋，但仍有一些共同之处。黑格尔觉察到了这种更大的危险，他比启蒙运动更具雄心，他依然将理性置于高位，大加颂扬，甚至超越了康德、《圣经》和历史，从而使任何权威的声音都臣服于哲学的理性。他通过这种毫无节制的言论，天真地将一把鹤嘴锄递到了具有破坏性的启蒙运动的接班人手中，他们也因此而与之同名，即所谓的年轻的或左翼的黑格尔派，一群摒弃感情用事的思想家，准备颠覆整个文化和社会。[③]

最初，黑格尔坚定地与歌德站在一起，支持德国主流传统的二元论。二元论一直倾向于两个独立而不可相互还元的实体，体现在信仰上，也就人的生命就核心本质而言是对立的。15世纪，库沙的尼古拉赞美"对立面的一致"，而对于路德来说，人类的最佳状态是保持

187

① Barth, *Rousseau to Ritschl*, p. 224; Nipperdey, *German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pp. 356—358, 375—376.

② *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al Despisers*, trans. J. Oman (New York, 1958), pp. 29—31.

③ 见 Warren Breckman, *Marx,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Social Theory: Dethroning the Self* (Cambridge, 1999), pp. 2—10。

"正义和罪恶的共生"①。这些都是二元论早期的例子。在此，上帝与人类、永恒与短暂、善与恶等辨证地共存，双方相互依存，根深蒂固。所有这些看法对于理解人类是必不可少的。

新的激进思想家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都希望将问题简单化并加以解决。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理性的绝对主权和宣称的独立的先验实体是不存在的，他们厘清和抨击了一个去除神秘面纱的后启蒙运动时代的社会。在快速的传承发展中，肇始于传统基督教的旧政权的核心信仰遭到攻击。康德和黑格尔对基督教进行理性的教化和道德的感化。与他们不同，左翼黑格尔派认为基督教是神化的虚构，甚至是有害的。

6.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是一位教会历史学家，黑格尔的学生。他在其出版于1835年的《耶稣生平》一书中，否认了耶稣的历史真实性，并且将古典基督教信条描绘成了与世界其他宗教并无二致的历史神话。在那个时代，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扰乱人心，也使得他丢掉了在苏黎士的教授职位。来自埃尔兰根的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版于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受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的热烈欢迎。在这本书中，费尔巴哈主张神学其实是人类学，人类本身既是有关上帝的声明的源头，也是有关上帝的声明所涉及的对象。神的属性（强大、智慧、善良、正直、宽恕）"设定了"人类应该相信什么或者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子。费尔巴哈列举了马丁·路德的一个著名的声明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一个人，信仰上帝有多深，就能从上帝那得到多少。"总的来说，这些

① F. Edward Cranz, "Cusanus, Luther, and the Mystical Tradition," in *the pursuit of Holiness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Religion*, ed. Charles Trinkaus and Heiko A Oberman (Leiden, 1974), pp. 93—102.

话的意思是：信仰，被认为是人心观念之投影，它创造出上帝。[①]

188 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揭露，矛头指向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而个人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在德国历史进程中却能和谐共处。个人超越社会所带来的兴奋，据说会给进步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自由民主带来最大的威胁。[②]

作为黑格尔的一名博士生，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学会了理性不是有限的也不是个体的，而是普遍的和社会的（这是黑格尔与康德思想最大的不同）。费尔巴哈写道："在我所思考的范围内，我不再是一个个体"[③]。他以其乌托邦式的远见设计了一个开明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爱意、倡导平等与共享。人们曾成功地展示了基督教的人本主义，但却没有接受它。他对这些进行反思，勾勒出了新的社会规则。这种新的社会规则在思想上或许同康德更加个人主义的社会规则有所抵触：

> 要从存在的角度来思考，（把他）看作现实世界的一员，而不是抽象真空里孤独的个体，一个绝对的君主，一个冷漠脱俗的上帝。[④]

7. 卡尔·马克思

与费尔巴哈一样，卡尔·马克思是一位对黑格尔着迷却又带有批判倾向的学生。由于两人对黑格尔的著作抱有不同看法，这使得他们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都没能谋得到一份带薪的学术职位。费尔巴哈节衣缩食，在大学里担任不领薪水的讲师，之后开始经营他岳父的瓷器

---

① Löwith, *Hegel to Nietzsche*, pp. 335, 338—341. 有关路德对于信仰的创造力的陈述，参见：Kurt Aland, ed., Lutherlexikon (Stuttgart, 1957), pp. 144—150. 费尔巴哈为路德这一观点著有专著，见：*The Essence of Faith According to Martin Luther (1844)*. 路德描述信仰的经历犹如被拽入"神魂超拔的境界"（*excessus mentis*），刹那间信仰者就超然度外了（extra se）。这就是使神形象化的对立物。Steven Ozment, *Homo Spiritualis* (Leiden, 1969), pp. 105—108, 196—197, 204—205.

② Brechman, *Marx, The Young Hegelians*, pp. 90, 96, 106, 109, 119.

③ 引自同上，p. 96.

④ 引自同上，p. 129.

工厂；而马克思则迂回于整个学术界的边沿，在左派的《莱茵报》当政治评论员，直至1843年报社被政府查封。[1] 在19世纪40年代革命期间，他俩都生活在充满热情的巴黎。

马克思虽然赞同费尔巴哈的投射或幻想理论[2]，以及他的反对基督教的社会纲领，但他认为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失败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已经赋予男人和女人神灵般庄严的理性权利，却没有引领他们进入现实世界展开富有启示性的对抗非正义的斗争。在两人之中，黑格尔更接近这一使命，他称颂政治人物以及像他一样生活和工作在德国的人们是人性的最高体现。然而，与马克思所赞成的卢梭和罗伯斯庇尔的观点不同，黑格尔无法认识到个人在德国所面对的最凶恶的敌人，却赞扬国家给予人类自身以集体的方式也无法获得的稳定、庄严和意志。[3] 在黑格尔的历史概览中，文明始于波斯人，是他们将文明传递给犹太人，然后传播给希腊人，再由罗马人传承，与日耳曼人分享，最后在现代的普鲁士国家得到完善。[4]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黑格尔的巨大的"空中楼阁"，也就是把专横的普鲁士和它驯服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错误地理解为人类至高无上的政治集合体。

189

尽管有这样的批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清楚地知道，在国家中，行为是一种"异化"——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提取出来的一个词语，并且将它运用到了新的工业时代。在黑格尔所代表的哲学传统中，超越个体的先验的"绝对精神"，是生命最必需的组成部分。缺少了它，行为或者统治就缺乏合法性，任何相信终极现实的劳动者或统治者，都不可能被期望尽职尽责。[5]

---

① Ibid., pp. 112, 272—273, 279—280.

② 费尔巴哈建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来与神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对立。他指出，上帝的观念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是人的观念的投影，天国不过是人间未能实现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不过是人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幻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以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上帝。——译者注

③ Löwith, *Hegel to Nietzsche*, pp. 241—243, 307—308.

④ F. N. Magille et al., *Masterpieces of World Philosophy* (New York, 1961), pp. 593—600.

⑤ 比较俾斯麦相近的认同陈述，第八章。

黑格尔左派对不完美的现实缺乏忍耐性并让社会了解其弱点。马克思对德国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是最不留情面的。在承认集体政治生活就是最大程度上的人类生活的同时，他反对将基督教的观念作为集体政治生活任何适当的组成部分。通过提升个体的地位，受宗教认可的超然存在已经成为独断专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来源，它破坏而非保护着公共的和伦理道德的基础。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完全赞同黑格尔左派对基督教的批判。与在他之前的费尔巴哈以及他之后的尼采一样，190 马克思将他对当时社会的一切反感都归咎于“先验的基督教国家”，这与希特勒在1930年的所作所为极为类似。当时，希特勒捏造了犹太人及其信仰的替罪羊并把基督徒也列入其类。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就是基督教会与国家政权联姻的产物，[①] 在这种国家中，个体战胜了人性，而集体生活和伦理共同体则在悲哀中散失殆尽。[②]

在寻找最终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马克思将目光转向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富足者和贫穷者之间分歧的根源[③]，而私有财产在没有基督教个人主义诞生的情况下是绝无可能产生的。因此，人类的生存就与社会团体或民众以及个人的复兴紧密相联，而这只能以消除个人宗教和政治自由为条件，也即在上帝以及自由民主死亡之后才可能发生。[④] 马克思勾勒出了一个新的政治集体的蓝图，在这个集体中，公职人员和工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共同生活在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中。[⑤]

马克思期望1848年革命吹响嘹亮的号角。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已经移居布鲁塞尔。在这里，他目睹了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遭到镇压。1848年，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党并

---

① “Political democracy is Christian since in it man, not merely one man, but every man, ranks as sovereign, as highest being.” 引自 Brechman, *Marx, the Young Hegelians*, p. 294. On Hitler's views of Jews and Christians, 参见第十章。

② Ibid., p. 285.

③ *Ibid.*, p. 278.

④ Ibid., pp. 292—295.

⑤ 参见 Löwith, *Hegel to Nietzsche*, pp. 169, 245—247, 307—308。

正式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在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长期定居英国。在这里，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在完成其他著作的同时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工人“失去自我”、公民生活的“野蛮化”以及泯灭人性的罪行，认为这个时代的很多哲学家和政客对于这种泯灭人性的罪行视而不见。[①]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理论上赋予人以力量，马克思则将这些抽象的概念运用到现实的对抗之中，鼓励大批穷苦的工人阶级投身于政治，以求通过无产阶级的“铁和血”来演绎改变历史的壮举。在马克思主义者夺取权力过程中，工人阶级将创建平等的社会共同体，超越带有等级制度的民族国家，这一举措不仅挽救了他们自己，也拯救了高层社会阶级。马克思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事件，而他原来的老师和对手黑格尔也许将这看成是一种诙谐幽默：“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存在与本质、失去自我与独立行动、自由与贫困、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的最完美的解决之道，历史疑团也迎刃而解”[②]。 191

这些言论富有想象，被视为不祥之兆，却不是幻想。人们肯定认为这是奇思幻想，因为在19世纪，大多数德意志人都不相信历史的含义能以宣言的形式得到彻底的显现，当然更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加以诠释。要是认为，如果无产阶级被赋予控制生产资料的权力，将会友好地解放中产阶级——而后者从来不曾为前者着想——那么这只是一个与黑格尔其他理论一样自我安慰的神话而已。[③] 另一方面，人们也必须承认这是有预兆的。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一群持批评态度的民众确实开始赞同这种千年的梦想。最终的结果是，这些看法必然被认为缺乏远见，没能预见到政治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及以后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很适用、很成功地接受和

---

① Ibid., 275—279.

② 引自 Löwith, *Hegel to Nietzsche*, P. 114 (from Das Kapital). Italics mine。

③ Löwith, *Hegel to Nietzsche*, pp. 313—315.

运用。[1]

伴随着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后黑格尔批判派的激进洪流，技术的跳跃性发展进一步得到加强，诸如煤气灯、电报、铁路和蒸汽船等，显示了人类可以不受束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大学和政府公职部门谈论完美的人和完美的社会已成为令人尊敬之举，这对传统德国历史观发出了挑战。传统的德国历史观总是将人与社会置于忽略不计和受挑剔的地位。相反的确凿证据在于，过去的德国习惯于通过教育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商议改良既存的社会，反对任何有关恒久地最终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看法。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所承诺的普世道德价值要求实行新的集体规则，让普通群众和有识之士产生共鸣，对现存的社会和政治进行彻底改造。对拥有悠长历史记忆的德意志民族而言，这种雄心壮志会使人想起重蹈迈斯特·埃克哈特和托马斯·闵采尔等的覆辙，他们是中世纪后期的英雄人物，浪漫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给他们恢复名誉，将他们视为 19 世纪社会文化反叛的先驱。这些早期的革命家们也试图为历史上的各种矛盾寻找最终解决之道。埃克哈特倡导采用“超越所有分歧”的精神统一体方法，闵采尔则主张对社会政治的构建进行“血腥清洗”。[2] 这两种方案都被同时代人认为是冒险的蛮干，尚未实施就夭折了。

192

8.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世界是深沉的，比白昼所想的还要深沉”[3]。这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借用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此反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4] 这里暗含着对启蒙运动的斥责，启蒙运动低估了当时世界人类

① 参见第九章，俾斯麦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

②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pp. 251—271;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pp. 13, 42; Ozment, *Mysticism and Dissent*, pp. 61—97.

③ 出自尼采《醉歌》（The Drunken Song）中的一句诗，德语原文：Die Welt ist tief, Und tiefer als der Tag gedacht. ——译者注

④ *Thus Spake Zarathustra*, pp. 227, 321; Löwith, *Hegel to Nietzsche*, pp. 368—371.

面临的巨大困境。在尼采新的言辞中，19 世纪的人类已经是“最后的人类”，不论是启蒙运动还是黑格尔左派的批判都已无法拯救人类。[1] 人类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寄托于新的人种的出现，这个新人种不是由资产阶级、基督教或是自由民主社会所创造的。

借助于犹太—基督教神话的废墟、失败的启蒙运动以及相互依赖的自由民主，尼采提出了新人类的概念。[2] 给权力赋予绝对意志，超人能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改变自己和整个世界。永恒复归[3]是他的信条——生命没有任何轨迹和增值。超然的上帝所创造和救赎的虔诚的基督徒已不复存在，新人类由其自身开始也以其自身为终结，而这一过程中的一切都没有过错、怀疑或者后悔。[4]

这种没有被生命的无意义吓住的特殊个体将会为所有人找到出路。[5] 尼采在希腊神话里为这些特殊的人找到了一个相似的神，即酒神狄奥尼索斯。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狄奥尼索斯是不可毁灭的，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耶稣刚好相反。新的人类通过生命的狂欢挽救了现代虚无主义。尼采将经验比喻成音乐的力量，即刻的愉悦和悲伤就像立刻调和了两种对立的力量，意味着保持“永恒的分离”。[6] 路德的信仰要素同样遭到了冲击，而且这也存在于巴赫的音乐演奏中。[7] 193 但是，与尼采超人的狂喜状态不同，路德教的信仰一直肯定超然存在、和解的主张，非常简单，人就是意味着永远在一起。

与同时代的俾斯麦一样，尼采认为，普鲁士军队和议会获得的成功不是源于思想观念，更多的是“铁和血”的结果。[8] 但是，到了 20

---

①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pp. 200. 212.

② *Thus Spake Zarathustra*, pp. 122, 124—126, 189.

③ 永恒复归（Eternal recurrence）是尼采超人哲学中的一个观点，即能量不灭原理需要永恒重现。世界为一封闭整体，世界历程所采取的形式，必是重复循环，一切皆在重现过程中。国内对此译名较多，如永恒重现、永恒回归等。——译者注

④ Ibid, pp. 199, 227, 253, 330—331.

⑤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pp. 199, 221.

⑥ Ibid, pp. xxi, 203—204, 210, 239—240, 248.

⑦ 参见第六章。

⑧ W. M. Simon, *Germany in the Age of Bismarck* (New York, 1968), pp. 155—157.

世纪，尼采的思想开始发挥重大影响。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咖啡馆内，刺杀奥地利大公弗兰西斯·斐迪南的刺客们探讨着他的作品。[①] 无数德意志士兵的背包中都放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1914 年，15 万册特别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新约全书》、《浮士德》一起被分发给作战前线士兵。这就是一幅新旧德国两极分化的图谱。[②]

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和狄奥尼索斯犹如新的福音，驱使士兵进入战壕，并且给他们在战壕中提供安慰，那么，这却无助于他们离开战壕。对于 1914 年这一代人而言，德国的现代文化和军事力量一样，完全归于失败。那一代人，无法忘记失败与投降、赔偿与剥夺的恐惧，因此即刻就会采取超人的复仇。

二、纯洁的民族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高尚的哲学追求与流行文化相融合。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和施莱尔马赫的"有限普遍存在于无限中，并通过无限表现出来"的思想，少数学者、大众知识分子、出版商、记者以及鼓手都被简单地称为"人民"（das Volk）。[③] 前者在思想的历史中漫步，进行着影响人们思想的游戏，而后者则对战争的动乱、工业革命带来的剧变以及新德意志国家的突然出现有着很本能的反应。[④] 但是"人民"也有一种本体的本质，在这种本体的本质中或者通过这种本体的本质，任何个体的德国人（individual German）都能成为"每个

---

① 在 James Joll 看来，他的批评有助于削弱"当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价值观"，他"号召人们采取行动，实施暴力，野蛮行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到 1914 年欧洲统治者们的决策"。因此，他的批评言论在思想和情感酝酿方面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84），pp. 188—189.

② Rudiger Safranski，*Nietzsche：A Philosophical Biography*，trans. S. Frisch（New York，2002），p. 329. 谢谢 Bolek Kabala 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

③ Schleiermacher，*Speeches on Religion*，p. 36.

④ 关于这种混乱状况，见 Blackbourn，*Nineteenth Century*，pp. 272—281；Raff，*A History of Germany*，pp. 85—86。

德意志人”（Everygerman）。[1]

1813 年拿破仑大败，这极大地满足了德意志人因为法国人占领和破坏其领土而形成的企盼已久的复仇，也激发了德国沙文主义的大众文化。这种沙文主义文化旨在促进德意志的统一，使德意志成为欧洲的强国。维也纳会议确定战后欧洲回复到战前的君主制状态，旨在进行复辟。这使得德国统一和成为欧洲强国的雄心几无实现可能。因此，维也纳会议旨在复辟的努力在德国激起了近半个世纪的抗议和革命。[2] 194

恩斯特·阿恩特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是德国早期民族主义流行风中的思想大师。这些人的写作深受赫尔德尔和费希特为自由解放战争摇旗呐喊的影响，他们对德国社会底层的深入接触比其他任何政治实体都要深远。波恩神学教授阿恩特就充满激情地讴歌拿破仑战败那一年的德意志人，称德意志人是仍然保留着纯正种族的“纯净血统的人”，并祈求跨越历史的德意志文化让这片神圣的土地充满灵气和虔诚。路德教的虔诚信徒、国家博爱运动的奠基人和现代体育的创始人雅恩，则呼吁大学生将身体的强健和民族主义融合起来，形成民族的福音。[3]

威廉·海因里希·里尔教授来自慕尼黑大学，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过渡阶段的又一位重要人物。作为大众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他认为德国村庄和城镇的每一位德意志青年都是德意志的“精髓”所在。与理查德·瓦格纳同时代的里尔，发现拜罗伊特的伟大歌剧中没有人拥有和他一样作为德意志人应该拥有的质朴和热情，他推荐在歌

---

① “*Volk* signified the union of a group of people with a transcendental ‘essence’ [which] was fused to man's innermost nature and represented the source of his creativity, his depth of feeling, his individuality, and his unity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Volk*. ” Moss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p. 4.

② “Napoleon had only initiated the process of Germany's subordination; the Congress of Vienna completed it.” Ibid. p. 14.

③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86*, pp. 381—383; Moss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pp. 4, 14.

剧中改用德意志民歌。[①] 与黑格尔的哲学精髓"绝对精神"相对应，里尔思想的精髓在于"人民"，一种深埋于德意志人情感中的根基，给普通的德意志人带来无与伦比的自信和自我超越的感觉。提到原始的"德意志属性"，他深信所有德意志人都共享这一原始属性。他以"德意志属性"淡化了等级和阶级差别是社会冲突或政治分歧的基础这一事实。于是，他就将"长期不安分的人"，包括贫困的工人、移民工人、犹太人和新闻工作者等，都排斥在具有天赋的德意志人群之外，说他们拒绝同化。[②]

195 在整个19世纪，随着沙文主义大众文化的成长，里尔的论点进行着自我复制。如果一种超然的"德意志属性"超越财产和阶级之外而存在，那么，原始的德意志信仰也能超越历史的和宗教的信仰而存在。[③] 在这种信仰中，德意志人既是启示者也是被启示者，全体德意志人（Volk）才是最终的实体。对于所有看上去不成熟和假设的人类跨越历史的宗教观念，从康德和黑格尔的基督教的各次转型来看，都是向前持续迈出的步伐，而就尼采的永恒重复信条而言，则没有什么进步。

在对德意志人认同的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行为古怪的人、富有卓越远见的人与阿恩特、雅恩、里尔等审慎的祷告者和组织者走到了一起。耶拿的出版商欧根·迪德里希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主持狄奥尼索斯酒神的宴会上，他穿着一条斑马条纹的裤子，围一块土耳其头巾，穿着令他着迷而普通人都讨厌的服饰。他与他的同事们引导了浪漫主义的新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始于1817年的德意志青年运动中招募而来的。[④] 迪德里希斯既不是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也不

---

① 在19世纪中期，瓦格纳是1848年自由革命的支持者，而里尔却反对革命，似乎里尔一直因和未原谅他。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pp. 839—40. 关于瓦格纳神话和音乐中的日耳曼主义，见 Robert Donington, *Wagner's "Ring" and its Symbols: The Music and the Myth* (New York, 1974)。

② Mosse, *German Ideology*, pp. 19—22, 27—28.

③ Ibid., pp. 33, 36—37, 43.

④ Ibid., pp. 53—57.

是反犹太主义者。他接受了迈斯特·埃克哈特的神秘教导的人类宗教模式。他以埃克哈特的著作为引导，出版了大量论述翔实的关于古代和中世纪德意志文化的著作，以证明跨越历史的德意志人民（Volk），提振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结。[①]

寻找永恒的民族种族根源就像黑暗遇到光明一样结束了。如果说这种寻找激发了浪漫主义者迪德里希斯和人种史学者博古米尔·戈尔茨“世界公民”的意识，同时却也催生了偏执者的努力。这些偏执者试图将世界各民族从文化和生物学的角度划分等类[②]，19 世纪的歧视性种族评判就是由此造成的众多不幸结果之一。在一种似乎比乌托邦和世间的至善完美还难以让人相信的文化中，这样虚幻的想法也是不会成功的。“两个灵魂，哎呀！在我的胸膛中，每个都离开并且排斥他的兄弟”，这是歌德在提醒新世纪的人们，分歧依然存在，冲突无法消除。[③] 完美总是在半途与不完美不期而遇，这是一条不言自明却又难以为人理解的公理，无限制的人类和社会进步的“新时代”是一种虚构。 196

德国种族理论家从康德那里获得了第一块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石。康德认为，地理位置和种族特点之间有一种联系，他称之为一个民族的“生命驱动力”。就像神学之于费尔巴哈一样，对于康德而言，地理学就是人类学：不同的地区造就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动机和行为。对于康德这种种族和文化之间的温和联系的思想，约瑟夫·阿瑟—德·戈平瑙（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伯爵这位尼采极为推崇的一位种族学者，给其增添了不同的定数，即种族越纯洁，就越能

---

①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 Hans Boesch 的著作《1500 年至 1800 年德国儿童插图史》：*Kinderleben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beit 15. bis 18. Jabrhundert*（Leipzig, 1900; Düsseldorf, 1979）。

② 参见第十一章。

③ *Faust, A Tragedy*, trans, Bayard Taylor (New York, 1950), Bk, I, scene 2, p. 39. 比较 16 世纪更为严肃的乌托邦题材的文学作品：Miriam Eliav-Feldon, *Realistic Utopias: The Ideal Imaginary Societies of the Renaissance 1516—1630* (Oxford, 1982), pp. 109, 119, 121—133; Ozment, *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 (New Haven, 1975), pp. 91—107.

经久不衰，优于混杂和衰败的种族。第二块种族理论奠基石就是对所谓“雅利安人”的发现。这是一个假定的印欧民族，这个民族被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从印度中部的家园向西方迁徙。通过对本土农民文化的研究，当代英国和德国的语言学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含糊不清的、很可能是虚构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始祖先。[①]

当所有这些种族的只言片语达到一定程度时，一个可预料到的问题产生了：在世界各民族中，哪一个民族最纯洁和最强大？许多德意志人认为，应该是北欧雅利安人或者是他们自己。19世纪后半叶，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这使得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市的家成为这些生物种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思想的基地。张伯伦是英国一位家境殷实的海军上将的儿子，但他加入德国籍成了德国公民。在世界种族研究方面，他是非常重要的权威专家，尤其对德国—犹太关系史研究倍感兴趣，并于1900年出版了一本德国—犹太关系史的畅销书。张伯伦不是粗鲁的反犹太分子，尽管如此，他却认定德意志犹太人是雅利安人保持其纯洁性的主要敌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人数不多、正在走向衰亡的民族，但是他们对待法律近乎虔诚的信奉使这个民族极具威力，这也使他们成为对德意志人的一种深信不疑的威胁。[②] 与戈平瑙伯爵不同，张伯伦认为种族纯洁性不可能自然产生，但可以“像赛马和福克斯猎犬”一样进行培育。[③] 数十年之后，这种学术性的推测被证明是一个极为不祥的征兆。阿道夫·希特勒，一位奋斗不止的纳粹党领导者，曾读过张伯伦的著作。在张伯伦临终之时，希特勒拜见了病床上的这

197

① Mosse, *German Ideology*, pp. 89—91；塔西佗和路德很早就曾对德国农民文化的纯正性予以关注。

② Paul L. Rose, *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From Kant to Wagner* (Princeton, 1990), pp. 358—76;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432—433.

③ Richie Robertson, "Varieties of Antisemitism From Herder to Fassbinder," in Edward Timms and Andrea Hammel, eds., *The German-Jewish Dilemm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hoah* (Lewiston, Maine, 1999), p. 112.

位老人并亲吻了他的双手。[1] 虽然没有人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情景，然而，这一亲吻却拉开了德意志对犹太人长期的种族主义压迫及种族灭绝的序幕。

三、抉择

面对“新时代”对德意志过去主流思潮的狂热追捧，19 世纪的德国并不缺乏实力强劲的背道而驰者。有两位人士，他们都置身于革命的烈火之中，以此来提醒他们同时代的人们，曾经的德意志人是何等英雄人物，这便是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贝多芬的努力使他比歌德产生了更加震撼人心的影响。

1. 启蒙运动与乌托邦之间：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贝多芬和巴赫相似，他用音乐保留了处于尝试阶段的 18 世纪德意志的二元主义传统。贝多芬出身于波恩一个服务于科隆选帝侯的音乐世家。与巴赫的家庭不同，贝多芬的家庭生活并不完美。在以后的生活中，他总是力图逃避这一点，时而宣称自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私生子，时而又说自己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私生子。在波恩宫庭，年轻的贝多芬着迷于法国启蒙运动和康德的绝对命令的高尚信条，这些业已成形的影响伴随着他在 1792 年来到维也纳，预示着他那如同变魔术般神奇的、充满英雄魅力的音乐生涯的开篇。[2]

拿破仑将军傲慢自大但提升很快，他于 1799 年担任共和国第一执政，1804 年成为法国皇帝。在此之前，贝多芬和绝大多数德意志和奥地利的知识分子一样，都非常欣赏这位法国将军，并且显然打算将他创作的《第三交响曲》献给他。然而，当拿破仑用他扩大的皇权践踏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时，贝多芬收回了他对拿破仑的献礼曲。尽管如此，贝多芬仍钟情于世俗的、兄弟般的乌托邦社会，至少他试 198

① Mosse, *Germany Ideology*, pp. 91—96.

② Maynard Solomon, *Beethoven* (New York, 1977), pp. 4—5, 20—22, 34, 85—89, 94—95.

图在音乐的幻想中去实现这一空想。[①] 在这一过程中，和拿破仑一样，他的思想逐渐从启蒙意识演进到了对新时代的自我感知的意识。这一结论可以从他晚年用于创作的书桌玻璃下的一句格言中得到验证，这一格言很明显是用于自我参考。格言源于古埃及，它写道：

> 我就是我。
>
> 我就是一切，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任何世人都无法揭开我的面纱。
>
> 他就是他自己，世间万物的存在都应归功于这种独特性。[②]

在原始埃及语中，这是对人类自治和自足状态的描述，前两句由女人讲述，第三句由男人讲述。移植到 19 世纪的德国文化之中，这些话语就成了自我神化的宣言。在旧约《圣经》中，当摩西问上帝的名字时，上帝回答“我就是我”（《出埃及记》）。这种原始尼采式的主张很早就在青年贝多芬身上体现出来，从启蒙运动那里得到了灵感。[③]

贝多芬的乌托邦思想在其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最为人称道，歌词事实上来自于席勒所写的抒情诗，关于一个学生的饮酒歌。在音乐领域，贝多芬发挥着如拿破仑一般的影响作用，践行着革命的最初梦想，首创了用交响乐来尝试表达天堂乐土、接受祝福的亡者的神秘家园。因此，随着《欢乐颂》给人们传递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旋律，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瞬间开始庆祝兄弟姐妹的情谊，没有任何世俗的矛盾和斗争，预示着一种统一和永恒的和平。[④]

199

20 世纪晚期，在贝多芬传记作者的善意的笔墨之下，这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被描述成要为其乌托邦思想辩解。既然没有不可能的梦想，人们也“无法阻止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恐怖，无法设置任何东西来阻

---

① Ibid., pp. 132—136
② Ibid., pp. 156—157.
③ Ibid., pp. 85—89.
④ Ibid., pp. 310—313.

止奥斯威辛和越南成为人类灾难之地的潜在可能性”。[1]

于是，19 世纪的乌托邦思想跃入了 20 世纪。跨越两个世纪的新时代的人们发现，贝多芬的颂歌是战胜人类现代悲剧的武器。人们可以原谅贝多芬乌托邦式的梦想，但这种情形却不会降临在 19 世纪初的拿破仑身上，也不会降临到 19 世纪末的尼采身上。这种原谅在于贝多芬将其乌托邦式的梦想融化成了一种对信念的狂热、音乐的心醉神迷和自我牺牲的爱的短暂经历。这样的时刻虽然不会长久持续，但却无法被击败。贝多芬也未抱任何幻想，试图将这种瞬间的神迷状态带入现实生活，并以此解开历史的谜团。在德国的古典传统中，人们相信，导致人们这样做的兴趣在于一种极权主义的时刻。在这一阶段，个人会将自己幻想成上帝。贝多芬充满沮丧地谴责拿破仑即在于此。

不论是短暂的统一感觉或是完美幻想，这种信念能长久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永恒是虚无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前奏。这些信念会催生前所未有的幻想，即没有概念就没有物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信念为人们坚韧不懈地追求着，它们逐渐地碾碎了人们心中的慰藉，那就是，宝贵的优雅时刻实际上是能传播和转达的。在历史上，这种幻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愤世嫉俗、厌恶人类的人群，也造就了一批失败的革命者，他们已经表露出坚定的意志，不能宽恕这难熬的、不完美却还必须活下去的生活。

2. 现实的无知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奥斯威辛和越南是真实的存在。一个远离矛盾和冲突的世界就是一个填充梦想的乐园，而对于那些不能从梦中醒来的人，还会伴随着梦魇。没有一个德国人能比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更好地告知乌托邦和现实的区别以及预测将自己置身于乌托邦或是现实之中所产生的结果。他对一个即将变成上帝的人物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即《浮士德》。这部作品是德国古典时代对自康德以来至尼采为止的德国新时期思想和文化稳步演进历程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挑战。自 200

[1] Ibid., p. 315.

1775年开始，歌德耗其毕生精力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该书的第一部分出版于1808年，追溯到16世纪，重述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浮士德博士，为获得超越人类的知识和权力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作品第二部分于24年后即1832年问世，它追随浮士德博士的生活脚步，直至它解决了浮士德博士死亡和永恒的答案。

歌德的《浮士德》不是现代的故事而是中世纪意识的现代化，是为已经忘记德国历史和传统留下深刻教训的现代观众进行的德意志二元主义传统的重奏。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后，人们才需要深入阅读此书。[1] 作品由天上序幕开篇，梅菲斯特恶魔快乐地看着人类的不同天性，质疑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性的善良，对启蒙运动直接进行了宗教改革的批评。

> 世界（理性）的主坚持原来的方式，
> 如同创世纪一样异想天开。
> 生活有点最好让他满足。
> 但是对于你已经借给他的一线天堂之光：
> 他呼唤它是理性——然后，他的权利增加，
> 远比任何野兽。[2]

一方面受到道德上处于危险之中人类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又渴望通过有价值的行为来达到神的高度，《浮士德》描写的这种无止境的斗争就是人类的生存状况。

> 我不像是神！这一事实感到太深奥：
> 我是那蠕虫，在灰尘里蠕动……

---

① 关于它的历史，见*Faust, A Tragedy*, pp. vi-viii；参见 Richard Auernheimer and Frank Baron, eds. *Das Faustbuch von 1587; Provokation and Wirkung*（Munich, 1991）.

② *Faust, A Tragedy*, part I, Scene, I, p. 10；参见路德论其处于上帝或魔鬼控制之下的原因。*Luther's Tabletalk*, no. 439（1933）, p. 71.

这似神般的着迷和欣喜若狂，这最终的存在，
难道我，现在只是蠕虫的我，值得追循……？
是的，我不惧怕这些门，这个词的真相像雷电：
人的尊严可能与神的高度较量！①

上帝和梅菲斯特打赌，人，曾经善良的造物，依旧善良，并且允许他的对手（梅菲斯特）将浮士德拿来做实验。虽然浮士德本身有堕落的天性，受困于一种“未被减轻的（道德的）困境”的生活，但上帝很自信，认为他将坚守善良的秉性，为善良而战斗，并得到与之相对应的神的宽恕。浮士德对一切都很了解，并直率坦白地承认，他既不是一个易于满足之人也不是一个善良之人。他丰富的学识没能让他更加靠近无限，也没有给他带来宁静。他希望探究生命的更深层含义，揭示生命的神秘，为了这一目的，他接受了“魔鬼的要求”。上帝离开了，梅菲斯特提出了他的交易，他亲自指点，赋予浮士德超越生命的黑暗的权力。浮士德以灵魂意志换取令他为之悸动的魔鬼的权力，接受了将自己的灵魂给予魔鬼的许诺。②

当我担保此刻飞行，
“啊，仍是拖延，你是如此公平！”
然后用不朽的系带束缚我，
然后宣布我的最后毁灭！③

最后，浮士德发现，人类的真正的和平时刻既不是个人融入无限之中，也不是迷失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不存在于其他任何永恒流传的事物之中。他发现他所追求的和平却是在世俗道德行为的无私时刻。魔鬼梅菲斯特出借给他最大的权力，允许他为了其他人

① *Faust*, *A Tragedy*, part I, scene I, pp. 24, 26.
② Ibidl., pp. xvii-xviii, xxi; part I, scene III, pp. 49—56; scene IV.
③ Ibid., part I, scene IV, p. 58.

202 而慷慨地行使权力。为行使这一权力，他修建了护城河，收回了环绕着邻居财产的沼泽地，通过不留名的服务他得到了前所不知的自我满足。

> 现在有我的最新，最好的成绩。
> 数百万的（他们）让我布置土地……
> 绿色，良田，其中男子和牧人去的地方……
> 是啊！我牢固地坚持这个想法……
> 他只赢得了自由和生存，
> 谁又每天重新征服他们……
> 我欣然将看到，
> 站在自由的人民之间，站在自由的土地上！
> 然后我欢呼飞行的时刻：
> “啊，还是拖延，你是如此的公平！”①

根据约定，这些结束语是浮士德将灵魂授予了魔鬼梅菲斯特。然而，上帝废除了他们的约定，派天使索要浮士德的“永生的心灵”进入天堂。② 但这并非浮夸的乌托邦的结局。浮士德仅仅只是欢呼了短暂的片刻，他没有进行游说也没有行使权力。他没有成为一个毫不含糊的好人，也没有成为超人。他的缺点依旧，仍然是一个与过去一样的分裂的人，只是现在，在自己的失败和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也没能带给邻居们什么神圣的礼物。然而，正如上帝和梅菲斯特打赌那样，浮士德将会是好人，他先人后己，这就是不同之所在。

---

① Ibid., part II, act V, p. 241.

② Ibid.

第八章　革命的保守主义：俾斯麦时代

在德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像奥托·冯·俾斯麦—沙恩豪森侯爵那样引起如此大的意见分歧。1862—1890 年他担任普鲁士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期间，德意志首次在历史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依据各人对他的理解，有人认为俾斯麦阻碍了德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有人认为是他引入了德国的政治现代化。一部分历史学家只看到新时代的科学，工业、民主的蓬勃发展以及议会的建立而简单地忽略了俾斯麦的历史作用。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看来，俾斯麦是推动德意志前进的"看不见的手"的自觉工具，尽管这种前进有些令人不悦的折中，而且超越了"日后的真正坚定支持者们"的能力。[①] 与其他精英学者和构成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专家型公职人员相比，这个平庸的学生和失败的公务员在平衡秩序和自由方面做得更成功吗？或者说，在现代德意志国家中，他的宰相任期是最失败的吗？ 203

俾斯麦这位日后的伯爵和侯爵在一个离异的家庭中成长，但父母双方都对他的成长付出了心血。俾斯麦的母亲温文尔雅而又心怀抱负， 204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176; Katherine A. Lerman, "Bismarckian Germany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German Empire," in Mary Fulbrook, ed., *German History Since 1800* (London, 1997), p. 154; Lothar Gall,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1871—1898*, II, trans. J. A. Underwood (London, 1986), pp. 217, 234, 237.

她为俾斯麦指出了一条从政之路，让他进入当时柏林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俾斯麦的父亲性格随和，让俾斯麦饱经波美拉尼亚容克乡间生活的洗礼。经历了学校中的奋斗岁月以及短时间的不太愉悦的公务员生涯之后，俾斯麦重新回到了父亲的生活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寻找新的人生方向。[①] 然而，他将继续涉足两个世界，并不断积聚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一、宗教和政治

俾斯麦在16岁时由牧师士莱马赫施坚信礼，成为一名路德教徒。在早期的20多年中，他的精神世界游离不定，他在莎士比亚、海涅和黑格尔年轻时期的作品中寻找医治忧郁的慰藉。波美拉尼亚的虔诚派教徒将地方上一位乡绅的女儿，约翰娜·冯·普特卡默介绍给了俾斯麦，为俾斯麦开启了通往新生活的道路。1847年，俾斯麦与普特卡默成婚。[②] 在他们恋爱期间，俾斯麦经历了一次宗教信仰上的转变，由此加深了他所认为的历史的力量凌驾于任何个人意志之上的信念，此后，这种信念成为了他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信条。

后来，他随身携带着路德注解的《圣经》经文，也经常用格言来阐释路德教虔诚派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否定式的宗教信仰才可能实现为同胞的服务。这种传统也促使他反对以理性之力量完善人类的启蒙运动思想，这是他与歌德共有的另一个古典的德意志信条。1847年6月，年轻而又个性粗暴的俾斯麦为了捍卫德意志"基督教"国家，反对给予犹太人政治上的解放。与此同时，他却声

---

① Lothar Gall,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I: *1851—1871* (Lon-don, 1986), pp. 13—17. Otto Pflanze,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I, 2ed. Ed. (Princeton, 1990), pp. 32—38.

② 在约翰娜（Johanna）婚后的47年里，收到了很多珍贵的信件，其中讲述了这个时代的杰出政治家的交往历程。*The Love Letters of Bismarck, 1846—1889*, trans. Charlton T. Lewis (New York, 1901). Otto Pflanze, *Bismarck*, I, pp. 48—53. 关于施莱尔马赫和宗教风气，见 Karl Barth, *From Rousseau to Ritschl* (London, 1959), 第八章, and Nipperdey, *Germany*, pp. 376—378。

称，他并非要与犹太人为敌，甚至承认“有些喜欢犹太人”。俾斯麦所担心的是，犹太人先入为主的忠诚将会使他们成为一个不尊奉所确立的宗教信仰的民族，[①] 这与信奉教皇至上论的天主教徒们极为相似。19 世纪 70 年代，俾斯麦曾与天主教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与 16 世纪时的情形相比较，对德意志国家和基督教世界而言，这一时期的德国犹太人已不再构成实际的威胁。到 1870 年为止，犹太人只占德意志人口总数的 1.25%（大约 50 万人），其他为基督徒，如果奥地利不计入内，新教教徒占基督教徒总数的三分之二。[②] 但是，正如生活在路德教年代的为数极少的再洗礼教徒一样，犹太人对俾斯麦的多数主义社会的愤怒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16 世纪，再洗礼派教徒突然涌向德国城市，最为明显的是向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明斯特市迁徙，这种迁徙招致了对犹太人的怀疑和迫害。[③] 19 世纪下半叶，犹太人取得的异乎寻常的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已经与其少数族群的地位极不相称，从而引发了对犹太人的愤恨和压制。在城市中，犹太人充斥于各类中小学校和大学，远远超出了他们在德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犹太人在银行业、专业技能领域、商业和贸易行业、出版界以及自由主义左派政党中的表现都十分突出，惹人嫉妒，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④] 德国的基督教徒认为，需要一位拥有足够力量和影响力的精英去迎接充满危险的全新未来，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大卫·布莱克伯恩的话说，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动荡不安的现代社会的最好体现”。在

205

① 从耶路撒冷沦陷到法国革命爆发的 1 700 年的岁月，犹太人已经将宗教融入了民族之魂。Peter Pulzer, “Emancip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German-Jewish Dilemma”, in Edward Timms &Andrea Hammel, *The German-Jewish Dilemm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hoah* (Lewiston, 1996), pp. 11. 正如 Blackbourn 指出的那样，改革实际上从未深入，德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威廉·冯·洪堡也持相同观点。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293; Pulzer, “Emancipation”, pp. 8, 12; Gall, Bismarck, I, pp. 29—32, 321; Emil Ludwig, *Bismarck* (Munich, 1927/1975), p. 93。

②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287.

③ James Stayer, *Anabaptists and the Sword* (Lawrence, Kans., 1972).

④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287—89; Pulzer “Emancipation”, pp. 14—16.

这种社会情形之下，“反犹太主义”这个术语就应运而生了。[①]

与俾斯麦年轻时期的愿望相反的是，19世纪60年代，德国各邦中的犹太人在部分亲犹太人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的帮助下，逐步获得了完整的法律权益和平等的公民权。[②] 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承认所有德意志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宗教教派自治”。尽管长期以来基督徒控制了公务部门，授予军阶，控制教派学校，筑起了防范的藩篱，对犹太人诸项权利的确认还是在1871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法律。[③] 尽管早在20年前俾斯麦就认为犹太人担任公职是对基督教国家的“蔑视”，但是作为刚上任的宰相，他却宣布给予犹太人政治上的解放。他也赞赏犹太人的治国才能，这是他在与民族自由党合作10年的时间中发现的。[④] 在私人访谈中，他推崇异教互婚，赞赏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婚生的后代，尤其推崇父亲是基督教徒而母亲是犹太人这种婚姻形式生下的后代。[⑤]

206

在俾斯麦成长的岁月中，另一件事情对其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古老的德意志同样为俾斯麦指明了道路，使得俾斯麦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古典的政治理念协调起来。1847年5月，抗议的浪潮洪波涌起，并引发了1848年革命。时年32岁的俾斯麦自行辞去了公职，以一个全新的普鲁士议会中保守容克地主的身份发表言论。在精心准备陈述之后，俾斯麦开始驳斥关于1813年后的德国统一和进步归因于由德国革

---

① “反犹主义”一词是在1879年出现的。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307—08. 有关犹太人是混乱的古代中世纪的象征，参见：Jeremy Cohen, *The Friars and the Jew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Anti-Judaism* (Ithaca, 1982), pp. 14—16. 关于制造19世纪反犹主义和反基督教徒的各种想象的根源的能力，见：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 1974), pp. xvi, 167—168, 283—289。

② 这次会议在Brian Vick看来既不是“支持犹太人”的宣言，也不是“偏激的反犹太人的集会”，而是在原则上接受犹太民族的新生及其宗教与文化习俗的传承。*Defining Germany: The 1848 Frankfurt Parliamentaria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2002), p. 211。

③ Pulzer, “Emancipation,” pp. 7—8, 12, 14.

④ 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爱德华·拉斯克，民族自由党纲领的起草者，是一名犹太人，曾是俾斯麦眼中的头号敌人，民族自由党支持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帝国”的设想。Ibid., p. 10。

⑤ Ludwig, *Bismarck*, pp. 353—354.

命者推动的自由主义改革的看法。并非因为社会哲学或是政治宣传，而是法国人对德意志人的“虐待和羞辱”促进了德意志的统一和进步。这是超出人们意料和控制的本能历史驱动力在起作用。[①]

1870 年法国在色当投降后，俾斯麦在给妻子的信中将这种天真的信念表达了出来。那一天，俾斯麦拜访了被俘的拿破仑三世皇帝，后者要求俾斯麦安排一次他与普鲁士国王的会谈。他在给约翰娜的信中写道：“我们之间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我要避免触及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于一个被上帝强大的力量推翻的人肯定会是一种痛苦和伤害。”[②] 俾斯麦认为将战争的胜利或失败作为解决历史问题的永恒的方法不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胜利和失败这两种情形都有可能发生在德国或其他敌对者身上，它们都是由无法预知的上帝来决定的。因此，一个民族最好对历史为其准备的一切事情保持警惕。出于这种原因，俾斯麦强烈地谴责威胁公共秩序的狂热派人士，是他们引发了 1848—1849 年革命。

俾斯麦从未忘记狂热派人士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自由派立法议员们的理想和信条促进了德意志的分化，加剧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对德意志领导权的争夺。当柏林的代表出席 1851 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联盟议会时，俾斯麦已经目睹了这一全新的国际挑战。他用一种挑衅和预言的语气评论道：德意志还不够大，无法同时容下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国家。当时，奥地利的面积要大得多，实力非常强大，正试图强行加入到由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中。[③]

207

---

① 后来他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历史的哲学方法融合起来，得出结论：“历史……不会像火车一样以稳定的速度滚滚前进，而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忽快忽慢地发展……人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当一个人看见上帝大步穿行于历史的岁月中，便要起而抓住上帝的衣领，尽可能前行。有人认为历史的进程充满着编织而成的机会，可以搅浑时间之水从而浑水摸鱼，这是一种不诚实的愚蠢的行为和过时的政治智慧。” Arnold O. Meyer, *Bismarcks Glaube im Spielel der 'Losungen und Lebrtexte'*（Munich, 1933）, p. 64k, cited by Gall, *Bismarck*, I, pp. xiv-xv, 28. Pflanze 也强调了这一问题，见：*Bismarck*, I, pp. 52—53; ibid. Ⅲ, p. 457。

② Love Letters（Sept. 3, 1879, from Vendresse）, pp. 416—417。

③ 引自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14—117。

二、首相和宰相

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废除了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国家宪法，并小心翼翼地删节了本邦的宪法，但在德意志各邦国中，议会制政府和君主政体仍然继续并存。虽然政治浪潮接连不断，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继续推动着现代化进程。1862 年，新任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认为，俾斯麦“在政治上可能有不犯错误的天赋”，遂任命他为普鲁士首相。1871 年，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则成了宰相。凭借着超常的力量，俾斯麦在这个位置上任职 19 年，成为了德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1]。[2]

威廉一世从初登王位起，就十分需要俾斯麦这类人物的辅佐。自 19 世纪 50 年代晚期以来，国王与议会的不和导致宪法危机，特别在对军队的预算的控制方面预示着某种危险的来临。到 1860 年，普鲁士在人力和军事准备方面已落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和奥地利。不幸的是，占议会席位大多数的自由党人控制着议会，正如宪法所规定的，他们小心谨慎地监管着军队预算。由于相关的军事预算是在过渡期间由议会通过的，因此国王不能单方面加强军事力量。而且议员们也怀疑威廉和宰相在秘密地加强军备，这种怀疑是正确的。

1862 年 5 月，议会选举中自由派左翼进步党代表议席继续增加，这一事件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危机。威廉一世决心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发出威胁，要么镇压议会中的对手，要么放弃王位。[3] 俾斯麦出任首相挽救了国王，他成了国王和他在议会中的敌人之间的绝妙的木楔子。双方都对俾斯麦有所顾忌。自由党人畏惧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俾斯麦代表着过去的阴魂，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国王担心他，是因为他

208

---

① 自德意志帝国开始，包括魏玛共和国和联邦德国在内，其最高行政首脑皆称 Kanzler，故有此说。在中国，译法不尽相同。通常，帝制时期的 Kanzler 译为首相，其他时期则译为首相。——译者注

② Ibid., p. 127; Gall, *Bismarck*, I, pp. xviii, 16.

③ Gall, *Bismarck*, I, pp. 159—160, 169.

明白，在当前局势下，俾斯麦作为首相会拥有更大的权力。

尽管俾斯麦的原则植根于古老德国的君主传统，但他也承诺会采取宪法上的折中方法，即以一种善意的道德方式来行事。他接受了威廉一世和其他复辟国王们都无法接受的现实，即法国革命改变了世界，议会政体已经存在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与这种认识相适应，俾斯麦熟练地将各股对抗力量纳入一种均衡状态中。这里的均衡是指邦联国家组织形式和温和主义的国家政体组织形式之间、各邦和帝国之间的平衡。①

在普鲁士军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俾斯麦没有让国王失望。在数年中，俾斯麦成功解决了根据政府需要为军队提供的资金，这种方法通常是迂回曲折的，至少在某个时刻也是违反宪法的。② 1867 年，俾斯麦对议会做出让步，同意 1871 年之后将每年制定军队预算的权力让给议会，但俾斯麦实现了议会 7 年才审查一次军费预算的目标。这种显著的转变使议会成了这场政治游戏中的被动方，政府则得以放开手脚，根据自己的规划发展普鲁士的军事力量。③

由于军事力量的建设得到保证，俾斯麦开始自由地实施自己主要的目标：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对普鲁士的竞争对手、同为德语国家的奥地利进行仔细的盘算。1859 年，奥地利极不光彩地败在意大利人手中，因此，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开始，奥地利在国际间的影响力日渐衰退。④在外交上，俾斯麦依然坚持奥普联合领导下的德意志联盟。他也拥护建立一个新的联邦议会，希望这两者都能达成和解并且获得 1848 年革命后的民主运动的支持。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这些调和的步骤将普鲁士推到了统一德意志的位置上，用俾斯麦在 1862 年 9 月的讲话来

---

① Ibid., p. 174—175, 186—188; Gall, *Bismarck*, vol. 2, p. 9.

② 这些举动也导致了 1866 年补偿条例的诞生，即在 4 年之后确认了曾经受到议会坚决反对的政府为了军事目的而使用的经费。最终，这笔资金还是拨付了。Gordon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1978), pp. 9—10; Pflanze, *Bismarck*, I, pp. 328—330.

③ Gall, *Bismarck*, *II*, pp. 64—66.

④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238; Sheehan, *German History*, pp. 859—867.

说，要通过“血和铁”来完成德国的统一。[1]

209 丹麦将位于德国北部边远地区的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并入其领土，此举极大地帮助了俾斯麦。这两个公国都有说德语的人口，荷尔施泰因的德语人口则占据主导地位，它还是德意志联盟的成员。在广大的德意志世界的强力支持下，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士兵占领了荷尔施泰因，也预示着来年奥普的进攻。1864 年 10 月，势单力薄的丹麦将这两个被包围的公国让与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第二年，加施泰因协定将这两个公国置于奥普的联合管理下，进而是奥地利占领荷尔施泰因，普鲁士占领石勒苏益格。[2] 由于这两处领地位于普鲁士的后院，由普鲁士来最终管理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而深陷财政危机的奥地利则准备让出它们，以交换由普鲁士占领的位于其东北边界上的西里西亚的一部分。然而，18 世纪时，普鲁士赢得西里西亚却颇费周折，尽管这并非俾斯麦拒绝将其分割给奥地利的主要原因。俾斯麦长期以来一直相信，普奥两国不可能在一个强大的德国内友善并存。因此，他抛弃了加施泰因协定，退出了德意志联盟，让普鲁士的士兵长驱直入，进入荷尔施泰因。[3]

在收回新占有领土以及维持其在北方的领地的努力失败后，奥地利动员了一支由支持它的联盟各邦组成的军队。1866 年，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索伦王室在波希米亚的柯尼希格莱茨战役中进行了生死搏斗。这是 19 世纪的最大规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萨克森联军。1866 年 8 月的布拉格条约将奥地利从德意志驱除出去，从那以后，奥地利作为新的奥地利—匈牙利的君主国独立存在，德意志联盟也就此解体，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的北德意志联邦，它包含了萨克森和“大普鲁士”——即普鲁士加上它所吞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和法兰克福。这个“大普鲁

---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28—130; Schulze, *Germany*, pp. 138—140.

② Pflanze, *Bismarck*, I, pp. 258—264.

③ John Breuilly, "Revolution to Unification", in Mary Fulbrook, et al., eds., *German History Since 1800* (London, 1997), pp. 130—31; Pflanze, *Bismarck*, I, pp. 251—253, 264.

士”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东部诸邦和莱茵地区诸邦的联合。[1]

击败奥地利为普鲁士建立新的德意志帝国扫清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普鲁士前进的道路上。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国是对意义重大的柯尼希格莱茨战役给德国带来的变化最为敏感的国家。现在法国成了两者中的弱者，因此更有理由对此保持警觉，并且做好准备，以应对预料中的霍亨索伦王室的扩张。 210

最终，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事件将好战的双方带到了战场上，演变成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国王威廉一世的一位亲属，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受邀登上西班牙的王位。由于法国预见到自己会因此受制于德国的钳制包围，便向普鲁士国王大声抱怨，而普鲁士国王起初也倾向于阻止利奥波德。然而，法国要求霍亨索伦王室保证永远不得登上西班牙王位，这是普鲁士国王所无法承诺的。

威廉一世在外交上拒绝法国国王[2]要求的公报落入俾斯麦手中，就如一匹斑马落入鳄鱼猖獗的赞比西河中一样。通过与法国的战争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就成了俾斯麦头脑中首当其冲的念头，而将霍亨索伦王室置于西班牙王位之上似乎能有效地牵制法国。来自国王的外交通牒信息又给了俾斯麦一个激怒法国的机会。在向法国大使电告这个消息之前，俾斯麦篡改了电报内容，最大可能地凌辱法国的傲慢。他确信，战争对于法国来说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会取胜的。[3]

6天之后，也就是1870年7月19日，法国和普鲁士开战。4个月后，德意志军队包围了巴黎，法国军队在色当和梅斯投降。根据最终和约，德国人获得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负担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这是对德国人损失的合理赔偿，它铭记着以往战争和占领中法国对德国的掠夺。尽管法国在其后的几年内就偿清了战争赔款，但它在

---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31—137; Christopher Clark, “Germany 1815—1848: Restoration or pre-March”, in Fulbrook, *German History*, pp. 3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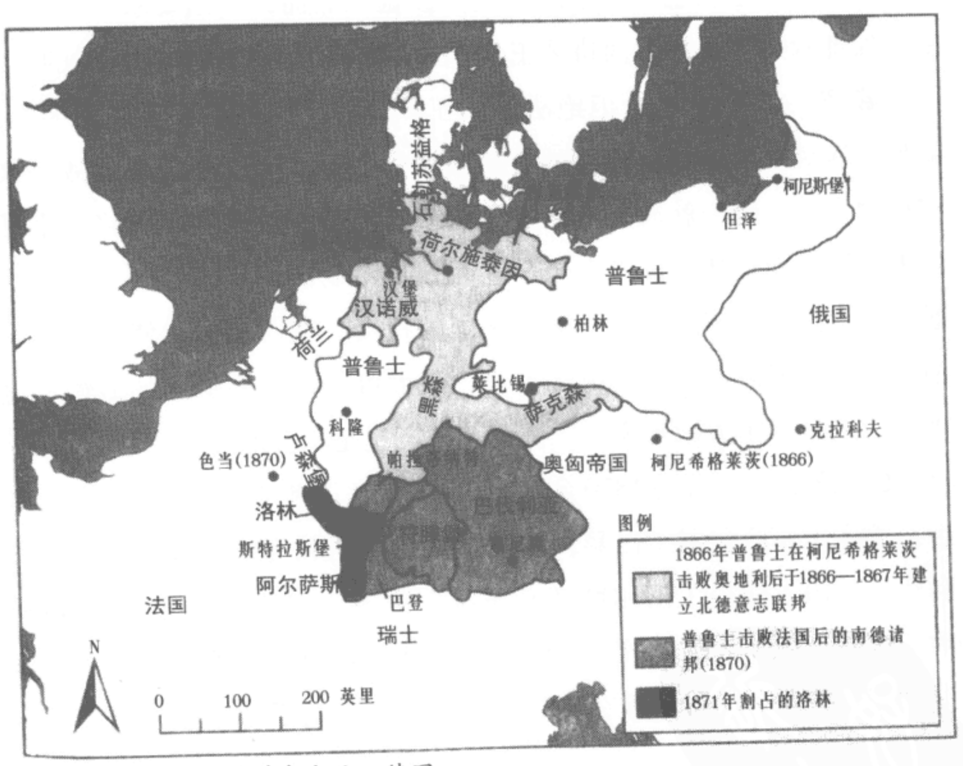
② 原文为 French king，应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译者注

③ Graig. *Germany*, 1866—1945, pp. 22—27; Carr, *The Origins of the Wars of German Unification*, pp. 178—180, 196—200.

很长时期内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这意味着，两国之间未来的战争和赔款将会是令人难忘的惩罚。①

三、震撼欧洲

211 随着普鲁士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胜利，德意志民族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如火如荼，北德意志联邦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符腾堡和巴伐利亚迅速加入进来）得到发展。曾经令欧洲列强最害怕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德国已经统一起来而且相当强大，足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欧洲。用本杰明·迪斯累里一针见血的话来说，自上而下的德意志革命是比自下而上的法国革命"更为伟大的政治事件"，在德意志能令欧洲势力格局重新洗牌这一点上，这一评论尤其正确。②



地图6 俾斯麦领导普鲁士统一德国

① Breuilly, "Revolution to Unification", pp. 136—37; Schulze, *Germany*, pp. 141—144.

② 引自 Gall, *Bismarck*, II, p. 40.

随着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新的成功，德意志也开始面对其自身最糟糕的恐惧：各列强结成联盟对抗德国。对奥地利—俄罗斯—英国同盟或是奥地利—俄罗斯—法国同盟的恐惧使德国领导人夜不能寐。两个同盟中任何一方都会使德国面临三线作战。整个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目标旨在拉拢俄罗斯，孤立法国。[1] 212

1871年4月，经过微小的变动，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变成了全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宪法。[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宪法，因为它试图在君主—行政—独裁的因素和联邦—立法—民主的因素之间取得平衡。新的政府设立了由54名诸侯代表组成的具有控制力的联邦理事会（Bundesrat，上议院），还设立了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有382名代表组成的帝国议会（Reichstag，下议院）。帝国议会的设立使得德国的国家意志绕开各成员邦的精英领导阶层，建立于公民投票之上成为可能。立法必须通过两院批准才能生效。然而，诸侯仍然控制着上议院，普鲁士则掌握着强加其意志的投票权，不过，新的德意志帝国的代表们也还是能表达意见的。[3]

1871年1月，在俾斯麦的竭力怂恿之下，威廉国王，即之前的北德意志联邦主席，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但他担心他的加冕称帝会削弱普鲁士人以及霍亨索伦王室所取得的功绩。普鲁士国王所表达出来的保留完整的德意志人的愿望表明，由单个的德意志邦和王朝组成的德意志帝国仍然十分重要。但是，与其兄长普王威廉四世粗鲁地拒绝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授予其皇冠不同，威廉皇帝在凡尔赛获得的是帝国的国王们和诸侯们对皇位的认可，而不仅仅是议会代表。作为新的普鲁士人的宰相，俾斯麦也在凡尔赛得到了一个帝国的任职头衔。从历史角度看来，在由北德意志联邦向帝国的正式转变

① Ibid., pp. 41—44, 49—52.

② 有关比较方案，见 Blackbourn, *Nineteeth Century*, pp. 256—59;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46—148。

③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147; Schulze, *Germany*, p. 155.

212 中，他的“小德意志”呈现出一种更为传统的和更具包容性的王国特征。①

狭隘、虚伪和粗鄙，这些曾经被历史学家所唾弃的特性后来都成了对俾斯麦的强硬严厉统治的指责，② 最近，人们已经认识到，新的德意志帝国提供了诸多的机遇。即使对于俾斯麦来说，新的帝国也是一部不断发展进步的杰作，而非一成不变的国家。反观他的历史哲学，他认为领导者和国家只是更为强大的神意下的人类集体力量的工具，因此，他认为这个新的帝国是由包括议会中的自由党议员在内的人民创造出来的，而非只是一个国王或是首相的杰作。

尽管新宪法还是以普鲁士宪法为模版，但正如预期的那样，当时的自由党对它是持积极态度的。俾斯麦因为取得了1848年革命无法取得的成就而得到不少赞誉：具有强大行政权力和强大的代表性议会的政府。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如果俾斯麦给予军队太大的独立性，他也会使军队适应时代的需要，强大到足以确保这一新的国家在政治上的生存和发展。当时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鲁道夫·海姆对于在1866—1871年胜利期间俾斯麦政策既为自由所吸引又排斥自由的总结让人难忘。

> 有时候……他在自由主义方向上走得太远了（正如他支持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在其他时候，他对保守主义有着令人遗憾和同情的倾向。还有些时候，他鼓励利益集团政治，而这种利益集团政治……蔑视政治生活中的高贵动机并且必定会带来腐败性的影响。但是……我提醒自己，没有其他人能够拥有如此鲜活的考虑，想让这个年轻的帝国变得举足轻重，成为永恒，富有活力……他心中的所有迂回曲折和矛盾冲突都能够从这种想法所蕴涵

---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43, 147—148.

② “一种军国主义的君主制，一个虚假的立宪制国家，一个议会制下的半宪法治理的国度……此外，一个普鲁士—德国的半专制的和虚假的议会制的政府。”Lerman, “Bismarckian Germany”, pp. 147—149。

的力量中得到答案。[①]

普鲁士的支配性影响力（其国王、首相以及军队已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不具备毁灭性，这通过继续存在于德国20个其他邦中的独立的政府和军队得到了证明。[②] 俾斯麦所有的行政权力，特别在外交政策方面，仍要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行事。皇帝和军队的行为他无法控制，如果没有议员的多数投票，则议会无法通过法律。 214

19世纪70年代，自由党得票率占多数。自由党在议会中所占据的席位多达四分之三以上。虽然他们在成功获得选票方面有些浮夸，俾斯麦相信，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的真正目的是建立一种干预型的国家。这是一种保守派的看法，他们也指责俾斯麦追求这种目标。[③] 虽然俾斯麦会激烈抨击反对派，给社会民主党人贴上“破坏分子”的标签，但在他担任帝国宰相的前10年中，更多的是保持缄默，打击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权势人物。他现在的名声完全如同马基雅维里，他无视自己对实用性的立法的忠诚，也忽略了有总比没有好的选择机会。当执政党联盟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装扮成自由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则会采取发自内心的保守主义的复仇。

四、天主教会的防卫

俾斯麦创立了普鲁士支配下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从而完全毁灭了许多罗马天主教徒们的帝国梦想。他们原本期望的是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领导下的更大的德意志帝国。同样是这些敌人，他们也对可以回溯至法国占领时期的现代主义新教文化生出忌恨，当时，在莱茵兰，教会的土地被征用，教士的权威也荡然无存。那种现代主义的新教文化

---

① 引自 W. M. Simon, *Germany in the Age of Bismarck* (London, 1968), p. 222；参见其他主要自由党人的资料，同上：pp. 99—122, 216—223.

② Lerman, “Bismarckian Germany”, pp. 149, 150—154.

③ “自由主义以释放个人力量和推动社会自由发展为名掩盖和隐瞒真相……也就一步一步构成了奉行现代干涉主义的国家。” Gall, *Bismarck*, II, pp. 7, 10—11, 19; Schulze, *Germany*, pp. 160—161。

认为，上帝仅仅“只是限制在理性范围内的”（康德），或者是自我的投影，按照某些人（如费尔巴哈）的说法，是有益健康的；而按照另外一些人（如马克思）的说法，则是有害的；还有一个更强烈的说法，那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①]

215 天主教会在19世纪对现代主义的回应与16世纪时的回答无异：飞越阿尔卑斯山，直至罗马教皇的控制之下。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只有教皇当局为现代主义的雪崩提供着避难场所。18世纪时，耶稣会首先唤起了教皇极权主义，此后，作为拿破仑革命的灾难性后果，教皇极权主义又一次在德意志得到复兴。教皇看到了与新的世界社会的最小的妥协都会给教会的使命造成危害，因而鼓励教皇极权主义。然而，一些天主教士与信徒期望一个更加简化和开明的基督教，把它提供给本国的民众，使之变成一种具有更少的法律和礼仪色彩的救赎灵魂的教化。[②]

天主教会这种新危机驱使教皇们重申他们对新的教义释疑方面的权威，并且任命信奉教皇至上主义的教士填补空缺的德国教职。1854年，教皇庇奥九世宣布了圣母无玷始胎教谕（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③]。这一教谕对19世纪的教会所起的影响就如同中世纪的圣餐体变论和忏悔赦免的教谕对教会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教谕授予教皇拥有对信徒和统治者们的今生和来世超越一切的非凡特权。为了保持教会与国家“最近采纳的进步，自由主义和文明”保持距离，1864年，庇奥通谕的《错谬要略》（Syllabus of Errors）对世俗世界一些最令人倍感骄傲的成就，诸如政教分离、非宗教学校、宗教多元主义和宗教宽容等，进行了批判和谴责，从而让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都极为震惊。最后的冲击波来至1870年庇奥九世颁布的《教皇无谬误》（Papal infallibility）教谕。在这一教谕中，庇奥九世忆及教皇博尼法斯

---

① 参见第七章。

② Gall, *Bismarck*, II, pp. 12—13; Nipperdey, *Germany*, pp. 263—264, 360—362.

③ 在该教谕中，庇奥九世宣称，圣母玛丽亚是圣灵感孕，因而没有原罪。——译者注

八世在1302年颁布的《一圣教谕》(Unam Sanctam)[①]，对法国进行了不顾一切的声讨，抗议法国以教会为代价而进行的扩张。庇奥九世宣称，国王作为一般的基督信徒，在事关信仰和道德的方面都低于教皇的权威，并臣服于教皇。[②]

在接下来的“文化斗争”（这一名词源于著名的病理学家、进步党议员鲁道夫·菲尔绍的命名）中，教会和国家都相信，他们在制度方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③] 对于民族自由党而言，教皇的宣称和指责对羽翼仍未丰满的民主运动不啻为迎头一击，而俾斯麦则认为，教皇的宣称和指责暴露了天主教教廷如同另一个掠夺成性的国家。对 216 当时德意志中央党领导人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为天主教的诡辩，俾斯麦采用苦中带甜的幽默方式进行了反驳。他曾在某一个场合宣称，有两个人维系着他的生命：“我的妻子和温特霍斯特，一个为我所爱，一个为我所恨。”俾斯麦援引教会与国家分离法案，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宗教和神学应该尽可能地远离议会。[④]

支持《错谬要略》和《教皇无谬误》的德国天主教徒被看成是归化的德意志人。他们的主要效忠对象被认为是具有潜在威胁的罗马外部势力，而非新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基于相似的原因，俾斯麦批评站在其对立面的中央党保守分子和社会民主党自由分子是“破坏分子”，批评他们更多地效忠于政治神学的思想意识而不是忠诚于新的德意志宪法。[⑤]

俾斯麦拒绝“去卡诺莎”（对教皇忠诚），他和当下的批评家们携手反对德意志国家和教会在历史上曾经进行的合作。从宗教改革时期以来，这种国家与教会间的合作就已存在，它已经建立了一种在政治

---

① 即教会之外无救恩（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译者注

②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p. 523—524.

③ Craig, *Germany*, pp. 74, 202—203.

④ Gall, *Bismarck*, vol. 2, pp. 26, 78.

⑤ “俾斯麦根深蒂固地认为，普鲁士是这些奉行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教士和信教徒进行宗教改革运动的目标，他们充满着邪恶的用意。”Pflanze, *Bismarck*, II, p. 196;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151; Gall, *Bismarck*, II, p. 37。

上紧密结合的官僚制度性的国家教会，而这种国家教会又促进并磨炼了两者的合作。在文化斗争期间，政府将基督教会严格控制在道德圣礼的精神领域内，赶走了公共学校的教士，并且禁止信仰方面的政治游说。新的宗教事务部门负责监督各类忏悔，“讲坛短讯”则禁止教士在进行灵魂救赎时评论政治。最终，1874 年颁布的“五月法令”要求所有教士候选人都必须参加资格认证的国家考试。[1]

大多数德国主教和天主教徒都反对《错谬要略》和《教皇无谬误》。这就给德国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即将当地的天主教会当局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教皇势力剥离出来。公开支持教皇的德国教士会有丢失主教职位和教区的危险。另一方面，一般的天主教徒在他们投票时并不会对天主教会持批评意见，中央党赢得了四分之三的天主教徒的投票。最终，政府与中央党以及天主教会之间的有勇无谋的博弈使其票源尽失，就像保守派的新教徒一样，他们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是下一个政府的斗争目标，因此也投票反对俾斯麦。中央党领导人温特霍斯特在阻止政府攻击教会方面的举措也卓有成效，他指责俾斯麦将他自己的政治敌人抹黑为整个国家的敌人。[2] 这时，教皇庇奥九世的逝世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继任为双方提供了挽回了颜面的转机。新任教皇将他的职责转向基督教的社会行为方面，远离政治对抗。他比他的前任采取了更为现实的态度来调和这个正在发生变革的世界。[3]

谁是这场文化战争的胜利者？因为主要的参与者都是专制主义者，每一方都得到了一些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场斗争留下了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其结果是，一个更加守纪的德意志天主教会呈现在教皇和德国政府的面前，而俾斯麦以及各个自由派政党则发现，他们已是这个名至实归的干预型国家的领导者。虽然类似于俾斯麦对德国基督界的残害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都没有再出现过，[4] 但是在对宗教信

---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52—154.

② Nipperdey, *Germany*, pp. 367—368, 371; Gall, *Bismarck*, II, pp. 17, 27.

③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p. 525—526.

④ 见第十章，希特勒消灭基督教的计划。

徒和公民贯彻国家法律意志方面，德国政府已经取得了更强有力的地位。然而，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国家凝聚力的严重削弱和信任的巨大丧失，很多德国人离开故土前往美国或者其他自由的国度。[①]

五、真相

19 世纪 70 年代期间形成了三大危机的发展。到 70 年代末，这三大危机的协同影响使得俾斯麦的权宜之计的统治变成了一种更加原则化的统治方式。这三大危机分别是：经济危机排山倒海，民族自由党的左派人士越来越多，两次刺杀威廉皇帝的企图。

1. 国内战线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经济危机显现出来，它和文化斗争交织在一起，使保守党转而反对宰相俾斯麦。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在立法程序中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民族自由党。在早期的军事预算危机中，俾斯麦就曾与之联合共创伟业，而且民族自由党支持俾斯麦以普鲁士为核心的统一德国的战略。但是，民族自由党的左翼集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其领袖爱德华·拉斯克是俾斯麦的心头大患，俾斯麦对他恨之入骨，甚至超过了对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的痛恨。这导致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之间的联盟处于一种既是实际需要但又令人不快的境地。[②]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和中期，俾斯麦的宰相生涯还是谦卑为怀，不得已与几个议会派别达成妥协，以使自己的议案获得通过。

218

经济危机对工业和农业造成严重影响，对钢铁工人、农民、纺织

---

① 参见：Gall, *Bismarck*, II, pp. 19—21, 31; Craig, *Germany*, 1866—1945, p. 77. 关于 19 世纪的美国人境移民：Deward R. Brandt et al., *Germanic Genealogy: A Guide to Worldwide Sources and Migration Patterns* (St. Paul, 1995), pp. 14—17, 78—79。

② Gall, *Bismarck*, II, pp. 70, 78; Pflanze, *Bismarck*, II, pp. 222, 239—241; Pflanze, *Bismarck*, III, pp. 108—112. 拉斯克（Lasker）起草了民族自由党的纲领，这个纲领在 19 世纪 60 年代是打开德国统一大业的金钥匙。Pulzer, "Emancipation", p. 10. 有关拉斯克的政治活动，见：James F. Harris,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rman Liberalism: Eduard Lasker, 1829—1884* (Lanham, Md., 1984)。

工人的影响犹为严重，而外国产品的进口则使得经济情况更糟。于是，关税保护的压力不断上升。由于民族自由党的党纲条款就支持自由贸易，政府和民族自由党在路线问题上出现了冲突。虽然关税难以保证政府财政的紧急需求，但是到1877年为止，俾斯麦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持观望态度。此后，教皇利奥有意想结束文化战争，而中央党也支持新的钢铁税，一个在关税方面更具共同志趣的顾客似乎正在向俾斯麦招手。①

俾斯麦提议政府对烟草实行垄断，从而打响了关税大战的第一枪。作为回应，社会民主党人指责政府只是口头承诺阶级福利，控诉政府青睐富农阶层，从而使议会陷入困境之中。② 俾斯麦对这一自由派集团的基本态度既是哲学性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俾斯麦在支持基本健康保障、意外事故、残疾和老年保险的同时，③ 他也相信，自由主义反对派更慷慨激昂的措施只是提升了毫不现实的期望，造成打破微妙的社会平衡和导致无产阶级暴动的威胁。1871年，在巴黎获得短暂成功的无产阶级起义之后，信仰变成了犯罪的证明。10年之后，俾斯麦仍在发出告诫，如果那些拥有“不可动摇的乐观精神和对社会进步拥有无限信仰”的人获取得权力，德国也会像巴黎一样，在快速旋转中很快失去控制。他相信，时代要求夯实社会进步的激情，而不是将它们挑拨成更高的火焰。④

在进行人身攻击之后，俾斯麦开始寻求与民族自由党人的对抗，他希望能孤立民族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别，而将其中的大多数人拉拢到政府一边。1878年，在两个月之内发生了2次试图谋杀81岁皇帝的行刺案件，这给了俾斯麦急需的借口。这两起谋杀案是：当皇帝沿着菩提树大道骑行时，遭到刺客开枪射击。第一次刺杀时，刺客使用左轮手枪，没有射中威廉一世；但是在第二次谋刺时，刺客使用了霰弹

① Gall, *Bismarck*, II, pp. 59, 88—90; Craig, *Germany*, pp. 85—86, 90—93.

② Gall, *Bismarck*, II, p. 105—107.

③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58—159.

④ Gall, *Bismarck*, II, pp. 12, 34—37, 101, 108—110.

猎枪（找到了相关痕迹），威廉受了重伤。[1] 较早时候，俾斯麦也曾将两次针对他本人的不成功暗杀转变成了政治优势。第一次刺杀发生于奥普战争前夕，在近距离射击的范围内，而第二次几近成功的刺杀则发生在抗议反天主教的五月法令的活动中。俾斯麦将缴获的两件武器作为办公室的战利品装饰。他曾挥舞第一把枪，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而在文化斗争期间煽动反天主教的情绪时，第二把枪则成了他非常有用的道具。[2]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刺杀威廉皇帝，但艰难的时世加上街头的抗议让俾斯麦轻而易举就能够指控是其政治敌人蓄意而为。第一次谋杀未遂一周之后，反社会主义法案（“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公共治安法”）被提交，这个草案剥夺了所有社会主义组织的集会和言论自由。虽然草案以 5∶1 的票数遭到否决，但草案掀起了持续三年的对“破坏分子”的讨伐声浪，并取得了想要的在此之后噤若寒蝉的效果。第二次谋杀未遂之后，俾斯麦启用了他非同寻常的紧急权力并以全体同意的表决方式解散了议会。然而，内阁大臣们否决了俾斯麦的军事法案请求，法案要求招募 1 000 名新警察并对进出柏林的通道设置警哨。[3] 在接下来的新一轮选举中，民族自由党丢失的席位比保守派获得的席位还要多一席，双方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次年，即 1879 年，新的关税法案生效，俾斯麦完全走上了与民族自由党派分道扬镳的道路。[4] 220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俾斯麦可以更少地采用政治妥协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规划。虽然历史学家们在某种程度上视之为一种“转向”，但俾斯麦深谋远虑、先发制人的统治方式看上去更像是在表明，他执掌的政府在经历了与自由党人以及天主教会的斗争之后得到进一

---

① Ibid., p. 93; Pflanze, *Bismarck*, II, pp. 391—393.

② Pflanze, *Bismarck*, II, pp. 233—237.

③ Ibid., pp. 394—402.

④ Gall, *Bismarck*, II, pp. 99, 101, 105—107; Craig, *Germany*, pp. 96—97.

步的加强。[①] 现在，俾斯麦颁布了反社会主义法案，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梦想，法案的实施始于 1878 年，持续到 1890 年。俾斯麦统治实力的增强并未能阻止议会党团更势均力敌地分裂，以至成了一个死结。情况和以前一样，要么是宰相的目标无法满足反对派的要求，要么是反对派的意图超出了宰相认定可行或期许的方案。俾斯麦的批评者们指责他阻碍时代的发展，而他则指责批评者们试图超出他们的范围多管闲事。考虑到时代的要求，俾斯麦游走在新德国和旧德国之间进行调和的方式虽然充满争议，却也不失为一种值得肯定的选择，他将一个内部纷繁复杂的年轻国家聚合在了一起，这种聚合却也伴随着剧烈的成长的疼痛。[②]

2. 柏林会议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既增加了欧洲对德国扩张的担心，也提升了德国人自身的担忧，他们担心欧洲会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弗里德里希大帝时常有一种“被恶棍包围”的感觉，与此相呼应，俾斯麦高调谈论着“关于联合的梦魇”。[③] 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年代里，德意志的立法权和军事力量都被外国势力所掌控，对内对外服从命令、保持警惕是德意志生命攸关的事情。对国土安全的关注严重阻碍了德意志寻求国外殖民地和国际声望的步伐。这对于令人引以为傲的新的德意志帝国来说，是一种苦涩的自我否定。

221

1878 年夏天，两次企图刺杀威廉皇帝的事件过后不久，出于对全欧性冲突的担忧，奥地利、法国、英国以及俄国和德国举行了柏林会议。这是对德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地位的致敬。在柏林会议召开之前，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俄国成功地将其军队开进了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这一重要事件使得俄国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主导者，使俄国战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殖民地世界。1878 年 3 月，土耳其战败，被迫

---

① Gall 把俾斯麦的“转变”描述成寻求“创造和维持他自己营造出来的形势而不是要适应新的形势并利用它们”。*Bismarck*，II，pp. 58—59，88—90。

② 参见 ibid.，pp. 110，113—114。

③ Raff，*A History of Germany*，pp. 161，165，170；参见第七章。

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这一条约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奥地利、英国以及德国对于他国的所作所为极为担心，也都准备限制俄国以土耳其和奥地利为代价进行的扩张。列强都不想在巴尔干地区开战，遂召开柏林会议，以劝导俄国自愿修改条约。由列强挑选出来领导这一困难的外交活动的国务政治家就是俾斯麦。①

除了巴尔干的危机之外，会议也重申相关规则，即每一个成员国都应约束对他国的行为。这一信息明显是特别针对新的德意志帝国的。这一指导原则要求，每个成员国在世界舞台上追逐自身利益时，不得践踏另一国的核心利益。日趋减小的土地或许会造成微小的纷争，但它不会挑起列强结盟的形成并由此导致全欧洲的暴戾肆恣。德国主要关注两点，都与俄国有关。俾斯麦通过在外交上倾斜于英国和另一个宿敌法国来制约俄国。在历史上，正是法国与外国的联盟给德国人带来了灾难。②

俾斯麦的治国才能以及各主要国家间独立地达成的各项协议挽救了和平。这位德国宰相如英雄一般辞别了柏林会议。后来，在他退休期间一直到逝世，欧洲社会对他在外交上的成就无比崇敬，铭记在心。

3. 皇帝威廉二世

1888 年，病痛缠身的威廉一世长子、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成为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但其在位仅 99 天。时年 29 岁的弗里德里希长子威廉继承父位，是为威廉二世。他的母亲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公主。同他的父亲一样，年轻的威廉也笃信政治自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现代人，对未来踌躇满志，甚至如果俾斯麦和议会阻挡他前进的道路，他会将他们统统踢开。尽管年轻的威廉和业已 73 岁的俾斯麦在政治阅历方面差距很大，但此刻两人之中俾斯麦却更加脆弱。顽固的保守派在整个 19 世纪 70 年代一直怀疑俾斯麦的政治意向，现在他们要求他为反容克地主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天主教中

222

① Pflanze, *Bismarck*, II, pp. 434—438.

② Gall, *Bismarck*, II, p. 57.

央党力量的壮大承担责任，前者力量的壮大可归因于俾斯麦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后者则受益于他对于文化斗争毫不留情的起诉。[①]

威廉二世一旦成为皇帝，俾斯麦不停地叫唤着狼来了，试图把自己变成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宣染无产阶级大起义的幽灵正在逼近，政府处于无秩序状态，而这些只有他才有经验来加以制止。然而皇帝的理想主义观念和缺乏经验使其在面对危险时表现得无所畏惧，而在推行国内政策时则缺乏自信。面对俾斯麦的叫喊，威廉二世的反应就是缴俾斯麦的械。他对俾斯麦在伤害之外再加侮辱，完全继承了俾斯麦的自信和对抗方式。[②]

两代人之间一年半的分歧随着俾斯麦的辞职而告终。这位伟大人物曾将威廉二世已经列入议程的劳动保护法案搁置一边，却力挺另一针对社会民主党派的惩罚性提案，以此来确保自己的攻势。威廉二世的祖父对俾斯麦的才华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一位天才，可以给予其自主决定的自由，如今，自负的孙子却也需要这种自主决定的自由。[③]皇帝命令俾斯麦撤回他的议案，最近的民意调查也让俾斯麦遭受重大挫败，他意识到，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遂于 1890 年 3 月提交辞呈。威廉对此事件的解释是："不是霍亨索伦王朝下台，就是俾斯麦王朝辞职。"[④] 俾斯麦的谢幕并不光彩。他长辈式的退位给威廉皇帝一个警示：他的政策可能领导这个民族走向战争——事实证明，这一劝告具有先见之明。[⑤]

223

① Hull,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pp. 79—80.

② Gall, *Bismarck*, II, pp. 200—203; Hull, *Kaiser Wilhelm II*, p. 80; Pflanze, *Bismarck*, III, pp. 350—377. 见 Jan van der Kiste 最近对于威廉的特点的研究：*Kaiser William II: Germany's Last Emperor* (Gloucestershire, 1999).

③ 柏林的有识之士给俾斯麦取了个绰号"威廉的最后情人"。他用自己的方法跟威廉相处极为成功。Pflanze, *Bismarck*, I, p. 309; II, pp. 276—278（1875 年威廉拒绝了俾斯麦的辞职请求），pp. 507—508（柏林会议以后，威廉敬畏俾斯麦，称"俾斯麦比我更有用"），pp. 514—516（在他们之间"最坏的对抗"之后，威廉压制俾斯麦）。

④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176.

⑤ Gall, *Bismarck*, II, pp. 213—214;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172.

3. 德意志历史的帕拉丁[①]

俾斯麦担任宰相时期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他对自由派、中产阶级和议会制政府完全不信任。正如他年轻时就公然抨击官僚主义者和立法者的僵化，他曾发誓他绝对不会成为那样：“（政府）大脑和四肢像长了肿瘤；只剩下腹部是健康的，它制定出的法律就是它在这个社会上的最直接的排泄物。”[②]

俾斯麦认为，他这种具有超常权力的宰相统治下的国家，如果处于这种僵化的政府的治理之下，不可能长治久安。在德国的竞争敌手可能联合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德国需要一种极权政治，即灵活而规范的君主政体和官僚制度。[③] 俾斯麦在致力于创建这种国家的过程中树敌众多，且一度离开公职，因此他对敌人长期暗藏的蔑视非常敏感。1895 年俾斯麦 80 寿诞，议会拒绝为他举行预期的庆贺和问候。对此，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群起责备，他们都视俾斯麦为致力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朋友。迫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抗议声浪，皇帝后来向俾斯麦表达了歉意。[④]

对俾斯麦的这种羞辱，不仅意味着德国抛弃了这位宰相，也否定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德国历史。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评论家们而言，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还没有达到非常合适的版图。大多数评论家认为，俾斯麦宰相任期之内所取得的各种发展进步，诸如国家的统一、工业经济、干预型国家以及政府统治的国际化体制等，即便没有俾斯麦，也会发生的。[⑤] 尽管许多同时代的人们认为他的存在使得一切与众不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根据俾斯麦的历史哲学，他也许已经 224 承认了这种看法。他就曾经嘲讽伟人造就伟业的观点。

---

① 帕拉丁（Paladin），查理曼部下十二骑士之一，喻为随从、追随者。这里指俾斯麦。——译者注

② Gall, *Bismarck*, II, p. 7.

③ Ibid., pp. 113—114.

④ Ibid., pp. 226—228.

⑤ Ibid., p. 234.

时至今日，纵然富有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也以具有讽刺性的语调来看待俾斯麦，认为是他把德国带入了现代世界，但又尽一切可能阻止国家的前进。这种归纳特别容易让人误解性地联系到当时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俾斯麦对此是完全支持的。俾斯麦自己的投资产业得到银行家罗特希尔德和布莱希罗德很好的经营打理，这让俾斯麦成了富有者，同时他也是德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1] 另一方面，令他最痛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依然与现代性有关，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不断提升的社会期望，这只能诱发各种超越社会所能达到的目标的革命。基于这种认识，俾斯麦认为他身处一个愚昧黑暗时代，与现实渐行渐远。

1866 年，当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取得胜利凯旋归来时，威廉国王亲自迎接俾斯麦，向他致敬。回忆起这些事情，俾斯麦认为自身已囊括了这个时代的智慧。普鲁士在取得对奥地利的胜利后，国王已经对其信任有加，而俾斯麦却更愿意相信，是上帝的力量笼罩在他的身上。他将这种力量称为“（政治和战争）事务中值得好好学习的一课”，换言之，“一个人如果能在任何时候发现自己将在下一个时刻像孩子一样走入黑暗，那他就能像这个世界上的智者一样聪明”。[2]

就现实目标而言，面对历史的不可预知的转折，哲学家和革命者的完美的梦想无法对抗以血和铁的方式来行事的原始激情和原始冲动力。在俾斯麦的有生之年，德意志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这并非因为伏尔泰或康德的教导，也绝非是 1789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影响所致，而是因为德国人民在应对敌人强加于他们的诸多苦难时，作出了开创性的反应。

---

① Ibid., p. 5.

② 引自 Gall, *Bismarck*, II, p. 29。

第四编

现代德国

第九章　最后的帝国：从威廉二世时期到魏玛德国

227　俾斯麦离去之后，德国已经不再需要他这样的人物。不过，当这位老宰相辞职之时，他其实早就有甩手不干之意。最后，由于多变与偏执，他对自己一手创立的政府失望之极，甚至想颠覆它。他的身后留下了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人等已经牢固盘踞于议会中的党团势力，而社会民主党则是他的劲敌。俾斯麦离去后，这些议会党团势力给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带来了可怕的挑战，而威廉二世却缺乏俾斯麦的领导能力和建构与击败政党联盟的技巧。另外，新皇帝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一窍不通。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位外孙心态浮躁，在提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方面野心勃勃，他竟一反常态地将英国作为敌对目标，而德国的生存和欧洲均势都却有赖于英国的信任和中立。

一、倒退与过渡

228　起初，威廉二世似乎是所有自由主义者梦想中的君主。种种迹象表明，就像“四八年革命者”热心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遗产一样，威廉二世在执政初期也是相当开明的。他支持为童工和女工改善条件的进步立法（如缩短工时，更好的工作条件，增加福利和新的申诉程

序等)，他也反对俾斯麦在1878—1890年实施的各项反社会主义法。尽管他的左臂在出生时受损而萎缩，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完美的德国男性：一位拥有六子一女的父亲，一位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和一名痴迷的猎手。然而，在他的政治举动背后，他的私人生活却温和而又有绅士风度，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极其复杂的人。[①]

威廉二世与他的皇家先辈们一样，坚信自己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乃直接拜上帝所赐。他无情地解除俾斯麦的职务一事清楚地表明，他不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可怜的应声虫。他直接插手议会事务，并随意而有效地挑战议会的权威，从而削弱了代议制政府，同时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无人加以监管的自己的手中。[②]

然而，如果说威廉想要集皇帝、首相和议会于一身的话，那些反对他的政策的政党和职业官僚们也想这么做。与之对立的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自由派期望能主导立法机构，控制听命于皇帝的大臣们，以期实行一种有效的选举君主制度。这会导致出现一个发号施令的多党制议会，无异于退回到了中世纪，自然会经常地激怒威廉。[③] 军费预算和自由党投票者人数的双双增长证实了德意志国家中的这两大对立的发展方向，就威廉皇帝而言，他是温和的中间路线派，这一点在有关主导性党派的问题上尤为突出。

从德国统一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的43年里，德国人口增长了60%，达到了6 800万。只有美国拥有比德国更高的生产能力。从

---

① Giles MacDonogh, *The Last Kaiser : The Life of William II* (New York, 2000), p. 69. 在伊莎贝尔·赫尔看来，威廉是同性恋但是没有确实地付诸行动。据说他跟菲利普·冯·欧伦堡王子有亲密关系，他们一起领导了“利本伯格圆桌会议”，也就是一年一度的双性恋者的聚会。*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1888—1918* (Cambridge, 1982), pp. 21, 52—53, 133. Kitchen 认为，威廉二世是在一个“同性恋和易装癖者的圈子中”。*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p. 215。

② “威廉通过自己的投票干涉国会的决定，在官方文件的空白处批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反对无穷无尽的政策声明。”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403.

③ Ibid., pp. 402—405, 418—419;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87—193. 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议会君主国，在这个国家里，大臣们对德意志帝国国会负责。” Ibid., p. 192。

229 共同价值和民族自信心来看，那时的德国已到达了社会发展的临界线上。[①] 虽然政治统一和殖民扩张上的障碍依然存在，但德国人相信自己的文化历史最悠久，注定要主宰欧洲国家。1890 年起，Deutshland über Alles[②] 开始在学校和国家节假日里唱响，这种跨地域的德国国歌培育着一个民族的认同感。[③]

世纪之交的德国人还对与他们的名字一样的古老历史的品质引以为荣，那就是良好的秩序。1590 年，一封自纽伦堡发往英国女王的英国外交信函中就提及说：这里的街道与伦敦不一样，没有粪便；如有人在白天丢失钱夹、手镯或戒指，很可能在太阳落山之前物归原主。[④] 尽管德国人相对较为贫困且有些狂热，但 19 世纪晚期德国城市都呈现出了这种淳朴的秩序。现代历史学家们警惕地发现，这是一种在后现代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笔下称之为“监狱型社会”（carceral society）的社会，它与 20 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历史关联。有人认为，即使 19 世纪的德国人也并非天生驯良，但是他们身处具有纪律约束机制（学校、收容所）的环境中，从而有助于一种“臣仆精神”的形成。一位历史学家震惊地写道，有 91 000 名居民的杜塞尔多夫警察局在一年内访问并征询了 13 500 名父母对孩子的看法。[⑤]

尽管马丁·路德的《教义问答手册大全》写于在 4 个世纪以前，但书中对第四诫命的讲解给杜塞尔多夫的警察行动提供了并非不合时

---

① 在阶级冲突和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声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价值“共同基础”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相信财产、成就和法律，倾向于规范、名望和正确的品行，家庭是勃勃雄心的避风港湾”。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351—352, 364. 关于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见：Dick Geary, “Socialism and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Before 1914,” in Dick Geary, ed., *Labor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Europe Before 1914* (Oxford, 1992), pp. 101—136。

② 德语，意即“德国至高无上”。——译者注

③ Blackbourn, *Long Nineteenth Century*，第八章。参见 Roger Chickering, *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Pan-German League, 1886—1914* (London, 1984).

④ William Sm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ittie [*sic*] of Noremberg… 1594 [English-German]”, trans. W. Roach, *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Stadt Nuremberg* 48 (1958): p. 222

⑤ E. G. Spencer, *Polic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German Cities* (DeKalb, Ill., 1992), 65—66，引自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381—383；另见：pp. 370, 374.

宜的解释和有可能是真正的启发性的论据。作为一代代德国路德教徒相传并沿用至今的元典性书籍，这本宗教指南认为，城市的地方行政官受到就职宣誓的约束，要光荣地为市民服务，作为回报，市民应该"忠诚地"服从他们。在德国古典传统中，路德的《教义问答手册大全》宣称民众要服从所有的权威（alle Obrigkeit），这是人民和政府之间重要契约的核心内容，德国的天主教也有这样一种情感。路德以不同寻常的现代脉搏发出了他的教导，那就是，孩子们不仅仅属于他们的父母。对一个孩子来说，所有成年人都是权威，包括学校的教师、店主或市政大厅的文职官员等，他们都有责任将孩子置于他们的关爱之下，保护和纠正他们的行为。反之，孩子在面对父母说教时，也有责任聆听他们的教导。[①] 230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著作中，德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学者们都从早前的德国社会和政治分裂的事例、尤其是"三十年战争"中，对德国人的良好秩序得出了相似的结论。[②] 与产生于意识形态或所谓的变态的各种看法相比，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教诲以及告诫性的寓言在对德国人的守纪和警惕进行解释时贬抑更少一些。

不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在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民众的文化开始碎化。在贸易与工业、农业、行政机构和军事等领域中，出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内向型职业协会和联盟。政党在这些团体里发展了自己的核心机构，而这些集团则反过来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游说政府集团。在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社会群体中，工业无产阶级在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而社会民主党则在 1890 年以后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并在 1912 年的大选中获得

① Ozment, *Protestants*, pp. 107—108;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83)，第四章。对年轻人和普通民众的监督既不是特别的镇压也没有取得成功，而只是阻止了逃课和有助于德国人取得"令人羡慕的扫盲率"。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383。

② 见 Cramer 的调查："The Lamentations of Germany"。

了 1/3 的选票。[①]

到 19 世纪末，这些联合团体和游说集团已经加大了德国内部的政治裂痕。在告别旧的等级社会后，新的创业者的成功将新的政治、社会和职业团体带入了权力地带，这些新的政治、社会和职业团体则反过来诱发了新的派别，进而威胁到 1871 年以来所取得的内聚性的民族文化的进步。[②] 就像皇帝和国会一样，19 世纪晚期的团体政治也呈现某种向古老的、分裂的德国倒退的迹象，只是现在混杂了一些新的不祥的因素。在德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统治者能像威廉二世那样拥有更大的然而却没有什么实践经验的指挥棒，也没有往日曾引导德国人道德和宗教的自明之理较之 20 世纪初的时候更让人疑惑和受到蔑视。

1. 玩火

231 与威廉二世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相对应的是正在解体的颓废（fin-de-siècle）知识分子文化。两位主要的代言人就是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他们对新德国和旧德国都感到失望之极，并且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唯一肯定的现实。这些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们驱散了由康德、黑格尔和歌德引导的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的自由温和的启蒙运动，这好似一个轮回，就像这些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取代了丢勒、皮尔克海默尔和路德领导的 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一样。同样的不祥之兆是，1871 年以后出生的已经清醒过来的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将他们父母的文化换成了他们自己的臆想出来的更纯洁、更真实的神话世界。年轻的德国人在新的“后统一”（postunification）的社会中追寻着自由和冒险，到处高谈阔论。在这一过程中，煽风引火者、军国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人数大幅增

① Lerman, “Wilhelmine Germany”, in Fulbrook, *Modern Germany*, pp. 201—202;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81—182; Schulze, *Germany*, p. 175.

② Nipperdey, *Germany*, pp. 228—229. 尽管新的社会团体也分离了新的社会阶级，但一些地方性的社团组织却把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联合在了一起。Ibid., pp. 234—235。

加[1]，其人数不亚于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多。

然而，很少有德国人会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实际成果感到折服。当然，这些成果并非科学技术的产物，也非经过努力所取得的个人以及全社会所享有的诸种自由。与这些进步相伴随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建设性批评框架，它使得发明和变化成为可能并继续发展。然而，最有益的且没有争议的是，一个国家中让人担忧的新物质主义思想以及受其侵蚀的灵魂仍然具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所拥有的各种历史宗教和哲学价值观，他们从未忘记内心的精神生活。生活在一个在经济、工业迅速崛起和官僚机构、军事力量突然膨胀的年轻国家中，许多德国人都疑问这些是否都是真实的。[2] 当然，如果说德国人在威廉二世时期过得很压抑，或者说他们渴望第一世界大战能成为清扫一切的神明，那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但很多德国人都在寻找遗失的东西。[3]

就像德意志帝国后期所出现的情形那样，当社会在各个层面发生冲突时，手中的补救方法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既有已证实的，也有以前不为人知的。罗马天主教教堂曾统治了德国人的灵魂近千年，甚至在无神论盛行的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也有1/3的德国人是它的信众。在文化斗争中，教会也如中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给虔诚的德国人提供着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先验选择和一种对德意志国家的政治选择。 232

现世主义者、绝大多数的新教徒以及许多德国天主教徒都认为，教会对现代主义的反抗姿态是落后和迷信的表现。除了传统的基督教以外，新世纪的哲学和万验灵药也很多。他们向德国各个阶层发出呼

---

① 参见 Schulze, *Germany*, pp. 176—179. 关于魏玛时期（20世纪20年代）青年的边缘化，见：Detlev J. K.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trans. Richard Deveson (New York, 1989), p. 94。

② 有关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参见：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第七章。Hans-Ulrich Wehler,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trans, Kim Traynor (Oxford, 1985)：经济和工业方面：pp. 32—51；军事方面：pp. 146—170；军备支出：p. 142。

③ Thus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385, and Schulze, *Germany*, p. 182. 有关历史编撰方面的争论，见：Blackbourn,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London, 1987), pp. 45—54, 217—245。

吁并引导许多人远离主流宗教，使之接受理性开明的世界观。[1] 如果说德国算不上欧洲信教最虔诚的国家，那么它也是自宗教改革以来神学领域参与度最高的地区。由于这样一种文化水平，或者说尽管有了这样一种文化水平，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放弃了传统的宗教庇护，转而接受启蒙理性、经验科学或者后启蒙时代的各种非主流运动。在这个转变的背后，隐藏着让人十分熟悉的数个世纪以来遍及全欧洲的对主流宗教的疏远。在德国，这种推进力量来自于它的生机勃勃和引以为自豪的理想主义，这个年轻、有成功决心的国家似乎正处于他的“零点时刻”上，也即处于它的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种满怀希望的想法是与现实相背离的。它使人联想到为逃避之中的朝圣者的灵魂而迅速搭建的各种避难所。许多浪漫主义者迅速成为过时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追求相对克制的教皇极权主义，其他人则是追求精神的或种族的沙文主义。还有无数的人通过完全逃离现代社会来渴求宁静的思想和提升灵魂，就像戴维·布莱克本所说的，他们自我陶醉于“心理学、性学、体育文化、医学、人类学、超自然问题、招魂术、佛教以及托尔斯泰的田园幸福观”。[2] 在这些超越历史和传统的研究中，很多先前温顺的德国人展开了新的翅膀，以最近的距离，去扇旺新时代的激情。

233 托马斯·曼就德国伟大的警示故事《浮士德》推出了他的现代型版本。作者本人一生跨越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和战后德国等几个时期。在这一新版本中，他回溯了自己一生所见证的德国历史，以纪念德国社会的变迁。在 1947 年最新修订的浮士德故事中，他赋予了这个曾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著名主人公以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特性以及他生活的事情。浮士德博士的现代化身是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库恩，他在与魔鬼约定的一次性接触中染上了梅毒，此后

---

① 见第八章。关于文化斗争，见：David Blackbourn, *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93), pp. 85—91。

②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397—398.

遭受严重的瘫痪、精神错乱，直至死亡。[①] 很显然，托马斯·曼站在德国古典传统的立场上反对19世纪的虚无主义。他塑造了一个好的德国人，即讲述者色勒努斯·采特勃洛姆，他就像歌德笔下浮士德最后扮成的样子：一个心安理得地按原则办事的人。

二、卷入世界大战

从文化上看，19世纪晚期的奥地利—德国社会是偶像崇拜反对者的世界，而这些偶像崇拜反对者自己却成了偶像，例如哲学领域的尼采，心理学领域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领域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音乐领域的理查德·瓦格纳，文学领域的托马斯·曼，社会学领域的马克斯·韦伯等。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最后一个皇帝威廉二世是相关学科的重要资助者，同时也是更大的干涉者。尽管他自己主要投身于政治生活，甚至将其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他没有上述诸位拥有的才能。[②] 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辞退了俾斯麦，这更多的是出于反对当时的氛围而非出于英勇行为。当时的人们更关注的是，诚如老宰相在屈尊的辞职信里已经指出的那样，威廉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俾斯麦通过把整个德国置于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周围并保持德国对外交政策的重视，使德国成了强国。他通过这种方式战胜了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试图永远维持那个处于长期分裂和邦国敌对之中的老迈帝国的企图。紧密坚实的帝国使这位宰相能够更容易腾出一只手去对付议会和欧洲列强。德国成了诚实的掮客，它将其在中欧的地理位置转变成了维护和平的国际优势，而不是在欧洲投下可恶的帝国阴影。

234

与俾斯麦相反，威廉皇帝通过规划德国的扩张而挑起国际冲突。他下决心要使德国成为世界大国，使德国称霸欧洲，并开拓殖民空间。尽管没人会知道这样的结果如何，但帝国政府的每一个命令都是通向战争之路的步伐。

---

①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p. 293.

② Matthew Jeffries, "Imperial Germany: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Trends," in Fulbrook, *German History*, pp. 186—187.

然而，如果说俾斯麦设计的均势欧洲一开始看上去就像用纸牌搭建成的玩具房子那样不甚可靠，那么，威廉也不该单独受到指责。与皇帝的干涉和莽撞相比，帝国新宰相莱奥·冯·卡普里维所依赖的外交部门的最终误判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要大得多。曾为海军部负责人的卡普里维是德国为应对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快速变化所作出的一个拙劣选择。他迅速陷入了对当时的海军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的言听计从之中，而荷尔施泰因虽由俾斯麦在任时任命，却对俾斯麦怀恨在心。在荷尔施泰因的建议下，卡普里维没有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自 1887 年以来，该条约保证一旦别国从西方或南方入侵德国时，俄国保持中立。卡普里维声称，该条约对俄国有利，因此他更倾向与当时欧洲的超级大国、更具重要性的英国结盟，指望在交战时能得到英国的外交干预或在德国遭到攻击时能得到英国的援助。

再保险条约终止还不到 5 年，法国与俄国就变成了贸易伙伴，而在再保险条约终止两年多时间以后，两国又成立了防御同盟[①]，相互承诺当德国对一方做战争动员时，另一方也参与对德攻击。[②] 突然间，德国陷入了自己非常害怕的强国钳形夹击下，而如果续签再保险条约，德国就可以避免这一危险。而当英国必须出来选择其立场时，德国人又不幸成为其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手。

235 1894 年，威廉二世展示了他对主要大党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主义者的手腕，这些党派起初还将他视为盟友。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威廉二世表达了工业界巨头们的担忧，支持新的反社会主义立法和审查法案，而这两个法案都未引起国会的强烈反应。在国会的混战和皇帝所准备的支持或背叛之间，在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已经很难看到 19 世纪中期以来德国人曾经二者必居其一地追求和破坏的民主政治。[③]

---

① 1890 年 3 月，再保险条约终止。1892 年 8 月，法俄同盟建立。——译者注

② Craig, *Germany*, pp. 231—239.

③ "'负责任的政府'的逐渐弱化同时也会受无情的君王压力的支配。" Lerman, "Wilhelmine Germany", p. 209; Kitche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pp. 217—218。

英国一方面与法国和俄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圆滑地进行竞争周旋，另一方面则对德国不顾一切地确立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地位大开外交之门。如果没有英国的中立，德国将不可能在19世纪90年代在殖民地和欧洲取得飞跃式的发展。但在世纪之交后，英国逐渐停止了与德国为友的政策。威廉稳步的建军步伐，使德军变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尤其更具有挑衅性的是德国的海军，它引发了欧洲人的巨大恐慌。建造战列舰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迷思，到世纪之交时，德国已建成至少38艘战列舰。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将目标直接对准了英国皇家海军，这是一场德国没有取胜机会的竞争。[①] 在南非殖民地大胆试探了英国的勇气[②]后，德国开始面对英国和法国的新合作。英法双方在1904年进入了协约友好阶段，此后，这种协约友好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大。

早在1907年，英国的外交官宣称，德国"明显地要统治欧洲"。而沙俄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德国，它因此开始与英国接近。[③] 在达成各自尊重对方在亚洲的殖民势力范围的协议后，两个大国和法国一起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然而却是令人恐怖的、德国最害怕的对手们组成的联盟，而俾斯麦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曾使德国人避开了这种联盟。如果战争要爆发，或者说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如今必须面对东西两线的进攻，而它却只有那个只顾自己的奥匈帝国以及曾经退却的意大利作为盟友（这就是老气横秋、缺乏生机的三国同盟）。总的说来，正是德国自己沙沙作响的军刀以及它的冒险，使它成了列强关注的中心。

通过1908年10月威廉二世接受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报的一次采访，德国老百姓就已经能够看到，德国政府正像在 236

---

① Kitche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pp. 220—223。关于德国在战争进程中的"吞并和称霸方案"，见：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pp. 28—29；Lerman, "Wilhelmine Germany", p. 215；Geoff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Boston, 1986), pp. 110—153 (against V. Berghahn)。

② 这里指世纪之交的英布战争中，德国支持布尔人对抗英国。——译者注

③ Lerman, "Wilhelmine Germany", p. 224.

走空中钢丝，将整个国家置于相当危险的局势之中。威廉二世的举动就仿佛自己是一位知情人，他以教训的口气指出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各种弱点，与此同时，他又明确表示，德国在军事扩张和在殖民地的袭击方面是清白无辜的。国家在纪律和诚信上的明显堕落使两国政府都觉得尴尬，以至于威廉二世被迫牺牲掉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夫，因为他没有对这次采访提出看法。[①] 到1909年，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竞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趋向对抗，在两国外交部门和高层都开始紧张不安地讨论未来前景。[②]

当然，没有人愿意让其演变成世界大战。当战争突然爆发时，它并没有发生在北欧，而是在长期危机四伏的巴尔干地区，这也不是大国间攻防所引起的战争，而是由于一些小国长期受到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挤压，发泄地方性的不满而引发的。几十年来，塞尔维亚领导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冲击着奥匈帝国的大门。塞尔维亚尤其不满的是，1908年以后，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而奥地利的兼并行为得到了塞尔维亚盟友俄国和奥地利的盟友德国的认可。奥地利为了寻求俄国的支持，曾许诺同意俄国的战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使其有机会成为地中海大国，但英法两国是不允许俄国这一古老梦想成为现实。[③] 结果是，塞尔维亚和俄国迁怒于奥地利，从而震动了三国同盟的核心。

德国的过度殖民扩张进一步恶化了欧洲国家间的关系。1905年和1911年，德国人两次卷入法属摩洛哥危机。1911年，他们用不正当手段攫取了法属刚果的部分土地。然而，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不仅仅是一小块殖民地，德国为此付出的外交代价要远远大于他们的所得。德国方面宣称，为了保护在摩洛哥的德国公民，德国海军有必要进入摩

①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426—427, 443, 446; Kitche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pp. 223—224;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202—209.

② Avner Offer, *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1989), pp. 4—5.

③ 参见第八章，柏林会议。

洛哥。于是，一艘炮艇驶入了阿加迪尔港口，迫使法国做出最谦恭的表态。这一行动警告了英国，使得1904年以来亲近的英法关系继续升温，转变为正式的反德同盟。

德国在近东和远东的殖民版图上同样留下了无关痛痒的印记。需要数十年时间来建设的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给人印象深刻，它打开了与奥斯曼贸易的大门，并方便地获得了中东石油。冒险的德国人在中国也得到了一处煤矿，并在那里修建很大的酿酒厂。[①]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打湿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冲突的火药桶，也没有减弱德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新挑衅。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特·丘吉尔在得知德国政府指挥着军队和海军，且相信政府凌驾于自己的议会之上时，便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似乎预示着战争将至。[②]

1912—1913年，巴尔干地区再次卷入战争之中，其中既有巴尔干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也有巴尔干各国之间的战争。塞尔维亚人成为最大的赢家。此后，塞尔维亚寻求在亚得里亚海得到一个港口，以便建立海军，这就引发了与奥匈帝国的新危机。当奥地利叫嚣着对塞尔维亚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和皇储弗朗西斯·斐迪南德大公却吃惊地发现，许多奥地利人竟期望和平解决以避免战争。由于被指责为亲斯拉夫人，奥皇和皇储两人就成了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好战分子的攻击目标。1914年6月28日，明显受到了塞尔维亚支持的波斯尼亚恐怖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刺杀了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他们的死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奥地利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这样一种处境之中，即只有在假定得到德国支持的情况下，它才能稳固它在斯拉夫地区的利益。

当然，德国也想在欧洲范围内证实自己的实力，但它没有必要通过拖延和扩大巴尔干战争来证实这种实力。然而，奥地利人与德国人有着共同的血统与历史联系，阿道夫·希特勒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

①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p. 218;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198, 120.

② 引自 Lerman, "Wilhelmine Germany", p. 224.

因此，他们强烈影响了他们的德国同胞。与此同时，野心和机会主义也是将德国推入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的动因。很多人认为，德238 国的国内政治问题是德国卷入巴尔干战争的根本原因。战争使德国有了建立德国人控制之下的中欧地区新市场的机遇。对于这一点，德国的精英们在战争爆发前的年代里就已讨论了这种想法的可行性。[①] 然而，直到1914年9月底，当德国军队陷入到马恩河沿线的泥泞战壕后，德国的高层才预见到这场战争比原先预计的更长，开始支持广泛的兼并计划。[②]

德国方面精心设计的占领中欧的计划姗姗来迟，直到战争爆发后才制订出来。虽然它自始至终采取的是进攻战略，但起初的设想只是进行一场防御性的战争，许多国家比德国更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③] 不过，在当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统治欧洲的特别计划。然而，到1917年，所有战争参与国对战后的期待都一下子迸发了出来。德国在东线击败俄国后对其苛刻的对待表明，如果他们也能在西线赢得战争，他们乐意横扫欧洲。[④]

但在1914年7月，即战争打响之前，德国还是权衡了它支持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后果。奥地利的高层依仗德国盟友的支持，要求俄国向塞尔维亚提供紧急援助前住手，以确保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快速征服，对此，德国人也答应了奥方提出的各种要求。7月19日，奥地利用最强硬的措辞向塞尔维亚提出10条最后通牒，要求48小时内答复，内容包括要求立即取缔反奥宣传以及按照附带的指控名单逮捕参与暗杀大公的塞尔维亚军官等。[⑤]

---

① 弗里茨·费舍尔的经典研究是基于学术界对德意志帝国时期和后帝国时期的意向性讨论基础之上的。参见引言，以及 James Joll 的讨论：*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84), p. 5, and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457, 480。

② Joll, *Origins*, p. 143.

③ Ibid., p. 196.

④ With ibid.,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454, 480—483.

⑤ Walther Schücking and Max Montgelas, eds. *The Outbreak of the World War: German Documents Collected by Karl Kautsky*, supplement I (New York, 1924), pp. 604—5; Joll, *Origins*, pp. 11—14.

与正在做战争动员的塞尔维亚一样，俄国人也将最后通牒解读为宣战，并开始战争动员。当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在准备战争时，德国人的注意力放在了俄国的盟友法国身上。7 月 29 日，俄国继续准备全面战争。第二天，当各方都在虚张声势时，德国以同样的语气回答说，最后一批精锐战士也已经准备完毕。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支持并没有阻止俄国人，同样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也没有延缓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步伐。在所有的和平期望落空以后，四大国开始展示自己的野心，发出最后通牒并且把军队开上了战场。[①]

239

德国军方很早就在制订相关作战计划，以应对他们最担心的局面，即与俄国和法国两线作战。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早在 1905 年就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在 1913 年去世前他还定期地对这份作战计划进行修改。这一作战计划可谓是一场进攻性战争，它计划让德军像潮水般越过比利时及其南部区域，直捣巴黎，横扫西方。然后他们再从巴黎掉头向东进，在俄国的西线来迎战预想中的动员迟缓的俄国。所有这一切，都是设定在两大强国对德国夹击的漏洞和不知情的闪电战的基础之上。[②]

这一计划的成功取决于 3 种可能性：德国人能灵活地调动军队（绝对不能陷入僵局）；在众多支部队中，必须保障军队由西向南再向东运动时的物资供应线；当德国军队借道比利时进入法国后，英国继续保持中立。然而，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了，因此，施里芬计划似乎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场持久性的战争。

三、战争的代价

为了避开法国东面侧翼的防御性工事，德国人在 8 月的头 3 天里就占领了比利时，但速度还是不足以迅速直捣巴黎并击败撤退的法军。

---

① Joll, *Origins*, pp. 10—14, 16—18, 21—22.

② 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1999), pp. 22—48.

第4天，当德国士兵开始喘息时，英国派遣来的远征军与他们遭遇了，从而进一步打乱了了施里芬计划。在确信战争来临后，英国、法国和俄国开始寻求各种方式援助对方来阻止德国的进攻。虽然对有关发动战争的谴责可能会落到在几个国家身上，但正是德国的巨大冲动，才使得殊为勉强的3个协约国在1914年夏末秋初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德国军队。

在长达4年的战争中，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是缓慢移动的战壕战，士兵在挖掘的战壕里面整月地驻守，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1914年9月，双方在马恩河沿线形成了拉锯战，法军和英军在那里站住了脚跟。德国人虽然越过了边界打击法国，但没能进一步深入。在此后的战争中，人们看到了坦克的出现、无限制潜艇战和美国大兵的到来。此时，在铁丝网、机枪和毒气面前，战争的浪漫和荣耀都变成了可怕的死亡。

1916年后，东线的德军取得了更多的胜利。在这里，他们有更大的机动性，而且拥有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等更英明的指挥官。他俩分别担任军队最高司令官和军需司令官。1914年的坦能贝格战役中，德军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俄军和德军的损失比是5:1。此后到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已家喻户晓，他们也成了战后魏玛共和国的未来主角。

由于战争陷入毫无希望的困境，而且形势恶劣，德国政府因此信誉失尽。德国人也因此而变得气馁和沮丧。1914年德国有1/5的人口投入了战争或从事着与战争相关的服务行业。到战争结束时，有近1/3的德国成年男子战死疆场、残疾或因受伤而丧失了行为能力，政府的抚恤单里也增加了60万战争寡妇。4年战争期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女性人口保持了正常增长，男性人口却呈现不足。在为数众多的家庭、工业部门和商业领域中，性别的不平衡引发了传统权力结构的大翻转。德国妇女地位在战前从没有这样强大，现在她们在家庭、农场和工厂里承担起了传统的男性角色，在工厂和铁路工作的女性人数

也达到了战前的两倍。[1]

在战前，许多德国人过着优裕的生活。现在对他们而言，由于商业萎缩、通货膨胀、“萝卜冬天”和虚弱的体质等突然带来的苦难给他们造成了无法忘怀的羞辱和怨恨。还没有到战争结束，德国就已经债台高筑。到1923年9月，1美元可以兑换2.4亿德国马克。[2] 整个德国士气低迷，道德败坏，这一切使得人们抱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纪律和命令得不到遵守。

于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和国内的人们起而反对战争，似乎他们可以随时开始重新过上从前的生活。最终大家能达成共识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能再信任他们的政府了。[3] 在愤愤不平、破灭的希望和无奈的背后，是先前受到信任的政府对其背叛者的打击。尽管德国人不是第一次受到其领导者的愚弄，然而许多不久前才开始富裕起来的人们已经失去了一切。这一事实引发了一种要求得到公平和获得权利的永恒需求。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一个垮了的、在许多人看来是病入膏肓的帝国君主政体和匆忙建立而前途看好的魏玛共和国之间。[4] 前一个政体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不得不消失。与此同时，后一个政体却提供了一个德国人从未尝试过的自由民主。这样一种新政体能保持下去并补偿过去所失去的东西吗？

---

① Richard Bessel,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1993), pp. 10, 13—15, 18—19, 225。Ute Daniel 则强调妇女工作的连续性：*The War From Within: German Working-Class Wome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 Margaret Ries (Oxford, 1997)，第三章。

② Ferguson, “German Inter-war Economy”, p. 264; Schulze, *Germany*, p. 211.

③ Bessel, *Germany*, pp. 29—31, 41—42, 48, 223—240。有关魏玛时期通货膨胀对于制度和民众道德的影响，参见 Gerald Feldman 的系列研究：*Die Deutsche Inflation: Eine Zwischen-bilanz* (Berlin, 1982)。Offer 强调，盟国的封锁导致了食物紧缺，潜艇战争不再受限制，最终将美国也卷入到一战中来。*The First World War*, pp. 354—367。

④ “共和制的试验是在一个最不利的时刻有了可能性。”见：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 6; Helmut Heiber, *The Weimar Republic*, trans. W. E. Yuill (Oxford, 1993)，第一章。

四、魏玛共和国

德国人信心十足地投入了战争，4年后，这一国家却忍受着被称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①] 战争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的震惊和受到的羞辱，进而引发了席卷整个社会政治层面的内部革命。242 在战争的废墟上，三大阵营相互竞争，以便操控国家的政治走向。一是发动战争的政府。现在，只要混乱的形势许可，它就试图尽可能多地保留它以前的权力。直接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是新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即 Räte，它代表着一大批退役士兵和市民的利益，日后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也在其中，他们要求与过去彻底决裂。最后是斯巴达克同盟，它后来演变为德国共产党（KPD），他们期望将德国改造成为苏维埃式的国家。这些新的左派和右派运动都反对旧帝国政体的残余，但彼此间也相互对立，它们为了德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陷入了内部的文化战争之中。[②]

战争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政府权力直接落入了战争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之手。他在知道帝国已走向垂死挣扎的情况下，仍玩世不恭地将温和派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提名为由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中央党组成的新政府的宰相。诚如历史学家哈根·舒尔策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第一届民主政府竟是“一位总参谋长绞尽脑汁”的产物。[③] 随着战败和军队的退役，帝国政府的一切残存都无法久留，马克斯亲王仅仅在职一个月，到1918年11月就辞职了。在他下台时，他宣告了威廉二世皇帝以及皇储从霍亨索伦王朝的宝座上退位，并且任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宰相继任者。皇帝及其皇储退位后流亡到了荷兰，艾伯特则变成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④]

---

① Bessel, *Germany*, p. 252; Wolfgang Mommsen,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20", in Richard Bessel and E. J. Feuchtwang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pp. 21—54.

②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22—23.

③ Schulze, *Germany*, p. 197.

④ Heiber, *Weimar Republic*, pp. 4—9.

甚至在魏玛共和国宪法产生之前，过渡政府最初的重大事件处理就没有赢得任何的公众信任。1918 年 11 月，它签署了旨在结束一战的停战协定并接受了无条件投降。并非偶然的是，来自新的国民政府的代表团签署了这个可憎的文件，而这一代表团中竟无一人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具有远见的将军和政治家们早在 1917 年的夏天就已预见到德国会战败，他们在那时开始试着运作一种体面的和平。自由党和中央党独自对俄国革命政权提出的和平建议表示认同，但最终徒劳无功，得不到响应。到 1918 年的春天，德军最高统帅部私下承认，德国的战败已经不可避免，然而，它并未让坚信不移的德国民众知道此事，使他们对无条件投降的苛刻后果毫无准备。

最高统帅部全权负责指挥战争，它曾向整个国家许诺要迅速胜利，也没有给出过任何完全失败的理由，它知道民众要求作出解释和需要复仇。将军们早就决定，要让新的国民政府而非军方来承担战败的罪责。最后，他们既受益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①]所提出要求的帮助，也受到了这些要求的阻挠。威尔逊要求让战争期间独立于军政机器之外的各政党来签署和平协议。相关条款还要求德国人接受和践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它们体现了来自美国民主经验中关于自由和自治政府的理想主义原则（这些原则曾多次对德国人重申，在 1945 年还进一步做了强调）。

军方已预料到，谁签署这些和平文件，谁就会成为大多数德国人眼里的"罪犯"，会被指责为给德国背后捅刀子的人。当时德国和谈代表团的领导人是中央党人兼代理国务秘书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尔，他因此成了令人憎恶的信使，两年后即 1921 年就遭到暗杀。然而，如果发生了对德意志民族的致命一刺，可以讨论的是，显然这一刺并非来自后方，而是来自前方，来自鲁登道夫将军，他日后成了希特勒的初始帮凶。情况表明，鲁登道夫相信战败已经无法避免，因此他转而与协约国接近，要求立即"停火以避免灾难"。为

① 时任美国总统。——译者注

此，他让德国接受了比交战双方谈判停战时还要苛刻得多的条款（无条件投降）。[①]

244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果，任何德国政府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来应对这些重创德意志民族的急迫而又苛刻的要求。对战败的责难，苛刻投降条件以及战后生活的混乱不堪等，这一切使得新政府从建立之日起就饱受攻击。

尽管艾伯特的上台不符合官方宪法，不过，作为一种政治交易的工具，他提供给了德国人一次全新的民主制体验，并有着成功的最佳机遇。但是，艾伯特一方面要面对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要面对新组成的社会主义和最初的共产主义政党，他们都向艾伯特政府发起了挑战，并迫切希望主宰新政权，因此，谨守原则的艾伯特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掌控政权。[②] 然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呼吁进行新的议会选举，而且很快就做到了这一点。直到 1919 年 1 月，国民议会才召集起来，新的宪法也直到 8 月份以后才生效。魏玛共和国就在这样一个机构内孕育出来了，它的名字则来自于宪法最后定稿的所在城市名字。

在魏玛宪法中，有 56 条体现着德国公民在未来的民主国家里应有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新宪法规定，总统和议会都要通过普选产生，总理则由议会中的多数票产生。如同早些时候被许可当大学里的旁听生一样，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在当选的 423 名代表中，妇女获得了 41 个席位，这一比例比随后的德国议会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议会都要高。[③]

宪法也包含着具有不祥预兆的新条款。出于炫耀性的民主姿态的考虑和构建联盟的策略的需要，小党也得到了按照获得选票比例获得相应议会席位的权利。国家的行政统治权仍保留在总统手里，他有权任命他自己的总理。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期间，他有权承担起“国家

---

① Bullock, Hitler, pp. 57—58;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 16; Niall Ferguson, “German Inter-War Economy”, in Fulbrook, *German History*, p. 264.

② Craig, *Germany*, pp. 401—403.

③ Ibid., chap. 2;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183; Schulze, *Germany*, pp. 202, 207.

立法权和行政权”，而总统本人即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日后，正是根据众所周知的宪法第48条，这一强有力的措施使得兴登堡总统手下的各位总理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强人统治，而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统治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①]

新议会悄然诞生了。新共和国的议会领导权落到了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社会党人手里，当然，这里的社会党人并不含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或共产党的意义。[②] 在1919年1月的大选中，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和他们的盟友中央党以及德意志民主党一起，取得了超过四分之三的选票。大选的胜利使一战后的德国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然而，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也即1920年6月，一场变化万端的选举使这一联盟的选票又降到了比1/3略多的票数。这对自由联盟而言是一个激烈的转变。不过，它只是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开头一幕而已。

1. 《凡尔赛条约》

无论新政府提出什么样的实际性期望，反映协约国和平条款的凡尔赛和约始终威胁着这些希望。与战争失败以及停战一样，《凡尔赛条约》的相关条款也使德国人备受打击。这些条款是在没有任何事先协商甚至没有任何合法的德国代表团在场的情况下强加给德国的。基于这些原因，废除《凡尔赛条约》成了德国人反复呼吁抵抗、要求重新武装和废黜新政府的团结性的呼声。这个阴影笼罩着整个20年代，直到1933年所有的一切都得到实现。

《凡尔赛条约》分为几个部分，在1919年5月起的几个月内陆续签署完毕。1919年6月的最后签署仪式被有意识地安排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正是在这里，德国人曾于1871年1月宣告威廉一世国王为德意志皇帝，以这种方式羞辱了被征服的法国。现在是轮到法国人来

---

① Peukert, Weimar Repablic, pp. 38—39.

② David Blackbourn 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描述成革命者而不是革命政党……，它非常坚定地认为，历史会让未来落入它的掌握之中。*Nineteenth Century*, p. 422。

提醒德国人他们是谁的时候了。在人群中，社会民主党的赫尔曼·米勒和中央党的约翰内斯·贝尔代表德国新政府又一次站在了舞台的中央，可怜地在投降书上签字。在魏玛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中，就这一点而言，主要批评者认为，这个新政府与新的国际联盟一样，不是外国掠夺者，而是协约国设计用来履约的傀儡而已。[1] 由于国际联盟没有集体武装，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德国和苏联被明确排斥在外）等国际联盟成员国便将执行《凡尔赛条约》的任务交给了最有能力而且也最愿意去做的法国。[2]

《凡尔赛条约》终结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也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德国领土较之战前减少了14%。被割走的土地包括一些重要的重工业地区。协约国重新划分了位于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之间重要的狭长地带，建立了一个通向北海[3]的“波兰走廊”。这是对德国人的羞辱，它会引发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强烈报复。在这段时期里，从德国里剥离的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泽市以及富含煤矿的萨尔兰，而萨尔兰的最终命运取决于最后的全民公决。与这些领土一道失去的还有10%的德国人口，数百万人被并入了波兰。此外，德国还丧失了全部的殖民地，半数以上的钢铁、煤炭和奶牛，5 000个火车头以及四分之一的化学和制药生产。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的陆军不超过10万，海军不超过1.5万人，同时禁止德国拥有各种重型武器、坦克、飞机和潜艇。德国人发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没有办法增强军事力量以维持国内的安全。一个解决法办就是让大批原有的不愿卸甲归田的士兵和军官组织起来，进入以“自由军团”著称的地方志愿部队。这些士兵和军官原本是为了补充地方上的警察和国家武装力量，最后却超过了后者。由于不允

---

① Schulze, *Modern Germany*, p. 204;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215.

② 后来作为施特雷泽曼在洛迦诺成功外交的一部分，德国于1926年成了国际联盟的一员。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252—253。有关法国对这一条约的执行情况，参见第十一章。

③ 原文如此，应该是通向波罗的海。——译者注

许生产航空器，德国人出于躲避监管的目的，完善了各种滑翔机，从而保留了他们先进的航空技术。[①]

《凡尔赛条约》将战争的罪责全部归结于德国，因此它要求德国赔偿所有德国占领的土地上由战争造成的损失，其中还包括协约国的战争抚恤金，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惩罚性费用。最初估算出来的赔偿金额高达4 800亿帝国马克，这一数字超过了德国年国民收入1 700%。协约国在后来的两个阶段里削减了这一赔款数额，1921 年 1 月减至2 690亿马克，第二年春天又降至 1 320 亿马克。这一赔偿过程将长达30 年，其中法国和比利时需要用自己得到的赔偿款去支付在战争期间欠下美国的债务。[②]

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这种巨额赔偿纯属“勒索”，一旦德国人起而反击，那将预示着一场大决战的到来。[③] 美国在没有加入国际联盟的情况下，退出了仍然处于贫困和危险状态的欧洲。但盛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协约国的赔偿要求过于霸道，富于好斗性。法国是历史上最频繁和最成功的德国土地的掠夺者，因此，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对强加给德国以及实施原先的赔款额度缺乏热情。[④]

一些历史学家根据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情况，以宏观经济的视角估算了赔偿金额，认为这些赔偿并不像德国人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难以估算的负担。赔偿事宜中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德国人可以在理论上寄希望于赔偿的灵活性，即国际社会并不希望大大削弱这个已经屈服的民族。[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 1918 年强加

---

① Kitchen, *Germany*, p. 233—234; Ferguson, “German Inter-War Economy”, p. 265; Peter Fritzsche, *A Nation of Fliers: German Aviation 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Cambrdge, Mass, 1992), pp. 104—106, 各类著作中处处皆是。

②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 53.

③ Ferguson, “German Inter-War Economy”, p. 265.

④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55, 57。法国是“最固执的也是最大的赔款债权人”。见：Stephen A. Schuc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 (Chapel Hill, 1976), pp. 23—24。

⑤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54—55.

给了俄国更为苛刻的赔偿，它要求得到俄国至少 3/4 的煤、铁、石油和棉花，割占俄国 1/3 的人口和铁路。[1]

在 1923 年 11 月至 1924 年 4 月期间，由美国人道威斯领导的委员会通过了新的赔偿方案，即将德国的每年经济状况与赔偿联系起来，并通过承诺给予德国短期的美国贷款来保证德国的赔偿。[2] 到 1929 年华尔街经济崩溃时，这些累积的贷款引发了德国资金的短缺，给德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然而，从 1924 年至 1929 年外资进入德国的这 5 年里，借来的数十亿美元确实稳定了德国的经济，使具有高效率的德国就像具有高效率的美国一样，能够牢记 20 年代这一“黄金”和“兴旺”时期。[3]

248 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前夕，另一个由美国人领导的杨格委员会重新修订的赔偿额度取代了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规定在固定赔偿 16 亿马克的同时，每年赔款由 10 亿马克逐级提升至 25 亿马克，而新的杨格计划则在德国每年计划出口的基础上确立一个固定的年度赔款比率。[4] 然而，新计划同样让德国人感到震惊，根据相关赔偿方案，德国人要到 1987 年或 1988 年才能赔付完毕。由于世界性大萧条的出现，该计划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在危机的影响下，德国已经没有能力支付任何战争赔偿或债务。赔款先是推迟到 1931 年，到 1932 年夏天则完全终止了赔偿。[5]

有观点认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赔款问题为虚弱的德国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刺激。[6] 无论这种说法真假与否，对德国人而言，并非只有物价标签才使赔偿问题成为和平的破坏者。对于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被迫单独承担战争的责任。在谈判停火协定和签订条

---

①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 481.

② 依照美国金融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副主席查理·G. 道威斯的看法。

③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60, 196—197.

④ 以美国金融家和律师欧文·杨格取而代之。

⑤ 从 1919 年到 1932 年间，德国赔款 213 亿马克。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 197。

⑥ “战争赔款让德国经济大出血。事实上赔款的净效应使经济保持在一个较好的状态。” Ibid.

约时，德国人完全被排除在外，他们除了屈服别无所获。而且他们被禁止参加国际联盟长达7年之久。这一切都是对德国人的羞辱。[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到战争结束时，200万德国人战死在欧洲战场。战后，在那些所谓的十足的统治民族之中，纵然德国在古老的成则王侯败则寇的法则之下成了一个奴隶民族，对于具有历史记忆的德国人而言，这是对他们的打击，是他们最无法原谅的蔑视。

2. 成功与失败

魏玛共和国在自由和保守的方向上的左右摇摆，反映了德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政治状况。它的14年的历程也被描绘为德意志帝国向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屈服的产物。[②] 尽管保守和倒退的本性在最后时刻得以复活，呈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右倾，但魏玛共和国在自由福利国家的宪法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只有革命的俄国大胆承诺将满足所有公民最基本的社会需求。而魏玛共和国则直接提出政府为家庭服务以及给工人以保护。这些既不是来自俄国，也不是德国革命的产物，它的根源在于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时期通过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保险立法。[③] 共和国雄心勃勃的立法者为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社会问题设计着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包括公民健康以及给孤僻者提供住房等，甚至包括遗传性的变态问题。它慷慨地给予贫困者和失业人员许多史无前例的的福利，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羡慕地称之为“启蒙运动的乌托邦梦想的顶峰，即确保社会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的利益”[④]。

249

然而，梦想家往往是可怜的教条主义者，魏玛的自由主义者在通

---

① Ibid., pp. 42—43, 46, 55;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227.

② 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First German Democracy”, in*Turning Points in Modern Times: Essays in German and European History*, trans. Thomas Dunlap (Cambridge, Mass., 1995), p. 103.

③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130—132；见第八章。

④ Ibid., pp. 135—136.

过各类社会保险立法时，并没有考虑到它的全部开支有多大。尽管在困难时期并没有兑现许多曾经允诺的福利，但所花的钱足以超过1915—1925年间德国福利预算的两倍。由于很艰难地从美国银行得到的借款被用来支付这些福利与服务，因此，当德国经济恶化时，德国政府已经积累了一大堆新的债务。[①]

除了福利国家外，还有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对战争失败的无法忘怀继续引发人们对于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许多人认为政府就是同谋。尽管德国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民主政治架构，但魏玛共和国的对这种新的民主政治架构的贯彻只是尝试性的和理论性的。德国人急需得到有报酬的工作，需要家庭保障和战后的重建，但新的议会似乎只专注于宪法问题和各类立法，远离各种最迫切的日常生活。[②] 新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也都准备一有机会就通过非民主的手段来取代魏玛共和国。顽固的旧势力则充满反对共和国的情绪，他们控制着司法和行政管理的核心岗位，从而形成了对抗和僵持的局面。早在1920年3月，右翼东普鲁士祖国党创始人沃尔夫冈·卡普便领导了一场叛乱，这一叛乱预示着暴力威胁会伴随着魏玛共和国的步伐，时隐时现地度过20年代，并在10年内一直是魏玛共和国时隐时现的威胁。在这种危险的平衡状态下，当新宪法赋予共和国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并且在发生危机时直接通过他的总理来进行统治时，新宪法本身就添加了一种结构性问题。[③]

250

德军最高统帅部更接近政府，在20年代，其内部反共和政体的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它已经失去了从德国社会党控制的议会中永远取得武装部队控制权的希望。从合同的角度出发，扩军将会使大型工商业特别是钢铁企业向政府施压，促使其将投资由福利国家转向军工

---

① Ibid., pp. 136—138, 145.

② Bessel, *Germany*, p. 255.

③ Bracher, "The Weimar Experience", in *Turning Points*, p. 5;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223—225;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242.

生产。①

在这种对抗的背景下，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系列事件而在情理之中了。甚至在1919年其成立之初，就遭到了明显的反对，国民议会的337名议员中有75人反对它的成立。在1920年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持批评或敌视态度的政党就取得了对先前执政自由联盟的轻微领先优势。② 许多反对票就来自东易北河地区的农场，当地人亲眼目睹了小麦价格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暴跌40%的情况。③ 最令人不安的是，政府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中等阶级的支持。由于担心会受到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干预和好斗的工人阶级的竞争，并因此付出高昂代价，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商人变得和社会下层阶级以及上层社会的部分脆弱群体一样易于激动。他们发现自己的生计受到众多威胁，因此，这些群体怀疑德特勒夫·波依克特所宣称的那些既伤害过也帮助过德国人的“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和准神秘的观念”。与农村的选民一样，城市中的中等阶级也逐渐丧失了对自由派政党的信任。1928年以后，他们也抛弃了保守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该党在新闻界巨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领导下，在1929年与民族社会主义党联合，共同反对杨格委员会制定的赔偿计划。通过这一合作，该党的很多成员都加入了希特勒的政党。④

251

仿佛并非所期望的那样，德国的全体选民把权力献给了赫尔曼·米勒领导下社会民主党联盟，它是维利·勃兰特领导的大联盟（1969—1974）之前的最后一次社会民主党联盟执政，这一联盟的执政时间为1928—1930年，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时间最长的执政内阁。简言之，魏玛共和国的有限成功应归功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他那位同样具有原则性的总理兼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1923—1929年期间，施特雷泽曼通过经济合作和集体安全，维持了与他国的友好

①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226—230.

② Bracher, "Dissolution", pp. 100—103.

③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 235.

④ Ibid., pp. 156—157, 231—233.

关系，特别要提到的是，他支持德国从美国获取大量借款。德国人能平稳而正常地享受 1924—1929 年的生活，正是这种成功外交的直接成果。①

3. 绝对风暴

如果我们回顾毁灭魏玛共和国和给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铺垫道路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超越人类控制力的各种大错和力量比比皆是。德国政府认为，塞尔维亚、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会削弱德国的初始打击能力，因此至少早在 1912 年就已经在准备战争。德国的高层官员和警觉的外国外交官们都证实，“有无数的狂妄的……扩张计划”正在德国传播。历史学家们长期认为，帝国政府是和平的主要破坏者和一战的始作俑者，它欲借此逃避盛行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危机。② 如今，德国需要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适应工业化进程，也即所谓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和缓冲地带，它就成了这段历史中更容易得到公认的因素，当然，还有德国要在殖民地问题上追赶老牌大国的自负愿望。这些也都是当时各国发动战争的特定时期的恰当理由。③

1918 年的惨败开始了德国的内部革命，它决定着在被打败的帝国废墟上建立起何种类型的国家。1919 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冲突，但它并没有体现这一点，最终也未能阻止派系间的政治战争逐步升级为法西斯分子的民粹民主制和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就一个面对帝国君主政体解体以及协约国苛刻指令的德国而言，魏玛共和国的经历是仅仅给人以希望的政治航程。于是，许多人很快就产

252

① Ibid., p. 198; Bracher, “Dissolution”, p. 101.

② Fritz Frischer（疑原文有错。此处应指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Fritz Fischer（1908—1999）。他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分析而名声大噪。——译者注）富有影响力的关于德国战争目的的争论也被 Wehler 和 V. Berghahn 所接受。关于其影响力和准确性，参见：Wolfgang J. Mommsen, “Domestic Factors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Before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6* (1973): 12—15; Lerman, “Wilhelmine Germany”, p. 224; Müller, *Another Country*, pp. 51—52。

③ Lerman, “Wilhelmine Germany”, pp. 222—224.

生了一种看法，那就是，新政府是内部的敌人，从而将它变成了受伤的尊严和无法挽回的失败的替罪羊。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事实。

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由于拒绝采取对战争负责的态度以及宁愿选择去指责他国和追求空想，从而使自己的处境进一步恶化。[①] 然而，在战后，德国人并非唯一的口是心非者。早在20世纪以前，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存在各种虚幻的无辜和责难。无论何种程度的自我欺骗和满怀希望的思考，都可以赋予那些基于战争结果而出现的新政治组织和政府以灵感，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也是非常理性的，而且也有理由充满希望。

此后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陷入了一场绝对风暴，而不是向虚幻世界的一次退却。[②] 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条战线从19世纪末以来都有发展，但也暗含着致命的自身缺陷，这一些都在德国集中体现出来。经济崩溃开始于20年代初期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在20年代末期又再次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失业潮。政治上的打击表现为魏玛共和国在捍卫自由民主制度方面的无能，引发了逐渐的然而却是空前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大崩溃。最后，德国19世纪长期对历史和传统的破坏，特别是思想和精神方面对于主流道德和宗教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到20世纪20年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使许多德国人迷惑、愤世嫉俗，在黑暗而陌生中探索前行，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道路。[③]

每条战线的问题都带有自身的特殊破坏因素，并且可能性极小地 253

---

① “德国已经退缩到幻想的世界，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困境和麻烦都认为是别人犯下的错。” Bessel, *Germany*, p. 283。

② 将 Bullock 对生活的隐喻“地震劫后余生”与1929年后的经济崩溃和1930—1932年的经济大萧条作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有理性了……进入了一种幻想的恐惧之中，抱着过分的憎恶和渴望，也接纳了希特勒富于煽动性的宣传。” *Hitler*, pp. 132, 153。

③ “到世纪之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世俗化已经广泛传开，基督教的价值不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人们寻找不同的政治诉求的新的信仰基础和新的价值体系：诸如独裁国家的权威概念……左派的阶级专政的看法；对‘民族共同体’的渴望等。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副产品就是种族主义乌托邦的形成，它在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 242。

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种无法想象的现实，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超越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无法无天的第三德国。在随后的12年里，即1933—1945年期间，德国将继续保持这一进程。于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拽着大部分德国人，着手设计他们的新时代，而这一新时代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自始至终都特别取决于最强势的人物。[1]

① 参见 Peter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Cambridge, Mass., 1998), pp. 199—211，以及后文、第十一章。

第十章　野蛮君王：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衰

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合法政府保持着中间偏左的立场，然而民众政治却从中间转向右倾，给人以不祥之感。在这10年的开端和结束阶段，社会民主党联盟执政优势明显。到了30年代初期，作为新的极右翼政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它那位带有暴发户色彩的法西斯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巧妙地接管了操劳过度而疲惫不堪的德国政府。无论从法西斯攫取政权来看，还是就由此产生的后果而言，都是与德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前所未有的大决裂。 255

前所未有的条件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事件。1922年至1923年初，极度的通货膨胀使德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在乐观的战争时期的过度开支和战后为支持法国占领的莱茵兰地区德国人罢工而滥印钞票。在1921—1922年的一年时间内，批发价格指数上涨了18倍。危机的第一年，即1923年，批发价格指数已经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达到了1913年时的12 610亿倍，而那时的 256 通货膨胀还未成为德国人心中的严重问题。在施特雷泽曼执政时期，这些阴影似乎消散了，但是到20年代末，又出现了比以往更加黑暗的阴影。在1929年华尔街经济崩溃以后，长期依赖于美国短期贷款偿还

债务的德国人的荷包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1]

1929—1933年，德国的失业率如同德国货币在货币史上的贬值纪录一样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高记录，失业人口从130万达到了600多万。他们当中许多人仍然保留着对美好工作的鲜活记忆，而其他人则有着极其痛苦的经历，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依赖于救济或简单的行乞为生。[2] 随着新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被危机所淹没，有时它甚至还使危机更加恶化，[3] 每年的痛苦经历都使得各种激进的政治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可信，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加入到相关的政党之中，对之更加拥护。

一、希特勒

民族社会主义党在成立之时有着它令人好笑的一面，但该党和其出生于奥地利的不为人所知的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就显示出他们掌握着时代的命运。尽管兴登堡政府竭力阻止它，但希特勒还是迅速而且稳固地登上了德国权力的巅峰。这一点，除了他自己外，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

据阿道夫的妹妹讲，他们的父亲管制很严格，阿道夫是第四个孩子，小时候经常挨打。他在学生生涯里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好成绩，并因无法通过考试而离开林茨中学。但他继续在林茨学习科学和技术课程。他也没有能从施泰尔的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在林茨，他虚度了自己的大好青春时光，而这一地区的许多德意志人都支持奥地利重返德意志帝国。20岁时他来到维也纳打着零工。在这里，他立志要当一位画家或建筑师，他曾两度参加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但都未

257

① 参见：Jeffrey Fear, "German Capitalism", in Thomas K. McCraw, *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1997), pp. 135—182。

② Detlev J. K.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trans. R. Deveson (New York, 1989), pp. 63—64, 252—253, 156; Mary Fulbrook, *The Divided Nation* (Oxford, 1991), pp. 34, 57; W. Michalka and G. Newdhart, eds., *Die ungeliebte Republic* (Munich, 1980), p. 118; V. Berghahn, *Modern Germany* (Cambridge, 1996), p. 100; Harold James,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Ian Kershaw, ed., *Weimar: 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 (London, 1990), 第一章。

③ 例如，布吕宁总理蓄意的"苦难和饥饿"政策的目的就在于结束赔款。

能如愿。[①]

在30年后，希特勒面对这一事实时仍持否定的态度，声称他拥有“无可争议的建筑设计天赋”，给当时的主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他当时的直接反应就是偏激、空想，在选择职业方面做一些甚至超出自己能力的白日梦以取得心理补偿。与此同时，他还沉迷于瓦格纳的音乐之中，这是许多自负和易怒的年轻人的安慰剂。[③] 这种伤害对希特勒似乎是持久性的。据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1931年后对希特勒的近距离观察，他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挫败感很强烈和害怕挫折的人，以至于他更爱与狗为伴而不愿与人为伍。[④]

对于希特勒来说，维也纳是一个给他的肉体和心灵都留下了重创的地方。在这个犹太人最多的说德语的城市里（1910年犹太人占维也纳人口的8.6%），普遍存在的社会和宗教冲突掺杂了大量反犹主义的宣传，从而使希特勒在这里形成了对于犹太人的早期偏见。[⑤] 希特勒居住在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里，而这里恰是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地区。他以画明信片为生，并有两个犹太人同伴帮他售卖。他也警惕地注视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该党的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他最不喜欢的东西（bête noire）。

---

①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1999), pp. 8—16, 20—24, 37—38, 40—41.

②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trans. N. Cameron et al. (London, 1973), 10/28/41, p. 97。也被称作“鲍曼记录”，经帝国部长马丁·鲍曼同意，修改和保存了1 054页希特勒的圆桌会议的非正式的记录，都是由指定的书记员记录的。

③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42—43, 48—49。后来，希特勒当上元首后，资助了拜罗伊特音乐节数以万计的德国马克，在那里得到了维尼弗雷德·瓦格纳和瓦格纳家族的款待，过得很舒服。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Memoirs*,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1970), pp. 149—150; *Table Talk*, 10/28/41, p. 97。

④ “这条名叫布隆迪（Blondi）的狗在希特勒的私人生活里占据了很重要的角色。它对希特勒来说比他最亲密的伙伴都要重要。”除了布隆迪之外，他只把爱娃·布劳恩（Eva Braun）当成忠诚的朋友。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pp. 300—302。

⑤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31—33, 36, 55—56, 58—59, 64.

1. 慕尼黑

希特勒因逃避奥地利的义务兵役，遭到了林茨警方的追捕，为此他逃离了维也纳。在慕尼黑，他才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才能：辩论、宣传或者革命政治。在那些年里，他成了街头生活的敏锐观察者，获得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情感智商。他有着非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察觉和表达出人们想听到、得到的东西，而不管它是否合适或可行。[①] 他是继墨索里尼之后，影响力更大的第一位将个人崇拜置于政治中心的20世纪政治家。[②]

258

希特勒曾坦白，自己不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早就发现了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热情的“新生代”，他并不受传统宗教信仰和深厚的历史知识的摆布。他从一开始就相信，永恒的生命规则是可以创造的。在德国人的历史里，人们还从未见过像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者那样更有勇气、更侥幸的东山再起的年轻人，或者说更顽强的有成功决心的政党。[③]

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希特勒吸取了阿图尔·叔本华的存在主义，他从中得到的教诲是，除了个人意志外，一切皆不存在。希特勒宣称，在整个战争年代里，他一直书不离手。尼采写的两本书，即《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反基督》，皆论及上帝之死。在希特勒的日常谈话中，每当他大肆抨击犹太教和基督教时，尼采这两本书的内容都会在他的言语中得到反映。[④] 在维也纳，一方面他和那里的犹太人保持着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却沉浸于在这个城市反犹太人的低俗小说里，并注视着当地的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卡尔·吕格尔的反犹举动。早年这些令他着迷的当地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是种族主义理论家约瑟

---

① Biographer Alan Bullock 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煽动家”。*Hitler : 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 1962), pp. 25—27, 34—37, 68。

②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p. 22.

③ 关于后者，比较第二章中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

④ 尽管在圆桌会谈中他很少提及他们。*Table Talk*, 10/25/41, p. 89; ibid., 3/7/42, p. 358。

夫—亚瑟·德·戈平瑙伯爵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以及最新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①

2.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多年的游手好闲和流浪生活之后，25 岁的希特勒在军队里发现了组织、纪律、同志般的友谊和事业。尽管他是外国公民，在慕尼黑仍被编入了巴伐利亚的一个团，这是当地德国政府犯下的一个错误，按照法律，奥地利的逃亡者应该被驱逐出境。② 这是复杂的命运难解之结的第一步，如果这种难解的命运出现变数的话，历史进程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③

259

希特勒在西线战场服役了 4 年，主要是当通讯兵。他表现非常勇敢，曾经两度负伤，第一次是在大腿上，第二次是在两年后眼睛因毒气而负伤。每次负伤都让他获得了铁十字勋章，而这些铁十字勋章成了他当兵生涯中少有的成就。在那些年里，他磨炼了自己的政治技巧，感染了他的同伴，赢得了尊敬，大家以“阿迪”（Adi）或“道尔斐”（Dolphi）来称呼他。甚至在那时，他已为战后与敌对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发生冲突做着准备，此外，他加大赌注，准备让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执政。④

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战争结束后的德国，政府更迭频繁，内部冲突不断。在巴伐利亚，战争结束一年半后，政权从左翼自由派手中转到了右翼保守派手中。在暗杀了临时州长犹太人库尔特·艾斯纳后，一个存在时间很短的士

---

① 与 Bullock 刚好相反，希特勒所表达的反犹太主义经由他自己先前的自我怀疑而成为至根深蒂固的信念。Bullock, *Hitler*, pp. 40—44；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34—35。

② 参见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 8, 87, 89—90.

③ Ian Kershaw, “Hitler: ‘Master in the Third Reich’ or ‘Weak Dictator’?” in Kershaw, ed., *The Nazi Dictatorship* (London, 2000), pp. 69—92.

④ Bullock, *Hitler*, pp. 50—51, 53, 55;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92, 96—97.

兵委员会取代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联盟。[1] 在地方军事组织自由军团的协助下，德国国家军队（德国国防军）随后又推翻了地方委员会的统治。这些军事组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留物，主要是由像希特勒那样的退伍老兵组成，他们再也不愿回到几无选择的大众生活之中。虽然无法预估，但自由军团给德国各州提供的警察和武装力量的人数已经大大超出了《凡尔赛条约》所允许的限度。在自由军团的帮助下，反动的军政府夺取了巴伐利亚的政权，使这个州成为全德国不幸的退伍老兵们所向往的地方。[2]

希特勒并没有脱下军装，他在慕尼黑为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联盟和后来接任的过渡政治委员会充当了两年的联络官。在工作中，他调查了那些被指称的破坏分子，传播巴伐利亚的宣传活动。在他加入当地的德国工人党（DAP）并很快取得该党的控制权后，他的政治生涯开始发迹。德国工人党只是 70 多个诞生于战争中的群众性组织之一，创立于 1918 年 3 月，是可以向 1919 年 1 月在魏玛开会制定新宪法的国民议会推荐候选人的少数政党之一。[3]

260

由于这样一种卑微的基础，希特勒开始了与革命派领导人恩斯特·罗姆的富有灵感的当然也是命运不佳的政治联姻。罗姆是慕尼黑军区的参谋长，公开的同性恋者，众所周知的“机关枪国王”。他们为了给这一政党打上烙印，于 1920 年将该党重新命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希特勒亲自设计了卐字形党徽，这一标志模仿了一个奥地利的同名政党的党徽。而罗姆的贡献在于冲锋队（SA，即 Sturmabteilung 的缩写），其成员大多数是自由军团的中坚分子。冲锋队从一开始就是该党的保护者，在此后的 10 中不断发展，变成了德国国防军的劲敌。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希特勒是该党的语言大师，而罗姆则是政策的执行者。一个新型的德国政府诞生了。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 25 点纲领中，希特勒等知道民众所

① 关于这些临时委员会或所谓的 Räterrepublik，见第九章。

②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105, 109—117.

③ Ibid., 117—124.

想，因而向民众允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也攻击了他们要反对的东西。在民众想要的东西中，25 点纲领提出了建立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方案。在《我的奋斗》一书的开篇中，希特勒曾满怀激情地为这一方案进行了辩护。此外，纲领还提出要得到新的土地和殖民地，因为它们关乎生存空间和在国际上的威望；在经济上支持作为该党主要基础的小商人们等。[①] 同时，党纲攻击了《凡尔赛条约》、赔款问题、新闻自由、资本主义、犹太人、大工业和大土地所有者。在早期，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瞄准了同样一群听众，即工人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希特勒的战略是两面的：一方面煽动阶级嫉恨，另一方面污蔑富人以及污蔑自由派反对派对战争失败负责。由于表达了德国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的期望，因此，数年之内，这一政党所赢得的白领选民的支持将会超过蓝领选民。[②]

1. 看门人

在 1921—1923 年期间，希特勒成了右派政治势力中最成功的吸引大众眼球的人物，和施洗者约翰一样，他成了一位仍然有待人们发觉的新兴政治领袖，将开创德国的新时代。[③] 与希特勒早期站在树桩上发表演讲时的团队不同，此时他的亲密伙伴里拥有着各种手段、媒体以及与高层的联系。除了罗姆外，希特勒的军队朋友中还有鲁道夫·赫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希特勒在同一个团里服役；还有赫尔曼·戈林，这是另一位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另外，还有喜欢美食的记者迪特里希·埃克哈特，他是少数几位能与希特勒保持亲密关系的人，使一些资助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报《民族观察案》

261

①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ed., John Chamberlain et al. (New York, 1940), pp. 5ff.

② Bullock, *Hitler*, pp. 64—70, 76; Schulze, *Germany*, pp. 231—232;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ed. John Chamberlain et al. (New York, 1940), pp. 3—4; Kershaw, Hitler, pp. 105, 137, 144—145, 147。关于罗姆的同性恋和清洗冲锋队（SA），见：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pp. 51—53。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是哪些人在支持希特勒，支持他的原因，见：Richard F. 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1982); Thomas Childers, *The Nazi Voter* (Chapel Hill, 1983); Thomas Childers, 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London, 198)。

③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157, 169, 170, 184—185.

（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成功中等阶级人士加入了该党。①

还有两对富有的夫妇：一对是泛日耳曼主义者胡果·布鲁克曼和埃尔萨·布鲁克曼夫妇，丈夫是出版商，妻子是罗马尼亚的公主；另外一对是卡尔·贝希施泰因和海伦纳·贝希施泰因夫妇，丈夫是顶级的钢琴制造商，妻子是社会名流，后成为了希特勒众多“母亲”之一。在希特勒被介绍进入德国上层社会时，这些“母亲”负责打点和指导这位不善交际的政治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布鲁克曼的作者之一，希特勒很晚才遇上他，并且直到其临终时都很尊敬他。②1923年10月的一天是希特勒难以忘怀的日子，贝希施泰因一家将他介绍给了居住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一家。对于初露头角的纳粹党来说，打开另一扇通向上层社会大门者是慕尼黑出生的“小伙计”恩斯特·汉夫施腾格尔，他的母亲是美国人，自己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学位，他母亲的家族在美国内战中出过两位将军。最后还有纽伦堡的出版商、反犹主义者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希特勒将他从竞争对手德国社会主义党那里挖了过来，此后他大大扩展了纳粹党的宣传范围。③

2. 法国的占领

262 从1921年夏天到1923年冬天，巴伐利亚打算对柏林的中央政府进行一次有节制的挑战，政变得到希特勒的政党的强有力支持。一系列与强制执行凡尔赛和约相关的事情推波助澜，鼓励了这次叛乱。1921年，最终的赔偿金额确定了下来，波兰走廊也从德国东部领土中划了出去。1922年8月，德国宣布破产，无力偿还外债，债台高筑。1923年1月，由于德国煤炭和木材的装运没有达到条约规定的数量，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从而给德国以最后的一击。④

---

①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p. 101。四大亲密伙伴是罗姆、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提安·韦伯，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革命时期富有才华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关于希特勒与埃克哈特的旅行，见：*Table Talk*, pp. 211—219；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pp. 296—297。

② 见第七章。

③ Bullock, *Hitler*, pp. 82—83；Kershaw, *Hitler: 1889—1936*, 187—188.

④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 191.

德国人通过停止采矿、工厂停工和铁路停运来进行反击。然而，这样的挑衅虽然缓和了德国人的民族情绪，却也使得柏林政府陷于不得不支持罢工工人的地步，但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随着鲁尔区工厂的关闭，别处与之相关的工人也失去了工作，从而扩大了政府的失业救济面。如果德国要偿付外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国内的失业救济了。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到年底时，马克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大人们将钞票捆起来用来生火或糊墙，小孩则拿来当搭房子的积木。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20年代末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失业潮，但20年代中后期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甚至在文化上极具创造性的黄金时期。同样，1923年的集体苦难证实这是一个改变民族的历程。不知不觉之中，深深的民族仇恨已经扎根于这些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和繁杂无聊的岁月里。①

德国人的苦难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成功紧密相关。因此，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就是对希特勒政党的一种混杂性的赐福。其糟糕之处在于它推动了德国人支持政府反抗占领军。然而，经济上破产的德国政府要求鲁尔的工人们复工，也帮助了纳粹党。政府屈从于敌人的场面又再次给批评者提供了指责政府背后捅刀的机会。

3. 施特雷泽曼

希特勒出现在历史舞台时，恰值1923年德意志人民党（DVP）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被任命为总理和外长。二者在国民中的名气都不断上升，至于其他方面，他们两人没有什么相同之处。施特雷泽曼是多个议会联盟和内阁的成员，他相信在魏玛共和国存在高尚的德意志精神，并且号召人们秉持这种德意志精神。但是，当政府强迫鲁尔区的工人们放弃他们的大规模罢工后，他的号召就变得更为困难，他 263

① 有关通货膨胀和赔款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参见：Gerald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New York, 1993)；Marc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France and European Economic Diplomacy, 1916—1923* (New York, 1980)。

的总理任期也变短了。后来，他派遣联邦军队镇压了萨克森、图林根、汉堡和慕尼黑的地方暴乱。在慕尼黑，因政府禁止串通一气的共产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党而引发了对抗。[1]

经历了鲁尔危机后，施特雷泽曼凭借着黄金储备和抵押资产发行了新的马克，暂时稳定了德国经济。尽管在国内福利方面裹足不前，但新的财政规定却使德国在赔款上得到了喘息的空间。[2]

施特雷泽曼在政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获得了成功。1925 年夏天，他使协约国结束了对鲁尔的占领；通过签署洛迦诺公约，赢得了协约国对德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承认；1926 年，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出于对施特雷泽曼使德国与别国建立正常的平等外交关系的认可，他和法国同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一起获得了 192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3]

4. 慕尼黑暴动

在施特雷泽曼短暂的执政期间，民族社会主义者开始夺取地方政权。到 1923 年时，巴伐利亚已经变了保守派军队的堡垒。在这里，高涨的民族雄心与魏玛共和国的问题相互呼应。在巴伐利亚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和该州国民军司令奥托·赫尔曼·冯·洛索夫将军的共同领导下，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计划建立一个新的政治联盟，其强大程度已经足以挑战柏林政府。

尽管希特勒相信巴伐利亚当局和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但由于害怕担任德国国防军巴伐利亚州分遣队长官的汉斯·冯·泽克特将军，希特勒决定强迫他们一起行动。他选择 11 月 8 日至 9 日发动暴动，因为这两天州长卡尔、洛索夫将军和州警察总监汉斯·冯·赛瑟尔都计

---

① Fulbrook, *The Divided Nation*, pp. 34—35;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p. 245—247.

② 尽管五分之四的赔偿款（以德国马克为货币单位）是新借来的，大部分是从美国银行借的，但这种支付是安全可靠并有预期进程保障的。参见第九章。

③ Richard Bessel, "Germany from War to Dictatorship", in Fulbrook, *German History Since 1800*, pp. 248—249; Fulbrook, *The Divided Nation*, pp. 35—38; Schulze, *Germany*, pp. 210—212, 215—216.

划会聚慕尼黑，参加战后革命推翻德意志帝国政府5周年庆祝活动。活动刚开始，赫尔曼·戈林就带领一批冲锋队队员护送希特勒走上了卡尔、洛索夫和赛瑟尔就坐的主席台。希特勒取过了麦克风，宣布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起义开始。他公布了新的临时政府，其中卡尔、洛索夫和赛瑟尔都在领导之列。

在明知这次政变成功的机率很小的情况下，上述被新任命的诸位领导找机会逃出了大厅，并向泽克特将军报警。此后，面对即将来到的危险，民族社会主义的领袖们选择采用虚张声势地展示力量的方式。第二天中午，2 000名民族社会主义者排列成强大的阵容，带着武器列队穿过整个城市，直至军队加以阻止才停了下来。结果，14人被枪杀，其中包括在希特勒身旁行走的一名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这一枪差几英寸，就可能改变了历史。戈林的腿部也中了一弹，希特勒则拖着脱臼的肩膀逃到了“小伙计”汉夫施腾格尔的家里，随后在那里遭到了逮捕。[①]

1924年2月26日到3月27日，巴伐利亚州政府以叛国罪审判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因为审判发生在反动势力较强的慕尼黑而不是柏林，这些领导人才得以保全性命。希特勒带着铁十字勋章，像战争英雄一样站在被告席上。他指控那些控告他的人，即卡尔、洛索夫和赛瑟尔等，是真正的叛徒，因为他们出卖了慕尼黑暴动。洛索夫用嘲弄的口吻将希特勒描绘成“只是一名鼓手”（一个煽动家和宣传家），只是因为失算才让他占了便宜。但是，时代的不幸就在于，对于许多在审讯室里的人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这种“鼓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②] 审判结束时，希特勒成了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地方性人物。

5. 领袖

由于巴伐利亚的政治风向在1925年出现了明显的右转，因此希特

---

① Bullock, *Hitler*, pp. 107—108, 112—113;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210—211.

② 引自 Bullock, *Hitler*, pp. 116—117;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212—219.

勒原本5年的刑期只服刑了13个月。如果按期服刑，他很可能在政治上被人们遗忘。[①] 在兰茨贝格监狱的那些日子里，他口述了《我的奋斗》，该书原本是一本意识流式的自传，主要为他自己的人生特别是战后以来的生活进行辩护。该书最初的题目是《与谎言、愚蠢和懦弱的四年半的斗争》，它更具传记色彩。1926年出版了《我的奋斗》的第二卷，它更具纲领性色彩。30年代，这两本书同时发行，使已经当上总理的希特勒成了富翁。书的主旨是基于尼采的高级人种和低级人种理论之上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按希特勒的话说，所谓的高级人种和低级人种就是"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或者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在两者的对比中，他附上了19世纪新世纪哲人们的论述，包括费尔巴哈、尼采、里尔、瓦格纳以及张伯伦等，同时还讥讽德国经典哲学和神学的核心教义，以此说明作为高级人种和低级人种的普通人。

1924年12月获释后，希特勒很快在党内恢复了自己的权威。在入狱期间，他越来越相信自己就是早先预言的"超级领袖"。对于新发现的戒酒和食素的习惯，虽然希特勒对外宣称的原因是为了减肥和防止食物伤害身体，但却被看成了超人觉醒的外在标志。[②] 他变成了狂热的素食主义者，然而，他很小心地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绝大多数的猎人和食肉者身上，因为这些人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当然，他也毫不犹豫地取笑他们血液运动中的不公平。[③]

266

考虑到希特勒具有的危险性，魏玛共和国政府禁止希特勒在两年

---

① 科肖（Kevshaw）强调希特勒改变历史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通过危险地避免逻辑的和规定的后果；然而最终他相信，与他的"个性"相比，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跟他的成功更有莫大的关系。Kershaw, *Hitler : 1889—1936* , p. 238。各类著作中有很多相关信息。概念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对希特勒的理解，那就是希特勒主管的程度和他执行的程度，参见：Tim Mason，"目的和解释：一种对民族社会主义理解的流行的争议"，in Mason, *Nazism , Fascism ,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pp. 212—230。

② Kershaw, *Hitler : 1889—1936* , pp. 261—262.

③ "别相信我会颁布法令禁止海军吃荤。假如禁止吃荤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种信仰，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行动不会成功的。" *Table Talk* , 1/22/42, p. 230。"连珠枪和已经300年没有进步的兔子之间的战斗太不公平。如果某个人跑得比兔子还快，我会取下我的帽子向他致意。" *Table Talk* , 10/20/41, p. 94。

内做公开演讲（在普鲁士则是3年）。出于使自己的政党获得更多的支持的雄心，在希特勒复出的第一年，民族社会主义者就安排了2 000次以上的公众集会。由于禁止在公众演讲，希特勒就与具有影响力的群体进行不受阻止的私人谈话，以便使自己从防守转入进攻。①

1925年，即希特勒获释后的一年，阑尾炎夺取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生命，在野的保罗·冯·兴登堡元帅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作为保守派的主要首领，兴登堡的上台使德国政府的政治倾向开始由左转向了中间偏右。② 他和施特雷泽曼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但都同样维持了德国的稳定，一个动荡的国家似乎找到了它的发展方向并开始平稳地向前行驶。然而，在20年代的剩余时间里，德国在精神和安全方面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都应首先归功于外国贷款而非政治上的突破或改革。③

三、国家的复兴

到20年代末，华尔街经济崩溃了，欧洲出现了大萧条，德国失业人口增长了3倍。所有这些使许多人觉得，多年前希特勒的批评及其对大灾难的预言是有先见之明的。在地方各州以及国民议会内部分歧加深，投票支持民族社会主义的地主、农民、工厂主和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长的时候，德国选民又出现了另一个大的分裂。到30年代初为止，兴登堡的总理们递交给议会联盟的政府议案往往不可能通过。④

1. 中心舞台

面对议会中的僵持局面，1930年7月，兴登堡试图运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从此以后便使用总统特权来进行统治。事

267

---

① Bullock, *Hitler*, pp. 113, 120—121, 126—128 132;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224, 231, 242—243, 257, 261, 271; Peter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Cambridge, Mass. 1998), p. 187.

② Bessel. "Germany form War to Dictatorship", p. 249; Bullock, *Hitler*, p. 132.

③ Bullock, *Hitler*, p. 143;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p. 107—124.

④ Bullock, *Hitler*, pp. 132, 150—153, 179.

实上，援引宪法第48条就是一种向家长制统治制度的转变，兴登堡通过他的总理扮演了现代版的皇帝。1930年3月，他提出了自己的议案，让中央党的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代替了当权的社会民主党的总理赫尔曼·米勒。[①]

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并不受欢迎，希特勒用他熟悉的愤怒和嘲弄对之加以抨击。然而在短暂的3年之后，他的政党也将入主政府，兴登堡在30年代后的极端性统治体制则成了希特勒政府的主要灵魂。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民族社会主义者继续拉拢另一个右翼党派民族人民党和以钢盔团著称的反动退役老兵组织。1930年9月的大选中，权力向极右方向的转变十分明显，当时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席由12个飙升到107个，拥有了超过600万的支持者。[②]

在这一事实的鼓舞下，希特勒制止了失去耐心的罗姆，决定“合法”地夺取最高权力。他的意思是要有策略地批评政府，使之成为不受欢迎的共产党和犹太人的替罪羊，以此吓唬德国选民。虽然他采取了约束性的策略，但他清楚自己的大部分要求，特别是1929年以后更是明显地表达了他的意图，即如果结束德国的困境和惩罚相关的责任人需要这么做的话，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到1930年，对民族社会主义而言，投票表决已经变成了达到目的的次要手段。

对于大多数德国普通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从经济危机和毫无效率的政府中解脱出来。诺特海姆是下萨克森一个拥有1万人口的小镇。对于该镇的模型研究仔细分析了希特勒政党的策略和号召，发现它“使文明化的民主制度陷入了虚无主义的专政之中”[③]，抱成一团而又较为保守的中等阶级渴望稳定和控制，紧密团结的工人阶级则

268

---

① Schulze, *Germany*, pp. 237—238.

②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324—325, 333—334；舒尔策使他们获得了130个席位。*Germany*, p. 233.

③ William S.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30—1935* (Chicago, 1965), p. ix。写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战争的创伤依旧存在，准确的信息既不自由也不安全，艾伦（Allen）将两个小镇（Thalburg代替了诺特海姆Northeim，后者首次出现在1984年的修订版中）和主要角色的名字小说化，作为它们合作的前提条件。

要求激烈变革，两者之间出现了分裂，这一小镇就成了纳粹宣传的合适之地。希特勒的政党通过持续的行军、集会、破坏和骚扰等方式扩大着民众间的裂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找到了当地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无所顾忌的“助手”。他们的左派自由主义的宣传足以惊跑诺特海姆的中等阶级，使之投入到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怀抱。最终，2/3 的选民把票投给了民族社会主义者。这些选民相信，民族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束萧条，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者接管地方和州的政权。然而，这种成功给中等阶级带来的是更苦涩的回报。当诺特海姆的选民投票给纳粹时，他们并不是要支持第三帝国所带来的那些东西，而只是支持纳粹曾答应的事情，即结束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危机。[①]

诺特海姆的故事也许只是当时德国的缩影。当时民族社会主义者喊出了转变和复仇的声音，并且成功地将自己描绘成无与伦比的执行者和胜利者。投票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人迅速增多，因为希特勒不像别人，他展示了比他们对现状更为不满的领袖形象，似乎拥有着意志和智慧去终结那些兴登堡和魏玛共和国长期无力解决的事情。[②]

2. 讨好希特勒

面对民族社会主义势力的快速发展（其党员人数在 1931 年翻了不止一番）以及自己威望的下降，兴登堡政府在 1931 年秋天开始与强硬的希特勒进行公开谈判。当时布吕宁总理仅仅要求在兴登堡的剩余任期里保持中立。1932 年 1 月初，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第二次谈判，希特勒仍坚持他所要的一切，即布吕宁下台并且进行新的选举。

据希特勒回忆，在 1931 年 10 月 31 日和兴登堡第一次会面时，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向他透露说，兴登堡在他所支持的所有事情上都遭到了拒绝。这位秘书后来仍在这一位子上为希特勒效劳。[③] 然而，希特勒纳粹党可以提供兴登堡政府所渴望的议会多数席位的能

269

① Ibid., pp. 3—34, 272—281.

② 有关这种错觉的产生，参见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第二章。

③ Hindenburg's habits of thinking and feeling are in revolt against all you represent. *Table Talk*, 1/18/42, p. 222 Bullock, *Hitler*, pp. 183, 187.

力掩盖了这一不好听的名声。到 1932 年 7 月，民族社会主义者已取得了 1/3 的议会席位，他们的冲锋队已经有 30 万人之众，并且数量还在增长。

总参谋部的军官和日后成为总理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力推希特勒进入政府，坚信只有与民族社会主义者合作才能够确保政府，才能加强国防军，才能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①] 在私下会谈中，兴登堡向希特勒承诺，在经济危机结束前，他将以布吕宁的辞职换取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暗示总理将由他来担任。然而，这意味着希特勒又要忍受兴登堡的统治，这一处于兴登堡对立面的前景是希特勒所无法接受的。

希特勒拒绝了布吕宁和施莱歇尔的请求，对他而言，实现其野心的唯一出路就是在 1932 年选举中竞选总统。[②] 在德国的政治竞选中，他第一次运用了飞机（这场竞选被称为“希特勒穿越德国”）以及电影广告等手段，获得了 30% 的选票，而兴登堡获得了 49% 的选票。在 5 月的决定性选举中，他与兴登堡之间的票数上升为 37% 对 53%。尽管选举失败了，但希特勒和他的政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7 月全国大选后赢得了 230 个席位。[③]

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已经成了德国的决定性政治力量。当时兴登堡正准备宣布取消所有的准军事武装，其中包括冲锋队、希特勒的保镖以及盖世太保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新成立的党卫军（Schutzstaffel）。[④] 希特勒和冲锋队首领罗姆以民族社会主义与政府合作为代价，要求解除这一禁令。已经有些筋疲力尽、乱成一团的兴登堡政府很快就接受了这一要求。

270 在 1932 年 5 月 5 日选举的 3 周后，不受人们欢迎的布吕宁辞职

① Bullock, *Hitler*, pp. 183, 190—191.

② 兴登堡私下里要求希特勒在针对政府的竞选活动中采用狭义的骑士风度。Bullock, *Hitler*, pp. 222—23;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370—371, 373。

③ Bullock, *Hitler*, pp. 196—99, 201;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 363; Berghahn, *Modern Germany*, p. 119.

④ 穿着黑衫的警卫人员，他们制服装饰着令人恐怖的死人头骨标志。

了。他成了反对派政治和通货紧缩政策的牺牲品。他曾经打赌性地认为，破产的德国政府将会更快地解除赔款，他还试图任由失业与贫困发展，这使他赢得了“饥饿总理”的绰号。但不幸的是，德国的赔款直到 1932 年 7 月也没有取消，那时，各国都已经实行紧缩性的经济政策。[①]

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兴登堡以可靠的中央党成员弗兰茨·冯·巴本代替了布吕宁。希特勒对巴本并无好感，因此，他同意巴本出任总理完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到 7 月底，半数以上的议会席位已掌握在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手里，他们联合起来的能力足以在街头制造大混乱。和布吕宁一样，巴本也担心政变以及没有能力在国会中取得占统治地位的联盟。兴登堡只好再次使用宪法第 48 条行使了总统特别权。然而，这一程序是对民主的一味毒药，不能长期维持。如果政府的议案要在议会通过的话，就必须组成一个多数派的联盟，而这将意味着民族社会主义者上台。

通过施莱歇尔的疏通，而且保证其内阁可以控制住希特勒，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邀请希特勒主持大局，巴本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感到胜券在握，提出了与新政府合作的条件，即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和举行新选举。第一个条件在 6 月中旬得到实现，第二个条件则在 7 月末得到了满足。[②] 如今，希特勒开始对自己重新定位，确立了自己真正的目标，即取得总理岗位，并得到兴登堡给予布吕宁和巴本一样的近乎专制的权力。

3. 吉星高照希特勒

随着戈林担任国会议长，民族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的主要对手共产党联合起来，以确保 1932 年 12 月对巴本总理最不光彩的不信任投票通过的可能性。[③] 尽管希特勒的目标是取代兴登堡，但是兴登堡总统

271

① Peukert, *Weimar Republic*, p. 256;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p. 157.

② Bullock, *Hitler*, pp. 210, 220;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365—367, 373—374; Craig, *Germany*, 1866—1945, p. 562—564.

③ Bullock, *Hitler*, pp. 226—227.

仍然妨碍着这位被其称为“波西米亚下士”的希特勒。由于民族社会主义者在11月选举中的票数下滑，兴登堡加强了自己的实力。他指出，议会缺乏多数派政党，因此恢复了巴本的职权。① 于是，希特勒的拥护者施莱歇尔开始密谋取得纳粹党的支持，抛弃希特勒，使自己成为总理。②

1933年1月，希特勒和巴本联合起来反对施莱歇尔，使他短暂的总理生涯走到了尽头，使政府再次陷入不知所措之中。这对兴登堡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发展，他别无选择。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了总理宝座。③ 希特勒使用了公元6世纪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击败罗马人获得最高权力时的庆祝仪式来纪念这一新时代的开端。④ 他相信，他出任总理将用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来改变德国的历程。⑤ 德国自1918年以来的自由民主实验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在随后的15年里，各种全新的、难以想象的独裁形式取代了它。

四、巅峰时刻的纳粹

在最初的6个月里，民族社会主义者还是以魏玛共和国遗留的自由主义作为执政基础，兴登堡于1934年8月去世后，希特勒就成了德国的最高统治者。还不到一个月，幸运之星给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好机会。1933年2月27日，精神失常、24岁的荷兰人马丁·凡·德·卢贝在国会纵火。希特勒一边叫嚣“共产党暴动”，一边就于次日把一份紧急法令即《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放到了总统兴登堡的面前。通过给这样一位出身于普鲁士的总统精心设计纵火、叛乱和恐怖等一系列动乱，紧急状态法令因此扩大到了整个德国，从而获得了民

---

①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371, 394—395.

② 有关施莱歇尔（Schleicher）的策划与阴谋，参见 Berghahn, *Modern Germany*, pp. 115—28;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395—396, 399。

③ Bullock, *Hitler*, pp. 238—239, 244;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419—421; Schulze, *Germany*, p. 243.

④ 参见：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阿拉里克、阿陶尔夫和克洛维。

⑤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 434.

272

族社会主义黑暗统治的合法基础。[①]

在1933年3月初的选举中，新政府赢得了43.9%的选票，虽然没有取得执政的多数票，但是票数有了一定的增长。在2月28日紧急状态法令以及3月的选举中支持率升高后，新的国会于3月23日以反差极大的4∶1的绝对优势票数通过了授权法令，即《消除德意志人民和国家苦难的法令》。[②] 当人们可能还在怀疑新政府的意图时，它真正的颜色就已在主桅杆上飘扬了。

4月初，希特勒向各州派出了他自己的地方长官，在德国各地确立起他的统治地位。地方长官监督地方对总理的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近代以前的帝国使者们不得不去依靠变幻无常的地方武装来执行相关命令，而希特勒的地方长官们则不然。他们直接受到当地的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的支持，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还有国防军。[③]

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带着明显的破坏法律的意图来掌控法律的制定权，该党在这方面的举动毫不掩饰。任何读过《我的奋斗》一书的人都知道，从文化层面而言，真正的雅利安人是没有游戏规则的，而是靠抛弃规则来赢得胜利。希特勒痛恨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消除社会差别和保持社会安宁的观点，他也同样特别痛恨犹太人，视二者为万恶之源。[④] 尽管反犹主义在新政府的宣传和成果中并没有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但它早就在考查各种反犹太人的法律。4月的第一天就实施了对犹太人商业的联合抵制，这一举动遭到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强烈抗议。在联合抵制犹太人商业一周后，新颁布的法律将犹太人排斥于公职人员和司法界之外，禁止犹太医生治疗享有国家保险的病人，削减犹太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配额等。罗马天主教也受到了管制。在罗马教廷的同意之下，神职人员在布道期间禁止发表任何评价社会和政治

---

① Ibid., p. 459.

② Ibid., pp. 466—468.

③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1974), pp. 397—98;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456—460, 469—470。关于钢盔团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整合，见：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pp. 205—206。

④ *Hitler*, Mein Kampf, pp. 395—399; *Table Talk*, pp. 7—11.

的言论。[1]

1933年7月，纳粹党通过监禁、驱逐出境和恐吓等手段使各个政治对手保持沉默，实际上成了德国唯一的政党，党员人数高达250万，声势甚壮。短短的几个月内，大批德国人，从公务员到地方保龄球俱乐部成员，都成功地一体化了（gleichgeschaltet），或者说，他们与纳粹党取得了一致的立场。到了10月中期，国会遭到解散，德国也不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开始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向《凡尔赛条约》发出了挑衅。11月选举之后，国会再次召集起来，成了民族社会主义者需要用来发动世界战争的最后一个工具，每一位到场的议员都支持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者在竞选时曾向选民承诺，对那些在德国背后捅刀子的人应该血债血还。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到。[2]

在做上述事情之前，希特勒必须清理一下自己的门户。他的目标是冲锋队的领导层，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煽动叛乱者的本色，而且其首领恩斯特·罗姆还一直有把冲锋队变成德国的主要军队的想法。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即罗姆自己可能会争抢元首的位置。这就会使国防军的首领们感到担忧，而他们现在已成为希特勒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1934年6月30日是众所周知的“长刀之夜”[3]。到7月2日破晓为止，党卫军杀害了数十名冲锋队的高层和其他政治异己者，一些察觉到情况的反对派人士要么逃亡，要么被逮捕入狱。[4] 经过这场血洗后，人数已经减少的冲锋队被纳入党卫军的指挥之下。从此以后，党卫军成了希特勒的铁杆贴身保护者和心腹。有人在评论当时境况的残酷性时指出，由于受到罗姆计划政变的谣言和关于他的同性恋的漫画

---

①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474—475, 478.

② Ibid., pp. 145—148, 478—479, 482, 490, 494.

③ “长刀之夜”，原文为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源自德文 Nacht der langen Messer。——译者注

④ 死者包括施莱歇尔；少将费迪南·布雷多夫，他是施莱歇尔的亲密同事；希特勒的竞争对手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还有希特勒的伙伴罗姆，他拒绝了“好意”提供的有尊严的自杀。

的影响，这场大屠杀赢得了来自国会和普通大众的喝彩。[①] 实际上，这些杀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直到1944年以后，德国军队内才有人给希特勒带来同样的威胁。

1. 废除《凡尔赛条约》

1934—1936年之间，重新军事化的德国再次确立起摆脱凡尔赛和约控制的政治和地理形势。一战给德国带来的最大破坏是它的莱茵河西岸地区。德国由于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它可以在这一地区集结军队了。一年后，萨尔地区也根据原先规定的公投结果归还给了德国。1935年3月以后，德国空军在长期遭到禁止飞行后，又重新回到了蓝天。因为协约国也在按自己的步伐重整军备，所以国际联盟无力制止德国的这些不祥举动。1936年3月，铸剑已毕，剑始出鞘，德国军队在没有受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开进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协约国则祈求上帝保佑，举目他顾，接受了入侵的事实，并自欺欺人地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74

1938年，德国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满足。作为对《凡尔赛条约》的进一步挑战，德国军队开进了普遍欢迎他们的奥地利，重建了作为人们谈资的所谓"大德意志"，而这也是希特勒在林茨读书时的梦想。从种族角度看，这种新的合并使德国意识到，它要继续使用武力来夺取土地，它相信，这对于它的不断增长的人口是必要的。而这些土地最终来自捷克人和波兰人那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今属捷克共和国），是说德语的民众的另一个主要聚居区，它因此成为下一个夺取的目标。与奥地利不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强烈抗议。协约国虽然听到了捷克人的呼救声，却不予理采。1938年9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到达慕尼黑，提出关于德国占领苏台德的问题，他竟然轻率地将捷克至关重要的缓冲带送了出去。6个月内，

---

① Fest, *Hitler*, pp. 470—474;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499—504, 517—519。关于德国的邻国在1938年夏天和1939年防止德国入侵的内部军事讨论和谋划情况，见：Theodore Hamerow, *On the Road to the Wolf's Lair: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ambridge, Mass., 1999), pp. 239, 349, 254。

德国士兵迈着正步开进了布拉格。接着，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德国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1939 年 9 月，两国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它们根据先前达成的秘密条款，征服并瓜分了这个倒霉的国家。275 此后，即 1940 年，德国军队有条不紊地占领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并在盟友意大利军队的配合下占领了法国。欧洲各列强中，只有西边的英国得以幸免。

2. 德国的毁灭

1939 年 9 月 3 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然而在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什么作为。如果不击败英国和苏联，德国就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德国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做的话，那么就像印度之于英国一样，苏联对德国而言已经变成了一个“优越的”民族的生存空间了。希特勒相信，俄罗斯人比犹太人还要低级，称他们“天生野蛮”，组织能力就像兔子，而非蚂蚁和蜜蜂。但他也相信，“雅利安人的一滴血”仍流淌在俄罗斯人的血管里，使他们成为能够服从命令的民族。犹太人具有纪律性，且关注自己的内在规则，因此更加危险。由于坚信布尔什维克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非法产物，因此希特勒将俄罗斯民族的失败看成是把他们从三种残缺的意识形态下解救出来。①

1941 年 6 月下旬，在西线完成直接目标的德军开始向东部进军。如果当时德军旋转 90 度，入侵北非和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那里，德国也许能更有效地打击英国，控制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以及中东油田的入口。然而对法国轻而易举的胜利以及与英国的战争僵局使希特勒改变了战略，他拒绝了将军们的意见，错误地选择了进攻苏联。后来他声称这一改变的原因是，情报确认，一个苏联工厂的大型坦克产量比所有德国工厂的总产量还要高。② 由于苏联的冬天与德国人拙劣的时间选择及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

---

① *Table Talk*, 7/5/41, p. 6; 8/11/41, p. 23; 9/17—18/41, pp. 33—34; 9/23/41/, p. 38; 9/25/41, p. 40; 10/13/41, p. 55. 参见：Robert Procto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1988), pp. 177—194.

② *Table Talk*, 1/5—6/42, p. 182; John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0).

的进攻停滞在了莫斯科的外围，从而使俄罗斯人逃脱了一场最可怕的大屠杀。 276

1942 年夏天，德国将第二次进攻的目标定位于占领苏联南部的油田。但是，在斯大林格勒，以围攻的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告终。这个战役是对双方军队来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不可逆转的拐点，大大减少了德国赢得战争的机会。对于德国军队来说，巨鲸英国和巨熊苏联实在太大，难以下咽。当 1943 年初美国全面介入战争时，盟军决心轰炸德国的普通居民，德国人变成了受追击的猎物，德国的垮台已经只是时间问题。1944 年 6 月 6 日诺曼底登陆后，盟国军队重回欧洲大陆，顽强向柏林进击。但是，到 1945 年 5 月，他们发现苏联军队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希特勒已经自杀。①

五、邪恶的根源：犹太人、基督徒和布尔什维克分子

德国人的愤怒和复仇把希特勒推上了台，但他们并没有给他任何授权去随意杀戮和劫掠那些无助的替罪羊，就像犹太人很快就受到的对待那样。希特勒可能祈求德国犹太人去给他的对手抹黑，并由此而推进他的计划，这一点无需用数百年来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以及相互之间的抵制来加以解释。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19 世纪的德国是一个犹太人生活的好地方。德国犹太人的解放开始于 19 世纪初，虽然人数不多，大约占人口的 1%，但到 19 世纪末已成为相对富裕且受尊重的阶层。占全德犹太人 37% 的普鲁士犹太人在 1808 年就已经获得了公民权，10 年内就像任何非犹太公民一样可以搬迁、工作、结婚和买土地。19 世纪中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解放了全德的犹太人，并成了其他各邦纷纷效仿的榜样。②

然而，犹太人发现他们仍受到争议。到 19 世纪 60 年代，犹太人 277

---

① Donald Kagan, *On the Origins of War* (New York, 1995); Schulze, *Germany*, pp. 245—270.

② Nipperdey, *Germany from Napoleon*, pp. 217—221; cf. Vick, *Defining Germany*, pp. 211—212.

虽然人数很少，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却在各精英职业中成绩斐然。非犹太人注意到。在19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和维也纳，8%的文科中学的学生和12%的大学生都是犹太人的小孩。① 传统上，犹太人在服装和零售行业中都相当强大，此外，17%的德国银行家、16%的律师以及10%的医生也是犹太人。政治上，大多数犹太人是左翼自由主义者，犹太律师在各个自由派政党内有很高的地位。爱德华·拉斯克是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也是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的主要批评者，他对开始于1873年的经济萧条进行了多方的指责。半个世纪后，即1922年，瓦尔特·拉特瑙担任了魏玛共和国的外长，率领政府代表团去贯彻《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赔款，然而，正是这一代表形象使他丢掉了性命，不出一年他就遭到了暗杀。②

在德国的基督教徒之中，虽然对犹太人的仇恨早就存在，但很久之后才被大家关注并且发展为一种系统性的运动。这种系统的反犹运动是对犹太人成功和德意志人落后状况做出强烈反应的一种注解。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绝大多数基督教徒的代言人，他们之中（不含奥地利）有2/3都希望犹太人改宗并融入基督教社会。③ 德国天主教和犹太教对宗教团体的忠诚高于德意志国家，这种观念使得他们既不受世俗的、非宗教的同胞喜欢，也不受他们那些虔诚的新教徒同胞的欢迎。④

迟至1900年时，反犹主义在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发展还远远超过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2 000名德国犹太人为祖国战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份里，也没有发生反犹暴乱或集体性迫害。

---

① Nipperdey, *Germany from Napoleon*, pp. 221—222.

② Blackbourn, *Nineteenth Century*, pp. 287—288; William Carr, "Nazi policy Against the Jews", in Bessel,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p. 70; Gall, *Bismarck*, pp. 70—72，相关资料丰富。

③ 见第三章，马丁·路德。

④ David Balckbourn, "Catholics, the Centre Party and Anti-Semitism,"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Essay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7), pp. 168—187。多数派的新教徒能够像对待少数派的犹太教徒那样强硬地对少数派待天主教徒，但是天主教徒也有他们自己的稍微温和一些的反犹主义。

1932—1933 年希特勒攫取政权时，反犹主义在其中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希特勒政府的反犹举动迟早会引起大多数德国人的惊讶和不安，这会使人们对新政府的害怕胜过对他们的犹太邻居的担心。事实上，发生于 1938 年 11 月 9—10 日的 Kristallnacht 即"碎玻璃之夜"甚至导致了纳粹精英层的分裂。作为该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饱受批评。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夜晚，也即慕尼黑暴动的纪念日，种族灭绝运动拉开了序幕。为了报复一位波兰籍犹太青年谋杀德国驻巴黎使馆人员，冲锋队杀死了大批德国犹太人，焚烧了犹太人的教堂，并全面破坏整个德国境内的犹太人生意。后来，同样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种族灭绝运动的导演者们力图隐藏这一事件的真相并试图加以狡辩，他们相信大多数德国人都不会同意。[1]

278

如果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德国高层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似乎是为了消灭欧洲的犹太人，那么这种看法显然是带有感情色彩，它不会成为德国士兵在东西两线与盟军交战的理由，或者说，不会成为那些在国内战线的人们为士兵们工作并等待他们回家的理由。[2]战争的原始动机完全是自我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犹太人为中心或反犹主义为中心。对于那些被迫赔付的苛刻赔款和一战以来所忍受的可怕苦难，德国人期望通过全面的胜利来报复和纠正他们被迫支付的苛刻的赔款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所忍受的可怕的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最初的胜利者被认为是为德国立下了大功，很多德国人希望战争的胜利成果多得就像希特勒回顾德国和苏俄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一样。在那个条约里，德国从苏俄手中接防了

---

① 有关纳粹采取激进方式力图消灭犹太人以及"最终方案"的演化过程，参见相关文献：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2: A Documentary Reader*, 3rd. ed. (Exeter, England, 1983), pp. 107—135。

② Schulze, *Germany*, pp. 270—275. 关于 Goldhagen 的讨论，见：Evans, "Anti-Semitism: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Longest Hatred'", in *Rereading Germany History*, pp. 149—177; Fritz Stern, "The Goldhagen Controversy: 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Theory?" *Foreign Affairs* 75 (1996): pp. 128—138; 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2000), pp. 251—262.

波罗的海三国及芬兰、波兰、乌克兰，同时还得到了苏俄 3/4 的钢铁工业和 1/4 的纺织工厂。在了解到德国人的普遍的情感后，希特勒宣称，与《凡尔赛条约》相比，《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具有“无限的同情心”。①

1941 年，波兰的犹太人聚居区里，从奥地利和德国驱逐来的德国犹太人开始激增，德国政府甚至还考虑过将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和马达加斯加的不切实际的办法。由于战争的起伏和灵魂的堕落等共同作用的影响，死刑开始成为最合适的解决方式。而对于被指派的行刑人员来说，毒气室是最有效率和压力最小的方式。② 1944 年，战争对德国人来说已是无法挽回，在集中营里大批屠杀犹太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当盟军攻入德国时，犹太人和犹太劳工结束了与他们的管理者的关系。这些管理者唯一关心的是尽快毁灭各个集中营以及他们所讲的故事。

279

新的大屠杀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它建立在纳粹战无不胜的假设之上并且被这种假设所蒙蔽。被包围的德国不可能既要向集中营里人数居高不下的犹太人和苦工供应粮食，又要供应一支正在撤退的军队，还要保护国内的公民从盟军的坦克攻击和地毯式轰炸中逃生。早在 1941 年时，希特勒就引用了一句话，谓之“法律适合于非常时期”，命令希姆莱一旦在国内发现麻烦的苗头，就“消灭集中营中的一切事物”，“一举”除掉那些麻烦制造者头目。③

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德国犹太人也只占德国人口的很小比例。但希特勒认为，没有其他民族会比犹太人给世界以更大的伤

---

① Raff, *A History of Germany*, p. 227; *Table Talk*, intro., p. xxxiii.

② Ian Buruma, “Depravity Was Contagious”, review of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2/10/00, p. 13.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1985). 关于盟国是否知道集中营的问题，见：Richand Breitman, *official Secrets: What the Nazis Planned, What the British and the Americans Knew* (New York, 1998), esp. chaps. 8—11, esp. pp. 231—232.

③ *Table Talk*, 9/14—15/41, pp. 29—30; Blackbourn,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pp. 437—439; Bullock, *Hitler*, pp. 700—703; Evans, “anti-Semitism,” *in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pp. 150—155, 160, 162, 165—166.

害，或者说没有其他民族会比犹太人更具伤害世界的能力。然而，在他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以及开始统治的第一个月里，是共产党而非犹太人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日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会纵火案的前后，希特勒的政党更害怕共产党的政变，而非任何正在逼近的犹太人的危险。

然而在发起联合抵制犹太人生意的运动后，情况急转直下。由于共产主义幽灵的威胁和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无能，民族社会主义者偷偷地把他们自己的没有什么销路的但却非同一般的反犹主义塞到了德国的政党政治中。希特勒把俄国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和忠于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描绘成了“犹太人的创造物”，把马克思主义和犹太教挂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脖子上。1920 年以后，这些“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民族社会主义最强大的政治敌人，也是德国现代民主制度最好的期盼。

280

在希特勒的脑海里，把马克思主义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政治上对于平等社会的共同渴望。在他的历史观里，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于公元 1 世纪“犹太人动员奴隶”反抗罗马人。革命事业超出了犹太人的能力，但却成功地被他们的更强有力的基督徒后代承担了起来。通过阶级对抗以及下层反抗上层，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成功地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基础，得到了不应获得的地位和好处。[①] 到了 20 世纪，希特勒发现历史正出现重演的危险，如今正以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民主制的形式以及以德意志帝国为代价来重复过去的历史。他把民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甚至现代主义艺术等各种东西纠集在一起，都视为“犹太人的创造物”。[②] 他相信，这些都是样式各异但又相近的“以无生有”的把戏。这是一种认为其他人获得了不应得到的成功的观念，这种观念来自于他的学生时代。当时，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各种失败，因此别人的成功一直折磨着他。

---

① *Table Talk*, 10/18/41, p. 75; Noakes and Pridham, *Nazism*, pp. 1997—1998.

② Bullock, *Hitler*, pp. 407, 410—411;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249, 275, 288—290.

在希特勒解读的历史中，尽管犹太教有着比基督教更长的历史和物质优势，但基督教表现出了社会政治的狂怒。现代的犹太民族是“引发人们腐朽的酵母”，但现代基督教则“从制度上培育着人类的失败”，造成的危险更大。“纯粹的基督教就是直接导致人类的毁灭；全心全意的布尔什维主义则湮没在空谈之中”。[①]

因此，希特勒在对德国的犹太人进行“最终解决”时，还找出了“腐烂的基督教分支”加以切除，将它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的“最终任务”，即消灭基督教中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②] 根除基督教徒远远超出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③] 这一“宗教问题”在理论上有两个层次，它不像犹太教，它拥有人数众多而忠心的继承者。保罗的基督教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制的原型，它在上古时期摧毁了罗马帝国，而现在又在威胁着罗马帝国在现代世界的继承者德意志帝国。在希特勒对历史的解读中，罗马帝国是日耳曼各民族的一位伟大朋友。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的联姻，曾经恢复了罗马的活力，延长了它在上古后期的统治。相反，基督教禁止了“雅利安人普遍接受的”罗马宗教，以一个上帝之下所有民族平等的虚幻观念取代了罗马宗教的稳定社会和种族一致的信仰，无视社会等级和种族的差异。耶稣曾引导“雅利安人反对犹太民族的地方性运动”并且在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中站在罗马人一边，而经过犹太教义熏陶的塔尔苏斯的保罗则反过来带领大众反对罗马人，通过基督教向罗马人和他们之后的欧洲文明释放犹太人的仇恨。[④]

281

---

① *Table Talk*, 10/10/41, p. 51; 12/14/41, p. 146.

② *Table Talk*, 12/1—2/41, pp. 140—141; 12/13/41, pp. 142—143. He calls this “a solution to the religious problem.”

③ 根据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说法，他领导的这一运动日后成了希特勒青年团，“从一开始‘毁灭基督教就被明确地认为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尽管‘权宜之计的考虑使这件事成为了不可能’……除非民族社会主义拥有团结的强大力量”。见：Joe Sharkey, “The Case Against the Nazis: How Hitler's Forces Planned to Destroy German Christianity”, *New York Times* 1/13/o1, sect. 4, p. 7; Robert L. Bartley, “Christians, Jews, and Wotan”, *Wall Street Journal*, 3/25/o2, p. A19。

④ *Table talk*, 10/21/41, pp. 76—78.

民族社会主义的精英们相信，基督教最终会反对党的“种族主义……没有节制的侵略战争以及教会完全从属于国家等各项原则”。[1]但不同于人数少的犹太人，基督教徒人数众多，过于强大，太德意志化，以至于无法进行攻击。纳粹党的领袖们也相信，在历史上，各教会总是采纳政治统治者的统治目标，因此，它们也许会及时地投入到民族社会主义的怀抱中。这个愿望就隐藏在民族社会主义纲领的第24条里，它接受了历史上的基督教，以便向动摇不定的基督徒们敞开大门。出于这个原因，希特勒命令党的领导人不管对自己的信仰有多么虔诚，也要保留教会，而他自己直到自杀为止，都是这样做的。[2]

相较于传统的基督教，启蒙运动中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和左翼的黑格尔派要脆弱得多，更容易被民族社会主义所吸纳。[3] 在纳粹统治的早期，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等在内的大多数教会在人权和公民自由问题上都保持了沉默，它们在经受这一政治风暴的同时，也都寻求迁就这一新政府的诸种途径。1933 年 7 月，梵蒂冈要求教士们保持沉默，以换取它对自己的学校和组织的控制权，它希望因此而守住一块基地，由此而展开原则性的道德战役。有一场这样的道德战役是针对安乐死计划的。1939—1941 年间，安乐死计划通过注射、营养不良和毒气等手段，估计杀害了 72 000 名身体和精神残疾的儿童和成年人。[4]　282

1933 年，一个亲纳粹的新教主导的德国基督教运动开始用新的纳粹政治方式合并德国的主流基督教领导阶层。这一运动的基本原则包括排斥教会中的非雅利安人牧师和那些娶非雅利安人为妻者。1933

---

① Sharkey, “The Case Against the Nazis.” *Rutgers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网站上有关纽伦堡方案的文献可以解读出纳粹毁灭德国基督教的计划（www. cam-law. rutgers. ed/publications /law- religion ）。Ibid

②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 pp. 95—96.

③ Michael Balfour, *Withstanding Hitler in Germany 1933 —1945* （London, 1988）, p. 17.

④ 有关德国的天主教与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参见：John S.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 1933 —1945* （New York, 1968）; E. C. Helmreich, *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 （Detriort, 1979）; Günther Levy,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and L. D. Walker, *Hitler Youth and Catholic Youth , 1933—1936* （Washington, D. C. , 1979）。关于安乐死的计划，参见：Jeremy Noakes, “Social Outcasts in the Third Reich”, in Richard Bessel, ed. ,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p. 88; Proctor, *Racial Hygiene* 。

年，德国基督教会选举大主教，在18 000人的新教神职人员中只有7 000人加入了对抗的牧师紧急联盟。[①] 然而，在1934年5月，效忠《圣经》、由新教主导的反纳粹“忏悔教会”却出面谴责这样的观念，即不论怎样，希特勒和他的政党都被看成是上帝意志的展现。[②]

在民族社会主义所想象的新时代里，《圣经》基督教在政治方面是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是“违背自然的……一种叛乱”。[③] 还在希特勒的学生时代，他就已经有了这种明显荒唐的印象。他曾嘲笑般地回忆道，上午10点钟学生参加神学教义课，听《圣经》中关于创世纪的故事，但到11点时又接着在自然科学课堂上听达尔文的看法，后者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胜利。[④]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建议通过将基督教教义置于科学之光之下来使基督教慢慢地“自然死亡”。[⑤]

希特勒相信，历史已经用文献证明，从塔尔苏斯的保罗到卡尔·马克思，从基督教造成的罗马帝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到列宁带来的俄罗斯帝国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一次飞跃，他担心警惕性不高的德意志帝国会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布尔什维克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下一个牺牲品。由于他相信古代罗马帝国后期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他在1933年的冬天和次年春天提出，危险的“古代基督教的经历”的幽灵会以一种新的“败坏种族完整性”的方式“复活”。1941年秋，他在日常谈话中又详细叙述了这样的担心。他表达了一种想法，283 即布尔什维克在非常时期放逐了成千上万的俄国男人，也可能有同样多的女人被送到了一些来自别国的劣等非俄国男人的床上。[⑥] 如此有

① Balfour, *Withstanding Hitler*, pp. 38—39.

② The Barmen Declaration, Craig, *the Germans*, pp. 96—98; Mary Fulbrook, *The Divided Nation*, pp. 80—81; Doris Bergen, *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1996).

③ *Table Talk*, 10/10/41, p. 51.

④ Ibid., p. xxxiii, 10/24/41, p. 83.

⑤ “随着科学的进步，基督教的教条衰落了……在科学之光下，神话也渐渐消退……当大多数人意识到星星就是世界，也许就像我们一样居住人类……那么，基督教的教条（包括创世和其他神话等）将变得荒唐。”Ibid., 10/14/41, pp. 59—60。

⑥ Ibid., H. R. Trevor-Roper's introduction, pp. xxvi-xvii.

目的的种族杂交，使欧洲面临着劣等的后代的威胁，是对基督教和布尔什维克所说那种平等主义的愚昧的追求。[1] 因此，那些在古代曾毁灭罗马帝国的犹太人力量，正借助于基督教和布尔什维主义生存于现代社会。对于希特勒来说，这里隐含着对犹太人“最终解决”以及战后对基督徒实行恐怖统治的命令。

六、为什么是希特勒？

1. 引力与手段

“是的，我们是蛮族！我们期望成为蛮族！这是个荣誉的称号，我们将让这个世界恢复活力！”[2] 1933 年，希特勒在进餐时曾宣称，从历史的角度看，通过这个称号德国人可以将卑微和征服联系起来。成功的领导者不会盲从于传统，也不会简单地宣传过去。从弗里德里希大帝、俾斯麦、施特雷泽曼到保罗·冯·兴登堡的统治都是这样。尽管纳粹的宣传将希特勒自己置于其中的 3 位德国人之列，但希特勒是超级的对立性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他发现德国的过去和现在只有失败和阴影，因而给德国人承诺了一个完美的新时代。一个在 1932 年才成为德国公民的奥地利人，他没有根基，多变，只顾自己，对德国历史丝毫不感兴趣，所要的只是用它来推进自己的事业。用一个现代传记作家的话说，直到 1928 年时，希特勒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家，离开南部德国就鲜为人知，是……巴伐利亚政治中的疯狂偏激者之中的一个分子”。[3]

希特勒在 1933 年夺权成功并不是德国人的真正胜利。[4] 他的党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它成功的到来仅是危机时期以及一些

---

① Ibid., 10/21/41, pp. 78—79.

② Ibid., cited by Trevor-Roper, introduction to Ibid., p. xxvi.

③ Bullock, *Hitler*, p. 114. “A man with no credentials for running a sophisticated state machine.”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 423.

④ “纳粹现象并非德国价值观换气过度的表现……纳粹主义既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一致同意的……”见：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pp. 234—235。

易受伤害的社会团体偏激性的支持的结果，也是其得到较好组织的游说的结果。没有哪一个团体比下层中等阶级（untere Mittelstand）更持续地支持民族社会主义。总体上看，1925 年至 1932 年期间，纳粹党 50% 以上的党员来自这一阶层。① 那些在 1933 年 3 月大选之前支持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人，实际上是选择了他们的痛苦和悲伤。这次选举是希特勒将德国转变为一党专制国家前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支持是对日后似乎可信的经济救济、政治改革和国家安全方案的积极回应。当复仇和赔款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最重要的事时，很难说他们是在支持发动一场战至最后一个男人的战争，或支持对 600 万德国人和欧洲犹太人的屠杀。

284

然而，在 1933 年 3 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 43.9% 选票，这是纳粹党获得的最高支持率。这一得票率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自私自利的结果。在国会纵火案还不到一周后，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纳粹厚颜无耻的恫吓，倘若需要再举例的话，那么几乎所有有敏锐眼光的投票者都注意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黑暗和不计后果的一面。

矛盾心理继续遮蔽着纳粹的成功。有人宣称，到 1938 年为止，10 个德国人中已经有 9 个成了“元首的崇信者”。然而，这里也同样不能否认，在纳粹统治的 12 年里存在许多个人和组织对政府的反抗，它们包括工人在生产线上的怠工，教会对各种非道德计划的谴责，以及对炸死希特勒的勇敢尝试等。② 纳粹的统治仅仅依靠无以复加的畏惧与恐怖，它从未像它的宣传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地使德国成为那种自

① 这一阶层主要是由“技艺精湛的工匠、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人士、下层中等阶层雇员和官员（包括小学老师）、小型商业经营者组成”。Balfour, *Withstanding Hitler*, p. 19。

② 令人惊讶的更高的估计，参见：Sebastian haffner's, *Anmerkungen zu Hitler (Munich, 1978)*，引自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p. 255, n. 19. Kershaw strongly refutes: *The "Hitler Myth,"* pp. I, 83—104。

愿而团结的民族共同体。①

然而，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的受外部掠夺和自我蹂躏的历史的迷茫的民族来说，面对如此之多的德国人把最具破坏性的掠食者带到他们当中的举动无所作为，或采取了苍白无力的抵抗。其背景有着非同寻常的条件，有人认为，这些非同寻常的条件足以将当代任何一个国家带到这种爆发点。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抱有神话般的期待，但此后是 1918 年可耻的军事失败，而且与 1921 年惩罚性的战争赔偿联系在一起。除了这些打击，还有经济的崩溃和前所未有的失业，而进行了 13 年多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统治的新政府却不能为德国提供摆脱这些灾难性的危机的有效措施。

285

如果没有如此多的交迭在一起的灾难降临到德国头上，而且魏玛政府在处理危机方面不是那么无能的话，民族社会主义者也许只能在疯狂的边缘徘徊。1925 年以后的年度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支持率的升降与政府成功解决危机的关系。能成功解决问题的魏玛政府将会比希特勒的激情演说更容易让大多数德国人平静下来。然而，艾伯特的自由主义和兴登堡的保守主义都没有能力将德国人从黑暗的日子里解脱出来。最后，这一事实给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以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他知道怎样用许诺去填补人们的希望空隙。

共产党成功暴动的幽灵尤其吓坏了德国的中层和下层中等阶级。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将极大减少他们的个人财产和生活水平。大多数的德国人也有理由相信，共产党暴动更可能与左派自由主义政府有关，而非和右派的保守主义政府有关。② 因此，随着兴登堡于 1925 年继任魏玛共和国总统，防止共产党暴动可能性的屏障已高高举起，

①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第四章; Balfour, *Withstanding Hitler*, 第三章; Hamilton 有益地标出了 1919—1933 年间各政党在帝国议会投票中得到的支持率。*Who Voted for Hitler*, p. 476, 另见: Henry A.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Oxford, 1985), 关于与希特勒青年团对立的其他青年文化 (prominently, the Edelweiss Pirates), 见: Peukert, *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 and Opposition in everyday Life*, trans. Richard Deveson (New Haven, 1987), pp. 145—164。

②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404, 407, 409.

然而，由于兴登堡的失败，这种防止共产党的屏障却有利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夺权。

希特勒的政党无视合法性和满足于暴力，将自己当成了无与伦比的问题解决者和各种错误的无情纠正者。由于看不到摆脱魏玛共和国的下层逆流的办法，而且将兴登堡和外国列强视为造成他们的困苦的责任者，于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就很容易对希特勒关于解脱和惩罚的魔术抱有期望。对于大多数自高自大的德国人来说，既然已经一无所有或近乎一无所有，那么，在终极游戏中，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什么都没有的态度似乎是最完美的。总之，那些已经接受了民族社会主义的人已经知道，它将意味着至少是与国外的敌人以及国内的第五纵队的战争。

2. 彻头彻尾的现代纳粹吗？

286 在现代德国的历史编撰中，将民族社会主义的成功斥责为是对于德国独裁历史的延续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甚至至今人们仍能听到基于年代学层面上的争论，也即最重要的一步是否出现在霍亨斯陶芬·弗里德里希家族、路德、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及俾斯麦时代。无论其先例出于何处，也不管它怎样，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它的最重要的关联是在威廉二世时代的德意志帝国。[①]

最近一个对“为什么是希特勒”这一问题的相反回答中，提到了接受民族社会主义的现代动机，目标指向它的平等主义、大众民主以及有关更完美的人民和国家的炽热许诺。希特勒集团抛弃了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后，既没有指望从过去也没有指望从其所处的时代得到教训，而是选择了还有待明确的未来。它邀请所有的德国人成为平等的参与者“形成一种民粹的民族主义”，这种大范围的接近既欢迎

---

① Evans, “Whatever Became of the Sonderweg?” *in Rereading Germany History*, pp. 12—22。引起不同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维·布莱克勃恩（David Blackbourn）的评论文章：“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Ger-man Bourgeoisie”（1981），in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pp. 67—83, elaborated more fully in Blackbourn and Eley, *The Particul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pp. 253—260, 285。

贵族群体也欢迎层中等阶级，并且既信奉沙文主义又包含着社会意识。[①]

如果希特勒是古老的、极权主义德国的顶峰和进行集体革新的德国一个穿着杂色服装的流浪艺人，那么他也是20世纪第一个从核心意义上接受了摆脱现存价值观的19世纪社会文化革命的政治领袖。[②] 他的政党的目标是用一个完全是尝试性的未来去代替一个稳固地坚守着原则的过去，包括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在遭受后黑格尔学派错误观念的多次删节后，德国许多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已在19世纪的搏杀中渐渐死去。威廉二世时期那些不满的年轻人，他们在时尚的空谈和民族领袖的吸引下，追求那些社会文化更少、种族性的和乌托邦的世界。像他们一样，精神空虚而职业上不得志的魏玛一代就更容易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牺牲品。[③] 有关为雅利安人增光添彩、将犹太人病态化以及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报复的奇怪论调，迷倒了大学、会议室、啤酒馆中的听众，鼓励着与德国人在历史上曾经认为是明智、道德和人性的东西进行最野蛮的分离。对于古老德国所要依赖的各种易碎的东西而言，这里有一种新的易变心理，它既自信又绝望，乐意接受希特勒的各种言论。 287

---

①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pp. 163, 233。纳粹求助于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抨击不平等的贵族寡头、资产阶级精英、资本家以及犹太人大谈的“民族重聚”和“共同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创造性条例”，它“在对民族负责的基础上承认并给予人民以公民权，而不是根据地位的级别来行事”。Ibid., pp. 178, 184, 192, 198, 201—202, 204, 208—209. 211, 228—231。

② 参见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351—357. 关于这些价值观在今天的地位，见：Müllen, *Another Country*, pp. 1—20, 266—285。

③ Peuckert, *Weimar Republic*, pp. 94, 256; Schulze, *Germany*, pp. 182, 232—233; Mosse, *Crisis of German Idealism*, chap. 9.

第十一章　复合的德国人：二战后的德国

1945 年 5 月 8 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正式结束。此前一天，所有的德国军队已经在法国兰斯向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无条件投降。到此时为止，盟军的轰炸已使德国的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整个战争中在德国的死亡人数攀升至 450 万人。在他们当中，50 万平民死于城市，200 万士兵死于战场，另外还有 200 万是在 1944—1946 年期间从德国占领的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驱赶出来的难民，他们曾被称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迁移运动”。[①]

获胜的盟国在寻求使战败的德国安定和统一之路，而他们自己却因为不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而出现了分裂。在日后的冷战期间，盟国的这些差异在各自的占领区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它们也同样塑造了德国的未来。法国和德国左翼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相信，德国问题的解决基于德国的永久分裂之上。最终，盟国为解决他们自己的分歧的需要建立了两个德国。

在 1943 年 11 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英国、美国和苏联同意将德国分区占领。1945 年 2 月雅尔塔的第二次会议上，三大国强调要在最大

---

① John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 The United Germany in the Mid—1990S* (New York, 1995), p. 23; Lothar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Oxford, 1997), pp. 5—6, 35.

的程度上强制性地解除德国武装和去纳粹化。在3个西占区，盟国开始把德国人转交到民主人士手中。与此同时，在东占区，苏联则选择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所有的4个占领区里，德国人都极不情愿地转变信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希望能走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一道路会使德国保持统一，而且是所有德国人可以接受的。①

1945年夏天，波茨坦会议贯彻了盟国的协议。在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和英国首相克莱门特·W. 艾德礼的会见中，盟国采纳了务实的统治方式，从而在长期的全欧性危机之后挽救了德国人。这种统治方式就是，一国的统治者，现在对德国而言也即盟国军事占领区的长官，将以他们认为的最好方式来治理占领区。

赔偿问题是盟国间的诸多分歧点之一。苏联人占据的区域领土面积最大，但人口最少和工业化程度最低，而西方盟国的则要好得多，他们的占领区包括鲁尔工业区。因此苏联人要求从西方盟国占领区另外再得到10%的赔偿。贫困的苏联人拆除许多德国的工厂设备搬运回国，并在国内重新组装，这表明他们无意长期占领德国。法国人在占领的头4年里同样大肆搜刮德国。然而，到了1948年，西方盟国包括法国在内达成了协议，在反省了《凡尔赛条约》的后果后，他们选择了复兴和重建而非惩罚和掠夺的政策。受益于在4年内投资14亿美元以便迅速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西德的统一和生产发展之迅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战争结束时，西德境内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人士，同样，在东德也很少有还在活动的共产党人，盟国在两个德国都十分忙碌。由于认为德国人整体上是纳粹，因此，西方盟国们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反法西斯组织在重建德国的进程中的角色。由于这样一种情况，抢先跳

291

① Mary Fulbrook, *The Two Germanies, 1945—1990: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 J., 1991), pp. 1—3; Henry A. Turner, Jr., *The Two Germanies Since 1945* (New Haven, 1987), pp. 8—16.

②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21—22, 371;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131—33, 153;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12—13.

跃性地开始德国民主进程以及将这一进程置于本国政治领袖领导下的机会就错失了，这是值得商榷的。① 同样，盟国在非纳粹化和再教育方面付出巨大努力的同时，却让西占区的德国人处于旁观者的地位。美国人所做的一份搜查纳粹的调查表引用了 136 个将德国人排斥在战后工作之外的强制性原因。那些遭到审查的德国人，共有 4 种可能有罪的类型，只有一个可以免罪。② 战后如此详细的审查和教导在冷战期间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就不幸和犯罪而言，它创造了官样文章式的可怕梦魇，使很多受到压制的德国人抱怨不已。③

与之相反，苏联人将矛头对准了社会政治结构而不是个人。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集体代替了旧的纳粹体制，这个集体还包含了先前存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1946 年成立的新的统一社会党（SED），从那时起成了东德唯一的合法政党。通过压制个人和企业的自由，新的苏联模式的指令性经济逐渐破坏了自上而下的控制获得的政治稳定。

尽管最初进行了筛选过滤，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前纳粹党成员在德国重建中获得了重要的岗位。许多事例表明，他们技术更熟练，经验更丰富。在较大的事务安排方面，他们更具实际经验，当然，这一点可以再讨论。在纳粹管制年代，许多工作岗位需要与党派联系。无数的德国人按要求成为名义上的纳粹党员，这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为生活所迫。在重建的最初数个月中，盟国关于确认和惩处真正纳粹分子的决定就引发了冲突，并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在牢记人类的责任和至关重要的继续前进的需要之间保持平衡。当然，盟国更看重前者，而德国人则更看重后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德国人已

292

---

① 相关例子，见：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135—136.

② Ibid., pp. 146—147;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17—18.

③ 德国延迟到来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和牺牲到伤心，他们的怨恨已经影响了德美关系。Richard Bernstein, "The Germans Who toppled Communism Resent the U. S.", *New York Times*, [NYT] 2/22/03, p. A7; Christopher Rhoads, "Revisiting History: Behind Iraq Stance in Germany: Flood of War Memories",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2/25/03, pp. A1, A8。

经遭受过一次有史以来类似的最惨痛的失败。[1] 现在德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对他们极其熟悉的十字路口，他们曾无法接受1918年的失败和魏玛共和国，并因此而铺就了通向1933年之路。

1949年5月，在盟国的授权下，德国选举产生的议会批准了西占区的新的临时宪法，即众所周知的基本法。73岁高龄的康拉德·阿登纳是前科隆市市长、天主教徒信仰者和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他担任议会主席并签署了这一法案使之生效。3个月后，他成为战后西德的第一位总理。战后的西德更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变化，因此它在前20年中一直由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执政，基民盟是老的天主教中央党在战后对所有基督教力量的重构。1948—1952年间，马歇尔计划使坚强而聪明的阿登纳能站得更高，去实践并不被某些人看好的所谓“总理民主制”的东西。[2] 其意图在于重新恢复西部的工业和劳动，以形成一道经济墙来对抗东部地区的社会主义。两个德国之间有两堵墙，而第一堵墙就这样匆匆建了起来。

1946年12月，英国、美国合并了他们的占领区（“双占区”）。两年后，即1948年6月，法国也加入进来（“三占区”）。1948年6月，西德进行币制改革，这是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脑力劳动的产物。这一改革给刚合并的西占区在迈向国家地位的道路方面以第二次强大的推动力。在美国铸造了新的德国马克以及在6月20日的48小时公告中将其引入西占区后，西方盟国还将新货币扩展到了他们所占领的柏林地区，那里位于苏联的占领区内。从西方盟国所占领的柏林地区，新的德国马克可以流向苏占区和东柏林，而在这里，苏联占领当局在几个星期之后就发行了另外一种货币，即东德马克。西方的行动打破了与苏联人达成的谅解，导致西方通往柏林的主要道路遭到封锁。3 个月前，苏联人在发现盟国计划建立旨在分裂的西德后，就已经退出了盟国管制委员会。于是，盟国飞机在不到11个月的时间内飞行了

293

---

①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135—136, 140, 147—148, 150;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17, 21

② Fulbrook, *Two Germanies*, p. 17.

27.7 万架次，向 250 万没有生活来源的西柏林居民提供物资。由于这种对抗，东德与西德诞生了。[1]

一、奇迹和挫折

绝大多数德国人曾希望建立一个东德和西德的混合性联盟。然而，由占领国根据对立的政治立场所建立的新政府代替了他们所期望建立的国家。不过，这些新政府也有着许多共同点：不像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它们各自都成了具有高度预见性和充满活力的国家。

阿登纳德国的相应对手是瓦尔特·乌布利希，他在苏联度过了战争年代。1945 年，他以共产党首领的身份重返东德。这年年底，农业地产实现了国有化，容克阶层的特权也被废除。在 1949—1971 年的 22 年任期里，他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理[2]。乌希利希使东德的金融和工业国有化，把东德的 5 个分离的州都转变成了党的行政区划，并在农业领域实行集体化。1953 年 6 月 17 日，东柏林爆发了针对苏联占领的暴乱，但遭到残酷的镇压。在 1955 年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东欧的军事联盟）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东欧的经济联盟）后，这个新的斯大林国家变成了苏联帝国中最重要的附属国。1960 年新一轮的农业集体化引发了新的抗议，加快了人们向西方的逃亡。到第二年柏林墙建立时，已有 165 万东德人逃亡到西德。[3] 1968 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宣布，它在新的宪法范围内实现对国家的最高统治。

294

联邦德国借鉴了带有竞争性政党政治和泰然自若的实利主义的西方民主制度，禁止共产党活动。[4] 1950—1980 年期间，西德马克的币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 8%，而民主德国的相应增长为 3%。当然，由于东德更为艰难的转型，这一增长率已经相当令人敬佩。[5] 另外除了

---

①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29—32;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157, 163—164.

② 原文使用 Premier 一词。这与乌布利希所担任的实际职务经历有出入。——译者注

③ Kettenacker, pp. 18—20, 51—51; Schulze, *Modern Germany*, p. 316.

④ Müllen, *Another Country*, pp. 22.

⑤ Fulbrook, *Two Germans*, pp. 52—54; Kettenacker, *Geramny Since 1945*, p. 1.

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联邦德国还通过实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停留于蓝图阶段而魏玛共和国只是断断续续地得到实现的成果，也即有效率的政府和金融安全，把它的公民都争取到了民主的进程中。基本法包含了新的条款，用以防止无政府状态和曾经毁灭了魏玛共和国的法西斯主义。它否定了那些选票获得率低于5%的小党在联邦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权利，并且确认，在议会达成协议选出继任者之前，总理将一直留任。[①] 联邦德国因此而成了更为稳定的民主制国家，它的原则和目标不会欺骗或恐吓任何人。

支持西德1950—1980年间30年的持续工业繁荣，是劳资合作共同决定的一项政策。除了这种合作共识外，德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归结于德国工人的能力，他们在每周35个小时的工作比其他许多竞争者一周40个小时的工作做得还要多还要好。[②] 在东德，相似的工作道德却受到集体化、国家化和政治一致性的调节和压制，人们只能以经互会之内的生产步伐为准。

1. 西德

在新的物质主义社会使一些西德人感到沮丧的同时，从冒险的、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中提升生活和自由的标准就成了大多数人的目标。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的奇迹变成了处于上升中的左派自由主义的批评对象，它还批评政府在中学和大学介绍纳粹历史时反应迟钝。这些批评导致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的三党联盟，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和社会民主党的下台，促成了维利·勃兰特和新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FDP）联盟在1969年的执政，开始了左派自由主义长达14年的统治。勃兰特是一位坦率直言并因此而易陷入危险的社会主义者，战争时期他在挪威度过，他支持了德国国内外的抵抗纳粹运动。在成为总理之前，

①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104—106; Fulbrook, *The Divided Nation*, pp. 175—177, 181—85, 188—189; Fulbrook, *Two Germanies*, pp. 30—31.

②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108—134.

他就已经是受人喜爱的西柏林市长和基辛格政府中出色的外长。

与之相反，基辛格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直是纳粹党党员，在当时的外交部门担任广播宣传人员。1945年，他遭到拘留。1947年，他重申自己没有犯下任何战争罪行。这一对似乎差异很大的人却能建立联合政府，这正是战后处于转变中的德国的一个真实写照。1969年，当勃兰特击败基辛格时，距社会民主党（SPD）的上一次担任总理已过去了39年。假如说勃兰特是一种反抗角色，那么恰恰也是社会民主党的赫尔曼·米勒总理，他曾经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前与政府真诚合作，领导了最后一届联盟的运作。

尽管统一社会党代表着民主德国这个无阶级社会中的极具特权的群体，但是在战后，不论在东德还是西德，人们都生活在一个没有权力精英的社会里。在西德还有一些残余的旧贵族，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反抗过希特勒，在公众的眼里，他们还保留着过去德国贵族的生活。① 战后的德国人用实用主义的目光审视着自己和国家，把德国看成一个职业社会，一个由诸多群体组成、自由选择生产劳动的公民社会，而不是种族政治的联盟，也不是有固定的等级和划分为阶级的旧的等级社会。②

随着1961年以后柏林墙将东德人封闭起来，整个20世纪60年代，英才教育和平等的思想在西德尤其是在西德的高校中得到了强化。③ 1959—1988年期间，西德大学的注册入学人数增加了将近7倍，从20万人上升到了150万人。在勃兰特和施密特担任总理时期，由于他们不断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尤其迅速。④

296

---

① "A strikingly large number of the conspirators belonged to the Old Prussian nobility." Fest, *Hitler*, p. 702。菲斯特（Fest）认为，就左派、魏玛共和国的代表、下层中等阶级商人以及工人而言，参加抵抗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另外，参见：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171—181，尤其是与霍亨劳厄—瓦尔登堡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会晤。

② "总的看来，德国人已经不再受到阶级意识的困扰。"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 165。

③ "Internal democratization." Fulbrook, *Divided Germany*, p. 235.

④ Ara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249—254.

在一大批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聚集的思想开放和自由的大学里，却配备着一批非常保守的教授，这一时期的许多教授都拒绝在他们的讲座上回答问题，这成了回避代际冲突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然而，这也成了德国的大学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了滋生不满的温床的唯一原因。在整个60年代，人们也可以看到，自主的年轻人文化在美国和欧洲得到迅速发展。大批怀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财富、音乐、性自由以及空前的群众性政治力量，他们发现自己已不再依附于或必须听从命运安排的那个属于他们父母的职业和社会的世界里了。除了许多地方的“暴君”乞求非难外，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也出现了“傲慢的”敌人，从而给世界各地不满的年轻人以嘲讽喊叫的机会。例如，美军在越南使用凝固汽油弹和B-52轰炸机等（当我1968年春天离开蒂宾根大学时，看到学生在学校建筑上把USA喷涂成了“U-卐-A”）。

1967年，一名警察在伊朗国王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射杀了一名学生抗议者。这一插曲由于媒体大亨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报纸将死亡责任推到了抗议者的身上而引发了更大的不满。此后，因代沟引发冲突的危险进一步上升。次年，由东德的和平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西德学生抗议者领袖的“红毛”鲁迪·杜奇克遭到右翼分子的刺杀，子弹使其身体残疾，从而进一步激起了年轻人的对抗。在这两次伤害事件后，极少数激进分子由抗议转向了恐怖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最激烈的行动组织就是“红军派”（RAF），也就是家喻户晓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这一名称是为了纪念恐怖分子的先锋人物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其中，巴德尔是一位教授之子，迈因霍夫则是位牧师的女儿、记者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他们恰巧也是一对情人。红军派在受到压制前，曾和其他相似组织一起，共杀死28人，重伤93人，绑架人质162人，还抢劫35家银行共计540万 297

马克。①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议会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冲突也不断加剧。维利·勃兰特将政治资本花在与东德关系的正常化方面，这就是新东方政策，这一外交举措受到那些期望与柏林墙那边的家人和朋友有更多接触的选民的欢迎。勃兰特在政治上对东德的主动示好不仅使两个德国走得更近，也提升了东德在欧洲和国际层面的地位，使它成为了联合国的一员和正常的欧洲国家。勃兰特的批评者则认为，新东方政策给敌人提供了帮助，对敌人有利，尤其是他们发现勃兰特身边的一位高级助手是东德间谍时，显然找到了特别中意的借口。②

另一个突出问题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它同样源于战后重建的迅速发展，当然还有柏林墙所体现出来的两个德国在地理上的分离。西德经济的繁荣创造了许多西德人不想要的低下的工作，但由于柏林墙的出现，西德所依赖的来自东德的稳定而廉价劳动力停止了供应。于是，来自于东欧和南欧地区的外籍劳工（Gastarbeiter）取而代之，这些外籍劳工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地中海地区的民众。

那些外来人口得到了战后德国人慷慨大度的全方位关照以及友善待客的情感需要，也得到了在原来国家所没有的报酬、利益和人权。来到西德的新移民人数持续增长，他们通常已经不想再回到他们原来所过的那种没有保障的生活。到1990年，这支新的劳动大军成了新统一的德国的一个问题。大约有480万外来劳工以及他们持续扩大的家庭生活在德国，其中有1/3是土耳其穆斯林。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很难融入到德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去，与此同时，他们却在德国的土地上成

---

① Ibid., pp. 536—537;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211, 282—286。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与哈贝马斯、格拉斯是左翼自由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为怜悯乌尔里克·迈因霍夫进行了辩护。Müller, *Another Country*, p. 54. 有关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的故事，见：Julian Becker, *Hitler's Children* (London, 1977)。

②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207—208;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63—69, 74—75.

功地复制着自己。[1] 2000 年，在法兰克福的人口中，土耳其穆斯林占 298 了 30%，城市里有 27 个清真寺供其朝拜。[2]

在德国历史上，归化的德国人和掠夺成性的外来者经常会融为一体，在这些现代的外籍劳工中，历史也会再次重演。然而，最近几十年来，这些从东面和南面越过边境来到德国的外籍工人，他们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而是被邀请到德国来帮助稳定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客人”，因此，他们是盟友而非外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持久性、人数的激增、非同化性等问题同样已经成为经济的负担，威胁着德国人的团结和文化认同。与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数以万计的带有经济动机的寻求避难者（Asylanten），他们利用了战后德国希望成为世界上遭受政治迫害者的避难所的忏悔需要。根据德国法律，任何外国人，只要踏上德国的土地，宣称要逃避暴政，就会接到由德国国家付费的避难听证，在过渡期内还提供食宿。苏联解体后，被邀请来到德国的其他战后移民中有东欧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在东欧面临着新的迫害。另外，还有将近 200 万德裔回到了德国。

1913 年的血缘法（国籍法）将德国的公民资格建立于血统而不是出生地之上。1990 年外侨法案则有所调整。它规定，在德国出生的居民住满 15 年且孩子也出生在德国的外国人有权申请加入德国国籍，由于审查严厉，只有 5% 的申请可以获得通过。[3] 就像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一样，近 2/3 遭否决的永久居民变成了非法移民，消失在已建立起来的外籍劳工社区之中。

根据 2000 年 1 月 1 日通过的新的法律，如今，假如一位父母拥有

---

①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273—280; Klaus J. Bade, "Exo-dus und Integration: 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und aktuelle Probleme", in Paul Bockelet, ed., *Zu Uiele Fremde in Land ? Aussiedler, Gastarbeiter, Asylanten* (Dusseldorf, 1990), pp. 9—20; also Bade, *Aus-lander Aussiedler, Asyl in Bundesrepublik Deutscbland* (Hannover 1994).

② Roger Cohen, "Germany's Financial Heart Is Open, But Wary", *NYT* on the Web, 12/30/00.

③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280—293;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230—231; *Facts About Germany*, p. 16.

8年的连续合法居住权以及至少3年的有效居住许可，那么任何在德国出生的儿童都是合法的德国公民。[1] 然而，新法律不鼓励双重国籍。在外国出生的德国人必须在23岁前选择德国或其他国籍。事实上，放弃非德国公民身份也许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申请双重国籍最迟只能到21岁。因此，在努力减少大批“归化”的德国公民方面，新的公民法优先考虑到了文化适应。倘若德国人能找到接纳这些数量巨大的公民的办法，那么德国人是否有能力养活这些人并且维持德国文化的统一性，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尚未回答的问题。

2. 东德

20世纪50年代，西德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成功超出了盟国和德国人的预料。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学生抗议者、恐怖主义以及史无前例的外来移民等问题开始威胁着德国的团结、自由和财富。赫尔穆特·科尔之所以能进行长达16年的保守统治，成为自俾斯麦以后当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这种预兆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奉行平均主义的东德通过在1946年建立的一党制统治，从一开始建立起了更具保护性的外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东德解散了5个单独的州，成为华约和经互会的成员，修建了柏林墙，并且坚持强硬路线，制定了由苏联定调、宣称民主德国是与西德平等的独立国家的宪法，这种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 尽管没有纳粹独裁，但东德一开始就是警察国家，拥有着被称为斯塔西[3]（STAatsSIcherheitspolizei 的缩写）的安全力量，其背后的支柱是苏联军队。1960年以后，东德人再也不能自由地去西德旅行，从此，他们不仅仅出于爱国主义和自由选择，而且因为受到了砖墙和子弹的阻拦——这是东德担心失去重要的劳动力以及针对西德的目的而采取的分离措施，就一

① www. Einburgerung. de.

② Fulbrook, *Two Germanies*, pp. 18—19, 28—29.

③ 东德的情报机构。——译者注

直与他们的祖国联系在一起。[1]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过了25年的集权统治后，东德开始与西德对话。在这10年中，最自由的举动是东德开始改变策略。197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承认了新教教会的独立性，允许其成为抗议和改革力量的避难场所，由此间接地走出了与西德统一的第一步。[2] 300

与上述现象相反，国家对教会承认并不等于对立双方的妥协或同化，而是源自德国历史深处的一种步骤，双方都带有冒险性和有所收获。与东德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一样，新教的神职人员也通过与国家的合作使他们的使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3] 1971年，东德主教阿尔布莱希特·舍恩赫尔在为新教教会联盟辩护时指出，东德教会已经成为国家福利体系运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更乐意“在社会主义中工作，而不是对抗或与之并列而行”[4]。因此，这种一致性达到了与国家实现互利的宗教和政治目标。这种协定并非表明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思想多元化，而是证明了自中世纪以来德国教会与国家之间那种历史性合作的压倒性力量。要努力推进宗教使命就急需政治上的支持。早在数百年前，路德就曾经说过，萨克森的统治和拯救基督徒的灵魂是各不相属的任务，但二者一样是由上天注定的。[5] 而1971年舍恩赫尔主教的看法也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关联。

教会与国家间的合作并非东德人可利用的德国历史中的唯一的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萨克森和普鲁士历史上的一些强人，诸如路德、弗里德里希大帝、俾斯麦等，也都曾受到广泛的欢迎。[6] 在

---

① 福布柯（Fulbrook）相信，力量不是万能的。“自由争论的余地、思想的自由度和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等”——后者得到了新教教会的支持和帮助——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过，她也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特征”描述成对其居民实施“有效的监禁”。Ibid., pp. 37, 40, 42—43。

② Ibid., pp. 41, 65; “the only independent social institution in the GDR outside the …system.”

③ 见：the prominent example of writer Christa Wolf in ibid., p. 68, and *Divided Nation*, pp. 293—294; 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169—170.

④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l272—273; *Two Germanies*, pp. 65, 69.

⑤ 参见第三章。

⑥ Fulbrook, *Two Germanies*, pp. 70—71.

东德人自己的历史里，他们找到了与苏联和美国模式所不同的改革自己国家的材料。两个德国都认为，苏联和美国都存在着缺陷，苏联人 301 镇压个人的自由，突出集体主义，美国人过于突出强调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社会分裂。经典的德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政治普世主义，通过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西方的新一代中得以保留，这些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鼓励德国人在欧洲和全球的视角下而非作为某一个特定国家下的公民来思考自己。这也许是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思想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尽管共产党失足于意识形态之中，但东德人对德国历史有着“更稳定、严谨和更诚实的认识”。[①]

当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通过对德国历史的挖掘来支持正在垮掉的政治制度时，许多东德人却点数着失去的自由而抓住每一次机会逃往西德，他们相信，在西德，对于个人和民族认同的回答更中肯和恰当。对于那些逃亡的人，历史讲述的就是德国男男女女的故事，他们世世代代将自己国家的意愿包含在坚强的行动之中。在这方面，20 世纪后半期的萨克森人和 16 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人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之处。而且，一项民族改革运动在寻找最有力的事实和本国的意图时，也考察了大量的不为人所知的德国历史，其中，教会和国家可以重新结盟。

与杰出的西德知识分子相比，东德人在更积极地解读历史方面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西德的知识分子解读过去仅仅是当作日后的恐怖的预言，在强权统治者的时代尤其如此。由于相信过去遭到了玷污而且也没有权威性，不少战后的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就像 19 世纪的哲人那样，不考虑政治、社会和文化。最激烈的批评是，把战后德国总理们发出的恢复常态的请求当成了俾斯麦帝国和皇帝威廉二世的德国发出的迷惑人的召唤。[②]

---

① Müller, *Another Counter*, p. 55.

② Ibid., pp. 48, 55, 137, 151. See Günther Grass below.

二、1990年德国统一

两个德国的统一以及从国外返回德国的流亡者使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在经历28年的隔绝后，分裂的家庭依然抱着重新团聚的希望。20世纪80年代，被教会煽起的稻草开始不断从东德吹向西德。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都继续宣扬超越马列主义与资本主义限制的精神自由和平等。不管是对东德人的公有理想还是对西德人的民主愿望，这种福音听上去是真诚的。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表示，在苏联集团内实行争论自由（glasnost）、放权改革（perestroika）的计划。在1987年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协议[①]里，允许东德公民在无需通常的官方折磨的情况下到西德作短暂访问，前往西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302

铁幕的第一道裂痕出现于1989年。当时，苏联听任新的匈牙利民主政府自行其是，匈牙利遂对奥地利开放了边界。很快，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也出现了渗漏。在东德，尽管柏林墙还是完整的，但小的幕布已经落下。当时的情况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接触、新的充满智慧的游说以及新论坛等，都促进着这一政治状况的转变。1989年夏天，在“我们是人民”的旗帜下，革命的抗议和游行，尤其是在莱比锡，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执著，直到被国家镇压。各种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莱比锡音乐厅管弦乐队的音乐总监库尔特·马苏尔等，成功地劝说用和谈取代了坦克。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昂纳克于10月1日辞职，最终流亡智利。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埃贡·克伦茨的新政府承认了公民随意去西德旅游的权利，甚至还承诺举行民主选举。11月9日，柏林墙打开了缺口，数以万计的人在那天往返于两边。到第二个周末时，人数已达400万。[②] 到新年来临之际，民主德国正走向崩溃，克伦茨的西德对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毕竟事情 303

---

① 1987年9月，昂纳克访问西德，签订了相关协议。——译者注

② Fulbrook, *Divided Nation*, pp. 323, 327—328, 332—333;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 425.

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科尔进行了重新定位，决定实现两德的重新统一。

德国人把科尔在 1982 年的选举称为 machtwechsel，或“权力转变”，它意味着，勃兰特和施密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 14 年的自由主义联合执政出现了转变。科尔领导下的保守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在中间自由派的自由民主党支持下，实现了长达 16 年的统治。科尔坚持了自己在竞选时所作的关于正常和稳定的承诺。然而，当柏林墙开放事件使两德统一成为可行时，他顺应了时势的压力，并且义无反顾地一直向前。他正确地解读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他们都期望能够立即得到统一。科尔一方面承诺给东德人一个美好的前景，另一方面又向西德人保证，这样做不会带来太大的痛苦。然而事实却证明，这两个许诺都是假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统一”中。[①]

在柏林墙倒塌的几个月里，科尔借助于立即实现德国统一的承诺，赢得了 1990 年 3 月的大选。相较于这种冒险，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战甚是谨慎。科尔和他的基民盟几乎立刻与东德的相应对手洛塔尔·德·马齐埃开始了重新统一的谈判。权力转变成功地变成了“转折”（die Wende)，在没有丝毫犹豫和指手画脚的盟国的情况下，两德开始了自己的统一。科尔给予东德人甜蜜的前景，承诺将首先 1:1 兑换工资和抚恤金中的 4 000 马克（此后，兑换比例将按年龄和财富进行调整）。东德人得到了口袋里的实惠和统一，然而，经济上的这一小点平等却把东德的工业企业扔进了与它们的西德对手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之中。[②]

1. 德意志人的特性

从罗马时代起，德意志人就在为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斗争。今天，当遇到一个外国人时，没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居民会更能了解或很快说出这位外国人的语言，或者说，他们不会做得有德国人那么好。

① 有关科尔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回忆，参见：“The Fall of the Wall: How Germany was United”, WSJ, 1/9/99, p. A26。

②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3, 5—7, 428—431; Fullbrooke, *Divided Nation*, pp. 339—340.

从这一行为人们也许只看出对权力的意愿。但更可能的是，它反映出一个民族奋力向前穿过他们的历史，以便向那些强大的、不信任的、危险的邻居们证明他们的能力和价值。

在罗马帝国垮台后与法兰克帝国、萨克森帝国创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文化上受到挑战的德意志人接受了发展程度更高的文化，即他们为之服务却又征服了的古希腊罗马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制度、语言、法律和习俗。[①] 德意志人一直是其他民族的谨言慎行的学生，尔今，他们要去外国度假的频率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②] 从一开始，德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就使得处于中央地带的德国人处在国际贸易和文化的十字路口上，因此这里也是一个拥有许多没有民族特性的教师的课堂。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还有后来与拿破仑的战争期间等，德国人展示了他们吸收和发展外国模式的能力。在这两次战争中，外来征服和占领使他们有理由怀疑，作为一个民族，他们能否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继续生存下去。在那两次战争以及重建期间，大批战败的德国人生活在由外国人重新构建的本土上。将他们的环境做得最好变成了德国人生存和自我发现的方式。

这里要特别好好地讲一下德国的音乐史。德国人从他们的外国师傅那里学到了音乐，他们却在这方面超越了他们的外国师傅。它开始于宗教改革时期的赞美诗。在宗教改革中，德国人将新的神学置于旧的宗教音乐和新的流行音乐之中，开创了内容丰富的音乐形式。[③] 在巴洛克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德国音乐家对具有其他民族特性的曲调和歌曲进行了改进。巴赫和亨德尔还有奥地利的同行海顿、莫扎特等，对意大利的歌剧进行了模仿，其中巴赫在法国老师那里发现了其他的样式，而亨德尔吸纳了英国的宗教清唱剧，其中有些音乐还赞美了古

305

① 参见第一章。

②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 218.

③ Christopher Grown, *Singing the Gospel: Lutheran Music and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ation in Foachimsthal*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代的犹太人。[1]

如此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探究并非仅限于音乐艺术。在研究早期德国语言和神话时，雅各布和威廉·格林兄弟比较了许多非德意志人的例子。雅各布·格林曾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的学生，而萨维尼可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学家，他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研究了解德国的文化。在相似的动机下，格林兄弟考察了各国民间文学，并写信给沃尔特·司格特以及在爱尔兰、英国、挪威、丹麦、捷克、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同行们。[2] 考虑到法国占领的后果，许多德国人担心，他们将见证自己文化的终结，正因为如此，他们从萨维尼和格林兄弟的研究中消除了疑虑，得到了鼓舞。[3]

到了 19 世纪，瓦格纳在他 30 岁时就成了德累斯顿歌剧院的总监，另外他还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他很自豪地将 1848 年革命的失败展示到了他的音乐指挥棒上。在他所希望的政治高度无法达到时，民主的失败唤醒了他，使之沉浸在浪漫的音乐反动之中，他期望在内心世界寻找政治无法达到的高度。通过这种方式，他比其他任何 19 世纪的音乐家都更有力地反映出新的批判文化，这种新的批判文化指出了通向 20 世纪的德国道路。另一方面，他害怕“外国的思想作品”，无论是音乐还是非音乐作品皆在其列。他认为，这些外国思想作品会污染更为纯洁的德国人。瓦格纳是德国作曲家中最具民族性的，然而他却努力使外国有才能者变得多才多艺。

在 37 岁时，他用假名写了一篇幼稚的论文，嘲笑“音乐中的犹太人风格”。在这篇论文的原作者身份被批露后，他遭到了公众的批判甚至排斥。[4] 由此，他显然得到了一点小小的教训。32 年后，他邀请

---

① Potter,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pp. 134, 201—202, 205, 225—226.

② Kamenstsky, *the Brothers Grimm*, pp. 25—27.

③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pp. 547—550。萨维尼是当时具有巨大史学成就的众多学者之一。

④ 瓦格纳称，那篇文章“打开了整个欧洲新闻界的愤怒狂涛的闸门”。见：*My Lif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ury St. Edmunds, 1994), pp. 564—566;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pp. 837—839。

德国犹太艺术大师赫尔曼·莱维在1882年指挥其作品《帕西法尔》的首场演出，从而给这位音乐天才一次迟来的超越了新时代反犹主义的先行机会，不幸的是，这只是个例外。[①]

19世纪的德国音乐学家们顽强地在历史中追寻着“德意志人的特性”，尝试着根据大量真实材料来整理出具有种族特性的“北欧日耳曼人的音乐感受”，在不知不觉中为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面准备了道路。相关的探索集中于古代的阿拉曼人部落以及日耳曼人各部落里广泛流行的七弦琴，这是一种可以演奏多音的乐器，它包含着音乐方面的独出心裁。然而，它的结论和当时流行的种族性的心理特征分析一样，是不正确的，也是危险的。德国音乐的经典风格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派生于波希米亚音乐，它无法明确认定为出自德意志人的源流。[②]

19世纪60年代，对德国统一的渴求强化了对德国人认同的思考。例如，没有一个人能比广泛游历的19世纪的人种学家博古米尔·戈尔茨得到更大或重新找到各种各样的收获。作为世界文化的自学者，戈尔茨的写作涉及内容广泛，诸如妇女特性史、莎士比亚的天才、德国人的小酒店、埃及的小镇等。这些研究为他探索德国人的特征提供了内容和比较。他发现，德国人的这些特性不仅在外国有，而且在19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③] 于是，他得出结论，他相信，德国人是属于“普世性的民族”模式。当然，他并非仅有的这种学者。在17—19世纪期间，德国学者即便不是唯一的世界级古希腊和罗马专家，那么也属于世界级的古希腊和罗马专家之列。德国学者们也花费了很大精力去研究当代法国、英国和美国社会。[④]

在文化斗争和民族统一的10年间，戈尔茨的相关著作从德国的历史角色入手，即在欧洲作为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承载者，

---

① Potter,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p. 203; Anthony Tommasini, “A Cultural Disconnect on Wagner”, *NYT*, 8/5/01, sect. 2, p. 27.

② Potter,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pp. 134, 202, 205.

③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9, pp. 353—355.

④ James, *A German Identity*, pp. 15—24;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pp. 545—554.

307 推断了德意志人的认同。他将那些导致德意志人超越欧洲的点点滴滴联系起来，发现了一个世界主义的民族（Weltbürgerlichkeit），这一民族对自己有太多的了解，同时又知之甚少。

像人类立于其他生物之上一样，德意志人在人类种族中也有着特权，因为他集中了全世界所有人种和民族的特征、天才和品德……我们是……世界主义者，是世界历史的民族……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不能关起门来称老大，谨守本土，或像不会说话的动物那样被人驱使……我们是这样的民族，即全世界的其他民族都能在我们身上找到他们的过去和未来。

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努力勤奋，技艺娴熟，并拥有中国人那种……尊重父母、老人……和君王的美德，也像他们一样尊重知识，尊重历史。

在我们的学识和其他的努力方面，我们展示了犹太法典编撰者的那种精细、组织技能、坚韧……和坚不可摧。同样，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也存在犹太人的那种诽谤、中伤、嫉妒和争吵，然而却并不对犹太人的交际能力、热情、同情和温柔的家庭感觉存在偏见……

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印度那种分离主义、世俗的、种姓制度的精神，以及那种极端的、毫无定形的、阿拉伯人的令人着迷的神话传说，还有古印度的盘坐沉思的神秘神学。

我们期待着王朝独裁统治与民主、落后与进步、空谈与发现、文雅与质朴、平庸和出众、离心和向心、旧权威和新思想、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和谐。

如果说至今为止只有一个来自早期欧洲移民的民族已经掌握并保存着任何环境中的世界文化，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人。罗马的历史流淌在德意志人的血管里，因为他们吸收了罗马的法律和习俗，其后通过基督教而崛起为新的强权，它让德意志民族

成为一种新的客观存在……[①]

因此，德国人不能够在政治上统一自己的国家，对于民族国家概念的了解非常困难，也难以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均衡，以至于这些德国人还帮助在世界其他的部分建立国家和城市……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很容易与所有其他民族的特性形成认同，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独有的东西。[②]

308

在10年之中，当为建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家集思广益成为一种时尚时，戈尔茨已经被认为创造了“不大可能的诸种模式的最长列表”。[③] 不过，他的观点却会推动将德国人的认同从犹太—基督教、古希腊—罗马和古代中世纪的日耳曼文化的混合物中剥离出来。经典的德国二元主义出现于德国人的各种渴望和对德意志民族的讽刺的并列之中。这一民族自认为代表其他所有的民族，然而自己却无法创立一个自己的持久政治联盟。

作者所建构的德意志人既傲慢又卓越。然而，这种“普通德意志人”不是雅利安的超人。在那一时期，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哲学的虚无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反犹主义成为了一个高尚的名词，与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的强大和衰落在戈尔茨合成的德国人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对比之下，最终在左翼黑格尔派的批评[④]中具体化了的神秘超人既不向后看，也不关注两旁，而只是独自关注未来，他不愿意研究他自己曾经是什么人，也不愿意回归现在的他，而是完全把自己丢在了身后。

2. 德国的民主

在经历了20世纪的恐怖后，今天很少有人将德国人作为人性的一

---

① Goltz's term is “Organismus”.

② Bogumil Goltz, *Zur Geschichte und Charakteristik des deutschen Genius : Eine ethnographische Studie* (Berlin, 1964, pp. i-13).

③ James, A*German Identity* , pp. 12—14.

④ On the intervening work of Heinrich Heine and the Young Germans, Sheehan, *German History , 1770 —1866* , pp. 581—586

面镜子。对于许多人来说，德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和道德发展较晚但也许会长久引人关注的国度。它在政治和道德发展方面并非一个值得仿效的世界民族，而是一个世界必须经常关注的特殊群体。近来，德国人只是因不同意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产生了对美国人的疑虑的谴责，309 于是，对德国人的各种怀疑也迅速浮上了表面，而德国人则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富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以及声名在外的德国人自己一直在找寻有关落后的德国人的事例，他们还未到引人注目的时候。从 1076 年皇帝亨利四世看到德意志的诸侯和罗马天主教会分裂他的王国，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社会主义将德国置于毁灭之中。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话来说，漫长的德国历史似乎是“一个发展进程被打断的、不甚完整的、延迟的故事”。①

除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的统一带来的异常快乐外，先前有关建立统一自由德国的打算更似乎是预言，而不是起步。然而，许多历史学家抱着矛盾的心理来看待联邦德国后见之明地称作“德国民主制度的里程碑”的东西，② 就像他们也以矛盾的心理看待德国的未来前景一样。从 1989—1990 年往回看，1848—1849 年的法兰克福议会似乎在寻求一个更适合革命精英的政体，而不是从法国占领下和解放战争以后的反动复辟中恢复的分裂的国家。1871 年德国人通过普鲁士方案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统一，德国成了最强大的国家，它迫使那些较弱的国家站到了一起。1918—1919 年，魏玛共和国给予德国人真正的民主，然而，它的宪法有着致命的错误，而它的领导人也不能确保一个遭到剥夺的战败国能有一个可行的未来。③

战后的基本法也援引了德国民主制发展中的这些早期事例。民主制度由盟国军政府于 1945 年强加给了德国人，因此，德国人再一次处于盟国的庇护之下，1949 年，德国人暂时批准了这种民主制度。盟国

---

① Barraclough,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pp. 456, 461.

② 参见引言。

③ Ibid., p. 456; Evans," German Reunifi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pp. 215—216.

们给予西占区的德国人以民主，就如同苏联人在东占区实行社会主义一样。一部真正的、本民族的德国宪法还必须等到1990年两个德国统一，这也是西德在基本法里设定的追求目标。[①] 长达52年连续性的民族社会主义和东德的独裁统治，都发生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之前。一旦获得了重新统一和自由，德国人民就发挥他们的原创性，提出了民治、民生、民享的民主政府政策。因为这样一个新的统一的政府，德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政体之一。

310

在国家创立的年代里，德国民主的实验是一项不断取得进展的成果，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德国的朋友还是德国的敌人，都存在异议。德国的统一是先前已战败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强大的复兴。迄今为止，还没有泛日耳曼的空想的不祥征兆，这种泛日耳曼的空想可能会复活德国黑暗的过去。尽管有僵持不下的激烈选举以及与亲密盟友们的分歧，德国人不会突然拂袖而去或加以痛斥，而是转入了内心世界。今天的工业和经济政策都给人以适应民主规则的一切表象。[②] 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1990年以后的德国似乎正处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的唯一持久的解决其政治问题的方案的边缘，也即"一个在历史范围内的有限的民主制的德国"。[③]

由于德国的重新统一，人们已经容易忘记较早以前的德国人在自由民主制上的尝试，即不仅失败了，而且下场很悲惨。新的德国政体使人们充满了消除德国政治分裂和强人统治的历史的希望，这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最近才在很大程度由外部促进而成。当持续的旧德国和脆弱易碎的新德国继续探讨有待解决的问题时，人们只能推测其结果。如果漫长的德国历史是向导的话，那么，与今天的民主相比，德国的民主政体则可能是一种更严格的民主制。在德国人的历史长河里，他们赞赏权威和秩序，也要享有自由和平等，他们确信，最好的政体需要这两者，也要保护这两者。

---

① Facts About Germany, pp. xix, 113—114, 138.

② Evans, "German Reunification", pp. 215—218.

③ Barraclough,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p. 461.

至少自16世纪以来，表现为国家统一的集体行为能力和表现为政治要求的个人行为的权利就是德国人所关注的两件事情，前者要求自我牺牲和保持一致，而后者则允许自我主张和持有异议。历史告诉我 311 们，成熟的德国政体可能会比法国和美国的平等民主制更限制自由，值得探讨的是，平等民主已经忘记了怎样约束自由，其后果就是会失去对个人的控制。个人自由在经历了法国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和美国的杰弗逊、艾默生的演进后，已变成了关注自我的权利，威胁着公共层面的公民责任和信仰者对上帝的义务。德国人并不认为真正的自由必须不受约束，或一个人有权乱砍乱杀。新的德国民主政体可能容忍更激进的然而却是短暂的对国家的不满和抵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世界上那些较陈旧的民主体制而言，由于权威和秩序的衰落所引发的问题要比扩大自由和平等的问题更为突出。新的德国民主政体可以给自由民主制的现代病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根据德国历史，有一个问题可能会提出，人们同样不得不发出疑问，是否仅仅政体就已经是或者说能够成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万灵妙方。在19世纪德国社会的文化战争期间，这一问题由于大规模的现代人对古代人的成功反叛而被推到了前台。当一个新的帝国的德国正在严厉封杀民主的德国时，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破坏性的左翼自由主义理性文化也正在削弱着德国启蒙运动的基础，而德国的启蒙运动与法国人不同，它曾经努力坚持各种艰难赢得的从过去进入现代的道德和宗教教训。出于对于旧德国的宗教信仰的蔑视，特别是对那些通过犹太—基督教教义得到信仰的蔑视，这种左翼自由主义理性文化的代言人宣布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新时代里，个人将革新世界，从过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20世纪解放运动的炮火自那时起已经遏制了19世纪的帝国政府、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余，如今，一种强大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精神正在整个西方繁荣发展。然而，19世纪的理性和文化反叛中的激进个人主义、无神论、精英统治论和空想主义也劫后余生，进入了21世纪。这场革命的劲头至今依然强劲，就像法西斯主义的不可思 312 议的复活一样，这场革命的目标同样对持续的民主体制的维系也构成

了巨大的威胁。[1] 要对抗这两者，最好的防御方法是古老的，而且也已经得到证实，那就是：事实与证据，怀疑态度和共同观念，节制与诚实，还有谦卑与力量。

3. 令人担忧的德国人和德国人的担忧

德国重新统一刚出现在地平线上，1990 年 2 月 26 日的《时代》杂志就在封面故事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将会担心吗?" 拥有6 100 万人口的西德已是欧洲最大的国家，正与有 1 700 万人口的东德合并，还有分散在世界各地难以统计数量的德国人也会加入进来。尽管存在着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惊人的统一费用，那时的大多数评论家已经预想着一个不可抗拒的政治、经济巨人的快速出现。不过，除了以色列和波兰外，各类民意调查表明，赞成德国统一者占压倒性优势，甚至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取了大约 2 600 万生命的苏联也支持德国的统一。

《时代》周刊也注意到，值得称道的是，战后以来西德右翼政党一直处于失利状态，无法取得在联邦议会拥有席位所需要的 5% 的支持率。为此，科尔也评论说，生活在 1990 年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已不是出生在战争年代的那些人了，不能再对他们加以指责。诚如格哈德·施罗德总理所指出的，战后德国的积极行为可以进行判断，当时德国给以色列和其他犹太人的赔偿已经达 330 亿美元，这一总数到 2000 年又翻了将近一番，而且还在增加。[2]

尽管 1989—1990 年的统一给德国人带来了异常的快慰，但统一后的德国仍处在麻烦和分裂中。联邦德国的公民要共同分担 20 世纪的遗产，而这份遗产是无法从人们的脑海中完全消失的，当然也不能采用早前东德的那种合理化方式加以解决。民主德国宣布纳粹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变种，而自己的政体与之无关，因此，它完全割断了自己与第

---

① Müller, *Another Country*，第一章；参见：Blachbourn and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ory*, p. 161。

② "Anything to Fear?" *Time*, 3/26/90, pp. 32—47.

313 三帝国所犯罪行的联系。基于此，它在战后没有给以色列任何赔偿，而只是在重新统一时进行了道歉。①

除了战争和大屠杀带来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外，两个德国也把他们将近30年的对立的政治和文化带进了联合之中，这些好比是再婚时的沉重负担。柏林墙倒塌后，还有一堵所谓的墙仍保留在人们的脑海里。② 许多东德人怀念民主德国的全方位保障体系带来的安全感，特别是在工作方面的保障。而西德人不满意于为拯救这个原先的"斯塔西"国家所付出的高昂费用以及在他们的土地上重新安置许多德国人。1989年，有37万东德人迁到了联邦德国。1990—1992年间，到原联邦德国定居的人数超过了100万。比较之下，西德人到东德去的寥寥无几，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有些人去东德是要收回在战后被苏联没收的财产，另一些则是去将国有企业转变西德的市场经济。这在大多数东德人眼里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认为这是统一后的抢劫。③

在统一的兴奋消失后，两边都找到了一些对对方不满的理由。在西德人眼里，高压下的东德苏维埃国家竟然不承担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责任，而它与民主的西德相比，却与民族社会主义有着更强的政治延续性。基于自己战后的优势，西德人带着道德的优越感，开始在政治和经济自由方面教导他们的同胞。东德人把他们称为Besserwessis，这一称呼来自剧本"Besserwissers"，意即什么都知道，是自以为是、好教训人的人。④ 就东德人而言，他们相信自己是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能带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而为德国的传统感到自豪，而大多数西德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今天，那些令人讨厌的左派自由主义者正敦促两边转

---

①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 500.

② 有关这一主题的讽刺性思想，比较参见：Peter Schneider, *The German Comedy* (New York, 1991), pp. 3—19; for the scholars, Noel D. Cary, " 'Farewell Without Tears': Diplomats, Dissidents, and the Demise of East Germany [review article]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3 (2001)*: 617—651。

③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已经私营化了。Kettenacker, *Germany Since 1945*, pp. 213—214; Evans, "German Reunifi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ereading the German Past*, p. 214。

④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 9.

变对国家的认同，倡导就像欧洲人和世界公民那样，过没有历史个性特征、政治上中立的生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派的德国学术界和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对德国历史和社会的尖锐批评，继续着早先的去纳粹化和再教育的努力。在这些本民族的批评中，人们要求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的孩子们不要再紧跟德国的历史传统，而要能够寻求一种全新的开始。这一目标并没有重振和修复衰落的祖国，而是创造了一个在全世界面前尽力赎罪和表示屈服的新德国形象。将德国的过去狭隘地解释为原始法西斯主义，也不能给现代世界以启示，那么这种尝试不如说是埋葬了德国历史。 314

许多最激进的批评家成长于战争年代，有的参加过希特勒的青年团，另一些则在军队中短暂服役过。他们都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赤字"的国家里[①]，感到有义务去面对父母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正视不寻常的德国历史。在新批评家中，最有名的是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以及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君特·格拉斯。与其他有名的左派不同，许多自由主义的人物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都在政府中工作过，例如施罗德总理，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外长约施卡·费舍尔，还有前学生抗议运动领导人、早就是绿党党员的内政部长奥托·席利等。席利与彼得拉·凯利是绿党的共同创立者，还是巴德尔—迈因霍夫帮首领的辩护律师。而哈贝马斯和格拉斯则一直保持着他们年轻的理想主义，直到70岁时仍保持着对国家的批评。[②]

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赞同"制度化的爱国主义"哲学，要求绝对忠诚于总能战胜现实政治的先验的政治理想。[③] 那些拥有和实践原则性学问的人是最真的爱国者，他们将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并且为了他们的福祉而对国家的行为做出恰当的判

---

① Müller, *Another Country*, pp. 8—9, 10, 78.

② Roger Cohen, "Schröder Aide Typifies New German Subtlety",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12/29/98.

③ Müller, *Another Country*, chap. 3.

断。许多现代批评家就像16世纪路德派的传教士一样很少妥协，无论何时只要统治者侵犯了牧师或者今天的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接管统治权，他们的任务就是启发公众。这是归化的德国人的一个全新种类。他们并非那些对另外的社会、民族或凌驾于德国之上的统治者表示感激的归化者，而是自封的、优先忠诚于至高无上的道德命令的本国公民的监督者。

315

格拉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为勃兰特写过一些讲话稿。和勃兰特一样，他在1999年时因为《铁皮鼓》（*The Tin Drum*）这一作品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该作品始于40年前，猛烈揭露了纳粹的思想。格拉斯反对德国的统一，视之为一次新的Anschluss[①]。他认为，重新统一的德国将很快吞并欧洲，就像它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以后那样。出于对德国发动战争的忏悔，格拉斯期望德国放弃国家的正常理想：权力、安全和财富。最好的德国应该保持一种分裂的、分散的、不关心政治的国家，让暗淡的东德扮演与明亮的、欢乐的西德“相对照的苦难国家”的角色。[②]

从历史的角度看，格拉斯所建议的是德国最可怕的恶梦。这种内在分裂、外在怨恨的人民已经成了德国历史的包袱。把这样的命运强加给战后的德国人，既是一种道义性的问题，同时诚如可看到的那样，对德国本身和世界和平而言，也是德国曾经走过的最危险的历程。就像早些时候阿登纳政府的保守性转向一样，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长期动摇态度使得科尔成了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针对格拉斯的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法兰克福总汇报》的评论和文学编辑马塞尔·赖希、拉尼基在1995年德国的《明镜》周刊的封面上发表了不同看法，他逐字逐句批判了格拉斯对于德国统一问题

① 德语，原意为结合、合并，特别是指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译者注

② Ibid., pp. 16, 68—69.

的最新看法，即反映在对统一后的柏林的历史漫游小说中的观点。[1]

由于德国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它与欧洲和世界的合作至关重要，因此一个退缩的、自我怀疑的德国是最糟糕的方案。[2] 如今，既不是高昂的重新统一和移民带来的费用，也不是对"心中的墙"的持久性使德国人惶惶不安。德国非但没有从对欧洲和世界所承担的责任上退缩，科尔总理和施罗德总理所领导的政府还在欧洲和国际的最高的层面上接受了这些责任。[3] 施罗德政府拒绝了跟随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316 这并不是否认自己承担的责任，也非德国和美国的评论家们所迅速断言的那样，是什么模糊的新"特殊道路"。即便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或受到误导所致，施罗德政府的反对态度也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合理反应，而且它还得到了大多数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经验的德国人的支持。[4]

那么，对德国人而言，他们担心的危险在何处呢？而他们又有哪些危险性呢？当今的德国人是五位一体，其中 3 位是根深蒂固的德国人，而另外两位则有着比较新的体验。他们每一方都是从对方慢慢发展而来，如果撇开依附或效忠的因素，那么每一方都会有超越另一方的机会。这个五位一体的德国人就是在村或镇的公民中的一个最纯粹的德国人的自我写照。此外，德国人也是来自德国 16 个州之一的公民。自 1871 年起，每一个德国人也都成了统一德国的一名公民，他们由通过选举产生的跨地区的议会进行管理。而最近，德国人又开始成为了跨国性质的欧盟的一部分，超越了他们本土的城市、国家和民族

---

① *Ein Weites Feld* (1995) (English, *Too Far Afield*). James J. Sheehan, "The German Question: Günter Grass's Novel Compares the Events of 1989 With Those of 1871",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1/5/00, sect. 7, p. 20。米勒 (Müller) 形容老格拉斯是"提醒 20 世纪 60 年代反议会主义"的鼓动者，而这曾是格拉斯在年轻的时候反对的。*Another Country*, pp. 64—66, 87—88。

②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 575; Evans, "*German Reunifi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222.

③ Evans documents "a general drive for a resumption of Germany's individual status as a great power." "*Rebirth of the Right?*" in *Rereading the German Past*, p. 227.

④ 参见：敌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沃夫·斯库伯 (Wolfgang Schöuble) 的批评意见："How Germany Became Saddam's Favorite State", in WS, 9/19/02, p. A16。

认同。最后，受益于国际贸易、移民和各类通信，今天的德国人已经成了无处不在的全球公民。

因为新的欧洲人和全球公民所具有的力量和吸引力，德国人不再提出对德意志民族性的威胁问题。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突然令人难忘地出现在德国电影制作人罗兰·埃梅里希的访谈中。他在导演了美国的票房热门电影《独立日》后，在他的同胞眼中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好莱坞之王”。在工作中，他往返于洛杉矶的高技术摄影室和路德维希堡之间，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时常最渴望的事是吃到他母亲那士瓦本人风味的 Maultauschen，字面意思是“口袋”，一种装满了馅的面食。①

科尔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以再次向世界保证不必害怕德国的力量。他宣布，德国人首先认同自己是欧洲人和全球公民。然而，德国拥有一个民族国家所无法根除的历史和命运，如果它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就必须接受和承认它的光荣和耻辱。在欧洲人和全球公民的认同之下掩盖民族认同的企图，对归化的德国人而言是一种威胁，它也使德国人内部出现了掠夺成性者的幽灵。这个问题和日耳曼人的部落一样古老，在施罗德政府时期表现得要比科尔时期更为严重。②

317

欧洲和世界对德国人既有着现实方面的担心，也有着与现实不符的害怕。就现实来说，最担心的是德国有能力干扰他们重要的经济部门。1998—2000 年期间，德国的大公司收购了一批外国的大公司，如大众汽车公司收购了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德意志银行的银行家收购了纽约的信托银行，戴姆勒—奔驰吞并了克莱斯勒公司，曼内斯曼收购了英国和意大利的蜂窝手机制造商。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威胁要接管伦敦的股票交易。③

---

① *Schau ins Land 11/5* (Nashville, Tenn., 1996), pp. 23—29.

② Roger Cohen, “In Germany, Getting Together Is Hard to Do.”

③ Edmund L. Andrews, “Germany's Consensus Economy at Risk of Unraveling”, NYT, 11/26/99, C5; Michael Gove, “Don' t Let Germans Buy Our Stock Market”, *The Times* (London), 8/30/00, “Comment”, p. 16; “Berlin Lacks Old Clout to Defend Germany Inc”, WSJ, 11/24/99, p. A12.

对于德国控制欧盟的能力的担心在增加。施罗德总理在2001年计划按照德国的联邦模式加强欧盟的中央集权，这将同时加强在各国之上的欧洲议会的权威和各国的权力，这引发了英国的强烈反应和法国的愤怒声讨。德国是欧盟人口最多、最富有的成员国，也是欧盟成员国中缴纳经费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一建议引发了人们对于德国甚至更大的影响力的担忧。①

在这些担忧的背后是人们对于德国的怀疑，也即施罗德政府不是像科尔政府向世界所承诺的那样，要做欧洲人或全球公民。与施罗德的建议同时提出的还有改进欧盟的问题。施罗德曾经坚持认为，世界应承认德国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就后者而言，施罗德的意思是，德国可以根据其力量来自由地来追求其国家利益，不用考虑自私和犯错。这对于准备打消世界对德国统一的顾虑的科尔来说，是一个即便不是禁忌却也非常微妙的话题。把施罗德的目标集中起来就可以看出，在德国经历了曲折的20世纪后，新的德国爱国主义依然存在。②

除了对德国在欧洲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现实担心外，人们对德国还存着有争议的与现实不符的害怕，即德国人是天生的反犹主义者和纳粹惯犯，他们需要世界经常的监视和警惕。甚至在德国人内部出现争论时，优秀的德国人的问题就迅速被提了出来。德国曾经挑衅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历史学家由此回溯和展望，将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紧密地绑在了一起。这是最近一种似乎有失公允的评价，即它曾经是一个复合的、远非荣耀的帝国的德国。同样，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20世纪80年代也点燃了一场激烈的“历史学家的争论”，他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置于范围更大、统称为20世纪法西斯和种族屠杀的模型之内，认为德国的例子只是在规模上不同罢了。从于尔根·哈贝马斯到《纽约时报》的编辑手记，人们又重申 318

① Edmund L. Andrews, “Germany's Offer Plan to Remake EU,” *NYT*, 5/1/01, pp. A1, 3.

② Winestock, “Schröder, Sensing Opportunity”, WSJ 5/15/01, p. A23; Cohen, “In Germany, Getting Together”, *NYT*, 8/27/00, sect, 4, p. 6.

了纳粹罪行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谴责诺尔特是在美化纳粹。[1]

对复活的新纳粹主义的担心也在2000年2月得到了证实。当时，战后西欧最右翼的政党即保守的奥地利自由党赢得了大选的27%的选票，并进入了奥地利政府。欧洲和世界对此立即做出了反应，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它的一个成员强加了制裁，《纽约时报》则在5个月内围绕这一事件发表了3篇长的警惕性文章。

事态的扩大起因于一名叫做约尔格·海德尔的人领导自由党获胜。海德尔的父母是著名的纳粹分子，与希特勒一样来自同一地区。海德尔本人拒绝对战争时期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进行各种各样的谴责，并因此而名声大噪。他还坚持认为，优秀的德国人不仅曾经服务于国防军，甚至曾经服务于党卫军。一个英俊的环球旅行者在加利福尼亚和哈佛商学院焚烧了他的画像。海德尔攻击不断增长的外籍劳工流入奥地利，反对奥地利向以色列支付赔款。所有这些言论，使他获得了大量的蓝领工人和年轻人的支持。[2] 批评家们以新纳粹主义的罪名来谴责他，而新纳粹主义在奥地利是一种犯罪。然而，这些批评家们发现，他们无法赢得这场诉讼。80%的奥地利人反对欧盟的制裁，一些较小的成员国也抗议“大哥哥们”施以重压。7个月后，欧盟解除了对奥地利的制裁。[3]

319

不管当时的较量如何，海德尔事件的主要教训也许并不在于在更大的德意志世界中出现了对新纳粹主义的信任和欧盟表现出来的道德懦弱。它也许主要在于奥地利此时的厌恶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使自己的

---

① Peter Baldwin, *"The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Boston, 1990);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p. 30—31, 231—232, 248—249; Evans, "Nipperdey's Nineteenth Century Since 1945", pp. 168—169; "Ferment in the German Right", NYT editorial, 6/25/00, dismissing as "repugnant" Nolte's "arguments that the Holocaust was not unique and Germany's past not so abnormal", and denouncing the Deutschland Foundation for giving him the award.

②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奥地利犹太人中也存在。见：Roger Cohen, "Jewish Leaders Trade Barbs Over Austria's Nazi Legacy", NYT, 3/25/01, sect, 1, p. 6。

③ Roger Cohen, "A Haider in Their Future", NYT Magazine, 4/30/00, pp. 54—59, and "Even in Euroland, Money Isn' t Everything", NYT, 9/17/00, p. 4; Donald G. McNeil, Jr., "Austrian Politician Some-times Down But Never Out", NYT, 7/23/00, sect. I, p. 3.

国家政治隶属于新的布鲁塞尔集体。而后者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既可以从历史中得到预见，也可以从进化的民主政治的比较中看到。

2000 年夏天，在欧盟辩论撤销对奥地利的制裁时，施罗德总理的反应谨小慎微，然而，他却强有力地阻止了东德地区新纳粹主义暴力事件的爆发。他深入拥有大量外籍劳工和成功的极右政党的城镇，试图唤起他们真正的德国人的公民意识。在艾格森（Eggesin）和沃芬—努德（Wolfen-Nord），他告诉听众，要"更有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支持老弱群体和外国人"。他的政府随后表明了终止光头党暴力的决心，通过慷慨地给予大红包，鼓励那些自愿离开这些暴力组织的人们：每人给予 45 000 美金，其中包括现金、新的名字、工作、重新定居和劝告等。①

自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一直用所显示出的善良信念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且更加努力地去创造一种更大的欧洲人的认同感，以改变自我的德国人。虽然德国财长不断重申共同货币会给德国人的生活带来威胁，但欧元还是取代了强大而受宠的马克。② 虽然今天的德国人在欧盟范围内拥有最大的力量，但联邦德国的行为无法让人对德国人的动机产生疑虑，即德国人想成为欧盟范围内的积极伙伴，而不是凌驾于欧盟之上的指手画脚者。③ 德国还以所谓的"大规模赎罪"为名，继续向以色列支付赔偿。④ 在勃兰特访问华沙犹太人纪念碑以及施罗德到新的柏林犹太人纪念馆期间，德国政府都确确实实地以下跪来树立起一个值得同情的民族形象。联邦德国前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

320

① Reported, disapprovingly, in a WSJ editorial: "Buying Off Neo-Nazis", 4/24/01, p. A24.

② 德国前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在创立欧元方面起过关键性作用，他直到 2001 年夏天仍然收到死亡威胁。C. Rohwedder and T. T. Th. Sims, "Don' t Expect Germans to Offer Up Any Euro Paeans", WSJ, 8/14/01, p. A II; Neal Boudette, "it Takes More Than the Euro to Unite Europe", WSJ, 12/31/01, p. A4。

③ "民主已经如此深入人心，并且今天受到了宪法的很好保护，以至于任何试图重返极权主义政体的企图都是难以想象的。"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500, 505, 512。

④ Ibid., p. 499.

克也敦促战后出生的人们要接受对于大屠杀的集体责任，并且铭记在心。[①]

如今，德国人对他们周围的世界也有着现实的担忧和与现实不符的害怕，这表现在他们的署名方式上。一个封面的图画能表达千言万语。德国杂志 Wirtschaft Woche，即《商业周刊》，曾在 1999 年 11 月 22 日杂志的封面上重构了一幅诺曼底登陆的图片，描绘了外国男女商人冲向岸边的情景，图片上方是醒目的标题：入侵！对共识社会的进攻。在这里，新的德国掠夺者，即全球化的经济，威胁着要分裂和战胜由政府、银行、工业和一直维持现代德国的劳工等整合起来的虚拟网络。

编辑们还想到了两个最近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经济崩溃，迫使政府挽救德国的领军型建筑公司，即有 150 年历史的飞利浦·霍尔茨曼股份公司（Philip Holzmann A. G.）。第二个例子是一个悬而未决且火药味浓厚的投标，即英国的沃达丰移动通信公司（Vodafone Air Touch）想要控制德国通信业巨头曼内斯曼股份公司（Mannesmann A. G.）的股权。霍尔茨曼公司是一个管理不当且具有高额借贷的公司，德国的各家银行早先就已经抛弃了它，现在将它丢给了市场。当施罗德政府最后对其进行挽救时，整个德国都出现了“共识社会”破裂的声音，激起一位德国评论员一再对“我们自己中间的蛮族”进行抱怨。[②] 而当德国政府在媒体巨头基尔希集团破产问题上无法整合德国人的各种利益时，对德国人精心整合的经济的另一次震撼又出现了。基尔希集团可能落到外国集团的手中，是德国文化的进一步粗化的

---

① Steven Erlanger, "A Memory-Strewn Celebration of Germany's Jews", NYT, 11/10/01, p. AI

② Edmund L. Andrews, "Germany's Consensus Economy at Risk of Unraveling", NYT, 11/26/99, p. CI; david Wessel, Charles Rhoads, and William Boston, "Berlin Lacks Old clout to Defend Germany, Inc." WSJ, 11/24/99, p. AI. The reference to "barbarians" was by Andreas Molitor in the newspaper *Die Zeit*, cited by Andrews.

征兆。①

对于德国人来说，美国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怕的 321 妖怪。一方面，德国人热爱美国的自由和财富，但是他们却不喜欢“昼夜不停地营业的精神、开放型市场的噪杂声、CEO 的薪金和工人工资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放纵的移民政策”。② 然而，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这些明显的美国缺点，尤其是后者，似乎正在以无法抵挡的姿态进入德国。

4. *矿山的金丝雀*

德国漫长的历史给它的未来之路提供了什么启示？今天的观察家们仔细查看着德国人对于持续增长的外籍劳工数量和经常不顾后果的全球化经济的反应。人们也关注着德国人对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国人特别是犹太裔美国人的不满，以及始终把第三帝国和大屠杀置于德国历史的最突出位置的努力的愤怒。③ 德国内部左派自由主义的批评来自于对德国的历史蔑视、对德国民主制度的怀疑以及对未来前景的警示等。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经历了持续的空前赔款，成立了反应敏捷的民主政府，形成了欧洲和国际社会范围内的堪称典范的行政机构，然而，在许多不愿谅解的人的脑海中，德国人仍然是潜在的蛮族、反犹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分子。④

最近，德国在另一个纳粹犯罪的领域展开了的新赔偿，即针对在战争期间德国商业中使用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奴隶劳工。1999 年 12

---

① Matthew Karnitschnig, “why Kirch Group of Germany Failed to spark a Rescue”, WSJ, 4//11/02, pp. AI, II; M. Karnitschnig and Hans-Peter Siebenhaar, “Bertelsmann Mulls Stake in KirchPay TV Arm”, WSJ, 4/18/02, p. A9.

② “U. S. vs. Them: American Economy Offers a Model others Both Envy and Fear”, ASJ, 1/18/01, p. AI.

③ 罗杰·科恩所说的“德国回忆的‘美国化’，就是定格于大屠杀，它……摒弃了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命题，是对 12 年纳粹主义的过度简单化”。Roger Cohen, “The Germans want Their History Back”, NYT, 9/12/99, sect. 4, p. 4。

④ Evans, “Anti-Semitism: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 Longest Hatred’ ”, in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pp. 149—151; 另见：Fritz Stern, “The Goldhagen Controversy: 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theory?” *Foreign Affaires* (Nov /. Dec. 1996), pp. 128—138; J. Hoberman, “When the Nazis Became Nudniks,” NYT, 4/15 /01, sec. 2, p. 13.

月，德国政府同意支付52亿美元去解决针对德国三大跨国公司（西门子、戴姆勒—克莱斯勒和巴斯夫）的控诉，由政府和公司平摊这笔费用。2000年5月，在国际社会持续的法律压力下，奥地利政府设立了3.95亿美元的基金来赔付受到的与德国相似的控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新的赔款的负担都落到了工人和股票持有者身上，落到了国内外那些没有生活在那个犯罪的年代的人或因年纪太小而没有犯罪者 322 的身上。[①] 最近，相关的诉讼案件已经纷纷针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跨国公司（通用电气、大通曼哈顿银行即JP摩根大通银行，以及IBM等），指控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的共犯行为或不作为。例如，这些控告案件包括IBM出售了用来管理集中营的计算器，还有美国和英国军方高层没有能够炸毁通往死亡集中营的铁路等。[②]

这种尝试性的敲诈遭到了非犹太人批评家以及犹太人批评家们的严厉谴责。然而，被控告的公司还是选择了赔付，而不是选择面对可能会发生的铺天盖地的负面宣传和正当的诉讼。[③] 诚如美国记者霍尔曼·詹金斯所指出的那样，相关的要求得到了赔付，它是出于“遵从一种政治的共识，即弥补纳粹所犯的罪行是必要的，它将使世界能够安心地接纳德国的力量”。[④] 因此，在大半个世纪后，大多数的实际罪犯也已死去了好久的情况下，那些压根就没有参与的政府和新生代们却还过着罪犯的生活，出于对正常的德意志国家的渴望，被迫当着替

---

① Holman W. Jenkins, Jr., “Nazi slavery and the Politics of Business”, WSJ, 12/29/99, p. A15; “Means of Atonement”, WSJ editorial, 5/22/00, p. A38.

② Barnaby J. Feder, “Lawsuit Says I. B. M. Aided the Nazis in Technology”, NYT, 2/11/01, sec. 1, p. 47; 见: Edwin Black, *IBM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1)。

③ “Lawyers [who] know how to milk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y] naming ‘villains’ and shuffling eye-popping sums around.” Gabriel Schoenfeld, “The new Holocaust Profiteers”, WSJ, 4/11/01, p. A18

④ Jenkins, “Nazi Slavery and the Politics of Business”, p. A15. 参见: Norman G. Finkelstein, *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New York, 2000), 第二章: “Hoaxers, Hucksters, and History.” On the controversy within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参见: Seth Lipsky, “The Strange Politics of Holocaust Restitution”, WSJ, 9/13/00, p. A26。

罪羊。[1]

今天，金丝雀正在德国的矿区欢唱，告诉所有的来者，矿山通常是安全的。然而。有一种发展趋势可能会终止这种歌唱，那就是战后的批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逐步升级的那种批评。这种批评坚持把民族社会主义、大屠杀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战争罪行和赔偿等作为德国历史的支撑点。倘若德国人可以成为文学和哲学的乌托邦所要求的那种不断忏悔的群体，那么就像“Fundi”绿党[2]想做的那样，德国人可以或者应当过着无技术的、田园牧歌式民族的生活。[3] 在历史上，德国人也一直笼罩在成为其他国家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阴影之中，而现今和将来的德国无辜新生代既不应该也不能在被转嫁的罪行和忏悔的奴隶状态之下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不管怎样，如果德国人普遍认同这样一种看法，而且新生代的德国人期望建立一个首先有别于阴影笼罩的历史的民主共和国，那么给德国人和整个世纪所带来的痛苦和磨难也许就会成为过去。正常的国家状态就是德国对未来的最好期望。 323

如果德国人吸取了浮士德的教训，把矿井填埋起来，金丝雀也可能会继续响亮地歌唱。在歌德的这一著名故事中，浮士德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结果给他带来的是个人的悲剧和一无所有。可是，在后来的生活中，他接受了人类的限度，并因此而在慷慨的选择中、在为自己也不认识的邻居的匿名服务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4] 德国的历史，包括血腥的20世纪在内，也是这样一些情节的故事。1952年阿登纳和大卫·本一古里昂就赔偿问题达成第一次协议，此后，德国就一直默默地援助新生国家以色列，成为继美国之后以色列最可靠的贸易伙伴和最值得信赖的军事盟友，例如德国就是以色列潜艇部队的供应者。

---

① 参见：Neal E. Boundette, “Seeking reparation: A Holocaust Claim Cuts to the Heart of the New Germany”, WSJ, 3/29/02, pp. A1, 8.

② 指绿党中的生态原教旨主义派别（Fundamentalist）。——译者注

③ Ardagh,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pp. 541—542。绿党“现实派”（Realo）如约施卡·费舍尔部长等，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加入政府，以追求更好的环境而非损害乌托邦式的目标。

④ 参见第七章。

当一些德国人相信自己会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罗杰·科恩所说的"美国的'大屠杀企业'"的目标时，德国与以色列之间仍然维持着坚定的友谊。[①] 由于阿里尔·沙龙总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方面的所作所为，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不和谐的声调，尽管如此，双方都不可能再次认为对方为不合法者，更不会成为敌人。

时常出现在德国和外国报纸上的一些奇闻轶事般的证据表明了德国人个体的浮士德式的转变。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被证明有罪的红军派恐怖分子西尔克·迈尔—维特。她在1977年参与绑架和杀害了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如今，迈尔—维特女士已成为一名在科索沃的社工和外伤治疗师。2001年，在对波恩一个路德派教堂集会的演讲中，她被问到为什么她的"年轻的理想主义"使她变成了恐怖分子。她的回答是，"思想意识的幻灭"导致对德国社会的索取超过了德国社会可以做到的合理给予，使她变得愤世嫉俗，认为一切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她告诉听众："我相信，我不会再做这类事。"最后她以夸张的口吻问道："我能做其他的事吗?"[②] 像这样的先例在德国历史中不胜枚举，用马丁·路德总结社会道德观的话说，这是在社会组织上进行"织补和修补"。

324

今天的德国是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2000年时，它也是最多的移民人口安身立命之所，移民人数高达700万，而且还在增加。德国人已经注意到了移民数量的膨胀，他们已经清楚表明，他们不想如罗杰·科恩友好地指出的那样，成为"一个欧洲联盟的一个多文化的单位"，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想成为各个同等民族的结合体。[③] 在这种倾向下，德国表面的发展趋势已经引发右翼的各种抗议，也就不足为奇了。德国外长费舍尔把新纳粹的潜在力量归结为一小撮具有暴力倾

---

① Roger Cohen, "Isreal's Ties With Germany Elude U. S. Jews", NYT, 3/4/01, sect. I, pp. 1, 10.

② William Boston and Roger Thurow, "A Woman's Journey from Terrorism to Repentant Survicor", WSJ, 1/11/01, pp. A1, 8。关于路德的公民伦理问题，见第三章。

③ Roger Cohen, "Sending Kosovars Home", NYT, 11/20/00, p. A10.

向的少数派，但他也表达了自己对“消极的排外者”以及在东德又复活了的红军派的忧虑。[1]

1990—2000 年期间，“排外袭击”中被杀害者有 100 多人。不管怎样，这种有节制的法西斯主义暴力行为似乎是德国政府在冷战结束时所预期的最低限制的反应，因此，对于德国内部和外部世界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2] 另外一个有关德国的新移民的危险性的明显事实已经不是费舍尔所痛称的少数排外事件。联邦政府如实地向每位新移民支付每月 450 美元，提供食物、住宿、教育、医疗和口腔服务，直至他们找到工作为止。[3]

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德国战后福利国家对本国人非常慷慨，对外国人也是一样大方。它的基础正在过去称之为平等主义的聚集重压之下发生动摇。德国人的工资和税收即便不是世界最高的，也在最高之列。这种高工资和高税收不仅威胁到公司的生存，也威胁着对工人的保障，他们要支付总工资的 70% 给国家养老金、保险和税收。[4] 如今，令好的德国人无法释怀的不是战争罪行和负罪感，而是他们战后的慷慨大度和对公平社会的追求。德国人拒绝美国那种把他们的国家 325 撕裂为富人和穷人国度的道德基础，他们不能不考虑令他们烦恼不已的共识社会以及这一共识社会中不断受到压制的富裕。但是，如果压制富裕的状况还要继续，那么人们就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惩罚自由和理性平等，以至于纵然少者不能得到更多，似乎也要多与少差不离。这是历史提出的一个目标，完全处在德国人能力范围内。

---

① Roger Cohen, “German Official Pessimistic About Far-Right Violence”, *NYT on the Web*, 8/26/00. 有关费舍尔和激进的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的更具偏见的看法，见：“Genoa Under siege”, WSJ, editorial, 7/20/01, p. A10。

② Roger Cohen, “German Faults ‘Silence’ About Attacks on Immigrants”, NYT on the web, 8/1/00.

③ Cohen, “sending Kosovars Home”.

④ Christopher Rhoads, “Behind the Crisis in Germany, a Past That Is Crippling”, *WSJ*, 12/6/02, pp. A1, A12.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B

C

[1] 即查理大帝。——译者注

D

E

G

① 旧译“德意志邦联”。根据该组织的特点及相关章程，译为“德意志联盟”更合适。——译者注

H

① 原文如此，应为侯爵。——译者注

I

J

① 德国人称之为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译者注
② 德国人称之为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译者注

M

① 路德教在对待圣餐问题上形成的两派。——译者注

N

O

P

R

① 应为 Teutoburg forest。——译者注

U

V

Y

Z

译后记

史蒂文·奥茨门特（Steven Ozment）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德国近现代史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现在呈献于尊敬的读者面前的是其2004年出版的新作。

译者接触过不少国内外有关德国史的学术著作，也曾翻译过相关的德文和英文著作。相比较之下，奥茨门特的这部德国史新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著作并非以新颖的撰写体例取悦读者，也没有以激进偏颇的观点吸引人们的注意，更非以一手的史料拉抬身价。其突出之点在于，力求辩证地审视两千年的德意志文明，纠正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历史的全方位批判和否定，在指出德国历史阴暗面的同时，展示德国人优秀的一面，以便让人们看到一部客观公正的德国历史。

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界“把民族社会主义、大屠杀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战争罪行和赔偿作为德国历史的支撑点”，“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状况解读德国历史”，是“有缺陷的，而且也是过时的”，人们“有理由更充分和更公正地讲述德国历史”，“以更客观、更富有同情心的立场来重构德国历史”。其理由有三点：其一，“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成比例的善与恶”，而“德国历史上的文明和创造的记录要比非人道和破坏的记录更长”。其二，“知道一个故事的结

尾然后在这一个故事结局的驱使下去了解整个故事，是一回事，从头讲述这个故事则是另外一回事”。人们不能以黑暗的纳粹统治为结果去推论整个德国的历史。而战后批判史学的缺陷就在于以现在追溯过去的方式来解读历史。其三，德国不是唯一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蹒跚犹豫的国家。1919 年时，欧洲有 25 个民主国家，到 1938 年时已经倒下了 14 个。对这种历史的曲折发展，要用平常心看待。不能因为德国 20 世纪上半期的曲折历史发展而对德国历史进行“暗淡的和笼统性的批判”，应该将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阴郁的道德化史学中解救出来”，使战后的德国新生代不再长期生活在纳粹罪行的阴影之下，要让他们看到光明的未来。

作者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历史的民主化发展方向，他指出，“德国真正的政治命运是 1949 年建立的联邦德国”。但是，这种民主化发展并非基于与过去的德国历史发展相割裂之上，而是具有继承性，“至少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优秀的德国人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使德国统一和民主之火薪火相传”。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通过对德国历史的长时段性研究，明确指出了德国人在对待民主制度方面的独特认识，即兼顾权威与民主、自由与秩序两个方面，认为德国人的民主政体“是一种更严格的民主制”。“他们赞赏权威和秩序，也要享受自由和平等，他们确信，最好的政体需要这两者，也要保护这两者。”为此，作者还就美国、法国的民主政体与德国的民主政体做了比较。他指出，“成熟的德国政体可能比法国和美国的平等民主更限制自由……个人自由在经历了法国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和美国的杰佛逊、艾默生的发展后，已经变成了关注自我的权利，威胁着公共层的公民责任……而德国人并不认为真正的自由必须不受约束”。他最后得出结论：“对于世界上那些陈旧的（即美国和法国）民主体制而言，由于权威和秩序的衰落所引发的问题要比扩大自由和平等的问题更为突出。新的德国民主政体可以给自由民主制的现代病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在作者的眼里，战后建立起来的兼顾权威、秩序和民主、自由的德国民主制度要比无节制的美国式民主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一个

美国史学家能坦诚地提出这样的看法，难能可贵。

承担本书翻译工作的具体分工为：第一编：常县宾；第二编：徐继承、肖先明；第三编：肖先明；第四编：刘馗、邢来顺。邢来顺通校全稿。由于诸种原因，翻译过程中定然存在各种错误和疏漏。其一，这部译作是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在语言表达、专业知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二，翻译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令译者为难的矛盾。这是一部研究德国史的英文著作，相关的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除了约定俗成者之外，仍有许多名词的翻译让译者无所适从。例如，英语中的Germans既可译为日耳曼人也可译为德意志人，而两者既有共性又不完全等同。译者只能根据具体的时间和所涉及内容选择前者或后者。又如，英语中的人名Frederick在德文中的对应词为Friedrich，由于涉及到约定俗成，就只能按照德文发音译为“弗里德里希”。类似问题较多。其三，该著作涉及内容广泛，其中包括许多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知识，让译者有力不从心之感。其四，约稿时间较短，且译者日常教学和管理事务繁重，无法潜心其间。以上种种，必使译稿中存在诸多无法令人满意之处，在此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2009年7月于武汉